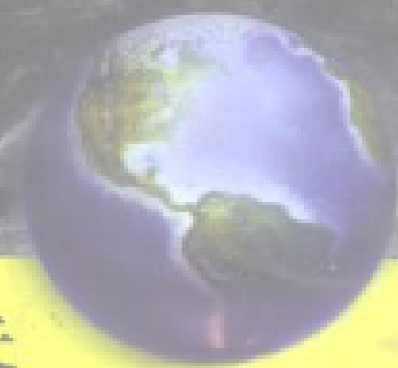


震撼世界的十年

—苏联解体与戈尔巴乔夫



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戈尔巴乔夫办公厅主任
(俄)瓦列里·博尔金 著
甄西 主译



昆仑出版社

99631

D751.25

17

D626/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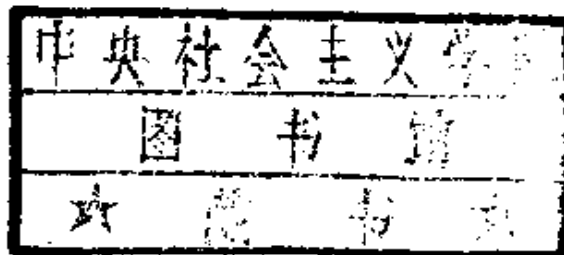
震撼世界的十年

——苏联解体与戈尔巴乔夫

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戈尔巴乔夫办公厅主任
(俄)瓦列里·博尔金 著
甄 西 主译



200053146



昆仑出版社



1986/85

震撼世界的十年

—苏联解体与戈尔巴乔夫

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戈尔巴乔夫办公厅主任
(俄) 瓦列里·博尔金 著
甄 西 主译

图字:军-1997-012号

TEN YEARS THAT
SHOOK THE WORLD

by

Valery Boldin

translated by Evelyn Rossiter

TENTATIVE PUBLICATION DATE: February 28, 1994

A division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震撼世界的十年:苏联解体与戈尔巴乔夫/(俄)博尔金
(Boldin, V.);甄西译,一北京:昆仑出版社,1998.1

ISBN 7-80040-301-7

I. 震… II. ①博… ②甄… III. ①苏联-政治事件 ②戈尔
巴乔夫-生平事迹 IV. D751.25

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

(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1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75

字数 220千字 定价:14.50元(软精)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是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戈尔巴乔夫总统办公厅主任瓦列里·博尔金，他多年担任戈尔巴乔夫的主要助理，了解苏联政权高层的大量内幕情况。他的这本书使人们得以从很近的距离观察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苏联解体的发展过程。作者叙述了前苏联最后十年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勃列日涅夫的晚年、安德罗波夫之死和契尔年科速亡、切尔诺贝利核灾难、阿富汗战争和苏联骚乱等事件。本书描写了这些事件的经过，但首先是描写了戈尔巴乔夫及其夫人赖莎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苏联解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内部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尤其是对8.19事件前夕国家领导层内的斗争内幕和整个社会问题的积重难返揭露得比较深刻，有许多情况是首次披露。作者长期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得以亲眼目睹戈尔巴乔夫的一言一行和苏联政权核心的运作情况。他是苏联反戈尔巴乔夫的8.19事件的参加者之一，因此被捕入狱，在关押和住医院治疗期间写作此书。

我们得到的是由美国埃维伦·罗西特从俄文初稿翻译成英文，由美国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昆贝塞克书屋1994年2月出版发行的英文本，本书由英文本转译。作者在书中对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性格、作风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对于

了解和研究戈尔巴乔夫本人，了解和研究苏联为什么会解体具有其它著作无法替代的资料价值和参考价值。但由于作者所处的特殊地位和本书写作的特定时期，其材料和观点均有一定的局限性，望读者在阅读时加以分析鉴别。

参加本书翻译的专家共 20 人，其中主要有王振西、穆建荣、李沁等，全文由王振西审校定稿，杜燕琼进行文字和技术校对。

作者自序

本书不仅是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遇到危机，而且是在苏联本身行将瓦解的时候写成的。多少世纪以来，我们国家从未经历过像苏联的最后18个月那样的戏剧性的变化。两次世界大战、革命、两大集团的军事和经济对抗都没有能使这个大国土崩瓦解。苏联的瓦解是由内部引起的，是党内、国内的一小撮反对派通过煽动性的口号造成的。他们口头上宣称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对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改革，增强这个国家的实力。实际上，权力斗争和个人间的恩恩怨怨使他们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将苏联引向瓦解和流血。

我觉得将这些事件公布于众是我的道义职责。我是戈尔巴乔夫圈子里为数很少的几个人之一，我们与他有着相同的性格，追随他的目标。我们为社会改革开辟道路，并亲自实施这些改革，取得了许多具体的成果。本书叙述了促使苏联瓦解的种种条件：近十年来国家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发展状况；党内危机的增长特别是领导集团内部分歧的增长情况；一些国家领导人在改革和政治权力斗争中所起的作用。

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工作期间，特别是任戈尔巴乔夫总统办公厅主任期间，我目睹了政治决策过程；国家和党的最高

权力机构的人事任免过程；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以及政治局委员和其他要员的活动情况。

本书在描写过去十年（1981—1991）来的一系列事件时，重点写了戈尔巴乔夫的活动：影响他性格、使他能出现在党的资深领导者中间以至跃上政治顶峰的各种条件和影响。由于他走上政治舞台助长了社会的变革。当他于1985年3月11日在中央全会上当选为苏共总书记时在头脑中已经产生了进行改革的思想，尽管当时还没有一个成熟的蓝图。他希望用美化的方法重新给社会主义一副更漂亮的面孔。当然，这不是改革，全世界后来都了解它是口头上的激进主义，实际上不中用。

读者从本书中将会看到改革的思想是怎样成熟的，谁是它的风源，谁建议对社会采取最激进的民主化和公开性。书中还叙述了前苏联最后几个月的发展情况，1991年8月19日事件的原因和后果。

维护“改革”目标引起了国家更严重的混乱，激起了人民中的政治动乱。政治领导没有达到既定目标，加上经常搞突然的政治变动，使国家走向分裂，促使一些原来构成超级大国的共和国分崩离析，去保护自己的人民。

像所有其它的回忆录一样，本书也不可能详述所有事件。它奉献给读者的，是想让读者知道处于政治顶峰的人们是如何看待人们记忆犹新的一些事件的。希望此书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更正确地分析发生在占地球六分之一的大地上——苏联——的悲剧的原因。

目 录

译者的话	1
作者自序	3
第一章 进入新轨道	1
离开真理报	15
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19
改革的曙光	27
勾心斗角	30
巨变前夕	34
第二章 当选苏共总书记	47
开始工作	54
个性影响	69
赖莎夫人	74
从斯塔夫罗波尔发迹	84
马克思列宁主义	88
第三章 从反酗酒开始?	92
反酗酒运动及其它政策	95

“让战斗开始吧!”	104
新闻媒体	118
第四章 出国访问	122
礼 仪	123
戈尔巴乔夫与里根	132
社会主义国家的分裂	136
第五章 公开性:转向民主化	142
谁掌舵?	150
政治阴谋的主角斗场	157
政治局:议题	161
第六章 不可对外人说	170
中央委员会的问题	175
中央全会	182
文件和群众来信	187
名目繁多的特权	189
公寓的变迁	195
如今特权更多	200
戈尔巴乔夫的工作与娱乐	203
第七章 失败的改革	208
第比利斯骚乱及其后果	218
人民代表大会与最高苏维埃	222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冲突	227

基础动摇	236
第八章 苏联解体	246
总统的办公机构	247
疑 惑	254
戈尔巴乔夫的六十寿辰	265
新奥卡廖沃的死胡同	268
第九章 执政党的分裂	279
跋 你为我们祖国都干了什么？	291

第一章 进入新轨道

铁门打开的时候，铰链发出刺耳的“嘎嘎”声，我被带进牢房，然后听到门在我身后锁上时钥匙发出的“格格”声。在暗淡的灯光中，我一下子扑到铁条床上。几分钟以后，我才看清楚周围的东西。不到两尺以外有一个洗脸池和一个抽水马桶。屋里没有窗户，只有一个带孔的铁板。环顾四周，我看清这间牢房长10英尺，宽6英尺。我坐在床上，继续打量这间新住所，这就是单身牢房了。也好，我什么人也不愿见。我的胳膊底下还夹着留给我的最后一点点私人物品。没有腰带、领带和鞋带，他们把我的钱和证件也扣下了，看来我不再需要太多东西，我躺在铁条床上，感到金属的寒气透过衣服浸入肌骨。

约5个小时以后门开了，所谓的午餐被放在洗脸池里。我没有碰那些食物。约1小时以后，我听到有人被带到了楼上。过了一会儿我也被带进另一间牢房，里面有两双眼睛好奇地盯着我。看到我的

情况，那两个人帮我在下铺铺上一个凹凸不平的垫子。我躺了下来，想睡得暖和点，却发现自己由于疼痛不适翻来覆去。更糟的日子还在后面呢，所以我得习惯这种生活。

我清楚地记得，被逮捕前那天早上我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黎明之前我就被走廊上人们压低声音的说话声惊醒。然后房门打开了，护士探进头来说：“医生来看你。”我从她脸上惊恐的表情看出有什么危险情况即将发生。来人脱下了他们的白大褂，其中一个人递给我一张由苏联总检察长尼古拉·特鲁宾签署的逮捕证。

给我看逮捕证的这个人与一个收视率颇高的电视连续剧《专家调查》中的汤敏少校长得十分相似，他也有着睿智的面孔和文雅的举止。我穿好衣服后被他们带上车，车驶向布拉戈维申斯基小街。司机们显然不太熟悉莫斯科的道路，为寻找这条街的准确地址花了很长时间。而城市的这部分路面恰巧正在翻修和铺设地下水电路，到处挖得乱七八糟。最后我们终于到了预定的街道，检察长钻进车中，我们继续向“水兵寂静”监狱4号特别隔离室驶去。

于是我就到了这儿，按照规定经过搜查，只给我剩下最基本的日用品。前几天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不断萦回在我的脑际，正是它们使我和其他人来到这个迷人的地方。

“明天下午2点，一架国防部的飞机会停在契卡洛夫机场。你必须准时到那儿。”这就是8月17日在克格勃接待大

楼里谈话的最后结果。

“你的身体行不行？能不能坐飞机？必须有人告诉总统现在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会信任你的。”

前一个星期我一直在住院，几乎每天都要打静脉点滴，觉得身体很虚弱。但是看到国家即将崩溃，我很担心，便不得不把个人的身体状况置于脑后。8月18日是空军节，我到达契卡洛夫机场的时候，那儿停了许多军用飞机和民用飞机。驾驶员们显然忙着参加庆祝节日的一些特殊活动。几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驶向一架图-154飞机。我们与机组人员打过招呼，沿着陡峭狭窄的梯子登上飞机。这架飞机没有普通飞机的那种登机梯。驾驶员帮助我们坐进舱内。奥列格·巴克拉诺夫（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奥列格·舍宁（负责组织事务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瓦连京·瓦连尼科夫（国防部副部长）和我坐在国防部长的机舱内。舱内的一侧是一个长沙发椅，另一侧是几把舒适的扶手椅，中间是一张大桌子。我们脱掉夹克衫。一些穿军装或穿便装的人员穿过宽阔的拉门走进其它的机舱。瓦连尼科夫下了起飞的命令。

发动机起动了，飞机摇晃着沿跑道滑行，我们迅速而平稳地起飞了。不一会儿，我就可以看到底下我的家乡莫斯科的树林、湖泊、蜿蜒的河流、以及一片片房屋。经过起飞时的陡直上升，我们开始平稳地爬高。地面被越来越多的团团云雾所掩盖。飞行要持续两个半小时。我开始严肃地思考这是怎么回事，我到底在干什么。我为什么会在这架飞机里？为什么必须讲明国家现在的严峻形势呢？

从1991年1月起，就不断有人讨论国家面临的困难。国家处于政治和经济危机之中。总统非常担心，他指示安全委员会的几个成员准备一份关于实施紧急状态的建议。他听了

他们的建议，却没有作出决定。他曾和德米特里·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季贾科夫、奥列格·巴克拉诺夫会谈过好几次，其中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警告他国家的经济正在滑坡，联盟本身也很可能崩溃。新的联盟条约草案忽略了民众在1991年3月17日全民公决中表达的保留联盟的愿望。离心力正在无情地扯拉着这个庞大的联盟。“法律之战”正在升级，由于各个共和国决定自己的法律凌驾于联盟的法律之上，立法方面的混乱每天都在增加。事实越来越明显：国家领导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

在军队和国防企业内，危机也在形成。如果对核武器没有严格的控制和定期的检查以及更换核弹头，一场无可挽回的灾难就可能发生。由于重视不够，一些生产核原料、制造和更换核弹头的国防企业被迫纷纷关闭，专业技术人员不断流失。一些知名的核科学家曾就核工业面临的危险向总统提出警告。编制紧缩使得越来越多的军官没有住房，也享受不到其它社会福利。国家的经济状况继续恶化。与原材料和零件供应商的联系中断了，易货贸易比比皆是。煤、石油、钢铁和其它原材料和燃料的产量和配发量都减少了。

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总统却在想别的事：他发狂似地千方百计提高自己目前非常低的支持率，准备出版自己的新书，帮助他妻子出版自传。已经有人保证为这本书立即付给赖莎一大笔现金，他们其它著作的出版工作也在进行中。赖莎的书将在苏联出版发行，她常给我打电话询问哪家出版社对她的处女作来说最适宜。

总统一家也将会面临困难时期，但他们在银行里存有硬通货。戈尔巴乔夫著作的稿酬加上联盟版权局付他的版权费，早已给他的户头输进了100多万美元。他曾接受过许多用贵

重金属制成的礼物，各种硬通货的奖励，此外，他还有其它财产。我提高了警惕，很想知道总统是否关心国家的命运，是否能腾出时间来处理国家的事务和人民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窘境。

工业部门的高级领导、工厂的厂长和苏维埃代表纷纷写信，反映困难情形，并呼吁赶紧采取措施。他们更加频繁地来找总统，经常向他反映情况。但这些努力并没有什么结果，总统总是说：“同志，你是动了脑筋的。所有合理的建议都会被接受。”

但是他的话缺乏说服力，很显然他害怕采取任何行动。他越来越愿意会见外国人，这些人赞美他并且很乐于和他一起合影。通常这就是会见的唯一结果，而没有贷款或其它形式的援助。就连他 1991 年 7 月在伦敦与七国集团的会晤，除了西方国家表达了良好的愿望以外，也是一无所获。

从 1991 年初起，总统开始为他在公众中的支持率降低而担心，与此同时，最令他伤脑筋的是叶利钦的声望日益提高。在这种情形下，他经常纠集一帮心腹，讨论他在迫在眉睫的苏联总统大选中取胜的可能性以及怎样才能提高他的支持率。

他们当中很多人都不敢担保他会取胜，但是他们都强调必须在全国恢复秩序，打击犯罪，遏制激昂的民族主义、种族骚乱和流血事件，促进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他们说最重要的是根据既定方针采取明确的行动：如果要实行市场经济，就应赶紧采取与市场经济有关的措施；如果还要保留原来的政策，也要赶紧采取相应的措施。多次讨论之后，戈尔巴乔夫似乎清醒多了，开始发布一些针对具体问题的指示。总统把一些问题交给季贾科夫、巴克拉诺夫和其他一些政府经济计

划官员和经济学家考虑，同时让总理帕夫洛夫加强反危机的措施。他们的建议经过多次会议讨论，但什么也没有改变。总统不能鼓起足够的勇气采纳在300天或500天之内恢复经济，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方案。他已经失去了意志力，不再能作任何关键的决定。他几乎没有足够的精力会见西方的政治家、写文章和准备接受采访了。

有一次，这些心腹们开会时，有人建议说，如果戈尔巴乔夫能被看作是受害者，他的支持率就会上升。这个主意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有什么大委屈，或者你是一个乞丐，或是一个孤儿，每个人都会喜欢你。”大家就这个建议进行了简短的讨论，然后似乎就被忘却了。

事情越来越明显，为挽救苏联而进行的斗争已演变成为保住戈尔巴乔夫的地位和支持率的斗争。但是由于他不能带来任何决定性的变化，就排除了任何取得积极结果的可能性。相反，他相继抛弃了一个又一个政策，但这并不是说他想要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他太缺乏勇气和力量，不敢坚持自己的主张。戈尔巴乔夫在玩一个复杂的游戏。

他对市场关系非常迟钝。在1984——1985年间，他害怕也避免谈及“市场”这个词的含义。为了给他解释清楚建立在商品和货币流通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关系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也能存在（尽管这种市场经济要受到指令性体系的限制），人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起初，戈尔巴乔夫觉得经济问题总的来说非常复杂。但是公平地说，他学习得很努力，很快就掌握了很多概念。然后他就开始使用这些概念，他用得如此频繁，以致于除了偶尔的失误以外，他成功地掩盖了自己对政治经济缺乏系统了解的大缺点。

尽管他学的是法律专业，却从没当过律师，而是一直从事党组织和农业方面的工作。在斯塔夫罗波尔工作的时候，他牢固地掌握了农业知识，并完成了在斯塔夫罗波尔农业学院的函授课程。他来到莫斯科以后，仍然从地区的狭小角度思考问题，过了一段时间才习惯于从全国角度思考问题。当安德罗波夫开始让戈尔巴乔夫积极参与政治局的工作时，他作为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开始注意更广泛的问题。即使在这时，戈尔巴乔夫也很热衷于发表文章，他极为重视语言，认为这是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每当出现了什么新的问题，即使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他也要说：“我们必须就这个问题写一篇文章或一本书。让我们坐下来搞个提案吧。”就连从福罗斯休假地回来以后，他还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在福罗斯他就已经写了一篇关于解决政变带来的问题的文章。

所有了解戈尔巴乔夫无能和犹豫品性的人都有一种失望的情绪。这个已达到崩溃和内战边缘的国家急需有人采取行动。

1991年8月为签署新的联盟条约的准备工作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尽管我在生病，还是不得不每天去检查条文排版工作。还有一些必需的用品：纸、文件、公文包、墨水和钢笔、50多根小旗杆。8月16日戈尔巴乔夫给我打电话，生气地问我加盟共和国领导在阿拉木图开会的事。我不能回答他，因为我压根儿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会。而且他可以问专门负责这些事情的助手和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他对我往他的休假地送去太多的文件十分恼火：“听着，我不是在工作，而是在休假。所以少送点，否则我就把那些没有读过的文件让人送回去。”

这可不是口头威胁。从前有一次他在别墅休息时，我送给他的一些文件他放了两个星期都没有看。这天我们比较平静地讨论了一些和国家前途有关的问题。

飞机开始降落了。已经收割过的灰黄色的土地，一些村庄和几个灰蒙蒙的工厂从我们底下飘过，一串小轿车在乡间的公路上行驶着，然后我看到了12年没见过的大海。接近机场时，起落架放下了，飞机轻微地颤动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机场上成排的重型军用飞机。我们这架图-154降落了，沿着主跑道滑行，发动机发出很响的声音。我们降落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的贝尔别克军用机场。在停机坪附近等候我们的陆、海、空军高级军官冲我们的方向微微点了一下头，然后就和瓦连尼科夫交谈起来。我们走进新建的候机楼里，这是一个优美的小型建筑，里面有一些房间，还有一个大接待厅，专门接待来度假的高级客人。

“不久前在这儿还接待过戈尔巴乔夫和其他共和国的领导人。”陪我们的官员说。

已经5点钟，可我们还没有吃午饭，要是能吃点东西就好了，因为我觉得越来越虚弱。几分钟以后我们进了接待厅，桌子上摆着午饭，有甜菜汤、肉排、土豆和煮熟的水果。我们匆匆吃完饭，都没尝出什么滋味。饭后我们走出大门，几辆黑色和灰色的伏尔加轿车将把我们带到塞瓦斯托波尔和福罗斯。

我最后一次去这两个地方是1962—1964年间。我还记得那儿的道路和山崖里战争时期挖的防空洞，里面有医疗室、商店和指挥中心。尽管太阳躲在云层后面，天气还是相当热。当大海最后跃入眼帘的时候，我很难分清天的尽头和海的尽头，

一下子觉得海天已融为一体了。约35分钟以后，我看到了海边的红色屋顶，这就是苏联总统的夏季别墅。我们向右转，离开大路进入别墅区。几个健壮的哨兵站在门口。我们驶向一座宾馆，这是一幢设计精美、结构牢固的两层楼，楼内的大厅非常宽敞，还有一个宽大的楼梯通向二层的医疗室。由于我得吃点药，便走了进去。里面空无一人。负责总统一家私人安全的尤里·普列汉诺夫去通报我们的到来。要么是没人在家，要么是主人并不急着接待我们，半个小时以后，我们才进入别墅的休息厅，在那儿等候。这座别墅里有宽敞的客厅，一个正对着海面的大房间，还有私人套房、饭厅和一个玻璃花房。所有这一切都是用最好的材料建成的。据普列汉诺夫说，共花了约8,000万卢布——这还没算上通讯设备的费用，你尽可以想象这里的豪华景象。所用的材料都是我没有见过的。有传言说，屋顶用的不是普通红瓦而是和红瓦有着相同颜色和质感的铝。最初的设计还有许多别的惊人之处，但这些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大约15分钟以后，戈尔巴乔夫出来了，他看起来焦虑不安。他的脸非常红，也许是太阳晒的，也可能是由于怒气。他匆忙地和大家握过手后，生气地问：“电话为什么被切断了？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我们来向您汇报，并说明情况。”

“是你们把电话切断的吗？”他继续问，根本没听见我们在说什么，“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边说边走进他的办公室。这间屋子又小又不舒服，有两个窗户，桌子两侧各有一个。没有地方可坐，戈尔巴乔夫自己也站着。舍宁踌躇着说道：“我们来向您汇报全国现在的局势，并说明扭转这种局面的方法。”

“你们代表谁？你们以谁的名义说话？”

舍宁吃了一惊。就在前一天，他还期待着能够进行友好的交谈，达成一致。事实上我们这次来设想的就是总统能作出决定，双方达成一致的解决办法。但是现在从一开始头绪就乱了。我站在窗户旁边听着这场谈话，突然意识到总统的举止颇有些异样，也许是他看到瓦连尼科夫在我们中间，觉得很惊讶？

“你们代表谁？你们以谁的名义说话？”他又重复道。

“我们代表全国的很大一部分领导。”舍宁说道，希望能把他的话说下去。

“精确一点，是谁？”

气氛越来越紧张。当知道在场的人中只有巴克拉诺夫是为这一行动负责的集团中的一员时，他说道：“我想听听你有什么可说的；我不想和其他人说话，因为他们什么人也代表不了。”

他又瞥了一眼普列汉诺夫说：“这没你什么事了，出去吧！”普列汉诺夫显然是因为这句话和戈尔巴乔夫说话的语气而感到受了羞辱，他出去了。

巴克拉诺夫开始说话了。但是戈尔巴乔夫又打断了他，问道：“谁派你们到这儿来的？”巴克拉诺夫列出了几个人的名字，总统一一记了下来。

“好吧，你们来告诉我什么呢？”

“我想先说说国家的形势。你知道农业和工业中都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但这并不是我们想谈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早知道这些了，而且比你知道的还多。”

他不让巴克拉诺夫说话。瓦连尼科夫插进来，用胜于雄

辩的事实讲述了国家和军队的形势，以及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整个国家和军队干部将面临的巨大困难。但他也被打断了。

总统仍以自创的策略保持着进攻的势头，近来每当他在苏共中央全会上遭受批评时，他常用这招。他总是发起猛烈而毫无意义的攻击以保护自己的位置。

这几番回合的舌战由于没有逻辑性因而毫无意义。戈尔巴乔夫心神恍惚地听着给他提出的各种行动方案。我理解他们的目的是让总统签署紧急状态令，收获庄稼，稳定经济，至少停止产量的下降。他应当指示内务部长或其他他信任的人将这些措施付诸实施。这些建议虽然都提了出来，但是由于当时的气氛充满了火药味，因而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你所提议的这一切都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解决，因此我将给你提出最佳的建议。”

他的语调突然一变，到现在我对此都不理解。接下来戈尔巴乔夫和我们进行了平静的讨论，并就如何解决提出来的问题拟定了实事求是的建议，还解释了他的政策。“好好想想吧，并且让你们的同志都知道这一点。”我们出去的时候，他依次与我们握了手。

赖莎和孩子、孙子一起坐在客厅里。

“有什么好消息吗？”她问巴克拉诺夫。

他告诉她我们是带着良好的愿望来的，一切都会好的。我们谈的全部是关于对国家局势的担忧。他还补充说作为朋友，我们祝她和全家人健康。

我们走出楼去，被这场令人沮丧的谈话弄得精疲力竭。巴克拉诺夫显然对所发生的一切感到迷惑，他说道：“他仍然固执己见，与事何补？”

普列汉诺夫又在楼里忙碌起来。我们的车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想要尽快离开这个空气高度紧张的地方。我们看起来像机器人一样，甚至都没相互看一眼，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的车经过门口健壮的卫兵，开到了公路上，有几辆车从我们身旁驶过。我觉得头脑非常混乱，回去的路似乎短了许多。

到贝尔别克机场时，飞机已经在等候我们了。我坐在候机楼旁边的凳子上，看着大家都上了飞机，高级军官告辞并离开以后，我才登上了飞机。飞机滑行了很长时间，在将要起飞时停了一下，然后沿着跑道高速前行，很快就升空了，经过最初陡直的上升后就开始稳步上升。我们底下的土地很快就被夜幕吞没了，偶尔有几点暗黄的灯光闪烁。我尽量坐得舒服一些，等待着返回莫斯科这两个半小时路程的结束。有人在说些什么，但没有人很专注地听。茶和甜点心放在了我们的面前，但我既不想吃也不想喝。

当我们在夜幕中降落在莫斯科的时候，天有点凉。我们坐进最早到的车里，根本没有注意里面原来有谁，谁和我们一起坐了进去。普列汉诺夫让司机快点，可是司机们走了不同的路线。在克拉斯诺谢尔斯卡娅附近我们的车胎瘪了，正当司机准备把备用轮胎安上去的时候，有一辆出租车来到我们身边，于是大家都坐了进去。大约 15 或 20 分钟以后，我们到了克里姆林宫。二楼政府厅一侧的走廊里站满了人，主要是负责安全的卫兵。我们从他们眼前快步走过。

我坐在房间的角落里，在微弱的灯光下看到人们坐在一张铺着绿色桌布的长会议桌旁。起初我只认出了副总统亚纳耶夫。服务员端上了茶和三明治。舍宁平静而全面地给这批比我们先到的人介绍了情况，亚纳耶夫提了几个问题，巴克拉诺夫说了几句，但没有什么实用的东西。我也没有再补充

什么。

讨论越来越激烈，然后转向下一步该做什么这个问题上。大家的意见很不一致。有人说，既然总统不同意他们的意见，那么一切还应该保持原样。立即就有人辩驳说：“你指望他会同意吗？太天真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现在，前进或后退都不太可能了。有几个人开始同时发言，大家热烈地辩论起来。从始至终一直有人在出出进进，他们还在等什么，给一些人打电话，听取他们的建议，或让他们到克里姆林宫来。

天太晚了，我觉得难受极了，便站起身来回到医院。我猜想自己长时间缺席一定在那儿引起了一片恐慌。

空军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当我在8月18日空军节这天晚上入睡的时候，还不知道他们决定要怎么做，那时我也不知道这将是最后一生中最后一个相对平静的日子。当时还有很多东西是我所不知道的：一些人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所负的重大责任，以及一些人落井下石的卑鄙行为。直到我经历过这些以后，才真正理解了人和人生。

我从来不能容忍那些善于阿谀奉承，好拍马屁的人。具有这种品性的人最容易背叛别人，甚至从背后捅上一刀。我当时能不能不去福罗斯呢？当然能。我已经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一次要打好几个小时的静脉点滴，经常感到头重、头疼和晕眩，身体非常虚弱。我当然可以拒绝参加任何行动。但是我见到的都是戈尔巴乔夫最为信任的人。他确实每当需要的时候就让我与他们会面。在这种关键时刻，我和他们的接触就更加合理了。我去福罗斯时没看到一点出现奇迹的可能，因为各个方面的形势都已经很清楚了，要拯救联盟，确实必须要改变这种局面。

星期一我一醒来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一打开电视，我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已经组成，副总统亚纳耶夫取得了控制权。播音员缓慢而悲伤地宣读着声明。亚纳耶夫已经从“生病”的总统那里接过了权力。他们本可以做得比这更好，这样的解决办法真是毫无道理。我第一个本能的反应是，赶紧去工作，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事情并不这么简单。我必须得打静脉点滴，并且还得在床上休息尽可能长的时间，我很晚才赶到办公室。街上有装甲运兵车和坦克。有人告诉我亚纳耶夫一直在找我。但是我打电话时却没人接。他的会议室里坐得满满的，人们出出进进。我悄悄地走进去，坐在屋子的角落里，他们正在讨论经济方面下一步要采取的措施。帕夫洛夫不在这儿。

给我的印象是他们似乎一夜都坐在这儿。讨论非常混乱——但后来事实证明，这并非因为缺乏睡眠的缘故。我没有等到讨论结束，就回到了办公室。每个人都很忙，因此谈话毫无意义。我召集了各部门的领导，告诉他们工作应当照常进行。

从8月19日至21日这三天，我唯一的消息来源就是医院的电视。但电视里的新闻报道很少，更多的是沉重的、哀乐似的音乐。我实在忍耐不住，就去了办公室，但在那儿也很难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没有任何消息，没人真正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把文件整理了一下，把戈尔巴乔夫签署的一个政令和几个指示发了出去，又把很早以前写的几篇文章底稿仔细阅读了一番，觉得很不满意。我把联盟条约的几个不同版本的底稿和几周以来的一些旧文件处理完之后，又回到了医院。电视里正在播送什么消息，但是杂音和干扰都很大。我预感到世界要发生变化了。当我感到稍微好了一点，就又

回到办公室，但是还是什么消息也得不到，我就又回到了医院。那天晚上局势确实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得知亚佐夫、克留奇科夫、伊万·西拉耶夫（部长会议主席）、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和伊瓦什科（苏共中央书记）和其他一些人已经飞去见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只同意会见其中的一些人，现在他即将从福罗斯返回。第二天早晨消息又中断了，电话也被切断了。我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离我进入“水兵寂静”监狱还有 24 小时和一个漫长的夏夜。

离开《真理报》

我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我的大脑极其兴奋，不断闪现那些鲜明而生动的记忆。事件的整个发展过程在我脑海里一幕幕地闪过，色彩缤纷而且内容详尽，搅得我头晕脑胀。我清楚地记得我和其他成千上万的人对社会变革所抱的希望。每个人都相信我们能拥有更美好的生活，没有种族歧视，没有民族冲突，没有流血、残忍和仇恨，没有难民和贫穷，没有国家的崩溃和军队的瓦解。

我还清楚地记得 1981 年那一天。从那天起，我和戈尔巴乔夫一起工作了 10 年。我在脑海中将那些情景回忆了一遍又一遍。当时我在《真理报》工作，所有的一切都是从我的电

话铃声开始的。《真理报》主编的助手瓦西里·波波夫告诉我他的老板想见我。我听了很吃惊，编辑部会议刚刚结束，对我分管的工作没提出什么问题，特别是阿法纳西耶夫任主编以来，通常不与人谈心。我走下四楼的时候，猜想着他究竟想要干什么。

“戈尔巴乔夫刚才来电话了，他想让我放你走，这样你就可以成为他的助手了。你认识他吗？”

我的惊讶是显而易见的：“不，我从来没见过他，对他一点儿也不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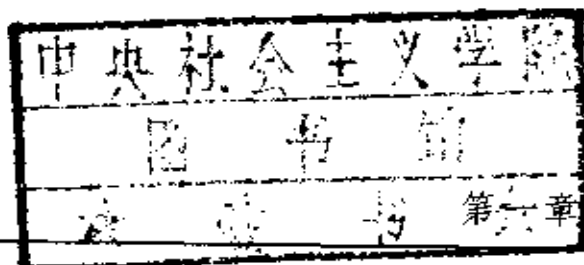
他被我的回答弄糊涂了，他疑惑不解地看着我：“好吧，没关系。”他边说边皱了皱眉头，向后甩了甩灰色的长发。他继续强调说：“我告诉他我不会放你走的。我该把谁留在这儿呢？他们经常到这儿来搜罗人。很快就没人在《真理报》工作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开始列举那些离开《真理报》到其它报纸和杂志以及党内另觅高就的记者的名字。

“记住，我不会放你走的。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要向上级打报告申诉。”

他努力地搜寻可以求助的人。米哈依尔·齐米亚宁不行，他不过是一位苏共中央书记。勃列日涅夫也不可能。我相信，他和在《真理报》工作的其他职员一样，知道总书记健康状况不佳。

我惊讶地盯着阿法纳西耶夫，仔细地回想着他说的话。我不认识戈尔巴乔夫，但我知道像他这样从边远地区上来的中央书记们，都是因为官运亨通，相处起来会令人难以忍受。而且他们中间的大多数都与腐败行为有染。他们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招待重要的来访者上，以博得其好感。我非常喜



欢《真理报》和记者这个行业，因此极不愿意离开这里，到党中央办公厅工作。而且我也清楚地知道在那儿工作并不容易，助手们被看作贱民，要干很多繁重的工作，而且还要遭受严厉的训斥。老板们把他们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动辄就要批评他们。

几天以后我应召到党中央办公大楼去见戈尔巴乔夫。我一到，就被领进了这位苏共中央书记的办公室。房间很小，天花板也很低，窗户上挂着软百叶窗。空气很不新鲜，散发着合成材料的味道。

和我打招呼的是个长像英俊的男人。他中等身材，有着一口洁白的牙齿，一双褐色的大眼睛炯炯有神，以前可能有过的满头秀发现在只剩下灰色的一圈，头顶露出几块紫色的胎记，延伸到额头和眉角。除此之外，我所记得的就是他漂亮的着装：一套由高级裁缝制作的褐色西服，里面是一件进口的肯定价格不菲的米色衬衫，打着褐色的领带，足登同色的皮鞋。他的衣服好像是昨天才做成的，还没来得及穿出褶皱。他向我走过来，伸出他柔软的手，就好像递给我什么奖品一样。

“我们是不是曾……”他开口说。但是我的回答打断了他的疑问：“没有，我们从没见过。”我们俩坐了下来，泛泛地谈了一会儿农业问题。然后，就好像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的，戈尔巴乔夫开始向我解释他期望我怎样做以及我要处理哪些问题。我不知道是阿法纳西耶夫顶不住了，最后答应放我走的呢，还是戈尔巴乔夫根本不打算征得他和我的同意。我什么也没说。不管怎么说，我得确切地知道他想要我干什么。我告诉他除了我的正常工作以外，我还在国家计划局教授高等经济课程，我很想继续干下去。此外，我的一本书正要出

版，手头还有几篇文章在写。

“太好了，”他赞同地说，“真是太好了。”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一旦在他的手下工作以后，我就不能再写作了，更不要说兼任教书的工作了。兼职在苏共中央是被严格禁止的，他们认为一个人的精力应该全部贡献给一个事业。

我没有明确地答应为他工作，无精打采地离开了他的办公室。这天晚上阿法纳西耶夫的气势大为减弱，他说他受到了压力。第二天早上，他发表了一番激昂的演说，说《真理报》已经快被抽干了，他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但是他没说他将向谁申诉。经验丰富的齐米亚宁建议他不要再抗议了（他显然曾去找过齐米亚宁），让他记住人员流动并不是单向的，苏共中央的工作人员有时也会调到《真理报》来。

我就这样结束了在《真理报》的工作，对此我一直深感后悔，并且盼望有一天能重返新闻界。在那个年代，《真理报》的自由和具有创造性的气氛对我的吸引力是其它任何诱惑都不能替代的。别的不说，自我调到苏共中央以后，单是工资就减少了50%。但这和我面临的困难重重、前途未卜的生活比起来，就实在算不了什么问题了。

但那时我还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气氛压抑，有着重重清规戒律的地方生活是如此困难。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整个社会的不满情绪日益加深，一场暴风骤雨即将来临，我将在激烈的斗争中生活，我不知道自己在这种争斗的漩涡之中能否生存下去，并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一个一个白天消逝后，接着来临的是一个一个的黑夜。正是在容易发生奇迹和罪恶的黑夜，我的脑海里常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想法。我想所有这一切都是一场梦，我很快就会在自家的床上醒来，对我所作的恶梦感到心有余悸。我甚至试着摸了摸墙壁和床头的铁栏杆。但是如同没有罪恶一样，也没有奇迹发生。我睁着眼静静地躺着，但是什么也没有看见，只有过去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眼前一幕幕地闪现。

从1981年5月开始，我要在早晨9点钟或者更早一些的时候到新单位上班。办公室在八楼，房间又小又脏，墙壁从地面到天花板都贴着一种塑料壁纸。空调放出酸臭的气体，就好像送到我们这儿的是千百人呼吸过后的废气。我违反规定开了一小扇窗户，然后开始我的书案工作。我的工作是研究农业生产，包括农业技术的细节。由于我的兴趣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因而对当年学过的农业技术方面的内容现在大部分都忘记了。

我坐在那儿，盯着面前标志有耕种各种庄稼的地区结构表，家畜饲养平衡表和其它很多东西。这些材料要是分到农业部或者是其地区分支部门会更好一些。但是苏共中央的农业部门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包括几十个农学家、动物学家、农

业化学家、果树和蔬菜专家、经济学家、工程师和其他一些专家。这些人完成了自己份内耕种和收割的工作以后，就开始告诉别人收获的技巧是什么，弄麦粥是什么样子，应该怎么吃。

部门领导是弗·阿·尔洛夫，这个人精明而有魄力，他曾经被“流放”到乌兹别克斯坦，任那儿的党委第二书记。现在作为党中央最具活力的农业部的领导，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政策。在他的领导下，这个机构控制着农业的起落，并且负责任命中央和地方所有农业部门的人员，以及各共和国农业部门的领导。

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已卷入这个庞大而臃肿的组织，沿着既定的路线走着，为了它的利益而奋斗。我就像山崩时巨大的石块中的一粒沙子，身不由己地移动，同时还想努力保留住自己的个性不被泯灭。

1981年的特大旱灾遗留的严重的后果持续了很多年，给农业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都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国库也空了。

高度紧张的气氛笼罩着政治局、苏共中央书记处和部长会议。大家积极地寻找着购买粮食的渠道。我尽职尽责地准备好了备忘录和文件资料，但是心里并没多少把握。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和戈尔巴乔夫单独接触过，更谈不上和他达成相互理解了。农业部门的工作使得他像别人一样经常考虑农业生产的细节问题，例如庄稼的种植，新的耕作方法，牲畜的饲养，饲料的准备和其它一些我认为无足轻重的问题。我觉得内心里我们都在轻蔑地注视着对方：我认为他研究一些诸如猪和鸡的饲料之类的问题太不合适，这些问题对我都是浪费时间，更别说是一个政治局委员了。他知道我的想法，对

此很不满。我也看到其它一些农业不景气的原因，包括许多高级领导对实际情况一无所知。经过与有共同看法的同事们商讨以后，我决定组织出版一系列文章，强调指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联系太少，而且我们过时的经济概念已经把农业区逼上了绝境。这些坦率有力的文章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由于对政治领导失去信任从而加剧了经济形势的恶化。国家的金融状况令人吃惊，许多工业和建筑企业都是在亏损经营。劳动纪律糟糕透顶：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不去上班。同时产品质量不断下降，从而导致人力和资源的极大浪费。农业设备运到农场的时候情形是如此之糟，以至于不经过修理就无法使用。反过来这也就表明最后收获的粮食将损失掉三分之一。

了解了国家经济缺乏活力、社会各方面都很混乱的现状后，人们的工作热情并没有提高。由于商品缺乏，再加上通货膨胀，从而导致无论是蓝领还是白领工人，花在购买生活必需品上的时间比实际工作的时间还要多。可能造成最严重后果的局面正在这个国家形成。现在要想治愈这个国家的经济痼疾，就必须采取果断的且经过详细筹划的措施。

但是现在的领导集体在行动上却显得无能为力。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伴已经越来越虚弱了。到处都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情绪。我在去全国各处旅行的过程中注意到：客人们总是受欢迎的，不管他们是谁。无论是什么客人来，主人们总是设宴款待，喝酒，忙着馈赠礼品。例如参观完一个集体农庄后，你总可以指望在车子里发现一些表达良好心意的旅行纪念品。戈尔巴乔夫就常抱怨说，接待到他管辖的地区度假的大批客人不知有多难，又得满足他们的兴致，又得为他们提供礼物。

与违法活动作斗争是很困难的。有一次我们收到了一份中央委员 P·梅杜诺夫送来的内部文件，抱怨检察部门对库班地区的居民有偏见。中央委员会讨论了这件事。我觉得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们大多数都倾向于支持梅杜诺夫，就天真地找到戈尔巴乔夫，将我所知道的有关那个地区领导间的暗中交易全部向他作了汇报。他听了我的汇报后什么也没说。他肯定早已知道了这一切，只是不愿第一个说出来。我后来得知负责调查这件事的副检察长维克托·奈焦诺夫不仅受到了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批评，而且名誉也受到了损害，不久就被解除了职务。

这件事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并很快得到证实。在很多地区和共和国都发生过此类事件，后来成为导致公众对党失去信任的原因之一。必须找到走出这种困境的出路，在工业和农业中，也需要采取新的方针和原则，注入新的活力。

1981年临近年底的一个深夜，我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一次坦率的交谈。他一边翻阅着文件，一边谈起农业和经济中的难题。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倾吐几年来一直困扰着我的问题的机会。当我谈到社会的发展需要新的思想和工作方式时，他坦率地谈了自己的意见。他建议应当选择一些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出新概念的人，并列举了一串经济学家的名字，其中很多人我都认识。我提醒他说，如果他举行此类会谈，肯定会被人发现，继而会招致反对。因为经济问题通常是其他政治局委员的领地，他们充满妒意地注视着伸向他们领地的每一个触角。后来的事实果然如此，不管怎样，与专家们的一系列会谈开始了，并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戈尔巴乔夫亲自或通过我从国家国民经济远景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劳

资委员会以及其它许多部门邀请了有名的经济学家。由戈尔巴乔夫主办的这类聚会，很快就成了习惯，后来几乎成了一种定规。很多经济研究机构的领导、院士以及知名大学的学者都出席过这类聚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会谈对戈尔巴乔夫起到了培训的作用，使他了解了目前发生的问题，并且教他学会了政治经济语言。

当时，农工联合企业的情形每况愈下，这些使戈尔巴乔夫深感忧虑。他急切地想要找到一些解决办法，至少要取得与1965年2月中央全会相当的成果。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开始酝酿一个粮食规划，并且开始为召开一次考虑全面农业政策的中央全会作准备。

来自农业部、国民经济远景计划委员会的专家和来自荣获列宁勋章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们起草了一个粮食规划草案。然后戈尔巴乔夫指示吉洪诺夫、尼科诺夫等院士们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压缩成一份篇幅较短的文件。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了这项在我看来毫无意义的工作，文件里空洞的高谈阔论为人们勾勒出物质丰富的幻影。

其实真正需要的是实施一些新的农业政策，例如免除债务，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戈尔巴乔夫极力劝说部长们，特别是财政部长瓦西里·加尔布佐夫，与其每年免除集体和国有农庄的债务，还不如把同样的金额以价格补贴的方式发给农民，这样还能促进农产品产量的提高。而大家都不能理解他的这种想法。勃列日涅夫听过这些争议后，告诉当时的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说，他不会空着手走上中央全会的讲台。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次全会很可能毫无结果。

会议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不过是把死马当成活马医罢了。

1981年大旱，为了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购买粮食，有关部门开始筹集资金，这已不是第一次了。全苏联的购买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立刻在世界上激起一股愤怒的浪潮。人们抱怨道：苏联庞大的胃口使得那些真正需要粮食的国家买不到粮食。但是不管怎么样，粮食是买了，尽管价格很高。而且参与此事的人通常还会得到很高的奖励，包括苏维埃劳动英雄的称号。那时候苏联和国外的运粮船只常常好几个月都停在那里，等着卸粮，以至于有些船里装的粮食都腐烂了，最后也没有什么可卸的了。

那些日子里人们很少想到钱的问题，各种奖励的获得者们也对失败缄口不谈。如果有人敢大胆地讲真话，就要冒着犯罪的危险。而真正负有责任的人却可以逍遥法外。1982年秋天显然粮食又是欠收，戈尔巴乔夫一边竭尽全力地号召大家抢收庄稼，一边又积极地寻找硬通货，从国外进口粮食。而与此同时他还想方设法使大家注意到他自己和他所处理的问题。他对演讲和发表文章总是有很大的热情。有一次他要求我写一本书，表明我们的粮食消费水平已经达到或正在接近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家，并且实际上我们摄入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他们，而俄罗斯在共产党执政以前的历史中，饥饿现象是司空见惯的。听到这些，我不禁疑虑重重。

的确，俄罗斯在过去的好几个世纪中都有饥荒的历史，本世纪也发生过。大地主和粮商把粮食卖给欧洲，而俄罗斯人却死于饥饿。这都是无法抹杀的事实。但是要说这种局面已经改变了，粮食规划会带来新的繁荣，至少现在看来还只是希望。至于说到英国和苏联在营养水平上的比较，还是少说为好。

但当我把这些情况告诉戈尔巴乔夫的时候，他坚持让我

着手写这本书。于是我开始搜集资料和研究文学作品，而戈尔巴乔夫给我布置的工作却越来越多，包括为各种会议准备文件。

我和他工作的时间越长，对他刻苦的工作精神和惊人的记忆力印象就越深刻：他能够记住几十甚至几百项统计数字，并能熟练地使用从专家那儿学到的各种术语。在那几年里他的成长是非常迅速的，连在最薄弱的文学方面也取得了进步。戈尔巴乔夫夫妇特别注重熟悉艺术，尤其是音乐和戏剧。在一个月里他们会安排两三次去剧院或者参观莫斯科附近的历史古迹金环线。但是看过戏剧或游览过后，戈尔巴乔夫夫妇很少抒发什么感想，也不对他们看过的演出或某个演员的表演发表什么评论。他的私人生活不为外界所知。工作、野心和对成功的渴望占据了他生活的全部。

他仍然特别注意外表，他几乎每天都换一套西服，而且精心地挑选华丽的衬衫、时髦的领带和精致的皮鞋。他对外表的关注程度常常令我吃惊。我觉得非常奇怪，像他这么一个忙人怎么能对自己大量的领带存货记得清清楚楚，并且每天都能找出与西服和衬衫相配的一条呢？在与他一起旅行时或其它各种偶然场合，我发现他总是每天现打领带，而不是像其他许多男人那样，把事先已打好的领带直接从头上一套就行了，这可能反映出他潜意识中想要弥补年轻时由于贫穷而失去的好时光。即使在经济窘迫的年轻时代，他也尽力使自己显得时髦一点儿。

早在1982年11月，苏共中央的局势就已经非常紧张了。国家的发展令人惊慌，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政治局的决定根本没有被执行，人民已经失去了信心，盼望着发生重大变革。

事情越来越明显：勃列日涅夫已不再能领导党和国家了。政治局会议上，他坐在那里，目光呆滞，看起来对他周围的一切，出席会议的人的身份，以及他们要讨论的问题都一无所知。他照着助手为他准备好的，用特殊打字机打出的特大号字体的稿子宣读。经常糊涂得把同一句话念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可怜兮兮地向周围望一眼，就好像承认自己的虚弱。为了缩短达成结论所需的时间，契尔年科会帮助他结束会议；大家都会迅速地表示同意，然后在一种惊愕的气氛中，离开会议室。

尽管有这些缺陷，勃列日涅夫在对待下属的态度上却比戈尔巴乔夫和气得多。勃列日涅夫经常和下属友好地交谈，并且看起来对他们的家庭生活颇为关心。而有一次为戈尔巴乔夫起草报告的几位同志在完成了任务以后，暗示我说，戈尔巴乔夫可能会举办一个招待会，对他们的努力表示感谢。但当我把这个建议告诉戈尔巴乔夫的时候，他却拒绝了。我建议他在几份报告上签个名，然后送给那些在这项艰巨的工作中倾注了很多心血的同志。他勉强地拿出四份，在上面划道：“送给某同志，致敬意，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

如果戈尔巴乔夫连这点起码的礼貌姿态都不做，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非常尴尬地把这些报告发了下去。当他们注意到他表达敬意的那种简短而言不由衷的方式时，觉得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他们问我是否他对报告不满意。此后，由于担心他再做出这种事来，助手们再也不让总书记在他们编写的材料上签名了。

改革的曙光

1983年安德罗波夫任总书记以后，至少从表面看起来，戈尔巴乔夫在党内的位置仍维持原状。他仍然主管农业方面的事务。但是他在决策方面真正的影响力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细心的观察者会注意到他是怎样缓慢而坚定地成为政治局里最具影响力的成员。他频繁地在电话里和私人场合与安德罗波夫交谈，以及他已在从事一些农业领域以外的工作的事实都向我表明：他正在交好运。他越来越多地参与各种经济问题，以及党组织和人事方面的决策。戈尔巴乔夫地位的上升引发了他和契尔年科之间的紧张气氛。尽管安德罗波夫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很注意安抚契尔年科，但并不喜欢他。

组织和人事方面的问题可能是安德罗波夫最不擅长的。戈尔巴乔夫也不能完全胜任这个工作，他自己不认识多少实业家和经济学家，而且给他提供建议的一些人也和他一样无知。但是由于许多问题亟待解决，而且许多岗位需要任命新人，安德罗波夫便倾向于相信和依靠戈尔巴乔夫来做这些工作。

1983年春天，他问我是否认识托木斯克州党委第一书记叶戈尔·利加乔夫。我告诉他我和这个人没有私人交情，但我在60年代初见过他，而且听到过关于他的许多事。

有一段时间这位州党委第一书记曾经在中央委员会工作，主要负责俄罗斯联邦组织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宣传

部的人认为他是一个办事果断、目光敏锐的人。利加乔夫当选托木斯克州党委第一书记后，我在那个地区的朋友告诉我说，当地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除了经济问题，他也很关心文化、教育和科学的发展。我把这些都向戈尔巴乔夫作了汇报。

“我已经认识他很长时间了，”他回答说，“1968年我们一起在捷克斯洛伐克工作过。”

那时候他经常提及一些党务工作者、经济学家、企业家和农庄负责人的名字，然后马上问我对这些人的看法，也许是为了验证自己评价的准确程度或是想得到一些新情况吧。起初我没有注意，但后来就对他的目的很清楚了。1983年4月政治局任命利加乔夫为党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位置，因为它负责管理所有的干部而且还负责任命党内和其它许多组织的干部。

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开始联手给党组织注入新的活力，他们向安德罗波夫推荐各个岗位的候选人。在给党组织的重要位置物色人选时，尽管有足够多的可靠的专家可供选择，但是戈尔巴乔夫却总是说没什么可挑的人。他们很少注意到党组织中间梯队的人选，其结果是，与州党委、市党委和区党委的第一书记比起来，其二把手的领导能力要差得多，而且年龄可能还要大一些。戈尔巴乔夫总喜欢说：“斯塔夫罗波尔边区的党委书记们要比其它很多边疆地区党委书记和州党委书记强得多。”因为斯塔夫罗波尔边区的各级党委书记都是他亲自挑选的。

他确实进行过许多人事变动，他曾经吹嘘说他在一年半内把所有的区党委书记都更换了一遍。他自然很信任从斯塔夫罗波尔来的人。总的来说，我遇见过的这些人都精力充沛

并且受过良好的教育。

从我开始在苏共中央与戈尔巴乔夫一起工作以后，恢复了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友谊，我们之间的友谊在他1973年出任驻加拿大大使时中断了。60年代早期我们经常合作编写关于各种问题的材料。那时他是苏共中央的宣传教导员，而我在苏共中央书记列昂尼德·伊利切夫的班子里工作。我是在《真理报》任职的时候认识伊利切夫的，他很器重雅科夫列夫，经常把最难做的工作交给他。

我是在雅科夫列夫回国休假的时候遇见他的。我们讨论了社会的种种变化，以及农业的发展。雅科夫列夫觉得加拿大的农业效率非常高，其方法很值得苏联学习，我很同意他的这个观点。他让我劝说戈尔巴乔夫亲自去那儿看看。他们两人会面后一致同意由雅科夫列夫从渥太华发一份电报邀请戈尔巴乔夫率政府代表团前去访问。电报准时发了过来。安德罗波夫尽管心存疑虑，但是在戈尔巴乔夫的压力下，还是同意让他去加拿大一趟。

加拿大之行对戈尔巴乔夫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使这位《新思维》的作者对西方国家的运作方式有了深刻得多的认识，使他了解到苏联将来发展可能采用的多种方案，并且熟悉了民主、自由和公开性等问题。后来戈尔巴乔夫告诉我说，这次旅行中雅科夫列夫向他畅谈了自己对于以后苏联和全世界发展趋势的看法，并且提出了一些改进我们这个社会的建议。

戈尔巴乔夫的加拿大之行对雅科夫列夫的命运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当时国内的头儿们似乎并不急着把他召回。最后通过向戈尔巴乔夫、契尔年科和K·M·博戈柳博夫求援，终于正式获准回到莫斯科，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

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很快就改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开始了他政治生涯中一个意气风发但同时又很不平静的阶段。

改革理论与实践的主要策划者就这样会师了。

雅科夫列夫成了我在党中央办公大楼第四层办公室的常客。我们一起为戈尔巴乔夫起草演讲稿和一些论文，也讨论其它的问题，主要是国际关系方面的。为了跟上形势的快速发展，我们经常工作到很晚。有时我半夜才回家，只在家里休息几个小时，又要去迎接第二天繁重的工作。党中央的形势日益紧张，我们的工作量也日益加大，很少有人知道，安德罗波夫已经病得很厉害了，他住院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易于疲劳，而且讲话困难。

勾心斗角

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去世以后，政治局决定在党中央的机构里保留他的助手们，为了这个目的就建立了一个特别的顾问团。但是没人向他们请教，他们几乎没什么事可做。但是由于他们对许多人任命和提升的背景都很清楚，再加上他们的独立地位，就使得这个顾问团成了一伙讨人嫌的人。

我还记得亲眼目睹到的这个顾问团即将散伙的早期迹象：戈尔巴乔夫给契尔年科打电话说，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和入葬的时候，顾问团的一个成员却在莫斯科郊外狩猎取乐。

契尔年科对戈尔巴乔夫说：“太不像话了！你起草文件把他开除了吧。怎么样？”

“太对了，”戈尔巴乔夫答道，“应该杜绝这种行为。”

把两年半前的旧事搬出来，并且以此为由惩罚一个人，这看来不太合逻辑，但是没有人对总书记的这个决定提出异议。就这样，一个曾经帮助契尔年科升上去的人就这样被开除了，不久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在其他几个人身上。于是顾问团就这样被解散了，中央委员会内再没有亲眼目睹戈尔巴乔夫和其他几位领导人是怎样青云直上的见证人了。

1984年3月，契尔年科当选为总书记。这使戈尔巴乔夫既沮丧又恐慌，他一定是希望自己能坐上这个宝座的。他年轻，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雄心勃勃。但是现在他发现自己还得老老实实地等着，为别人卖命。

而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被任命为中央第二书记的前景也变得微妙起来。契尔年科表面上已经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宣布将任命戈尔巴乔夫为书记处的书记，从而使他成为党的第二梯队的成员。但是由于政治局还没有就此作出决定，在政治局的会议室里他没有坐到总书记的右侧，面对着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而是还坐在原来的位子上，这使他大为沮丧。第二梯队成员的身份没有得到确认，又受到如此待遇，戈尔巴乔夫觉得很生气。有时在亲信面前，他无法掩饰自己的愤怒，大骂契尔年科和那帮老家伙。他经常和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促膝长谈，倾诉自己被压抑的挫折感。乌斯季诺夫鼓励他平静下来继续工作，并且许诺会跟契尔年科谈及此事。

即使这样，契尔年科对戈尔巴乔夫的态度仍很暧昧。吉洪诺夫和其他政治局成员把戈尔巴乔夫视作对他们的地位的主要威胁，他们极力反对批准对他的任命，并且想尽种种办法羞辱他。他们不能容忍安德罗波夫在位时他的青云直上。

这种局面僵持了很长时间，直到乌斯季诺夫失去了耐心，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戈尔巴乔夫应该坐到新的位子上，契尔年科似乎明白过来似的，赞成这个提议。这两个人的一唱一和，使委员们明白第二号领导人的问题已经定下来了，便纷纷鼓掌表示赞同。唯一没有改变立场的是吉洪诺夫，以后在他任部长会议主席和政治局委员期间，他一直坚决反对戈尔巴乔夫。直到18个月过后他已经退休了，他才送给戈尔巴乔夫一封表示歉意的信，但是后来他对这一举动感到后悔。

戈尔巴乔夫后来把信的内容告诉了党的其他领导。这封来自一个几乎毁灭了他的对手的表示歉意的信，令他非常高兴。

困扰了戈尔巴乔夫许久的问题顺利地解决了，他看起来非常高兴，而且开始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工作。

从此戈尔巴乔夫非常努力地工作，以显示他的能力，但是他感到契尔年科和他越来越疏远，偶尔他才会被邀请参与重要问题的决策。总书记对他根本没有信任感，而安德罗波夫在位时他对这种信任感习以为常。戈尔巴乔夫对此非常忧虑。但是尽管他作了种种努力想要改善他与总书记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似乎仍隔着一道坚冰。他与部长会议之间也不能达成相互理解。他总是谈及自己的孤独感，并且向所有信任的人保证他对契尔年科是忠心耿耿的。

不久我得知，应戈尔巴乔夫的要求，利加乔夫向契尔年科谈过，让他相信戈尔巴乔夫对他是很忠诚的。也许这番话起了作用，或许是因为别的原因，契尔年科对他的态度缓和了一点。他同戈尔巴乔夫交谈的次数多了一些。尽管有许多限制，但他总算开始实施契尔年科的计划了。有一次他对我说，前一天他见到契尔年科时告诉他说，虽然流传着一些恶

意的流言蜚语，但他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辅助契尔年科，做需要他做的一切。他又对我补充说：“你不要在党内和别人发生口角，以免成为话柄。我会为总书记做我应该做的事。”

戈尔巴乔夫觉得他的这些话能堵住那些认为他有野心的人的嘴。人们不知道他的话里真诚成分有多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也不可能对契尔年科倾注全力。这不仅是两种性格，而且是两种哲学体系之间的冲突。如果不完全遵从契尔年科的意愿将会对戈尔巴乔夫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这样将把戈尔巴乔夫对问题的理解与契尔年科的理解对立起来。

当我对戈尔巴乔夫谈到这些想法时，他习惯性地保持沉默。他经常对别人的话不作任何评论，这是他性格的一个特点。甚至他说“不”通常却表示他同意。我注意到，尽管他沉默不语，他并不是对别人的意见充耳不闻，这些意见可能在他以后的行动中被采纳，最后成为他自己思考的结果。有些想法可能要经过几年才能被他所理解，转变成他自己的结论。戈尔巴乔夫耍花招的技巧，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是看起来没有人对此特别反感，因为人们觉得在政治斗争中，这种现象是很自然的。

戈尔巴乔夫现在的工作范围比以前宽多了。除了农业外，他还要处理化工、轻工和商业方面的问题，还得召开中央书记处的会议。这也就意味着他的大部分精力花在调配工、农业党的干部上，他很想把所有新任命的人都控制在他的手下。有一次发脾气的时候，他对利加乔夫习惯于把人事问题直接交给契尔年科很不满。“他不向我请示，而是直接就去找他（契尔年科）。”他恨恨地说，“我没想到利加乔夫会这样。”

但是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尽力维持和利加乔夫的关系。

系。而与此同时，他把记得的事情都梳理了一遍，然后，机会一来，许多人事问题他立即不让利加乔夫插手了，而把这些工作交给了曾任克拉斯诺达尔边区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格奥尔吉·拉祖莫夫斯基来做，但那是后话了。从1984年中期起，戈尔巴乔夫在党中央表现得特别活跃和积极，他不仅自己努力工作，也要求别人和他一样。他千方百计地把越来越多的问题划在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做事的方式和措词总是显得那样强健而自信。

巨 变 前 夕

戈尔巴乔夫的地位仍然很不稳定，他的升起令契尔年科智囊团的成员们很惊恐，他们千方百计地贬低他在党内的作用。尽管根据党内的传统，书记处书记也兼任政治局会议的执行主席，但在契尔年科生病期间，他们不给戈尔巴乔夫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的机会。而平时政治局会议经常延期召开，只有感觉两次会议的时间间隔实在太长时，契尔年科才会在最后一刻把戈尔巴乔夫召来，让他召开一次会议。戈尔巴乔夫气愤至极，他觉得像这样既不给他足够的准备时间，又要让他召开会议，纯粹是为了让他当众出丑。当然他这种想法也是对的。但是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没有发作，最后总能成功地主持会议。

会议讨论的议事日程通常是由契尔年科的助手和内务部长博戈柳博夫拟定的，由于总书记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政治局会议的议程都很简短。一些重大的问题要不就是提出来

而不需进行讨论，要不就是压根儿不在会议议程里面。和勃列日涅夫在任时的情况一样，会议一般只持续 30 到 40 分钟，最后往往采用事先已准备好的结论而宣告会议结束。戈尔巴乔夫任主席期间，并没有改变这一惯例，但是他经常强调所提出问题的重要性和解决起来的困难性。

据说随着契尔年科身体状况的恶化，实际上得先把 he 抬进会议室，让他安坐在主席的位子上，再把所有必需的文件递给他，然后其他政治局委员才能进来。他气喘吁吁、脸色潮红、断断续续地照助手为他准备好的稿子念。会议开得越来越短。我从来没有见过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们如此恐慌，他们已经料到契尔年科不可避免的最后结果，而且意识到得推荐出候选人。他们坦率地谈论局势，对很多人来说，未来的形势很严峻。

而戈尔巴乔夫仍然努力地工作着，他准备在一个意识形态大会上发表演说。这个会议早在 1983 年 9 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就定了下来，当时安德罗波夫还活着。本来定的是契尔年科在会议上作一个报告，但是现在他的身体状况如此之差，而且他的地位也变了，成了总书记，这就排除了他作报告的可能性。戈尔巴乔夫恰好抓住了这个机会，因为大家都认为党的意识形态问题应该由第 2 号领导人来管，这个习俗是米哈依尔·苏斯洛夫创立的，以后的继任者都援引先例。这次演说将巩固戈尔巴乔夫作为党的第 2 号人物的地位，表明他有权参与制定党的政策。

戈尔巴乔夫让助手们召集了一群意识形态问题方面的专家开始起草报告。这个班子包括 N·比克宁、雅科夫列夫、瓦·梅德维杰夫、格·斯米尔诺夫、S·西托里扬和其他几个意识形态委员会的成员。1984 年秋天，在银树林的 19 号别墅

里，他们开始工作。

人们事后才意识到，这个报告的最后文本可以说包括了对社会各方面进行改革的思想基础，而这些正是1986年2月党的第27次大会要详细阐述的。我们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我们一直遵循的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缺陷。在形势发生了变化以后，我们仍然照搬30年代创立的适用于一个贫穷的国家的计划性经济。它忽视甚至阻碍了科技的进步。50年代党的20年规划错误地引导我们不断增加钢铁、水泥、煤炭、石油和无机肥料的产量。到了80年代我们既没达到也没接近在这些项目上的指标，而同时又耽误了其它领域的发展。

如果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注重同样的经济指标，苏联就可能超过它们或与它们持平了。但是，时间和科技的进步却对我们开了一个致命的玩笑。1980年我们的目标是达到某一指标，我们以为达到这一指标后我们将与美国为伍了，或我们已经非常接近它了。但问题是美国和其它一些西方国家与我们的发展方向截然不同。他们并不急着完成数量指标，而是依赖于国际劳动分工，从国外购买煤炭、石油、金属等工业产品，甚至减少本国的产量。而另一方面，他们大力发展电子、化工和宇宙航空工业，不断取得科技进步。他们就这样根据节省资源的生产原则，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把我们的努力给抵消了。

苏联在经济发展上是全线出击，而美国则是以科技的进步为龙头。最后的情况是：庞大的工业部门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我们不仅陷入了经济危机，而且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脱钩了。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发展模式是一个死胡同。就这样，苏共中央、部长会议、以及我们的计划机关、经济学家犯下了一个致命的大错。

然后就有了重建经济模式的想法，从计划型转向依靠科技进步。现在急需解决这些问题，以加快社会经济的进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上述就是报告中提出的看法之一，报告还探讨了其它纠正现有局势的可能的方案。有意思的是，那时候就提出了要积极使用市场机制，尽管当时报告撰写人对此有不同看法，并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有人详尽地给戈尔巴乔夫阐述了在社会主义制度里也存在着商品和货币关系，即使在经济危机中也不能忽视这些关系。但戈尔巴乔夫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比较谨慎。很多观念已经根深蒂固，要想推翻它们并非易事。

戈尔巴乔夫如此谨慎，显然是因为他还记得60年代中期每次提出市场机制都会引发一场动乱。他的反应是很可以理解的，人们应该想到，在他准备升任新职位的时候，他极不愿意惊动那些每次对“市场”这个词都要恶毒咒骂的人。而另一方面，他也很可能真是不理解这个问题，深信“发达的社会主义”根本不需要市场。我也不能肯定他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的确切想法，因此不敢妄加评论。我们也许可以猜测，他当时在心里考虑着许多问题，包括他自己的前途。

尽管现在报告的内容已经公开了，但是那次会议之前遇到的困难却鲜为人知。按照中央书记处的惯例，戈尔巴乔夫与契尔年科进行了一次交谈。契尔年科却连召开这样一次会议都不愿考虑，他说中央一次全会已经处理过这些问题，因此不需要再进行讨论了。但是戈尔巴乔夫早已料到他会这样，他回答说他是在执行中央全会的决定，希望总书记能在会议上作一个简短的发言。戈尔巴乔夫的话极具说服力，尤其是对付契尔年科这样的人。契尔年科在年轻的时候就不够坚定，而且不愿意拒绝别人直接向他提出的建议。

这一次他又是很快就屈服了。但是戈尔巴乔夫的问题并没有完，契尔年科显然不能自己发表讲话，他也不想向大会发去祝贺，更糟糕的是，他在助手的帮助下研究完报告以后，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报告一点也没有提他自己在1983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但是戈尔巴乔夫对此早就准备好了，他说这个报告中再提到契尔年科时，就不应该是作为以前负责党的意识形态问题的领导，而应当是现在党的总书记，他又澄清了其它几个问题。当戈尔巴乔夫真正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他经常表现得执著而咄咄逼人，有时候甚至有点粗鲁。他的话起了作用。显然会议将照常举行，戈尔巴乔夫也将发表他的演说。在此之前，他又仔细地看了契尔年科的评论，然后让我们加进一些不涉及原则问题的内容。

反复地分析了这次会议本身和它产生的结果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它在戈尔巴乔夫最后升至党的最高位置的过程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大步走向讲坛的这个人年轻、精力充沛、而且极为投入。尽管他的演讲还有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但报告本身充满了新的想法，包括了很多方面。

在场的主要是作家和其它知识分子，他们已经厌倦了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现在他们突然发现党的领导集体中还有一些新的成员，可以继续党的工作，改变全国的形势。戈尔巴乔夫的演说里有一些重要的新想法，特别是有一些新经济概念，这些以后都被不同程度地采用了。

戈尔巴乔夫的报告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有一部分人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和在报纸上竭尽全力扭曲甚至贬低报告的重要性。戈尔巴乔夫细心地把这些都记了下来，若干年后他还能列出那些对他的立场持反对态度的个人和报社。

事实上，很多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人后来发现他们的命运都决定于当时的反应如何；有一些人后来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弥补当年的过错。当然，现在这些问题已无足轻重了。

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在会议开幕之前不久去世了。失去了这个重要的保护者，戈尔巴乔夫的计划被打乱了，他突然感到自己很脆弱，对未来深感忧虑。但是，契尔年科病情的加重以及他自己在大会上的出色表现已使他成了一个不可轻视的角色。

大会结束后过了几天，戈尔巴乔夫就和雅科夫列夫一起飞到了伦敦，与玛格丽特·撒切尔举行了第一次会谈。早在这个时候，撒切尔就看出他是一个有前途的领导人，并支持他升任国家最高领导人。当然她不仅目光敏锐，而且消息灵通。

不久我就因为过量工作引发了心脏病，又一次住进了医院。这次发病的原因有戈尔巴乔夫对我的苛求，也有我自己的敬业精神。尽管我觉得很不舒服，戈尔巴乔夫仍要求我起草一份即将发表的报告，并准备其它文件。在医院住了一个月以后，我去了一个疗养院，慢慢恢复了健康。在这个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显得特别执著，他经常打电话，问我在什么时候能回去工作，并发布各种指示。而医生却不急着把我放出去。不管怎么样，我的身体这么虚弱，戈尔巴乔夫也不会觉得我有什么用。

随着全苏联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选举的临近，全国的政治局面日益活跃。这次竞选活动花去了我很多时间，因为我总是忙着写各种发言稿。虽然戈尔巴乔夫已决定在斯塔夫罗波尔竞选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席位，但他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的选举中却有一些新问题。以他第二号领导

人的资格，他应该是莫斯科的候选人，他和他的顾问们对此深感烦恼。会见莫斯科各阶层的人民是很关键的，因为这意味着这位“有前途的黑马”将受到首都人民的检阅。当然他的斯塔夫罗波尔之行也很重要。

鉴于他是党内的第二号领导，按照规定《真理报》将以大半页的篇幅刊载他的讲话，这样便有利于他提出很多肯定会为大众乐于接受的想法。他与投票人见面时的讲话稿很快就准备好了，他前往斯塔夫罗波尔的日期也定好了。

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宫廷阴谋”和内部的勾心斗角愈演愈烈。契尔年科的病情日益恶化，多数时间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随着他的精力日渐衰减，他总是感觉到一个年轻农业专家的影子隐隐闪现。对他和许多人来说，这个影子神秘甚至充满恶意。支持契尔年科的各派想用尽最后的力气阻止戈尔巴乔夫接任重病的总书记。而戈尔巴乔夫尽管在乌斯季诺夫的帮助下坐上了政治局里属于自己的位子，他还没有能搬进属于党的第二号领导人的办公室。他的对手们成功地使他还呆在第四层老办公室里。那些对党组织的程序非常熟悉的人认为这是对党中央第二书记的怠慢和侮辱。戈尔巴乔夫当然也这样想。原来戈尔巴乔夫迟迟没有搬进新办公室的官方理由是契尔年科还没有把他的东西完全搬走。现在又说，契尔年科病得这么重，没法决定哪些东西搬走，哪些东西不搬走。直到戈尔巴乔夫要启程前往斯塔夫罗波尔的前一天，突然出乎意料地获得允许可以搬到五层的新办公室里。戈尔巴乔夫立即下令开始搬东西，然后飞到斯塔夫罗波尔去了。

但是，在其它一些问题上，他还得忍受一些令他感到难堪和羞辱的决定。我们住进城市商业区二层楼的官方招待所时，戈尔巴乔夫决定再看一眼演讲稿，他紧张地一会儿插进

去几段。一会儿又删去几段，我非常害怕他弄巧成拙，甚至可能把稿子整个破坏。我总觉得最后一刻进行的修改不会有什么好处，常常会出错和引起误解。

就在我们赶着把工作完成的时候，塔斯社的代表进来告诉我们说戈尔巴乔夫的演讲稿在报纸上占的篇幅将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一样多。这个迹象很不妙，表明戈尔巴乔夫的对手现在占了上风。按照他的指示，我立即给他在莫斯科的秘书打电话，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有人阻止他们搬进新的办公室。但是秘书告诉我说，一切都好，正在把东西往新办公室里搬。

当我向戈尔巴乔夫汇报的时候，他紧张地听着，不断地插嘴说“但是”，“但是”……他总是把自己的挫折感发泄到他旁边的人身上，蓄意伤害别人的感情。根据我这些年来的观察，他在烦躁不安或者别人说的话特别有道理的时候，就会羞辱和他讲话的人。戈尔巴乔夫不喜欢提建议的人。他对自己作为领导的重要性深信不疑，他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有时听到了一个新的建议，他就会说他早就有这个想法，而且他一直在做必要的准备工作；或者把这个想法展开，解释其背后的原因，以显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其他很多人也对我说过，戈尔巴乔夫的态度使得别人很难给他提建议，也难于有效地和他合作。

1991年在新奥卡廖沃举行的联邦会议上，他的这一性格特点表现得特别明显。当时戈尔巴乔夫对手头的问题掌握得如此之差，以至于根本不能作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因此他会打断一个发言者，对他的意见表示赞同，假装那也是自己的想法。有一次叶利钦公开表示不满，措词强硬地告诉戈尔巴乔夫不要插嘴，让他说完自己的话。当然这时候戈尔巴乔

夫已不再觉得这些刺人的话是有意冒犯他了，他会沉默一会儿，睁着一双湿润的棕色大眼睛，抱歉地看着提抗议的人。不久以前戈尔巴乔夫还受到大家普遍的尊敬，现在却显得非常可怜，他继续讨好地支持别人的观点以表现自己，同时也继续丢面子。

早在1984年春天，他就常常批评给他撰写讲稿的人工作得不好，其实这些讲稿都得到过他的批准。这充分表明了他的不自信。而另一方面，他并不总是怨恨别人，他的情绪变得很快，常常把自己对别人说过的不敬之词忘得一干二净。尽管有很多困难，我仍然尽力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向他提出建议。在为他竞选苏维埃代表斯塔夫罗波尔之行作准备的时候，我和他在访问路线的选择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他想去那些最偏远僻静的村庄，看看他从没见过的小农庄；而我觉得既然农民同志已经对他很熟悉了，他应该把焦点转向大的工业企业，和那里的工人们多待一些时间，还可以去一些研究所等地方。地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弗谢沃洛德·米拉霍夫斯基已倾向于同意我的意见了，但戈尔巴乔夫仍固执己见。上路后的头两天期间，他只会见了四、五十个特意从几十里以外召来的饲养牲畜的农夫和牧羊人。直到这时他才明白自己犯了个错误，效果很明显：没什么人来看他，而且由于这些地区的偏远，报纸的报道也被延误了。他的这趟行程越来越没价值。这时他终于改变了路线，情况立即有了好转。

站在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前，想到自己的讲话将在全国播放，这使戈尔巴乔夫在发表竞选演说时有点紧张。竞选活动完了以后，我们参加了一个告别晚宴，得以轻松一下。然后我们上了飞机，盼望着能休息一下。我和负责安全的官员坐在一个舱内喝茶。对于和戈尔巴乔夫夫妇坐在一起，和他们

共进晚餐，我连一点儿愿望都没有。我不能说他们两个不好客，赖莎总是想把客人招待好，但是和她在一起很难感到放松。我也从别人那里听到过类似的评论，人们还感到戈尔巴乔夫夫妇和他们的客人之间的关系紧张而做作。就好像这对夫妇罩着一层看不见的带有敌意的面纱。

突然戈尔巴乔夫夫妇把我召进他们的舱内，他们让我坐下来，并递给我一杯茶。接下来的谈话给我留下了永远难以磨灭的恶劣印象，尽管当时我极力掩饰自己的感情。他们对我说，我做得很好，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因此他们决定继续让我做他们的助手。他们问了一些关于我个人的问题，表达了他们的赞许之意，还提出了一些建议。我只是隐约听到他们在说什么，因为我胸中有一团怒火在燃烧。机会一来，我就起身告辞了。

“倒底是怎么回事？”我思索着。我一直以为我们在为一个共同的事业而奋斗，但最后结果表明，他们只是延长了我的契约。自我开始为戈尔巴乔夫工作以来，职位的晋升就不是我工作的动力，因为我知道，表现得不好我可能丢掉这份工作，而表现得太好我就会失去自由。我想要做的就是帮助这个精力充沛的人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片属于我的祖先、家人、朋友和同志的土地永远会激发我的自豪感。我为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拥有众多的朋友而感到无比骄傲，他们不仅在莫斯科，也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等加盟共和国。我真心热爱和尊敬那些在残酷的战争岁月中和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并肩战斗，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打败了法西斯主义的少数民族同胞。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在战争岁月

中拿出面包和来自西部地区的妇女和儿童分享，并为他们提供住处，还把很多婴儿抚养长大，他们都赢得了我永远友谊。我自己也曾是一个被疏散的人员，因而我知道没有什么能磨灭人民心中对苏联各族兄弟的勇敢和无私的记忆。

我很清楚我给自己设定的艰巨任务，就是心怀这些理想，我开始为党的一位领导工作，想确保国家道德品质的优良传统和经济实力齐头并进。我的性格和信仰都使我不能容忍自己成为任何个人的私有财产，也不能接受自己的命运在一个家庭的环境中决定。如果把我的勤勉工作看作是顺从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这样做就像是先给我三年的实习期，到最后非常“仁慈”地宣布允许我继续为他们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这简直荒唐可笑到极点。我开始认真地考虑能否继续和这个如此误解我与他的合作，并把助手看作仆人的合作。为了解释他这种行为的原因，我作了一些努力，结果是我越来越觉得戈尔巴乔夫从最初普通的农业背景迅速升到权力的顶峰，已经超出他对社交风度和文化的驾驭程度，他的傲慢和对助手的蔑视态度我早已清楚，这次从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对戈尔巴乔夫进行过仔细研究的人那里得知的一切又完全证实了我的看法。

但是我心里仍然怀着对共同事业——使我们祖国更加强大——的理想，这个理想迫使人将个人恩怨置之度外，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和戈尔巴乔夫的行为，只把它看成是他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愿望。但是这道伤疤却深深留在了我的心里。

契尔年科于1985年3月10日傍晚7点20分去世了，享年74岁。因为早已从卫生部长那里了解到了有关情况，戈尔巴乔夫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有思想准备。总书记逝世的消息一传开，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苏共中央的书记们都聚集在

克里姆林宫。在只供政治局委员使用的会议室前面的一个胡桃木镶板的房间里，戈尔巴乔夫简要地向大家汇报了契尔年科的死讯及死因。在场的许多人第一次知道总书记原来病得这么重。大家对接下来的安排进行了讨论，但不很具体，戈尔巴乔夫建议大家到政治局的会议室里继续进行讨论。

那天晚上，戈尔巴乔夫又一次感受到人们对他进一步升迁所怀的潜在的、强有力的反对态度。前途尚不明朗，他却急于召开一次苏共非常中央全会。大家同意全会于次日举行。当时尽管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政治局的会议却休会了。新领导人的命运掌握在以下这些人手里：最接近党的通讯渠道和组织机构的人；能接触中央委员的人；能控制中央机构的人。那天晚上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参加全会的代表都接到了一份电报，通知他们大会将于次日下午5点举行。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开始忙碌地准备包括悼念契尔年科的各种文件，这些文件将对这次苏共中央非常全会的结果产生关键的影响。

第二天早晨戈尔巴乔夫给我打电话说：“今天下午5点将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我们需要一个简短而充实的演讲稿。开始干吧，把雅科夫列夫也叫来。”

我和雅科夫列夫坐下来开始起草的时候，就一致同意不应花太多的篇幅赞颂契尔年科的美德和功绩，而应当向前看，勾画出一个新的行动路线。最后的成稿就体现了我们这种想法。

契尔年科的死讯传开的那个晚上是应该记住的。从这天晚上起，党的高层领导发现他们一下子卷入了一场赌注极高的政治赌博，包括妥协投降和各种政治把戏在内的漩涡之中。我很怀疑还有没有另一位总书记的任命经受了如此细致的检

查，引起了如此热烈的讨论，得到了如此强大的组织后援。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所有这些准备工作都是苏联人民生活中一个新时代开始的前奏——一个神话破灭、国家崩溃、军队瓦解的时代，一个一度伟大辉煌的国家走向民族分裂的时代。

第二章 当选苏共总书记

红场上又一次站满了人，但是这一次人们看上去并不急于显得悲痛。看台上又一次挤满了来自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高级领导以及外国使节。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也再次来到这里，她仍然不习惯苏联寒冷的天气，为了暖和一点不停地跺着穿着时髦皮鞋的双脚。列宁墓里的一小批客人啜饮着一杯杯的热酒，也是为了取暖。

葬礼现在几乎成了一种传统了，负责完成各种仪式的人员非常清楚该怎么做。然而这次葬礼在某些方面却与以往有些不同：正在走向列宁墓上方的讲坛的这个陌生的身影——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即将成为苏联几十年来最年轻的总书记。揣在他兜里简短的演讲稿不是颂词，所要表达的也不仅是全世界人民和共产主义运动对这位伟大的领导人突然逝世的悲痛之情。它提出了未来的前景，指出了使国家摆脱危机的办法。起草稿子的过程中，我一直坚决要求把这些意思包括进去，以便从一开始就强调改革和进步的需要。感觉敏锐的人可以听出，前面将有很多严肃的工作要做，以便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悼念仪式一完，我就离开红场，回到办公大楼里。三天来以排山倒海之势涌现的一系列事件终于结束了，我也有了一点儿时间静下心来想想究竟发生了什么。尽管有点荒唐，政治局里第一个建议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的是维克托·格里申，他于3月10日深夜在那间胡桃木房间里提出了这个建议。他是不是有更加深邃的打算，以为会有某位政治局委员反对这个建议，而提出其他候选人？

戈尔巴乔夫后来回忆他当时的反应时说：“当时，我说我们不必要着急。让我们晚上仔细地考虑一下，把所有情况都考虑清楚，明天再作决定吧。”

这个回答很灵活，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当时唯一能说的话。格里申的建议没有得到别人的支持；实际上，连葬礼仪式主持人的问题都还没有决定，也没有人急着任命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感觉到了空气中犹疑不定的气氛，他也很清楚在采取下一步行动之前需要全面地打好基础，于是他宣布暂停讨论，最后的决定将在第二天的政治局会议上作出。其间将会有一场幕后阴谋的混战。而安德烈·葛罗米柯和各加盟共和国、州和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看法很关键。精明的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中央政治局委员）没有从美国飞回来参加契尔年科的葬礼，这样就在无形中帮助了戈尔巴乔夫，尽管对此是有争议的。葛罗米柯受到大家普遍的欢迎，而且以严肃认真著称。他的声音无疑是很关键的，但是他的年龄已使他没有当选总书记的可能。另一方面，他当外交部长的时间不会有多长了。也许他可以得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位，在这个职位上丰富的国际经验会对他有好处。戈尔巴乔夫无意争取这个二等席位，而且他这个年轻的农业专家还没能熟练掌握国际事务，因此他需要一个国际经验丰富，

与外国领导人有着良好关系的人。因此，葛罗米柯得知这一建议以后，情况有了新的转机。除了利加乔夫、尼古拉·雷日科夫以外，苏联政界的老一辈领导人也开始为了戈尔巴乔夫而介入政局。

大多数党中央的书记、州和边疆区的党委书记都倾向于支持戈尔巴乔夫，尽管他们有一些条件，有的想留在原位，有的想调到莫斯科去。只要情况需要，人们就到处许诺发誓。但是也有一些怀疑者，他们清楚吉洪诺夫和其他几个政治局委员是不会改变反对戈尔巴乔夫的立场的。

1985年3月11日的上午和下午工作都十分繁忙。中央委员会正在为全会作准备；而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忙着迎接中央委员、各州和边疆区的党委书记以及工农企业的领导人。人们公开地讨论着戈尔巴乔夫当选中央总书记的可能性。凌晨3点钟政治局会议在克里姆林宫继续进行，对这个年轻的候选人的支持必须得定下来了。政治局的会议只有一项议程：选出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尽管一切都已在幕后安排好了，仍然要全力避免最后可能有的突然变化。会议一开始，葛罗米柯这位最年长的政治局委员、全党乃至全国最有威望的长者要求发言。戈尔巴乔夫知道可以指望得到他的帮助，因为经过私下的磋商葛罗米柯已经答应支持他。果然，葛罗米柯信守诺言地提名戈尔巴乔夫担任党的总书记，并要求第一个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发言。由于他受到大家普遍的支持，他的话就标志着政治局委员们的心态已发生了转变。做出决定以后，政治局委员们已准备好参加中央全会了。

就在这时，中央委员们列队进入了全会的会议厅，其中很多人早就来了，他们在华丽的大理石休息室里转来转去，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交谈。所有的人都急切地询问政治局会议

的进展情况。前一天，很多州党委书记都会见了中央委员会里的同僚。中央委员们普遍的观点是那些上了年纪的领导已经不能工作，而且很快就可能去世，不应该再选他们担任总书记。国家需要的是果断有力的新领导。

很多人提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名字，但是仍有人表示怀疑。一些顽固的州党委书记尽管承认他的能力，但觉得他缺乏足够的经验，对经济问题的了解很肤浅，而且对工业生产一无所知。

全会的会议厅里逐渐坐满了人，我坐在靠门的地方以便需要时方便离开。宣布会议开始的铃声响了，主席台左边的一扇门一开，会场里立刻静了下来。戈尔巴乔夫出来了，眼睛低垂着，跟在他后面的领导人按照在政治局、党和国家的地位高低依次排列。戈尔巴乔夫走到主席台中央，沉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说他代表政治局宣布这次非常中央全会现在开始。

他照着稿子念道：“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令人难过的消息。”我觉得这句话由于频繁使用，已经成了陈词滥调了。党在近些年里已经听到了太多此类的“令人难过的消息”，就好像大家都相信那些年老多病的领导人不会死一样。

他继续声音含混地说：“昨天晚上7点20分，党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我们的朋友和同志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去世了。”他的脸上挂满了由于这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带来的深切的悲痛之情。接下来他讲述了契尔年科的革命生涯，以及他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的突出贡献。

戈尔巴乔夫继续说：“失去了一位同志、朋友、领导，我们应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以更大的革命热情继续我们

的伟大事业，争取实现共产党的崇高目标，维持苏联人民幸福安宁的生活和全世界的持久和平。”

然后全体起立为契尔年科默哀一分钟。

“这次全会的议程上还有一个议题，”戈尔巴乔夫现在的声音大了一点，“就是选出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现在请葛罗米柯先生代表政治局讲话。”

大厅里静得出奇，只能听见中央委员们的呼吸声。他们有点糊涂了：为什么让外交部长发言呢？这是不是意味着权力发生了转移，葛罗米柯要任总书记呢？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昂首挺胸地大步走向讲坛，直视着大家，他粗声说道：“现在由我来向中央全会提出一个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的候选人。政治局委员一致同意推荐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担任中央总书记一职。”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掌声已响彻大厅。顿时，许多人在过去的24小时内高度紧张的神经松弛了下来，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主席台。戈尔巴乔夫刚才一直低着头坐着，现在他抬起头来，想要平息住掌声。但是他的动作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掌声愈发热烈了。

大厅里重新平静下来以后，葛罗米柯开始讲述政治局讨论这件事的过程，描绘当时的气氛。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很不平常的演讲，充满了各种修辞手法、出人意料的修饰语、新颖的论点和复杂的逻辑。他说戈尔巴乔夫是能胜任这个职位的候选人，他有着丰富的党内工作经验以及领导人应当具备的宝贵品质：讲原则，有信仰，有列宁主义者的坦率风格，还有很强的分析能力。葛罗米柯又列举了戈尔巴乔夫其它一些优点和成就，有现在的，也有从前的。大家都全神贯注地听着，就好像他在列举宙斯之子赫拉克勒斯的十二项英雄事迹，

但是在听众的心里，他只完成了一项——第九项。（注）

政治局和中央的其他委员也对此表示赞同，他们指出完全可以相信戈尔巴乔夫能继续执行党的政策，为列宁主义事业而奋斗。在会议的最高潮，大家一致通过选举戈尔巴乔夫为党的总书记。掌声停下来以后，新的总书记开始讲话，他保证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 26 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方针政策，这就意味着他将致力于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社会的各方面进行影响深远的改革，包括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进社会关系的物质和科技基础，发展民主和加强苏维埃的作用，继续忠实地维护和平，与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团体密切合作，并且积极推动各种革命力量。他感谢大家对他的信任，并发誓会成为党、人民和伟大的列宁主义事业的忠诚的仆人。

戈尔巴乔夫用这篇演讲结束了这次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中央全会。现在他已达到党和国家权力的顶峰，他可以随心所欲，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勾画国家的蓝图了。

然后人们散开了，但是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有义务找到新的总书记，向他表示个人的祝贺。戈尔巴乔夫沉浸在内心的自豪和别人恭维的暖流之中。我朝他办公室的接待区望去，听到州和边疆区的党委书记强调他们自己是如何赞同这个任命，并和他谈论新的计划和事业，要求他驱除那些从勃列日涅夫时期开始有的食客。每个人显然都很急于再握一次新领导的手，向他保证他们的支持，并询问他的建议。

我觉得他暂时不需要我，就回家去了。我突然对所发生的这一切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就好像我一直在参加一个荒唐

注：希腊神话，宙斯之子赫拉克勒斯以力大无比和办成十二件难事而著名，其中第九件难事是取得了亚马逊女王的腰带。

而虚伪的闹剧，所有的演员都在演出他们早已认真排练好的角色：即使那些私下里痛恨这个来自斯塔夫罗波尔的年轻领导人，对他的升迁深为不安的人也毫不吝惜对他的赞扬，和别人一起放声大笑。新的总书记如此年轻当然让大家有了乐观的理由，至少它结束了一个在莫斯科广为流传的笑话，大意是，政治局的每个委员肯定要在当总书记的时候去世。主要的问题是戈尔巴乔夫是否有能力担任好总书记的角色，尽管他有很多优点，我也知道他在很多重要的方面有不足之处。他含混的发音和口音（乌克兰和俄罗斯口音的混合）肯定是能纠正过来的；即使不能，也不会有什么坏处。人们能很快适应他们的领导人的发音习惯，甚至自己在下意识中也开始模仿。不是曾经几乎整个国家，就连广播电台的播音员都曾模仿赫鲁晓夫在“kommunizm”（共产主义）中“Z”字母的腭音吗？因此人们也没有理由不接受戈尔巴乔夫的发音方式——把“Azerbaijan”（阿塞拜疆）念成“Azerbarzhan”（阿塞巴疆），并且在最奇怪的地方加重音。这些都不会产生什么灾难性的后果，毕竟不是所有的高级官员都受过良好的教育，特别是第一代的很多领导人根本没有机会接受真正的正规教育。最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性格是否合适，他是否能够果断有力。那时候就有人对此提出疑问，但是我尽力排斥这种想法，尽管我自己也不是很有把握。现在想来，难道1985年3月11日发生的一切是一个历史和政治的魔术把戏？

当时，如果有人告诉我新任总书记的性格比他的所有前任都要软弱，他将把我们国家的航船驶上一条充满风暴和磨难的航线的话，我是不愿意相信的。

在老广场我遇见的第一个人是雅科夫列夫。我们到了他的办公室，要了一些茶，然后沉默地坐了很长时间。

“现在该啃硬骨头了，”他最后说，“这是个苦差使。我一点不羡慕你。”

“我能做什么呢？我之所以承担这份工作是因为我看到我们在走下坡路，”我答道，“我会尽一切努力促进经济发展。但问题是，我不知道我能被允许做什么，我自己又有多少自主权。前面还有很长的路，我会尽量做好的。”

雅科夫列夫自言自语地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些真正的好主意，我们还需要一项坚定的政策，如果没有，就会遇到大麻烦。老的做事方式将会使我们一无所获。”

现在这个国家进入了一个没有标明航线的新的水域，大家都在谈论好日子就要来了，但是通向地狱的路不也是用好意铺成的吗？

开始工作

戈尔巴乔夫立即迫不及待地搬进了党中央办公大楼主楼第五层被称为“6号”的办公室，一点儿时间也没耽搁。就如同过去俄国的沙皇迷恋王位、王冠和权杖一样，这个新办公室也一直吸引着他。几乎在一夜之间勤务人员就把一切都收拾好，把楼梯上的长地毯也换了，把地板也磨光了。会客厅里还有一点儿活没干完，但是戈尔巴乔夫已经等不及了，开始在他的新办公室里接待来访者。

这间办公室很大。实际上，面积大是中央办公主楼第五层上所有办公室共同的特点之一：它们都很大，而且都靠走廊的一边。房门右边冲着走廊有宽大的窗户，走廊尽头是莫

斯科市党委书记的办公室。窗户上总是挂着麻纱窗帘。门的对面是一张庞大的办公桌和一张皮转椅——总书记的椅子。桌子上方悬挂着一幅列宁肖像，按照当时党中央的惯例，只有党的高级官员才能坐在列宁肖像的正下方，在其他一些低级官员的办公室里，得把肖像往旁边侧一点。

转椅的左侧是通讯控制台，这是一个硕大的胡桃木盒子。上面是城市间秘密和绝密通讯装置，以及一部与领导保持联络的特别电话的按键。这部电话连接着政治局的所有委员和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部长会议的副主席、最高苏维埃的高级委员们以及总书记负责的其它一些重要部门的领导，包括克格勃、国防部、外交部、内务部的部长，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军事工业委员会、《真理报》的总编以及戈尔巴乔夫的顾问和助手。政治局委员和其他一些个人与总书记有双向通讯联系，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时候给总书记打电话，而总书记也几乎总是予以回答。

戈尔巴乔夫显然很喜欢他的新办公室，以及这里的通讯设备。是啊，他现在不仅能给全苏联，而且能给全世界的领导人打电话。以后他会经常在电话里与法国或美国的总统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们交谈，祝他们生日快乐，或在某些节假日向他们表示祝贺。

但是，他并非对办公室的一切都感到满意。他觉得房子太小，憋得慌。我参加过几次扩大总书记办公室的讨论会。他建议把整个第五层变成他的私人公寓，包括他自己的电视演播室。党中央机关管理局长尼古拉·克鲁奇纳经过我的办公室时，经常进来聊一会儿，他总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想不出来该把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室和利加乔夫的办公室搬到哪儿去。不过不久就决定把邻近一座楼里的电影院改造成中

央书记处的会议室，而利加乔夫搬到第三层专门为他建的办公室里。但是直到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继而成为苏联总统以后，这个计划才得以实施，这已经是几年以后的事儿，那以后戈尔巴乔夫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克里姆林宫度过的。而在1985年的春天，人们还在努力工作，期盼出现喜人的变化。

完成了当选后一些例行工作，处理完几件紧迫的事项以后，为了进行一些变革和显示他自己目的的严肃性，戈尔巴乔夫开始考虑他的下一步政治行动应该是什么。在当选总书记以前，他经常谈论即将到来的变革，但当它们不可避免地严峻的现实发生冲突时，事实证明它们大多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们当然对该做什么多多少少知道一些，但是没有人知道该从哪里又怎样起步。一位新领导人的当选并不意味着他的变革就一定有道理，也不能表明他为了保证在社会各方面实施变革已经建立起全面而系统的体制。作为总书记在决策的过程中必然要进行各种尝试和犯错误，而且得为国家的命运承担责任，这个事实令戈尔巴乔夫深感不安。幕后的小动作和耍花招及宫廷阴谋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人民期待着真正的变革发生，而现在的条件非常有利于变革。

当选总书记后不久，戈尔巴乔夫即召集一些中央的书记、助手和其他一些信任的人讨论作为新领导应该采取的措施。我记得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点。第一、加快新人员的任命速度，以代替那些与从前的总书记们关系密切又不能对所管辖的领域进行大胆变革的高级官员。第二、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应继续加速科技进步，特别重视作为所有生产变革基础

的机器制造业。由于坚信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源于机械制造部门成绩不佳，他积极推行工厂现代化，引进两班和三班制的工作方式。第三、总书记到全国旅行，参观访问工厂、农庄并现场解决问题。当然讨论中也提到过与农业、建设有关的问题，但都先搁了下来，等待以后再做研究。

戈尔巴乔夫决定他访问的第一站应是首都的一个工业企业。他让我做必要的安排，但是要完全保密。总书记想要视察普加乔夫汽车制造厂、一家医院、一所学校和一家商店。我安排好了他的视察路线，但这已经不是一次突然行动了，因为戈尔巴乔夫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格里申，而格里申当时是莫斯科市党委第一书记。当然一切都为戈尔巴乔夫的来访准备好了。如果说工厂里要想在几天内发生重大变化是很困难的，而医院就不同了：戈尔巴乔夫访问的这家医院变化如此之大，以致于我几乎都认不出来了。人行道、小径和通向正门的大道都新铺了一层沥青，蒸气和热焦油的气味还在往上升腾。在我们参观的这一层病房，病人不允许到走廊里来，以免他们说的话刺痛了尊贵客人的耳朵。后来我从戈尔巴乔夫的安全人员那里得知，在他要进的两三个病房里，床上躺的都是健康的安全官员，头发剪得短短的，他们赞扬医疗人员的态度和医院的伙食，却不能精确地说出自己的病情。医生们听出了他们言语的混乱，对此次访问的结果颇感不安。

在其它几个地方我们也遇到了同样的“作假的村庄”。例如，我们似乎很偶然地应邀进入一个“普通工人”的新居，他们恰好有一些非常好吃的小吃、糖果、果酱和其它一些美味食品。再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些食品都来自安全人员得到的特别供应。既然这样，人们就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就连墙上的挂毯和其它装饰品也是为了这个场合而特意借来

的。戈尔巴乔夫真诚地和工人交谈，询问他们的工作和家庭情况，热情地和他们握手，祝他们家庭幸福、工作顺利。

在这些访问中有趣的倒不是这些小把戏，而是这样一个事实：戈尔巴乔夫无疑已经意识到大家都在作假，他却也将错就错，还允许记者拍照。不久以后，在一次从外地访问回来的飞机上，我提到了这件事。我告诉赖莎莫斯科之行的一些真相，戈尔巴乔夫在一边听着，我想这些话也许会使他们清醒。我个人觉得，对这种欺骗行为应毫不留情，想要愚弄总书记的人应对此负全部责任。然而赖莎却非常惊讶：“你想要怎么样？当你邀请客人去你家的时候，难道不也是把屋子收拾干净，把最好吃的食品摆出来吗？”

要反驳她很难。如果有客人来，我当然会把家收拾干净。但我的客人不是一个高级代表团的成员；而且家庭的住宅不同于一所医院或其它国家单位。这是政治访问，不是老朋友间随随便便的聚会。我想要指出总书记不是客人，而是国家的领导人和主人，但是我没有说，我怕被误解。显然，至少现在这种表演是可以接受的，而且还可能经常发生。但是我没有想到很快我们的全部生活就要变成一个演戏的舞台了。

在为视察莫斯科汽车制造厂作准备时，我明白地指出，国家和党的新领导要想知道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他就应该用和他们一样的交通工具到工厂去——坐公共汽车、地铁或有轨电车，以便从一开始就看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有多难。我建议他坐公共汽车从工厂到当地的医院，从那儿再到新住宅区去看看，那里住着很多工人。不管怎样，工人政党的领导人没有理由害怕与工人见面吧。但是戈尔巴乔夫无疑认为我是胡说八道，断然拒绝了我的建议。我明白他觉得坐在带有

装甲钢板的豪华轿车里面安静一些，但从防弹玻璃后面能看到什么呢？那次旅行当中总书记确实看到了别人想让他看的一切，当地的老板也得以展示他们感到满意的一面。他们的目的显然是要证明莫斯科是一座模范城市，领导们夜以继日地操劳，想尽最大努力确保城市繁荣稳定，人民生活幸福。一切安排当然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我很怀疑总书记在他的这些旅行中是否想知道什么新的东西，关于他访问工人的新闻报道可能就是他所需要的全部。

除了前面的几点建议以外，还提出了其它一些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紧急措施和建议，后来以各种形式得到了实施。但这都是些权宜之计，根本没有达到社会改革所需的广度。人民需要改革，无数个家庭期盼着生活水平高一点，住房好一点，有更大的自由。那时候没人预料得到1985年春天开始的改革实验最后对苏联和众多少数民族产生的影响。那时大多数改革的推进者和支持者真诚地渴望取得迅速的进展。

戈尔巴乔夫上任以后认真地工作。他首先交给雷日科夫的任务之一就是列出公众最希望进行改革的问题清单，这件事他也跟我商量过。雷日科夫是一个性情随和，不说一句废话的民主人士，我和他有着很好的工作关系。我们很快就确定了最紧迫的问题，但按照今天的标准，也没提出什么新建议。重点是一个我在《真理报》时经常思考的问题：给老百姓土地，确保每个城市居民都有一小块土地。由于我的农业背景，以及我和莫斯科市领导的关系，我曾经得到过一块地，作为栽种果树和蔬菜的合作地，由编辑部的全体职员共同管理。这块地现在的情形仍然很好，很多《真理报》的职员为了自己和家人都要花一些时间在上面耕作。

我曾倡议借报纸这个宣传工具为所有感兴趣的人提供小

块土地，还建议允许各企业的职员接管空地和破败的农村公社。直到安德罗波夫上台前，事情一直发展得很顺利；然后人们被以浪费土地和违反建设别墅的法令的罪名带上法庭，整个进程完全改变了。最后土地分配完全停止了。雷日科夫和我现在想要重新提出这个明智的想法。我们还提出了一些关于改进住房、医疗条件等建议。后来这些想法在一些具体的决定里面都有所体现。我们提出的建议大多都得到了执行，特别是关于土地分配方面的。除了一些为满足当前公众紧迫需求的措施以外，政治局和政府还制定和实施一些旨在加速科学经济发展的决定。这些决定主要针对以下领域：加紧生产，提高效率，改进机器制造和能源业顶尖部门的技术，重建钢铁工业，改善计划安排，加大投资力度以及引进高技术 and 计算机。同时，根据政治局的决定，也开始加强对密切相关部门的管理以提高劳动力使用效率。

如果仔细地分析一下那时采取的一些措施的实质内容，就会发现它们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它们基本上是权宜之计，意在堵上一艘沉船上的漏洞。戈尔巴乔夫每访问一个地方，就不可避免地在那个地方实施一系列关于经济发展的措施。就这样资源被浪费了，投资效率也降低了。

尽管“改革”这个词已被全国广为谈论，但对于社会所需的变革仍没有一个全面的概念。最初几项心血来潮的经济改革措施很快就遇到了限制和障碍。很多人多次告诫戈尔巴乔夫，如果不先确定一个关于发展的一致概念、不把重大问题说清楚的话，就不可能在具体的细节问题上取得进展。现在既然主观和客观条件都已具备，对于改革就需要一个严肃的理论基础，还需要有逻辑性和连贯的行动来支持。

前几年社会中的不满情绪越积越多，已达到随时可能爆

发的程度。大家都意识到这一点，特别是知识分子精英们，这些人通常都是进步思想的来源和传播者，他们包括科学家、各个经济部门的专家、企业的主管人员、几位最高层的军事指挥员以及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到80年代中期，这些社会的精英们已准备好许多关于苏联民主化和改革社会关系的建议，并且为科技的快速发展做好了基础工作。

几十年里积累下来的很多关于改革的想法从来没有公开过。自从赫鲁晓夫“解冻”以后，人们不再为生命担心，许多社会学家敢于对社会改革提出建议了。党中央和政府接到了大量改革的建议。柯西金60年代中期的经济改革尝试大多源于此。确实，他们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80年代开始的变革的基础。

我经常有机会见到各个领域著名的科学家和学者，以及教育家、文艺工作者和作家，这些高级人才知道我们的体制错在哪里。那时候坦率谈论的不仅是经济和政治问题，很显然僵化落后的领导机制扼杀了许多新思想。单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年龄就阻碍了他们向前看，考虑国家如何发展。

从党的第26次代表大会开始就可以明显地看到：政治局的大多数委员都难以活到下一次代表大会。我们的历史已进入了一个悼念时期。这些知识分子对此很清楚，他们早就对领导阶层中的年龄结构感到担忧，并且对每个政治局委员的能力都了如指掌。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戈尔巴乔夫在政治舞台上的亮相吸引了一些知识分子圈的注意。当然，最初人们并不是以善意的目光来看待他，因为人们普遍觉得像他这样的农业专家没能解决国家的粮食问题。但是，他的一些优点逐渐被发现了：他属于相对较新的一代，受过良好的教育，在他高兴的时候

可以显得很有魅力；他还有点天分，能把那些一直盼望着有一位精力充沛的领导进行改革的人团结起来。尽管他们最初不一定支持他，也不是没有疑虑，但最后他们都帮助戈尔巴乔夫赢得了广泛的信任，并且在复杂的权力网中上升。

新任总书记的出现极大地激发了进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科学家、学者、专家和管理人员被戈尔巴乔夫对改革的渴望所驱使，把他们的建议摆在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面前。接连几个月他们坐在封闭的党和政府的别墅里，勾画着对经济改革、社会民主、改革政治体制以及国际关系的新蓝图。

雷日科夫的班子非常勤奋地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重组经济关系的建议，其中有很多有建设性的想法，戈尔巴乔夫经常把一些带上讲台。但是仍然缺乏一个系统的概念性的框架。戈尔巴乔夫觉得逻辑只能妨碍他的改革，因此他尽力阻止这样一个框架的形成。很多人，包括在党代表大会上发言的人，都想知道我们究竟要走到哪里去，但是他们的请求如同石沉大海。这以后我们渐渐看清楚了他之所以妨碍这样一个概念的形成，有另外一个真正的原因。

直到1988年戈尔巴乔夫一直得到广泛的支持，此后他开始失去信心，也逐渐改变了立场。许多学术界的成员离开了他，思想的源泉枯竭了。他还经常更换为他准备报告、撰写演讲稿和接受采访发言的助手和顾问。

在改革的理论方面以及人员的选择问题上，他都受到雅科夫列夫的很大影响。雅科夫列夫在类似问题上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他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就开始接触这方面的问题了。我意识到他在任驻加拿大大使的时候，就已经制定了一整套苏联重要部门改革的规划。作为戈尔巴乔夫智

囊团的首领，雅科夫列夫请来了很多专家；然后在总括他们意见的基础上，他构想了一套社会重组的理论概念体系，以及一套改革的实际措施。除了负责创作班子以外，他也参与起草总书记的报告和演讲稿。戈尔巴乔夫的智囊团包括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如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麦德维杰夫，列昂尼德·阿巴尔金，阿贝尔·阿甘别吉扬，A·N·安奇什金，S·A·西塔良，N·比克宁，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尼古拉·彼得拉科夫，以及V·P·莫金。还从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外交部、党中央、部长会议以及其它部门召集来了很多专家。这个班子吸收了大量知识分子的宝贵成果，孕育了改革的雏形。到了准备报告和演讲稿的最后阶段，戈尔巴乔夫就会和一些精选的助手亲自上阵，要么在办公室，要么在新奥卡廖沃或沃伦斯科耶的国家别墅里。

这个庞大的由高素质专家组成的班子完全可以拟定改革的系统理论框架，但是没人让他们这么做。这个班子努力的唯一成果是分析了一下80年代中期党和国家的局势，而时间在不知不觉地流逝。很多工作都是很直观而随意的，很少注意到后果。人们坚定地执行总书记的指示，天真地以为他知道什么是最急需的。

戈尔巴乔夫一上台遇到的一个全球性问题就是发展高科技。他听到过很多关于以前为举办一次科技问题会议所做的准备工作，他自己很有信心，决心把这件事重新搞起来。他相信既然苏联所有的灾难都缘于机器制造业发展不足，通过这个环节可以使整个经济链运转起来。关于这个问题的一次重要的中央会议定于1985年6月举行，这就需要准备一份报告。因此一批专家、企业家和理论家就开始奔赴沃伦斯科耶的2号别墅，在那里他们苦干了两个月。

会议是在中央全会会议室召开的。这是一座相当新的建筑，紧邻着苏联最高苏维埃大楼。尽管有点不方便，但对它的评价是，它是与克里姆林宫和谐地融为一体的一个建筑杰作，参与设计和建造的人都获得了列宁勋章。地面和墙壁都是用意大利大理石制成的，很多地方都装饰有大理石的工人、农民和士兵雕像。装饰品都是从世界各地进口的。椅子和桌子都是用白桦木制成的，还装有扩音器，非常舒适。据知情人讲，它们如此舒服，以致于在作例行性报告的时候，常可以听到轻微鼾声。

学者、企业老板、部长和中央委员就聚集在这里开会。戈尔巴乔夫开始朗读已经准备好的报告，听众十分专注。然后就在摄像机的镜头下，一场生动的辩论开始了。这简直产生了轰动效应，全苏联的电视观众都可以看到一场直率的辩论，谈的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而且大部分都没有讲稿。新任总书记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一点也不像他的那些前任那样，僵硬地站在讲台前，眼睛死盯着稿子，尽管他也不敢完全不看讲稿。

广大的党员和人民群众越来越对这位精干的新领导充满信心，认为他有能力挣脱旧时代的束缚。当时这个事实非常重要，因为言语已经变得毫无价值。

我想要强调一下，戈尔巴乔夫从1985年到1987年间的政策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的基础之上：他坚信苏联的社会主义令人民引以为自豪，应该继续发展下去；神圣的社会主义信念会引导我们达到最终目标——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我认为最初戈尔巴乔夫的所有思想都是以这个信念为基础，排斥了其它的一切。以这种态度对待过去的传统，自然与大多数人的感情相符。人民希望在经济和外交政策上进行大幅度

的改革，社会快些实行民主化。他们希望除了原来已经习惯的社会保障以外，党委和党组织能有更多的自由，并且能有一套新的激发积极性的体制。全党一直很支持戈尔巴乔夫，特别是他强调必须把社会主义的成就保存下来。

然而不久以后，形势却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一年的事实表明，要想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是不可能的。戈尔巴乔夫曾经说过，农业只要摆脱了旧的束缚，让农民自由选择各种租借方式，一两年内就会有足够的粮食。单是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和实际生活脱离得有多远。

当他决定把这个论点加到他的报告中时，我提出这是不现实的。他大光其火：“你难道不知道农民们是怎么想的么？看看中国发展得多快，我们不比他们差。”他还是写上去了，不过在报告中，他把开始富裕的时间推迟了，写成“两到三年”。

对改革含义的这种粗浅认识就导致了他仓促地做出决定，采用与以往迥异的管理方法。最糟糕的是，各级政府人员，甚至包括戈尔巴乔夫手下的人，开始被频繁更换。还没有执行完一个专家组的建议，他就开始对别的专家的意见感兴趣。人员像走马灯似地更换，各种意见像万花筒一样令人眼花缭乱，这可能也反映了总书记自己心里的恐慌。不断地有人提出关于加速经济发展的建议，随着一次次的变化，人们越来越有一种感觉：不久就要发生向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了。而且这些方式都属于资本主义发展原始的不成熟时期。尽管我们还能听到“建立人道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景”的说法，但这些只停留在口头上，不过是一块意识形态的遮羞布，掩盖了背离中央全会和党代表大会通过的政策赤裸裸的事实。

净说华而不实的废话也是戈尔巴乔夫性格的必然结果。因为从中学到大学，从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到在党内工作，他已经习惯沿着一条既定的路线前进，并且认为成功、赞同和掌声都是他理所应当得到的。16岁他就得到奖励，担任校共青团书记，并且以优异的成绩从高中毕业；他被免试保送进入莫斯科大学，又成为大学的共青团书记，最后以极高的荣誉毕业。在那些年中，戈尔巴乔夫听到的全是鼓励、赞扬以及对他能力热情的肯定。大学毕业以后还是同样的情形。如果去做单调的法律代理人的工作，不经过艰苦的努力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戈尔巴乔夫没去做那些工作，他先是为共青团工作，然后又负责党组织的工作，这里他以同样的方式不断升迁。在这样的机构里工作给了他很多出头露面的机会。而且他从来不用为他的表现负责，也不会因为失败而遭到惩罚；他从来没能从实际生活的学校中毕业。他几乎总是在党的机构里工作，这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他的脊骨没能坚硬起来，仍然非常柔软。结果，当他的改革遇到实际困难时，他很快就会失去兴趣，把注意力转向其它的东西。因此我们也许不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他的活动范围缩小到只做一些演讲，在报纸和电视上作报告。他还常去西方旅行，在那些国家，他作为苏联的代表，会受到隆重的接待。

那时，他不仅要党的命运负责，而且要对全国人民的幸福负责。老百姓希望他们的新领导不仅仅停留在口头许诺上，这么多年他们已经听腻了华丽的语言。现在他们想要知道他们在沿着一条标识清楚的路线向着一个既定的目标前进；他们想使事情变得好一点，至少不要变糟。我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觉得压力越来越大，他的天赋和能力已经无济于事。当1988年开始影响深远的试验时，经济形势迅速恶化。

政治局、党和公众看到说出的话并没有见之于行动，就开始对他失去了信心。戈尔巴乔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大为沮丧，开始四处寻找灵丹妙药，接连提出一个又一个新想法。就在这时候，他开始接受一些显然在其它几个国家已获成功的建议，他先是提议效仿匈牙利模式，然后又提议效仿瑞典或奥地利模式。

寻求各种发展方式并没有什么错。资本主义也成功地向社会主义借鉴了很多经验。但是我们在采用外国的管理方法的同时，难免要对整个体制进行重大变革。苏联的工业管理者们不喜欢零敲碎打地模仿，他们觉得这是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

戈尔巴乔夫感觉到党和中央委员会现在对他产生怀疑，他又紧张又沮丧。而这时他也远离了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在1988年到1991年间，犹疑不决是他政策的一个基本特点。他既不敢前进也不敢后退，因此疏远了很多激进的派别，他也不去团结那些支持强硬路线的传统派别。各级党领导，以及要求民主的公众，眼见戈尔巴乔夫不明确和不连贯的政策将会使他们一无所获，就逐渐对他失去了信心。这对戈尔巴乔夫，对党，对全国都是一个悲剧。他最后终于孤立了，被党内的同志所蔑视，被社会上要求民主的人士所嘲讽。

但是这一切要四年以后才会发生。当时人们仍热衷于探讨重新改组社会的途径，改革之风刮遍了整个苏联大地。人们称戈尔巴乔夫是他们的保护者和他们的希望。他们渴望着更大的自由，更多的民主，希望能有一个机会说出他们对一些难题的看法。党中央、工业部门和政府机关中对戈尔巴乔夫曾有过的疑虑都被全国上下这种欢欣鼓舞的气氛冲散了。

写给戈尔巴乔夫的信开始像雪片一样从全国各地和国外向戈尔巴乔夫飞来。人们开始写诗赞颂他，把他比喻成救世主。

我总是先把这些信过目一下，再简要告诉戈尔巴乔夫信的内容。他非常喜欢这些信件，有时候他会连续坐上好几个小时，反复地读那些他特别欣赏的段落，并把一些话念出声来。

“听这个，”他在读塔斯社的内参前常这样说，“在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发生的建设性变革在东欧国家引发的反响日益强烈，人民对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领导人已经不大能应付这种局面了。”

我不能肯定是谁先发现戈尔巴乔夫喜欢读吹捧他的文章——是西方的情报机构，还是我们自己的大使。但是人们充分利用了总书记的虚荣心。赞扬他的信息从四面八方涌来，使得每个在国外的苏联代表都觉得有义务把一些刊有颂扬戈尔巴乔夫伟大功绩的剪报和杂志寄回国内，而且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告诉戈尔巴乔夫西方国家的领导和“普遍百姓”是多么欢迎他。

从国外寄来的信件数量激增，是平常的好几倍。很多人给戈尔巴乔夫寄来了纪念品，家里的传家宝，金钱和其它值钱的东西。在很多西方国家铸造了纪念他的纪念章、金币、银币和铂币。就这样他收集了大量贵重物品，同时还坚信这是对他成就的奖赏。直到后来人们意识到他不关心国家或人民，而只关心他自己的声望后，纷纷逃离他的时候，他仍然对此深信不疑。

个性影响

又一个白天过去，又一个夜晚来临，一切都在重蹈故辙。我根本没注意到我的室友，甚至不知道其中一个人已经被带到别处去了。看到我的这种情况，另一个年轻人尽其所能地照顾和保护我。他叫季玛，是个聪明招人喜欢的小伙子，两年半来他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他告诉我：“在这儿斗争是没有用的，你什么也得不到。要想表明你是清白无辜的一切努力在这里都是徒劳的。他们认为你是罪犯，把你当谋杀犯、强奸犯或者人民的敌人一样对待。别难过，没人能保护你。如果你想要成功，你就得保持高度的警惕性，要不然你就完了。”

虽然我已经没什么斗争的念头，但我也理解了他的话。我越来越想在床上躺着，任思绪飘回到过去的日子。

和戈尔巴乔夫共事十年，我觉得有必要总结一下他的性格、道德标准、能力和工作方法，以及他自己声称的一些对他性格以及领导能力的形成影响很大的因素。第一，他继承了两个家族的遗传基因：他母亲一方是切尔尼戈夫的戈普卡洛家族，父亲一方是沃罗涅日的戈尔巴乔夫家庭。他对自己的基因非常重视。对于他远一些的祖先的生活情况，人们只

能猜测，但是他祖父的生活非常困难，有时甚至是悲剧性的。他们亲眼目睹了集体农庄运动的诞生，并且与当权者发生了冲突。这些无疑都影响了米哈依尔的性格。他融合了父亲的淳朴、温柔和善良以及母亲的强悍甚至有点尖刻的性格特点。这些特点在后代的身上并不是平均分配的，这从他的哥哥亚历山大的身上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上校，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做事喜欢直接了当，像个孩子一样，这常使他陷入一些棘手的局面，有几次甚至需要别人把他解救出来。我很喜欢亚历山大的直率、不做作，不会耍花招。我记得曾经对戈尔巴乔夫说过这些，他回答说他的哥哥是个好人，继承了他父亲的大部分性格特点。

戈尔巴乔夫长成了一个聪明、能干、勤奋的农家子弟，有着很强的记忆力，还会耍很多小花招。在这最后一点上他经过若干年的修练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但是熟知他的人就会发现他那些鬼点子和手腕并不高明，一眼就可以看穿。他大量积累的那些以备在各种情况下使用的自制秘诀也是如此。他最显著的特点是有这样一种能力：不仅能胜过对手，而且不管事态的发展如何，他总能为自己制造出万无一失的局面。不了解他的人总是被他的招数弄糊涂。他知道如何迫使对方按他的愿望谈话，令他的对手最后赞同他的观点。

早在1985年11月同里根的会晤中，里根的助手就发现了他的这个特点，建议里根不要让戈尔巴乔夫支配议事日程，或在谈判中游离已经拟定的主题，或不停地变换主题。尽管戈尔巴乔夫在他任总书记期间对这一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巅峰，其根源却要追溯到他在斯塔夫罗波尔的政治成熟时期。

还在青少年时代，戈尔巴乔夫看起来就注定会当英雄。像前面提到的，他领导着共产主义青年团，还总是站在学生运

动的前列，参加了业余戏剧团，还亲自在舞台上表演。戈尔巴乔夫曾经回忆说，有一天他中断了所有班级的课，为的是领着学生看河水的到来。河水已经沿着运河喷涌而来，滋润这块被太阳烤焦的大平原。他很自然地想到中断上课，因为对于这样一块干旱的土地，有水是值得庆贺的事。早在那个时候，他的政治判断力显然已经胜过他的老师们，因为他们从来没想到过庆祝这样一件不仅对农业有着重大价值，而且有着政治含义的大事。人们总是乐意在很多事上原谅戈尔巴乔夫，因为他学习成绩很好，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后来，他又是他父亲在拖拉机站的好帮手，负责集体农庄的所有机械操作。

像当地的其他孩子一样，戈尔巴乔夫很早就开始在地里干活了。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劳动力十分缺乏，农业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战争也给年轻的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心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后来他常忆起当年如何被一个给德国军队干事的卡尔美克人鞭打，和他怎样躲在偏僻处的农宅里以免被枪打死，或者被送到法西斯德国去。尽管他没有见到德国人在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西部地区的暴行，但法西斯的所作所为还是对戈尔巴乔夫的性格产生了影响，他非常崇拜实力和权威。战争以后他不仅在同代人中获得了承认，还在16岁的时候因为帮助父亲开联合收割机被授予了一枚政府奖章——劳动红旗勋章。在艰难的战争岁月里，当他父亲还在军队的时候，他负责养家糊口，顺利地度过了饥荒和困难时期，从而证明自己是个人勤勇敢的人。

在以后的生活中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些性格特征。在莫斯科大学的读书生活拓宽了他的见识，提高了他独立工作的能力，但是从专业方面来说，他的收获却并不是很大，尤其是，

他只在本专业工作了几天。他先是被分配到总检察长的办公室，实际上是等待一个空缺职位。当时，在毫无法治可言的斯大林时期上来的一些人，名誉不佳，正待被清除出去，同时也在为一些蒙冤的人进行平反工作。据戈尔巴乔夫自己所说，只有具有法律经验的人才能得到这些空缺职位。但是他没能得到一份工作，这个事实一定深深伤害了他。依我所见，这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插曲。他后来说，其实他是有可能得到总检察长的职位的，但是他自己曾经说过，作为一个年轻的边疆区党委书记，他是不会接受这个职务的。不管怎么说，他已经忘记了大部分法律专业知识，这一点有后来的事实作证：该他实施民主化和政治改革的措施时，他常觉得茫然不知所措，不得不求助于卢基扬诺夫。

如戈尔巴乔夫自己所说，他在70年代中期拒绝了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他的理由是，对于他的事业前途而言，担任这样一级职位已经太迟了。戈尔巴乔夫和政治局的关系很密切，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价值，和其他党员不同，他不愿意“党叫去哪儿就去哪儿”，而是等待着更合适的机会。他的想法是对的。

莫斯科大学不仅教授给戈尔巴乔夫一些法律知识，还使他有可能会尝试在青年运动中做一个政治斗士。能有机会领导成千上万的学生当然是很有吸引力的，它能满足在年轻人中普遍存在的虚荣心和雄心。在大学里他遇到了很多能力很强的同学，他们的许多主意后来都被广泛地采纳。他就是在大学里认识后来和他一起在斯塔夫罗波尔共事的兹杰涅克·姆雷纳尔兹的，他们的关系很密切，戈尔巴乔夫经常高兴地提到他们之间的友谊。斯大林的逝世震动了整个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甚至世界的很多地方。姆雷纳尔兹将斯大林的

逝世称为“姆雷纳尔兹恐惧症”，意思是苏联已经“完蛋”了。

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从此发生了分歧。在“布拉格之春”事件中，他们的立场针锋相对，这给他们的友谊罩上了一层阴影。戈尔巴乔夫仍然忠于共产主义的选择，而姆雷纳尔兹离开了捷克斯洛伐克，但是他们没有公开决裂。

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以后，姆雷纳尔兹在一家意大利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戈尔巴乔夫看到后把这篇文章保留下来了。有一次他把它拿出来，开始谈论姆雷纳尔兹，暗示他们曾经是朋友；他又仔细阅读了一遍，说文章没有什么错。很快他们的友谊又恢复了，姆雷纳尔兹成了他的常客，他给戈尔巴乔夫提供了关于发展的建议，还警告他不要匆忙将现有的机构解体，这样是很危险的。在多年的相互交往中，他对戈尔巴乔夫肯定有影响，只是难以说清影响程度有多大。

莫斯科大学的课外活动使戈尔巴乔夫有机会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并得以参加学生精英的团体活动；同时他也明白了通过什么途径才能沿着权力的阶梯向上爬，尽管这只是在共青团里，但这对他以后爬上首都的权力宝座不无裨益。

戈尔巴乔夫以很高的荣誉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来和赖莎·季塔连科结了婚。他被分配回斯塔夫罗波尔，迎接他的是渺茫的前途，生活安排也很不理想，他还遇到了许多通常年轻大学毕业生都会感到头疼的困难。他和赖莎忍受着艰苦条件，租了一间小屋子，整个一个寒冷的冬天都没法取暖。但是他们年轻、健康，而且决心提高自己的地位。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有良好理论修养的年轻共产党员回到自己的故乡，急切地想努力工作，飞黄腾达。

赖莎夫人

如果戈尔巴乔夫不和赖莎结婚，很难说他的命运会如何发展。妻子的性格和态度对戈尔巴乔夫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我相信，在一定程度上对党和国家的命运也起着作用。

凭着她强硬、尖刻和盛气凌人的个性，她知道如何让别人服从自己的意志，如何达到自己的目的。戈尔巴乔夫一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她立即端起了苏联第一夫人的架势，在这一点上比她丈夫真正觉得自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用的时间短。她经常大言不惭地通过电话向总书记的助手和其他几个政府成员，特别是她熟悉的人发号施令。她以贵夫人圈子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自居，从不允许别人对她的权力有半点疑问。她在全苏文化基金会中占有很高的位置，实际上就是它的领导者。根据她的指示，许多文化机构、广播、电视和报社的办公室里都装上了政府电话，在她和她的克格勃警卫的车里都安装了和总书记一样的通讯设备。

赖莎决定结识外交使节的夫人们，因此她要在1986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这一天为她们举行一次招待会。一天晚上半夜时分我仍在工作，突然接到戈尔巴乔夫的一个电话。他经常在很晚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发布一些意想不到的指示，这些问题都是他和赖莎散步时突然想到的。这次是和招待会有关。本来决定这个活动由外交部和苏共中央国际部主办。这个决定是由中央书记处发布的，现在他让我把它转变成政治局的决定，以便于准备工作更加顺利地进行。不久政治局的

决定就发布了，它比法律更具有约束力。

招待会是在列宁山上一座政府宾馆里举行的。到场的有领导人、大使和其他一些党政高级官员的夫人，还有一些知名的女演员，以及一些来自文化界和学术界的女士。很多参加者都对这次活动的豪华留下了深刻印象。女士们排成一条长队，为的是能握一下总书记夫人的手，向她表示节日的祝贺。第一夫人看起来一本正经，她老练地审视着客人们的衣裙和服饰珠宝。然后女士们纷纷就座，她们身旁的桌子上摆满了所有可以想到的美味食品，她们坐在那里耐心地听着欢迎辞。那时候招待会总是很奢侈，还有著名演员的表演。整个活动要花去国库不少钱，但是似乎没人在乎花多少钱。按照惯例还要给这些出席招待会的女士献上鲜花和各种纪念品。

我知道很多人觉得这种活动单调乏味，但是为了避免得罪第一夫人，还是去了。因为她们很早就发现她的记忆力很好，而且如果谁要是不出席，显出对第一夫人的不尊重，只需瞥一眼到场人名单就可轻易被发现。我自己觉得庆祝活动冗长乏味的主要原因是几个月前赖莎就让我给她写演讲稿。她有自己的助手，这个人实际上也是总书记的幕僚，但是因为某种原因她不喜欢他的风格。她是一个非常挑剔而又反复无常的人，很难与之合作。她看到自己认为应该删去的文字，就立刻进行指责，还经常说一些挖苦讽刺的话。随着时间一年年地流逝，写这样的材料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我得尽量避免重复。我急切地想要找出一个办法，以免她对我的工作挑刺，进行侮辱，况且这还不是我的本职工作。很快我就有了一个主意，我每次送给她三四个版本的演讲稿供她选择，这些稿件通常都是由一些有着独到的见解，并且对前一年的

招待会一无所知的人提供的。她仍然会提出一些批评，但是无论如何她最后总会从这些稿子中挑选一份。后来我才明白，她批评的目的是表明还要进行修改。G·普里亚欣就遇到了这种情形，他是戈尔巴乔夫的顾问之一，被指定为赖莎写一本书。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妻子都严厉地批评他写作水平如此之差，使得整个一本书都要进行修改。但是据我所知，这本书后来就按普里亚欣的原样出版了，尽管戈尔巴乔夫夫妇很可能做了某些修正。

赖莎由于所受的教育和在大学里教授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所持的是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者的观点。事实上，无论是私下还是在公开场合她都经常大声宣称她的信念。她把这一精神传授给成百上千的学生，并且向他们灌输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实信仰。戈尔巴乔夫常说，在他的家里，除了最小的孙子，其他人都是苏联共产党的坚定分子，而赖莎是“我们这个家庭党组织”的头儿。她不仅是头儿，还是这个组织的灵魂和制定标准的人。而且她也不仅在家庭党组织里制定政策，在戈尔巴乔夫制定政策时，她总是尽力使她的丈夫把全家一致通过的路线在全党实施。我可以向你保证这只是稍微有点夸张。

我自己就亲眼见过赖莎是怎样一天天地在戈尔巴乔夫耳边不停地提她自己热衷的一些想法，而最后又是如何令她的丈夫妥协，听从她的意见。戈尔巴乔夫性格温和，常常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因而常常受到他妻子的影响。有时我能看出戈尔巴乔夫的一些想法是在赖莎脑子里萌芽的；事实上他也经常对我讲述她的想法，让我评估它们是否有得到实施的可能。

日常生活中肯定会遇到各种问题，我知道戈尔巴乔夫总

是在顾问和政治局委员的帮助下就一些问题准备好决定，以防不测。但过一段时间，他的观点就可能发生变化。我会突然听到他提出一个新的论点，而我对此已经非常清楚了，因为赖莎曾多次谈过这些。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形成自己的意见的，不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是这样，例如报纸、杂志、广播或电视应当采取的立场，而且就连在个人的能力评价和人员职务任免上也是这样。

在这里我不想提及具体的政治家的名单，但是一些领导，包括几个部长，都是因为赖莎的缘故才得到他们的职位的。在此之前他们都经受了对其忠诚和勤勉程度的严峻考验。

赖莎不仅要求执行她自己的政策，而且她在和丈夫一起旅行的时候，需要得到足够的注意，还得为她安排必要的活动。我们在古比雪夫州的时候，她对我说：“让我告诉你州党委第一书记夫人对我说了什么：她说她本来应该陪我一起逛逛的，但是现在不行了，因为没人照顾她的狗。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们对这个奇怪的理由一笑了之，同时心里在想这是表明人们不喜欢总书记夫人参观企业和机关呢，还是说这位女士实在太爱她的宠物了呢？或者这位女士根本就没明白究竟是谁屈尊来参观这个州了。不管怎么样，知道这件事的人都一点也不忌恨该州的党委第一书记——叶甫根尼·穆拉夫科夫了。此人很有点子，他当时正经受着双重压力，一方面是繁重的工作，另一方面是当时州一级高级干部普遍遭受的批评。

如果你和我们一样对穆拉夫科夫的命运感到一阵恐惧，那你就对了：从此他被忽视了，从而使V·阿福宁占了便宜。戈尔巴乔夫的古比雪夫之行后，他成了该州党委第一书记的

强有力的候选人，此人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党委书记，后来被调到了中央。

雅科夫列夫非常清楚戈尔巴乔夫和他妻子之间的复杂关系，他特别小心不招惹她生气。即使这样，他还是在几个意识形态问题上和戈尔巴乔夫产生了严重分歧，从而使自己陷入困境。戈尔巴乔夫夫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十分重视，同时要求别人也重视他们的观点。政治家、作家等感觉到赖莎在文化政策上的影响日益增强，他们给她写信，极力劝说她同意他们的安排，抱怨他们遇到的很多问题，请求她帮助博物馆、学校和图书馆，还请她为他们说情，以便让他们得以完成工作，或者搬进一个好一点的新居。奇怪的是，这些问题大多都迅速而圆满地得到了解决。如果赖莎的愿望和电话没有结果，总书记就会亲自下令，督促迅速落实。

事情越来越明显：总书记夫人已不仅是他的顾问或者是在影子内阁中的一个成员，她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政治角色，不仅在出访中，而且在国内也要表现自己。她在很多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使得党和政府中的许多政要没有立足之地。

不管原先的礼仪如何，戈尔巴乔夫夫妇在他们频繁的旅游中总是一起给各个纪念碑敬献花环。他们的旅行需要大量的新闻报道，人们很快就领会了其重要性。在电视屏幕上他们看到的不仅是总书记夫人，而且是一个日渐独立的政治人物，总是有安全部门和外交部的警卫和随从伴随着她，而她总是对这些人颐指气使。国外的要人并没有漏过这一点，他们对她这种傲慢的行为颇感惊讶。

在描写与赖莎会面的情形时，美国总统夫人南希·里根说她注意到赖莎有进行道德说教的习惯，而且对她的随从傲慢无礼。就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内，南希已对她作出判断，觉

得她就像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要向人间揭示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

如果说我对和赖莎·戈尔巴乔夫第一次会面有点紧张的话——我确实紧张——她很可能比我更紧张。我不知道该和她谈些什么，但是我很快发现我没必要担心。从我们见面的那一刻起，她就一直在说，说，说，我根本插不上嘴。这也许是因为她自己觉得没有安全感，但是在三个不同的国家会面十多次，我对她的基本印象是她总是在说话。

更准确一点说，是说教。有时话题是苏联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光辉成就，有时是苏联艺术，更多的时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两次，她甚至对我大讲特讲美国政治制度的失败之处。

我对此毫无准备，也不喜欢这些。我原来以为我们会谈一些个人话题：关于丈夫，孩子，处于众人注目的中心的感受或者是我们对未来的希望。我还准备和赖莎谈谈反对毒品的计划，因为很多国家的第一夫人都觉得这个问题和她们的社会有关。但当我提起这些的时候，她很快就把这问题跳过去了，她说在苏联不存在这个问题。是真的吗？

第一天在日内瓦喝茶的时候，她给我的印象是她希望别人对她百依百顺。如果她不喜欢她坐的椅子，她就打个响指，招呼她的克格勃警卫迅速地给她换一把……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曾经见到过很多国家的第一夫人、公主和女皇，但是我从没见过

这样的人。

（摘自《我的命运：南希·里根回忆录》——译者注）

南希·里根就是这样总结出了苏联第一夫人的品质，对这位前苏联第一夫人来说，这些话是有些尖刻，很容易伤害感情。不过戈尔巴乔夫夫妇可不是那种不能控制自己感情的人。赖莎忍受了南希的挖苦。在1992年5月的美国之行中，她满怀爱意地拉着南希·里根的手，就像两个孩子在上学的路上手拉手横穿马路一样。

大多数苏联人也对赖莎的言行不满。他们凭直觉就能感到是谁在真正主宰着国家事务，于是人们写来越来越多的上访信，以表明自己的想法。起初只是个人写来上访信对第一夫人的行为表示惊讶，不久，各级党委书记以及工厂的党组织，偶尔甚至是整个地区也开始写上访信。

戈尔巴乔夫是不是知道这些上访信件，他是不是意识到自己威信正在受到严重的、甚至是不可挽回的损害呢？我肯定他是知道这些信件的，但究竟他是否明白这件事的影响，我就不得而知了。

办公厅主任卢基扬诺夫也开始对戈尔巴乔夫谈起这件事。他对我开玩笑说：“我决定把一切都告诉他。反正除了我身上的那个部件外，也没什么怕丢失的了。”

卢基扬诺夫当时还不知道他会丢掉很多，甚至包括个人的自由。我也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向戈尔巴乔夫报告了这类信件。有一次他听完以后又生气又惊恐，当着我的面马上给葛罗米柯打电话：“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我需要你的帮助。我必须经常出访，而且需要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人陪

伴着我，以便帮助和照料我。我已经习惯于和赖莎一起旅行了。但是现在对此持异议的信件像潮水一样涌来，有的还是党的干部写来的，我该怎么办呢？”我可以想像得到葛罗米柯在电话另一端咬着嘴唇仔细想了一会儿，说按照国际惯例一般都是这么做的。不过，现在戈尔巴乔夫对什么国际惯例可不感兴趣，他需要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葛罗米柯继续慢慢地说，在苏联内部，这可是件敏感的事儿。不过他感觉到这不是戈尔巴乔夫想要听到的，就补充说如果他要是觉得为了履行职责有这个必要的话，那就怎么方便怎么办吧。

“也就是说你认为这么做没什么错了？”戈尔巴乔夫充满希望地问。

葛罗米柯很可能并非十分确信地回答说，他想已经形成的习惯可以继续下去。

戈尔巴乔夫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把那些信件都递回到我手里。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因此就勤勉地把这类信件和其它邮件一起送给总书记，但是我担心最后——但愿上帝保佑不会这样——它们可能都跑到赖莎的别墅里去了。

戈尔巴乔夫夫妇仍旧一起旅行，而且声势还越来越大。不久赖莎说她想要一幅特别的世界地图，把她去过的国家都作上标记。我不知道从哪儿可以得到这样一幅地图，就给几个制图员打了电话。这个部门的领导亚什琴科答应帮助我，最后他们制出了一幅地图，精确地标出总书记夫妇国内外的旅行路线，从莫斯科出发的一根根红线指向外国的首都以及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和州。莫斯科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光芒四射的红太阳。

由于总书记夫人频繁进行国内外旅行，她需要一个特别的克格勃安全小分队。人们给她提供了很多选择，但她都不

喜欢。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以前保卫他们一家的安全人员，在他任总书记后的一天内就被遣散了。原因是他们“不合适”。也许是他们知道得太多，或在其它方面有些不足，但是戈尔巴乔夫是这样对我说的：“他们越来越懒；我们走路的时候他们总跟不上我们，而且他们已经习惯了老的作事方式。我让普列汉诺夫把他们，连同医生一起全换了。”

新任总书记替换前任时，理所当然地会发生一些混乱。克格勃第九局的局长直接隶属于总书记，勤勉地执行总书记的各项指示。偶尔他也会把这些事项报告给克格勃的最高领导。而戈尔巴乔夫上任以后，就更混乱了：他需要新的私人保镖，必须又年轻又结实。合适的人选很快就找到了，而在赖莎的安全人员安排问题上却遇到了一些麻烦。除了一个安全小分队，她还需要一个副官随时陪同她。她不喜欢最初的人选，于是，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一场搜寻战开始在克格勃的各个部门进行。最后在索契找到了一个受教育程度比较高，性情也很随和的军官。但是他只干了几个月，就被干脆利落地遣散了，理由是不适宜为第一夫人工作。这并不奇怪，因为她曾认为其他很多厨师、清扫和整理房间的女仆不合适。其实早在她丈夫成为总书记以前，她家里勤务人员的更换率就已非常之高。由于他们都是穿军装的，就被分配到其他政治局委员的家里。他们很快就泄露了戈尔巴乔夫一家生活的真实状况。这些话先是流传到中央和部长会议有关领导的耳朵里，后来又传到莫斯科老百姓那里。我觉得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于是不顾自己的原则，一有机会就告诉戈尔巴乔夫频繁更换服务人员不利于他的威信，应该着手纠正这种局面。他明白我的意思，却默不作声。我觉得我的劝说没对他妻子产生什么影响。但当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以后，对于他家

的勤务人员来说，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他们现在想逃走都不可能，甚至是危险的。不管怎样，他们在这里的待遇高，工资和大学讲师、学者们在一个水平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不管赖莎自己有多少理由，她选择作勤务人员的女性都不是最年轻漂亮的。她的这种人事政策使得负责安全的头儿非常为难。他经常来向我抱怨，一脸绝望的样子：“我倒底能从哪儿找到这种人呢？我得从头儿开始训练她们，还得使每人获得资格，这要花多长时间啊！”

戈尔巴乔夫当然知道他妻子的怪念头，但是他缺乏足够的意志力，无法使他的妻子改变主意。

正像我在前面所提到的，赖莎后来经常参加党代会和其它会议文件的准备工作。我自然而然地认为她也会仔细检阅其它文件，并让别人知道她的看法和愿望。戈尔巴乔夫有时也会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例如由两位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和梅德维杰夫起草的文本，只是因为赖莎要进行修改而遭到否定，戈尔巴乔夫不得不亲自出面解决问题。雅科夫列夫愤怒至极，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不时看我一眼。麦德维杰夫环顾四周寻求同情，同时尽力为自己的措辞争辩。但是，他们都在浪费时间，最后还是赖莎说了算，特别是如果文本牵扯到思想和文化问题的话。

赖莎不仅统治她的家庭，只要有可能，她就不遗余力地参加政策的制定和人事安排工作。最重要的是，她造就了总书记的性格，帮他行驶在充满暗流的危险的政治海域。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评判她的行为：说她有主人翁责任感，或者说她干涉总书记的事务。他也许需要这种干涉，但不管怎么样，这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损害了他的威望。

从斯塔夫罗波尔发迹

戈尔巴乔夫有一次在思考都有哪些因素使他最后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时，说了最初工作过的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社会政治环境对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由于这里自然条件艰苦，气候恶劣，很多当地人都得以磨炼意志、增强勇气、提高能力。许多国内外知名的工业家以及国有和集体农庄的经理都曾在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工作过。多年来，大量受教育程度颇高的人聚集在山脚下的矿泉疗养城里，在当地的文化和学术中留下了明显的印记。戈尔巴乔夫当然不是第一个从这里崛起的政治领袖，安德罗波夫就出生在这里，苏斯洛夫和费奥多尔·库拉科夫（农业部长）都曾在这个地区工作过。像亚历山在·索尔仁尼琴这样世界闻名的作家以及其他一些社会名人也来自这里。

有几十个不同的民族居住在斯塔夫罗波尔地区，这些勤劳勇敢而又精力充沛的人民创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环境，非常适宜那些有才华又有进取心的人发展。戈尔巴乔夫经常谈起那些天分很高的农民，他们虽然没有受过教育，后来却成为成功的经理，从而显示他们努力工作的巨大潜力。他非常感激这些农民，因为他们教给他很多实用的智慧。

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在近二十年中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而且还有着巨大的潜力，这就使得领导人才不断涌现出来。这里有一个巨大的跨越了几个温度带的农业区：从高加索山脚下直到干旱的大草原，实际上也就是从里海到黑海。除了热带作物，这里几乎耕种着所有品种的庄稼，而且条件特别适

宜饲养牲畜，尤其是绵羊。为了给干旱的土地提供充足的灌溉用水，还修建了运河，这就使得种植蔬菜、瓜果、动物饲料和其它作物的细耕农业成为可能。

工业水平也在不断上升。这些年来，电子、农业机械和工业机器制造部门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传统的旅游疗养业和医药业发展也很快，还新建了一些工人疗养院和度假别墅。斯塔夫罗波尔地区人民受教育程度自然提高了。这真是个发愤工作的好地方，又有乐趣又有成果。

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党团组织一向就很强大，成千上万个很有能力的人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由于这一地区的人普遍都努力工作、干劲十足，很多人后来在党政机关，特别是农业领域中担任要职。但这些并不是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独有的特点。其它很多地区也出了不少人才，有的还超过了该区。

最后还要提到一点，戈尔巴乔夫通过在这个以疗养胜地著称的边疆区工作，赢得了很多上层领导的支持，后来在他一级级升迁的过程中，这些人不同程度地帮助过他。

树老根多，人老话多，人越老，就越爱回忆往事，忆及那些令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往日辉煌。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当然也能找到这种普遍的性格弱点。他当选总书记以后，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总喜欢谈起他和当年的政治局委员们会面和交谈的情形，如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安德罗波夫、苏斯洛夫、库拉科夫、米哈伊尔·索洛缅采夫和维·伊·沃罗特尼科夫。他所说的这些谈话并不是在某人的办公室里进行的，而通常是党政领导与他们的家人一起在矿泉水城度假时发生的。

像其它疗养胜地的党委书记一样，戈尔巴乔夫也经常会见、招待和陪同政治局委员和其他政府官员。他们的会面都是在一些非正式场合，例如在农村里，高加索山区，以及景

色优美的山谷和河谷里。卫生部长叶夫根尼·恰佐夫和中央管理者们在这些地方建造了一些漂亮的别墅，还设有极佳的狩猎设施。客人们通常在芳香的草地上铺上一块桌布，摆满各种小吃，然后心情放松，以摆脱身居高位而带来的压力。这个时候，他们显得既真诚又坦率，还有几分感激之情。戈尔巴乔夫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和许多领导同志建立了联系。

我记得曾经看到过戈尔巴乔夫接待一些政治局委员和其他人的照片，当时的气氛轻松而随意，彼此之间充满了信任感。但是，这其中也有一些很微妙的场面。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对每个客人都要赠送一些纪念品，作为高加索之行的留念。

赖莎有一次回忆说：“有些人很直率，一些高级官员的妻子直接了当地说出她们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纪念品。”然后她列出了几位夫人的名字，她们希望得到这种或那种纪念品——高加索硬币、精美的瓷器或其它贵重物品。

“这花了我们不少钱，”赖莎接着说，“我们得想个办法摆脱这种局面。”

摆脱这种局面是不可能的，不过戈尔巴乔夫很快就被调到中央工作，于是这种令人头疼的接待客人并千方百计满足他们需要的工作终于结束了。

戈尔巴乔夫与党政领导的非正式联系无疑对他以后的发达有很大益处，因为他们都曾支持帮助过他，使他承担起重大的责任。而戈尔巴乔夫对安德罗波夫、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以及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评价都很高。在我认识他的这些年中，我从没听他说过一句贬低勃列日涅夫的话，每次提到他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总是充满敬意。他一定非常感激勃列日涅夫对他的器重，以后总是满怀深情地回忆起这些。

1982年1月的一天晚上，在追忆往事时，他真诚而激动地谈起了苏斯洛夫：“他是一个多么聪明非凡的人啊！现在他在书记处和政治局有那多么工作要做，我真是惊讶，不知他是怎样把一切都处理得那样井井有条！”

当这位年轻的边疆区党委书记刚刚成为政治局委员的时候，除了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之外，并没得到什么高升的机会。要想升迁他还得从这新党校毕业，学会如何在莫斯科的官僚机构中进行周旋。此时他又深感曾经作为高加索山脚下一名党委书记对他是多么有益。过去他经常在各种非正式场合会晤来这里疗养休假的各级官员，其中当然有很多人以后能帮助他。他可不是对所有前来的官员都一样费心思，例如，他对他的同级——其它州的党委书记就不是特别的热情，有些人还是自己给他打电话，特意请他会面的。我记得在70年代中期曾经听到过有些党委书记这样评价他：“有那么多重要人物注意着他，他简直兴奋得发狂了。应该把他派到我们乌拉尔地区、贝加尔湖或西伯利亚来。那样会使他清醒过来，就不会这么傲慢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位官员恰巧负责一个不断有达官显贵光顾的地区，就应当受到这样的谴责。戈尔巴乔夫准确地知道需要结识哪些贵人并热诚地接待他们。到了莫斯科以后这些关系在他迅速升迁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了解党中央、部长会议、最高苏维埃、各部委和政府部门以及其它一些重要政府组织中的权力网，对每个想往上爬的人都是必需的。掌握与人交往的技巧，获得那些说话算数的人的支持，也是升迁的必备条件。戈尔巴乔夫花了几年的时间终于最低限度地掌握了这些技巧。人们每对他的优点作出定论之前，总要对他进行全面仔细地审查，并用各种方法

对他进行检验。

他很快掌握了玩弄花招、妥协折衷和取悦他人的技巧，而这些技巧可能早在斯塔夫罗波尔时他就学到了。他成功地学会了莫斯科各级权力机构普遍使用的一些基本策略，包括口是心非、狐假虎威、笑里藏刀的技巧。

首先，能吸引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的注意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他经常光顾剧院，事实上他以此而闻名。他在同记者谈话时所用的言辞热烈而诚恳，仿佛都发自内心，甚至有点故意迎合记者的味道。但当他觉得什么事不对头的时候，就会对他们大声嚷嚷。

当戈尔巴乔夫向总书记这个目标做最后阶段的冲刺时，他在政治方面还很不成熟。他的演讲技巧极差，当面对众多观众讲话时，就紧张得要死，只能照着预先准备好的稿子宣读。不过他进步很快，工作非常努力，想尽力给别人留下一个完美而深刻的印象，要不是他还有一些天赋的话，这些努力也都会是白费功夫。

马克思列宁主义

如果不提及戈尔巴乔夫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列宁理论体系的牢固掌握程度在他事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那实在是我的失职。他熟知共产党的历史和列宁的作品，并且经常运用这些“家底”。这使他在斯塔夫罗波尔及至后来莫斯科的党组织中都显得出类拔萃。很多政治局委员，特别是勃列日涅夫，几乎记不得什么列宁的作品——这并不奇怪，多年来他们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政治事务，还要管理经济，这些占

据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除了《资本论》第一卷，很多人根本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只是在场合需要的时候引用一些列宁的只言片语，就连戈尔巴乔夫也没有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他前辈的著作。中央书记们自然都配有受过良好教育、有着深厚理论基础的助手，当然这并不能替代他们自己对理论原著的了解和掌握。

而戈尔巴乔夫在这方面的弱点就少得多。在改革的第二和第三个年头里，他突然对列宁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发现了许多对他非常有启发意义的章节。每当我去他办公室的时候，总能看见他的大桌子上放着几本这位社会主义奠基人的著作。他常常当着我的面拿起一本来，大声朗读，并与现在的形势进行对比，然后赞颂列宁的聪明才智。他觉得这还不够，为了显示他对马列主义熟悉的程度，他会让我从书架上抽出某一卷来，从中找出某一段话。每当我表现得有点犹豫的时候，他就会气愤地说我对马列主义的创立者们了解太少。事实上，我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些段落都死记硬背下来，而且即使脱离上下文，也能有效地说明社会中的某些问题。

在1986年和1987年里，戈尔巴乔夫受到列宁著作强烈影响，给我的印象是，他急于提出一些能够继承列宁思想的理论，并且期望也能够像这位苏联的奠基者一样做出震惊世界的举动。

当起草或准备发表他的演讲稿和文章时，戈尔巴乔夫总是尽力为其中的建议提供理论依据，以显示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多数情况下这种意图都显而易见。正像我们所看到的，戈尔巴乔夫非常喜欢发表文章，他对此有极大的热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如此之多的著作以他的名义出版发行，蓝皮书在书架上排成堂皇醒目的一行。

还在大学上学的时候，特别是在斯塔夫罗波尔的共青团和党组织里工作时，他就养成了向报纸和杂志投稿的习惯。有一次他让我把他在斯塔夫罗波尔所写的全部文章都搜集起来，结果我们得到了沉甸甸的一大堆，一个人压根儿提不起来，更别提搬动它了。但是其实质内容与这些物理重量比起来却很不相称。他在斯塔夫罗波尔写的所有文章都明白无疑地表明，他认为要想使苏联社会发展，最基本的就是必须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严格执行党代会的决定以及勃列日涅夫当时提出的具体作法。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不折不扣地落实了这些想法，不论是开始作为边疆区的党委书记，然后是中央书记，还是最后作为党的总书记。

在莫斯科召开的隆重纪念列宁诞辰 113 周年的大会上，他作了发言。他是这样描述列宁的：“他的名字已经成了世界革命的象征，他的思想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进步群体，并且已经在各种社会事务中得到了具体体现。”

1987 年庆祝十月革命胜利 70 周年的时候，他又一次表示忠心拥护列宁的思想：“70 年在文明发展的世纪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是没有有一个历史时期能够与我们在伟大的十月革命以后取得的成就相比。我们应当踏着前人的足迹，把我们的全部精力和智慧都投入到十月革命所确立的伟大的革命目标中，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崇高的事业了。”

我只是有选择地引用了一些事例而已。然而，为什么后来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态度发生了 180 度的大转弯，对此还没有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他的思想何时开始发生变化的也是一个谜。

很可能他在设计改革方案的时候，并不能烧毁连接历史的桥梁；或者如他自己所说，改革的进程还没有启动；或许

他压根儿没明白顾问们向他建议的改革究竟是什么性质。无论如何，他在1986年2月第27次党代表大会上发言的时候，再一次宣称苏联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仍在焕发生命力的明证。

历史学家终将弄明白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是在什么时候以及怎样发生了如此急剧的变化。究竟是什么使得他从宣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转为赞扬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呢？

戈尔巴乔夫自己迟早也要向全世界解释他的观念和原则发生剧变的原因。他当然不想让别人把自己看作一个风向标，随风摇摆。我个人倾向于相信这种说法：这一切并不是他自己的选择。总书记发现国内外的势力不仅束缚了他的手脚，而且还设下陷阱陷害他。他被迫带领党的信徒们进了屠场，而最后只有他自己不仅毫发未损，还更加肥了。也许他想重新开始一切。

第三章 从反酗酒开始？

早在1985年春，戈尔巴乔夫在准备视察莫斯科的一些企业时，就曾讲述过他周游苏联的计划。“当然，我需要走访尽量多的工业中心和主要农业地区。”他说，“我必须了解国情，知道老百姓担心什么。但是我觉得最好还是从最大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开始。这样的地方我去过一些，不过都在莫斯科；现在应该去革命的摇篮列宁格勒，然后去基辅，以后再根据需要决定去别的什么地方。”

他以后的日程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安排的。1985年夏天，他去列宁格勒作短期视察，然后去基辅和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对工厂的党员和工人发表演说。对许多人来说，这是值得纪念的时刻。党的干部、企业领导和工人们平生第一次看到如此生气勃勃的总书记。他不用助手搀扶，回答问题令人心悦诚服。他还不时脱离讲稿。看得出，他对视察的企事业和社会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心里想什么一清二楚。

他对自己在列宁格勒的演说十分满意，下令电视台从头到尾播放。就是从这时起，他对自己能不过份依赖于讲稿开始充满信心。此举并不妥当，因为他的即兴发挥占有的时间

长，而且漫无边际，有时该说的反而没有讲。尽管如此，它仍是个不同寻常的举动——使人回想起过去的年代，那时天才的革命家不用讲稿而鼓动群众干起惊天动地的事业。然而这种时代毕竟一去不复返了。在1985年那个时候，人们需要的不是能言善辩，而是组织才干。

1985年秋初，由于石油产量下降，带来硬通货的严重损失，戈尔巴乔夫去视察西伯利亚西部的秋明和哈萨克。打前站的包括党中央书记处的书记、部长会议副主席、政府成员和其他高级官员，他们为此行作了充分准备。

赖莎同戈尔巴乔夫一起飞抵秋明。在那个年月，这种伉俪同行很可能是百姓对于戈尔巴乔夫夫妇不满意的唯一缘由。

赖莎精心打扮，穿的是从国外定做或购置的时髦服装，戴的是天然首饰，自然给人留下很深印象。但是，秋明的工人们，尤其是妇女，对此根本不能理解。原油和天然气工人的妻子儿女们生活十分艰难，他们之中很多人还住在破烂不堪的兵营式的生活区，没有什么方便设施。他们的衣着最简单不过，与总书记夫人的华丽装束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只能报以冷峻的沉默，心中十分不满。

更糟糕的是，那时赖莎还没有专门为她安排的“夫人日程”，于是总书记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基本上形影不离，从油井到与当地官员的会议。尽管如此，公众对戈尔巴乔夫这次访问的反响热烈。他们到达视察的第一站时，人们倾城出动，在摩托护送队的周围排成一道厚厚的人墙。这样的要人来访实在新鲜，大家都蜂涌而至，一睹为快。在苏尔古特和杨堡，欢迎的人群熙熙攘攘，兴高采烈。实际上，地方官员也未料到会出现这样纷杂的场面，十分紧张，但愿一切顺

利，但愿领导人对产油区的访问圆满成功。

这是戈尔巴乔夫出色之旅中的一次，由于电视的播映，在全国引起更大反响。他自己对此行成果和工人们给他的欢迎也十分满意，于是表达出一种思想（此前我已听说过）：“我们必须依靠人民，他们会帮助我们解决任何问题。”

如此看来，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他相信人民，视他们为自己力量的根基。只是到后来他才认识到他们还很落后，听不进他的新思想，无法理解他倡导的改革。

他在视察期间对秋明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的一些问题寻求解决方案，召开了专门会议，听取了硬件设备、输油（气）管道和各种原料供应者的报告；对社会问题也作了研究，制定出加速建造居民房和供应更多消费品（尤其是冬装）的计划。在有一个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坚决不同意这些北方官员的意见，他们要求在靠南地区、在国家的中部地区大力发展合作建房。

“你们应该住在这儿，就在这里。”他充满信心地对周围的人群高声宣布，“你们就应该在这里生儿育女、退休养老。”

显然，他在说这番话之前没有深思熟虑。人们的反应不但是沉默，而且是激烈的反对。他们争辩说，遥远的北方可不像克里米亚的斯塔夫罗波尔，甚至不如乌拉尔山脉的彼尔姆地区。他们告诉他，北极地区一到冬天就冰天雪地，日照时间很短，空气中又缺氧，孩子们很容易生病，老人很难挺过来。然而总书记不为所动。他说，开发北方边疆地区非常重要，还是要终年住在这里，因为条件如此之好，住房质量又如此之高。谈到这里他热情洋溢，充满自信，强调再三。我都担心我们究竟是否还回莫斯科去，既然这里的生活如此美好，我们何不也在北疆定居呢！

不过，我们还是悄悄地离开了北极圈以北的这个地区，飞抵秋明，戈尔巴乔夫将在那里发表重要演说。由于他想对演讲稿做些变动，就硬要雅科夫列夫和我当夜修改。第二天早晨我一醒来，稿子已不在了。显然，戈尔巴乔夫起得更早，是他把稿子拿走亲自动笔了。

他在演说中谈到加快开发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的问题，严厉批评了造成浪费的某些采油手段，以及未能在油田使用密集开采法的现象。当时仍使用落后的技术和设备。演说也充分论述了一些社会的和经济的问题，它们不仅与秋明有关，而且涉及到整个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此外，他还提到一个特别微妙的问题：禁酒计划，这是党中央政治局和部长会议最近通过的。

反酗酒运动及其它政策

前面我已经提到，如今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一批可以说是“新人”的手中，他们之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有些极其大胆的想法。遗憾的是，他们的大胆无畏是儿童的大胆无畏，危险就在眼前时他们也认识不到。近年来党中央和政府收到医生、科学家、作家和妇女的许多来信，声讨遍及全国、使各阶层人民深受其害的酗酒现象。于是戈尔巴乔夫下令制定一系列措施，扫除这种弊端。

这一时期计划采取某些激烈措施，其中包括减少不以葡萄为原料的酒精度高的甜酒产量。这种大家叫做“巴尔莫杜什卡”的酒到处都有，价钱又便宜，因而被视为特别有害。伏

特加的生产也要逐渐减少。白兰地、干葡萄酒和香槟则不受影响。但是，当草案送交政治局讨论时，委员们在一种“除恶务尽”的崇高愿望的驱使下，一致认为提出的措施不够得力，必须加码。当利加乔夫和索洛缅采夫受命监管这个计划时，我以为不仅将禁止人们喝酒，而且连闻一闻酒味都不行。

大难即将临头，我这种感觉不幸被事实所证实。国家计委和贸易部官员、加工企业以及农民们尽其所能地捍卫制酒业。他们警告说，建议的措施将使国家财政损失几十亿卢布，并将使葡萄种植者破产，大部分酒厂倒闭。然而，那些人坚信禁酒对人民有好处，与他们讲道理是徒劳的，禁酒的调子越唱越高，权威的建议越来越多，继续讨论实无意义。主张逐步地慢慢减少酒产量的人被打成反动分子，说他们妄图使苏联人民世世代代饮酒不止。辩论很激烈，不过政治家最终还是占了上风。

禁酒一方获胜后，又经过索洛缅采夫的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几次热烈讨论，计划便付诸实施。其举措比原先设想的还要极端，要减产的不但有伏特加酒和上面提到的巴尔莫杜什卡酒，连白兰地、干葡萄酒和香槟酒也不能幸免。进口酒的销售量将大幅度缩减，致使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酿酒业濒临破产。像往常一样，我们一心一意地投入与邪恶斗争的崇高事业，却忘了事先向朋友通报我们要减少对他们酒的购买，以致苏联人对酒的兴趣突然消失时，他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严峻事实。

这些决定以及伴随而来的加工工业与酿酒业的破产给国家财政以沉重打击。财政机构不久便尝到苦果，国家计委、财政部和农业部全力放缓变革的进度，至少把它限制在决议本身规定的程度。然而不幸的是，党的监察委员会经常干预，索

洛缅采夫已 72 岁高龄，酒已经喝足了（在有些人看来他喝得太多了），如今对禁酒毫不让步。政治局委员们在开会时都异口同声地主张扫除酒患，不过我与他们单独讨论此事时，却发现他们实际上倾向不要这些决议，说减少酒的产量简直是胡闹。据我所知，他们本人的喝酒习惯一如既往。不用说，当时其它国家仿效者寥寥无几。

对其他人而言，法令依然有效。在秋明，戈尔巴乔夫声称：“我们将恪守戒酒法，毫不动摇。我们将坚持原则，善始善终。”

这个轻率的法令对国家的经济、也对领导集团的权威带来了严重后果。公众对这些草率构思、仓促出台的措施既不理解、也不买帐。

在 1985 年 11 月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人数骤然减少。人们遗憾地看着拼盘，它本不是同矿泉水和果汁一起供人享用的。外国人则用训练有素的眼光打量着改革的最初成果，同苏联领导人友好地握手，表示祝贺，并祝他们在已选定的道路上取得更大成绩，然后便匆匆离去。他们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于是，在后来举行的所有招待会上，政府领导人不顾他们自己制定的法令，把葡萄酒摆了上去，有些还有白兰地。

后来，人们大都觉得，在整个改革计划中，禁酒法是唯一真正实施了的项目。其实不然，连它也只得到部分实施。党中央收到成千上万的抗议信。以前写信坚决要求采取禁酒行动以挽救崩溃的家庭和丈夫儿女的妇女，如今又来信要求增加伏特加的销售，因为她们的丈夫已转而喝科隆香水，吃牙膏甚至鞋油，而他们又不习惯于这些东西的味道，于是便大发脾气。整个人民向政府和执法部门发起秘密战争，第一个

牺牲品便是政府对酒业的垄断，而一旦破除后便不可能恢复。以糖为主要原料的国产饮料业蓬勃兴起。从那时开始，糖一直是紧俏商品。

政府害怕了。政治局开会时，很多委员对禁酒令的发起人怒目而视，对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和索洛缅采夫也流露出敌意。不过，禁酒令的倡导者津津乐道于拯救众人于灾难之中，他们继续坚持多年，像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那样，决不偏离既定航向。而且，在禁酒法生效的初期，由于酗酒的人少了，犯罪和伤人事件确实有所下降。当然，也发生了核电站的锅炉爆炸、火车相撞和沉船事件，而这些可能是长期禁酒的结果。

戈尔巴乔夫视察秋明期间，正是酒的问题开始受到关注之时。当地妇女发表演说，盛赞戈尔巴乔夫把大众从堕落中拯救出来，使家庭避免破裂。她们的男人们则保持沉默，神色严峻。他们坚信，改革在此边疆地区行不通。为了过冬，大批白酒已经运来，任何人别想再把它弄走！

这就是戈尔巴乔夫之行给石油和天然气工人留下的相互矛盾的印象。

下一站是西哈萨克的切利诺格勒。在那里又举行了一次集会，然而同以前的这种集会一样，它也没有对这个农业区的运作带来丝毫影响。戈尔巴乔夫在演讲中准备谈几个问题，其中包括提高面包一类食品的零售价格。对这个问题早该采取措施了。不过我很担心，未经过细致讨论而匆忙出台的任何决定只能带来一系列预见不到的后果。

还有一点令人担忧：有人计算过这项措施将对其它产品的价格带来什么影响。正如在《真理报》工作的我的一位朋友所指出的那样：“金价上涨时，老百姓不会怎么注意，因为

他们不买那些贵重物品。然而，金价一涨，市场上萝卜的价钱也会变化。”这条法则毋庸置疑。我发现面包一类食品提价的细节未经充分研究，不得不告诉戈尔巴乔夫，我不赞成此事，并尽量说明自己的观点。他默默地听着，没有回答。不过，价格问题显然需要引起重视。

那时我并不赞成价格保持原状。多少年来，价格没有反映经济的真实情况。现在正是采取措施的时机，因为人民还信任政府，市场流通的商品还齐全，对卢布的支持率也达到50%。但是，处理这些问题必须过细，必须兼顾所有商品和服务项目的价格。轻举妄动只会破坏金融秩序，带来新一轮而且更严重的通货膨胀。

在80年代中期，当权者不敢铺开战场处理这个问题，而是坐等奇迹出现，结果浪费了宝贵的时光。实际上，我国提高生活水平的努力几乎一直寄托于奇迹的发生。过去革命、集体化、改革、扩大玉米种植、垦荒、生产的集中管理、生产的专业化，无不寄托于奇迹；如今，转轨、民主化、农业私有化，也都指望奇迹会出现。更糟糕的是，与此同时极少采取切实措施来改善生活条件。

次日，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正好是我50岁生日。飞机在高空飞行，在飞机的休息室，雅科夫列夫和拉祖莫夫斯基提醒戈尔巴乔夫那天是我的生日，于是赖莎叫人拿来一瓶红葡萄酒。值得说明的是，从一开始，她就一直反对对禁酒法的新解释，声称禁止饮用葡萄酒纯属胡闹。

我一直赞成她的观点，只要可能就坚持这一立场；不过，在那些日子，我没有机会对这个人人关心的问题做任何实事。

我们把这种名叫穆库扎尼的葡萄酒倒在杯子里。戈尔巴

乔夫可能觉得在下属面前喝酒感到尴尬，也可能有其它原因，总之他只抿了抿而没有喝。话题很快转到此行的结果以及它给随行人员留下的印象。

突然，赖莎说道：“让我们为我们的事业干杯！为忠于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干杯！我要你们起誓，永远忠于他。”

她的提议使在场的每个人都大吃一惊。雅科夫列夫转过身去看着窗外，拉祖莫夫斯基则出人意料地笑起来。我不相信赖莎真是这个意思，更不理解个人起誓有什么意义，于是想大事化小。我们致力于同一个事业，报效自己的国家，毕竟不是忠于任何个人或其配偶，而且也不是生活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下。然而赖莎仍然坚持，显然有其用心。戈尔巴乔夫举起高脚酒杯，但赖莎坚持说：“不！不！你们必须说‘我发誓’。”

局势眼看要控制不住了。如此看来，我们也要宣誓效忠于她。雅科夫列夫巧妙地转换了话题，说起在其它国家的见闻，此事才尴尬地收场了。

几年后，当戈尔巴乔夫的老战友拉祖莫夫斯基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时，我又回想起穆库扎尼酒事件。不久雅科夫列夫也被撵出总统委员会，但得到承诺：福利待遇不变。然而这种允诺后来毫无意义。1991年，他就自己的待遇问题大发雷霆说：“我毕竟没有提出什么要求，他们答应过我的福利待遇不变，但戈尔巴乔夫没有遵守诺言。”

这就是他辞去总统高级顾问的理由之一，当然还有许多其它原因。好多报纸载文严厉批评他，戈尔巴乔夫没有出来为他说话。其实，作为党中央总书记，他本可以帮上忙的。戈尔巴乔夫不愿意为他人辩护，尤其是别人处境不妙之时；为

他忠心耿耿工作的人一旦受到攻击，他便会立即抛弃他。

强求别人发誓效忠，甚至在 34000 英尺的高空，无异于强调对个人忠贞不二。这是把别人视为自家奴隶的皇家恶习，不要他们忠于事业的原则和利益，而是忠于某些个人（甚至是政治骗子）。戈尔巴乔夫的臣民则被他们的主子老爷要求随时更换衣服，以适应某天某种特定的装束。

那几年时间似乎过得很快。戈尔巴乔夫的日程表上排满了会议，经常发表演说。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准备好讲稿，每次都要根据他的命令反复修改。到此时，在党中央的沃伦斯基别墅里已住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写作班子，为总书记准备报告、演说和讲话。国际专家也在忙碌，因为戈尔巴乔夫讲话中要谈些国际问题。

戈尔巴乔夫 1985 年 9 月 1 日在切利诺格勒演讲后，又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讲，会议结束时还讲了话。与此同时，9 月 30 日对法国电视台的讲演稿也在准备之中。10 月份他的日程包括 15 次演说、讲话、报告和谈话，没有发表的那些还不算。有的月份，他的言论（包括演说、贺电和发表的文章）超过 32 次。当然，数量并不是唯一的顾虑，问题是戈尔巴乔夫本人偏偏要积极参与准备讲稿，对已准备发送的材料加以修改，有时改得比原稿好，但更经常的是越改越糟。总而言之，准备讲稿很费时间。

戈尔巴乔夫总是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打乱了正常的秩序。本来政治局应该对他演说的内容事先讨论通过，而实际上委员们对他的倡议和允诺大都是通过读报才了解到的。再说，戈尔巴乔夫要接见一批又一批的外国客人，很难有时间认真考虑国内问题，也没有时间同政府的部长们、各共和国的第一书记、以及各州和边疆区党组织第一书记交谈。

所有这些都拉大了总书记同中央委员、地区党组织第一书记以及工业界领导人之间的距离。他们都乐于继续帮助戈尔巴乔夫，但却与他失去了联系，不知道他在哪里。戈尔巴乔夫自己往往避免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这是他性格的一大弱点。戈尔巴乔夫很少给地方官员打电话，对当前动态也不感兴趣。隔阂开始出现：地方官员很快就意识到，与总统当面会见或电话交谈都毫无意义。戈尔巴乔夫对经济事务开始失去兴趣，他不顾忠告和请求，不再单独会见部长和企业经理，而往往成批地会见。他利用这种场合发表简短的鼓舞士气的讲话，其间还夹杂着严厉的批评。人们都有隔阂感，尽量不去见他，除非迫不得已。日程安排的活动结束后，10至15位书记一起被总书记召见，讨论的气氛相当庄重，大部分时间是戈尔巴乔夫一个人讲话。

我的一位老朋友曾任西伯利亚地区某州的党委第一书记，有一次他为我描述了自己失望的心情：“这些政治讨论真让我倒胃口。我想谈具体问题，但听到的是老一套的政治空谈，就是你从地方党委听腻了的那种宣传鼓动。如果你能帮忙，就设法安排我和他当面会见，否则我真不知道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

会见戈尔巴乔夫要由他的秘书安排，我不能够、也不愿意改变这一程序，因为我不认为自己是他的接待员。当然，如真出现紧急情况，我也会写个综合报告，请他对地方党的书记的某些信件格外注意，或通过接待员转交戈尔巴乔夫本人。不过，这类请求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减少，见到戈尔巴乔夫不再是很困难的事了，几乎随时可来，而今反倒是无人扣门。来访者越来越多地是外国人和外国通讯社的记者，这些人想沐浴在他的荣光之下，或者为了以后能对同事们炫耀自己曾

与苏联总统作过长谈，他支持他们的观点并答应帮忙。英国报界巨头罗伯特·马克斯韦尔带着自己的摄影机来见戈尔巴乔夫，照完相便离去。他没有什么特别问题要问，他和戈尔巴乔夫都即将垮台，相互也帮不上什么忙。不过马克斯韦尔还是充分利用了这次会见。

1985年春，我被任命为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的助理。在起草1984年会议上他的报告之后，他曾让我负责意识形态事务。我当时就意识到这不会长久。他任命阿·帕·卢希科夫为助理，这是一位有经验、有头脑的人，善于处理多种问题。他起初留用了阿·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作为对西方国家事务的主要顾问。此人是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三朝的元老顾问。尽管是学者出身，但总是用老眼光看待当前的问题。负责社会主义国家事务的V·V·沙拉波夫，后任驻保加利亚大使。党中央总务部则交给熟悉行政事务的卢基扬诺夫，他曾与莫洛托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共过事（他自己也很喜欢提及这点）。

这个班子的成员思想不同，处理工作的方式也不同，很难说能融洽合作。

那时雅科夫列夫已经负责党中央宣传部。我看不出自己为什么调任这一职务，直到后来我才了解个中缘由。早在60年代初期我已经熟知的党中央的学者斯米尔诺夫此时被任命为负责意识形态问题的助理。他受过良好教育，稳重，有时甚至慢慢腾腾，很少主动提出什么看法。雅科夫列夫把他推荐给戈尔巴乔夫，说他规规矩矩，简直好像瓷器店的一头公牛（原意思为爱闯祸的粗人，此处指虽不一定合适但还老实的人。——译者）。就是这些五花八门的人组成一个班子，协

助总书记决策。

“让战斗开始吧！”

戈尔巴乔夫和夫人继续在全国各地旅行。我们经常去工业中心（如大工程和军工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他计划视察古比雪夫州，那里有庞大的工程设备，包括位于莫斯科东南 500 英里的陶里亚蒂市的伏尔加汽车制造厂。虽然有这样一个大规模企业在他们的管辖之下，当地领导的表现却不尽人意，第一书记也威望扫地。看起来这种情况不久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全州——后来也确实如此。不过在当时，戈尔巴乔夫仍希望自己的视察会带来变化。

总地看来，此行相当有意思。戈尔巴乔夫和赖莎受到热烈欢迎，但电视台对这次视察的报道使赖莎不太满意。负责此类事务的斯米尔诺夫把任务交给电视台和雅科夫列夫经管的宣传部副部长的第一秘书。有一天用餐时，赖莎问起视察的问题。

“这里的人民真好，我们受到盛大的欢迎。”她说，“但是新闻报道很糟糕。人们能看到的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只是他的后脑袋，他和他的随从也分开了。镜头中尽是成群的记者、电视台的人员、党中央意识形态专家和分管这行的助理们。”

这番话使我想起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有一次我听到戈尔巴乔夫本人提出的批评，内容一模一样，讲对他第一次视察吉尔汽车制造厂的新闻报道很差。我作为此行的组织者，

根据戈尔巴乔夫本人的要求，安排了一次低调的、注重实际的报道，毕竟这是一次工作访问。总书记将了解这个工厂的情况，还要去普罗列塔尔斯基地区的一个医院、一所学校和一个“普通”工人的住房。因此，只邀请了很少记者同往，电视新闻也只报道几个镜头。戈尔巴乔夫同意这种安排。我个人认为，对这次视察除非采取务实的严肃态度，否则看上去只会是招摇过市。

可是第二天，我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我没有理解对总书记视察的报道应当包括什么内容，没有把它报道成一项划纪元的事件。头一天还亲自选定上电视的镜头的戈尔巴乔夫如今却在埋怨报道质量太差。我留意了他的讲话。可又一次视察之后，我再次受到训斥，尽管此前我专门请来党中央宣传部的专家帮忙。雅科夫列夫发现我的问题后，骂了几句，然后试探着说，戈尔巴乔夫的背影出现有什么关系？毕竟任何见过他的人都可以作证，他的后脑袋展现出一个异常高贵英俊的形象。他每天都光顾理发师，此举已非同寻常；如果某人的后脑袋每天都上电视，他肯定会感到自豪。因此，这件事到底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雅科夫列夫的话引起我的思考，我开始从全新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可能我思考的时间太长了，也可能我还是没有完全想通，等到我最后知道电视镜头该对着什么的时候，我已被调往新的部门。接替我的是长于世故的斯米尔诺夫，他是科学院的通讯院士，曾任哲学研究所所长。显然，我不必再为戈尔巴乔夫的后脑袋伤脑筋了。

如今，负责提高苏联领导人形象的人——格奥尔基·卢基奇就坐在桌旁。赖莎没有直接对他讲，只是大谈老百姓对总书记的热爱（对此大家毫无疑问），而电视却未能把这种热

爱播放给全苏联人民和世界各国。说到其它国家，她可能说得对。不知是一时心血来潮想要小聪明，还是想起自己也受过类似训斥，总之我说了句：“依我看，不但视察成功，报道也很完美。”

这句话无助于场面的平静，反而引起赖莎一段更长的独白。她对我们畅谈了自己对宣传鼓动和意识形态部门以及对苏联电视摄相师专业技能的高见。听到最后，斯米尔诺夫把餐巾往桌子上一甩，快步给前来报道此行的班子打电话去了。他惯有的哲学家的沉稳被打乱了。他下令：出现在电视上的总书记只能是“正面”形象。

第二天早晨，卢基奇和我坐在大厅里，等着来人招呼用早餐。助手经常应邀与总书记共餐。时间过了很久，卢基奇不禁问道，我们被遗忘了呢，还是不值得邀请？我想了想回答说，这种事以前从未发生过，我肯定等一会儿就开饭。卢基奇的胃动过大手术，定时进餐就像吃药一样重要。最后我也忍耐不住了，便问走廊值勤的卫兵戈尔巴乔夫在什么地方。他说早餐已取消，戈尔巴乔夫没有叫上我们就自己去了工厂。

此后不久，斯米尔诺夫调到另一部门。他吃不消这种变来变去的日程。他经常生病，习惯于平淡的生活方式，经受不了精神高度紧张和蒙受羞辱。

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们变动更频繁了。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离去时，戈尔巴乔夫征求意见看谁接替他好。我当时提到阿·车尔尼亚耶夫，认为他是个博学能干的笔杆子。这一提名没有马上被接受。戈尔巴乔夫有次出访时见过他，总的印象是此人不适合当助手。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问题日趋重要。雅科夫列夫告诉我，他后来也提到车尔尼亚耶夫，这次总算成功。在我看来，戈尔巴乔夫对这次选择从未后悔过，

两人合作得像孪生兄弟一样。

接替斯米尔诺夫的是伊万·伏罗洛夫。此人受过良好教育，知识面宽，还算能干，可是由于健康欠佳，常常引起行动不合拍，工作效率差。这无疑是这位《真理报》的总编和编辑之间出现矛盾的原因之一。新任命的还有其他一些人，如沙赫纳扎罗夫。

彼得拉科夫也出现在我们中间，但很短暂，不久便被选为科学院院士。还有许多专职或兼职的顾问、助理、助理的助理、顾问的助理。伴随而来的当然也有各种矛盾和磨擦，政界人士聚到一起难免这样。每个人都想出人头地，在太阳之下赢得一席之地。顾问和助理，到底孰高孰低？弄得内部争得你死我活。车尔尼亚耶夫和沙赫纳扎罗夫给总统写了个条子，指出在内部电话号码表上，助理列在顾问的后面。顾问闻听此事反驳说，他们全属于另册，根本不能与助理相提并论。无事生非，这也司空见惯。他们许多人怪罪于我，说我这个办公厅主任，器重一部分人而瞧不起另一部分人。他们责问：为什么某人开着新车招摇过市，而只配给雅科夫列夫一辆老车？为什么没有配发给他们通讯设备，而戈尔巴乔夫有？总书记对于这些争斗心里很清楚，却采取一种哲学家的超脱态度，从不刨根问底。他还告诉我不要为此浪费时间。

1985年夏秋两季，戈尔巴乔夫一直在国内外旅行。他对于我国的经济潜力、人民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担心和需求没有一个全貌的了解，因此想填补知识上的这个空白，进一步了解需采取什么措施。而所见所闻使他震惊。他了解到祖国的辽阔，有巨大的生产潜力；当然，也深感面临的问题十分复杂。他有充分理由采取他实际上已采取的对策：要破除根深蒂固的经济管理制度，而这又要冒使生产停顿的危险。

但是，人民要求改革。要什么样的改革，戈尔巴乔夫还不是很清楚，不过他总是对自己、对周围的工作人员、对集会的民众反复引用拿破仑的名言：“让战斗开始吧！然后我们再见机而行。”

有人可能要问，戈尔巴乔夫有必要这样匆匆忙忙地打破全国的生活体制和社会体制吗？他毕竟只是宣布要进行改革，并没有讲要向经济开战使人民遭殃啊！不管怎么说，没有制订好作战方案就投入战斗也只有拿破仑啊！

当时，为了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发起进攻，不仅需要政治局和党中央全会作出决策，也要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苏共 27 大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这次会议要讨论改革的战略战术，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去迎接异乎寻常的巨大挑战。

政治局会议指定一个班子起草总书记的主报告以及其它文件。领头的是雅科夫列夫——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我们集中在沃伦斯基 2 号，它座落在一个树林中。这个小树林与明斯克公路平行，距胜利纪念碑约 1/4 英里，离莫斯科商业区不远。我们在别墅开始为党代会起草文件，这是改革时代开始以来的首次党代会。我们讨论的主要内容是报告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如何开头就争论了很久。传统的作法是从国内问题开始，但这次有人提议要从国际问题谈起，起草一份我党关于世界发展形势的基本政策。雅科夫列夫得到世界经济和国际事务研究所几个研究员的帮助，他们很快送来了报告稿的部分章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想到要对国际问题规划一个新的政策，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新思维”。值得提醒的是：改革的思想，包括它的基本组成内容，都主要是雅科夫列夫的主意。戈尔巴乔夫几乎所有的讲话也都以雅科夫列

夫的思想为基础。如今这项艰巨任务又落在他的肩上，主报告所有章节的起草他都积极参与了。

讲完国际问题后，报告接着转入经济和社会问题。这部分基本上包括改革的所有侧面。改革的理论在这里得到系统的阐述，讲得非常细。我再次感到，这样只能使人们摸不着头脑，搞不清“改革”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又如何把它付诸实践。后来发生的事情正是这样，改革变成了笑话和趣闻轶事的题材，逐步成为各种活动中混乱和摇摆不定的代名词。

我们认为报告的草稿可以送去一审了。这时戈尔巴乔夫把雅科夫列夫和我召到黑海边上的皮聪大，他和家人正在那里度假。虽然时已深秋，还可以穿着单衣在外面散步。戈尔巴乔夫提议我们在海滨凉亭里讨论报告稿。在150英尺的远处，海水一浪一浪地翻滚着，带着潮气的凉风迎面扑来。戈尔巴乔夫、赖莎、雅科夫列夫和我都裹着毯子大声读着报告。我把每个人的评论录在袖珍收录机上。重放时只能带着耳机听，因而不时引起大笑。大家的评论要比报告稿长两倍，都得经过仔细推敲，加进报告稿中，又不能影响原稿的基本内容。

此时戈尔巴乔夫越来越直接地参与方针大计的起草工作。他对主题已经了如指掌，对实质问题的判断也有根有据。最重要的文件他积极参与准备，也邀请最信任的助手参加，但自己唱主角。尽管如此，他显然还需要我们起草的第一稿，因为它体现出最基本的思想。当然，他要我们反复修改好几次。

我们在皮聪大加班加点地干，等回到位于一个旅馆和一个疗养院交叉处的住地时，都已精疲力尽。戈尔巴乔夫一家下榻的别墅属于国家安全委员会，位于如今世界闻名的小松

树林，分成互不相连的三处。这里是一个大自然保护区，十分幽静，只能听见海浪冲刷海滩细石的沙沙声，令人心旷神怡，是休养的好所在。在这里，疲劳很快便消失了。

戈尔巴乔夫夫妇住在一个两层的小楼里，有木质镶板的内室，房间很大，还有一间办公室。傍晚时分，我们便到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继续研究。有时他留下我们用餐，饭菜同莫斯科一样单调无味，而且量少，我们常常回到住地再吃一顿别有风味的格鲁吉亚菜。总而言之，戈尔巴乔夫家的气氛并不特别有吸引力。除特殊情况外，天天如此。上午十点钟，夫妇俩出去散步。

我们开始积累材料，工作逐步取得进展，不久便可返回莫斯科，带上一大堆评论和补充材料，然后开始关于 27 大报告的第二期准备工作。1986 年 1 月初，讲稿准备完毕，只需总书记本人最后润色。他建议，收尾阶段在扎维多沃进行。那是勃列日涅夫及其亲密助手最喜爱的休养地，本是专供狩猎的军事禁区，距莫斯科 90 英里，沿列宁格勒公路，在一个水库旁，离科纳科沃车站不远。国内外的要人都喜欢到此打猎。

过去几年里这里建起一些别墅。当年勃列日涅夫住过的房子属于 60 年代建造的五层楼公寓那种标准样式。而今的别墅很高级，有昂贵的木镶板和大吊灯。整个地方是农民小木屋的古朴样式和意大利豪华的当代风格的结合体。

戈尔巴乔夫就住在这里。雅科夫列夫、梅德维杰夫和我住在百码以外的五层楼公寓，里面设有大游泳池或桑那浴室。饭厅很大，有专门放电影和打台球的房间。还陈列着勃列日涅夫和客人们留下的猎物和各种纪念品。附近还有两个两层楼的豪华别墅，装饰和陈设都是进口的，当时没有人住。

每天上午 10 时左右，我们五人就在戈尔巴乔夫别墅“农

夫屋”里坐下来开始工作。中间是个未上油漆的小桌子，四周是用熊皮和野猪皮铺垫的大扶手椅。赖莎如今已成为参与文件准备的正式成员，她对草稿字字句句反复推敲。她组织大家工作，对报告稿在意识形态上的纯洁性严格把关。大部分内容都要听写下来，加以补充修改，有些条文要加进去。总之工作进展很慢。

中午，赖莎宣布稍事休息，并用茶点，包括热牛奶、咖啡、糖果、小饼、奶油、搅奶油果冻。她和戈尔巴乔夫端起土耳其玻璃杯，喝的是专门配制的咖啡。茶点用毕，打开窗子通风，我们便出去活动，然后又回来接着干这种枯燥劳累的工作。

戈尔巴乔夫夫妇苦干精神出众，他们对雅科夫列夫和我准备的草稿在很多地方提出质疑，我们则尽力捍卫自己的成果。只是在我们确实弄懂他们不满意之处后，我们才进行修改，不过最后总是他们说了算。即使我们着力保留报告草稿的某一特定章节，几天后我们还是发现已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意愿改了。只有梅德维杰夫愿意推翻自己准备的原稿而另起炉灶，常常是主动这样做。雅科夫列夫和我不禁觉得此人如此健忘。在沃伦斯基的时候，是他坚持原稿行文的啊！梅德维杰夫也是个干活不要命的人，他认为有了更好的就不要好的；到第二天他又会发现最好的又比更好的还好，如此循环不止。

最后，报告稿总算敲定，我们该走了。我们到户外一看，发现田野、树木和水塘都盖上了厚厚的一层雪。站在外面太冷了，于是我们快步走了一会儿就准备离去。内勤人员已经开始打扫房间，保安人员已把车开到门口。我们站在前门，等候戈尔巴乔夫和赖莎。丈夫先到，几分钟后夫人也来了。他

们伸出手来，我们热情地握手。我们想说声谢谢，又觉得表示感谢的一方不应该是我们。头天晚上举行了告别宴会，上的是白兰地、威士忌和葡萄酒，但整个气氛不够欢快。我们对他们找不出什么可谈的，只是回忆了1985年的春天，当时有人开始谈论要发起阻止戈尔巴乔夫上台并把他赶出政界的运动。总书记对这些记得一清二楚，包括那些人的名字。显然，他什么也没有忘记。

聚会结束时已到半夜。我们的房间黑黑的，叫人提不起精神。这时我觉得烦透了。我把文件整理好。这些天，戈尔巴乔夫的报告稿或直接送给总书记，或通过我转交。办公厅主任卢基扬诺夫很讲效率，文件从不耽搁。他把自己对总书记的责任看得很重，办事符合传统和工作环境。

戈尔巴乔夫走后，我们便驱车返回莫斯科。我径直前往中央委员会，因为文件要还，报告要重新打好，以便第二天印出，分发给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此时我对自己的工作越来越不满意。我的印象是：我们做的不对，在文字上下功夫——报告、演说、声明。社会形势日趋紧张，而党似乎看不准方向。经济形势最令人不安。领导集团忙于解释改革的实际含义，就像表演脱衣舞那样，把一层层弊端一股脑儿都甩到前任头上。老百姓却越来越怀疑：领导人是否真正知道自己走的是什么路？该采取什么行动？

在当时，没有人知道该采取什么具体行动。这可能难以置信，不过确实如此。我们已步入一个新时期，一个混乱和半生不熟的理论时期，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后天又是一种说法。

按计划第二天召开政治局会议，每个委员都收到了报告稿，都认为自己能影响报告提出的观点。按说所有委员一律

平等，可是发起言来就论资排辈，按照座位离总书记的远近。总书记的报告和观点往往放在非常突出的地位，这使我不解。在这次会上，每个人似乎都在说，报告的这部分或那部分起草得多么多么好，至于修改和补充意见，即使对重要问题的修改补充意见，也似乎是作为顺便想到而提出来的。葛罗米柯一开始对重大问题发表了一大堆意见，后来很快就失去信心，犹豫不决，含糊其词。会后，戈尔巴乔夫同往常一样说：“看看你采纳哪些意见——当然不是所有意见。”

有这种指示很容易把所有意见抛在一边，不过我们还是尽可能把改善原稿的真知灼见容纳进去。经过两天的辛勤工作，报告终于定稿。大会即将召开，代表已开始报到。戈尔巴乔夫闭门不出，在家里大声朗读讲稿，试验何处停顿效果最好。他经常给我们打电话，询问有什么新情况，或宣布他对报告稿作了变动。这样某些部分又要重新打印。几小时后他又会打电话来，指示我们重新打印报告的某些页，就是他刚才作了改动的那些部分。

戈尔巴乔夫与利加乔夫、拉祖莫夫斯基一起确定了未来一届中央委员会的人选，这也是大会的一项重要议程。政治局大部分委员都不知道谁将当选，谁将落选。这种人事的秘密决策权是最高领导人至高无上权利的基础，使总书记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命运。很少人意识到这种极其重要的决定不过是个别人的主意。因为是总书记决定谁进中央委员会，当选的委员自然感恩戴德，选举他为自己的领导人。对有些候选人戈尔巴乔夫可能征求葛罗米柯的意见，比如，某某驻外大使准备进中央委员会，您有什么意见吗？葛罗米柯除了说“没有意见”，还会讲什么呢？

领导都喜欢大讲民主，然而当民主阻碍他们决策时就闭

口不谈了。参加大会的代表中有在老传统中成长起来、对党的 17 大记忆犹新的人，即使是他们，对中央委员候选人也从不表示反对，从不直言相陈，最多从选票上划掉一个名字（又有什么用呢？），一面心里还在嘀咕自己是否太胆大妄为了。这样做精神压力太大，勾掉一个人名要三思而行。如果代表团长发令，他们胆子会大些。但命令是领导层下的，而且只下达给信得过的人，故尔很难影响选举结果。

中央委员会和莫斯科市政府所属的旅馆都住满了大会代表，根据每人的官衔和来自哪个代表团分配房间。他们的心思都用在处理个人事务上，急着抢购，给配偶，给家人，给朋友。要买东西太多了，用火车都不一定运得回去。中央委员会下设一个邮政部门，专门负责把这些物品给代表邮回去。政治局决定，给出席 27 大的代表的礼品不能太高级，不过总额已大大超过 1000 万卢布。礼物包括公文箱、皮制文件包、手表、钢笔，还有专门为大会准备的包装精美的各种政治书籍，这是别处很难买到的。

除此之外，每个代表还可以从旅馆内、从国营百货公司特别门市部以及各种食品店中购买其它物品。各共和国送来了各色风味小吃。那个年代为党的代表大会作准备相当铺张。不过，这也是代表们能享受特权待遇的最后一次党代会了。此后，凡想早餐吃段香肠的人都得排队，人人平等。

戈尔巴乔夫在家里研究报告之时，代表们也在研究这位新领导。那时，他的权威已达顶峰。当然，他和人民之间还有隔阂，他对人民不够真诚，人民对他也缺乏理解。也就是开始阶段的这种磨擦最终导致了整个党垮台、社会大乱、国家崩溃。

党的第 27 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986 年 2 月 25 日 10 时开

幕，克里姆林宫内的大会议厅布置得庄严肃穆，场面宏伟壮丽。政治局委员、各兄弟党的代表团团长、全世界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所有领导人几乎都集中在红色大厅里，大厅布置着苏联共产党党旗党徽。代表们全体起立，欢迎主席团就座。

戈尔巴乔夫走到主席团讲台中央的麦克风前宣布，出席大会的代表共 5000 名，实到 4993 名，并宣布大会开始。这是他作为总书记第一次主持这样大规模的集会。代表们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每一句话。

出席大会的还有众多的来宾、外交人员和新闻界的代表。每个人都对戈尔巴乔夫的报告很感兴趣。在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这都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党代会的召开符合好传统，一切按照经过多次考验的程序进行，也如期结束。很多人认为报告很成功。大会期间的发言也围绕主题，没有空话。所有文件都一致通过。戈尔巴乔夫定好的候选人自然也都当选。这样，上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作了适当调整；不过，很多高层人物仍然留任。

谢瓦尔德纳泽在大会上一时性起，失去理智，以格鲁吉亚人的特有方式，对总书记大唱赞歌。这显然与改革时代的作法有悖，一时整个会场鸦雀无声。这一尴尬的时刻决定着整个改革的命运，也决定着戈尔巴乔夫个人的命运。如果他一言不发，大家就会觉得改革说到底什么意义都没有，领导人换了，老原则、老办法却纹丝不动。戈尔巴乔夫很快就意识到应采取的对策。他打断谢瓦尔德纳泽，表示拒绝接受他的赞颂。这可能并不容易，因为从共青团时代起两人就是好朋友。戈尔巴乔夫在皮聪大休假时，谢瓦尔德纳泽曾去看过他，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当然，后来他成了戈尔巴乔夫的外

交部长的第一人选。总之，戈尔巴乔夫对自己的应变能力颇为满意。

“我一直在考虑任命爱德华为外交部长。”会前他曾说过，听口气此事已成定论，“当然，我们已经有过一个格鲁吉亚人，但爱德华很能干，又诚实，希望他能恪守我们已经制订的原则。”

对谢瓦尔德纳泽个人和格鲁吉亚的现状，我原来的印象不错，唯一担心的是他缺少处理国际事物的经验，这会给人留下不太好的印象。戈尔巴乔夫需要一个既能干又听话的人，显然希望这位自己定的候选人会大有作为。接着就发生了大会的事件。会议纪录对此一字未提，但从那以后，想拍戈尔巴乔夫的马屁来获取恩惠的人减少了。在以后的年代里，还真用得着这些人，总统需要支持；但在当时，他们有理由保持沉默。谁要提他的名字，就会受到批评。待到党的28大时，代表们恳求戈尔巴乔夫疏远那些阿谀奉承、投机钻营的小人时，他却沉默不语了。

党代会改选了中央委员会，上一届委员有很多落选。戈尔巴乔夫事前对名单下了很大功夫，如今已见成效。在中央全会上，政治局的成员也作了调整，增加了几位新人：原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列夫·扎伊科夫、党中央书记鲍里斯·叶利钦、索科洛夫元帅、白俄罗斯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尼古拉·斯柳尼科夫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塔雷津。书记处成员包括负责党中央科学部门的梅德维杰夫、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农业部长尼科诺夫、党中央组织部长拉祖莫夫斯基和党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

党的领导增加了不少新鲜血液。新人都很天真，急于解决党和国家面临的所有问题。总地来说，对党在过去的错误，

他们没有瓜葛，实际上也不太明白。另一方面，他们之中很多人缺乏政治经验和经济经验。

27 大后，戈尔巴乔夫对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职责都作了分工。利加乔夫成为党中央的 2 号人物，负责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在戈尔巴乔夫缺席时也主持政治局会议。按照他的地位，他不但负责书记处的工作，而且主管整个意识形态部门。他还要监督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纯洁性。这一任务他已相当熟悉，60 年代初就曾担任俄罗斯共和国党中央的宣传鼓动部部长，工作很有活力，办事一向果断。然而新当选的中央委员雅科夫列夫也负责这个部门的工作。他的任命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从性格上讲，从受的教育讲，他都是搞意识形态的人，而且从 50 年代起就在中央宣传部任职，逐渐成熟。由于很早就从事宣传工作，他对业务、对人头都很熟。从 60 年代起就相知相识的这两个人如今分管同一部门，激烈对抗紧随而来。

对同一问题各持己见是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不过也很难肯定），再加上两人都很有主见、争强好胜。一个是单刀直入、坚决果断，没有时间注意微妙的细节，不愿意玩弄花招；另一个则稳稳当当，老谋深算。他们的争斗对党不利。头头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所有部门和人员也都四分五裂。两人的争斗最终有个戏剧化的收场：有一天利加乔夫按日程要举行一个简短的记者招待会；而雅科夫列夫通过第二天与编辑们的会面和私人渠道，要宣布利加乔夫的讲话作废。

一周之后，两人又互换角色。他们的情绪都达到沸点。分歧波及到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也反映在其它问题的决策上。决议草案被无端撤回。几乎整个书记处都卷入了这场纠纷。根据我的记忆，每次书记处会议或政治局会议都要讨论意识形

态工作和大众媒体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采取一种灵活姿态，避免卷入纠纷。有时听到利加乔夫向他诉苦，就要他顶住——“一直朝前走，采取行动，杠杆不都在你手里吗！”

但与此同时，他也支持雅科夫列夫，经常告戒他：“按我们商定的办。但要确保编辑们不要发表胡说八道的骗人文章。尽可能和他们谈，同时也要握紧手中枪。”

总书记常发脾气。花了很长时间听取当天的报刊综述之后，他就会在政治局大动肝火，怒气冲冲地大骂编辑和新闻界，催促雅科夫列夫去恢复秩序。当然，在这种问题上，他得到政治局几乎一致的支持。然而雅科夫列夫“恢复秩序”时也给利加乔夫一个机会，让他采取行动，他自己也紧紧抓住这种机会，因此两人积怨很深。总之，在80年代后半期，混乱和争吵笼罩着舆论界，从而为一系列震撼人心的事件搭好了舞台。

新闻媒体

必须指出，在戈尔巴乔夫的心目中，舆论的作用特别重要。他开始与创造性脑力劳动者经常会晤，诸如作家、记者、艺术家和演员。他先请他们发言，然后自己作长篇讲话。但不久他们就认识到自己是在浪费时间，因为提出的问题没有一个得到解决。作家埋怨出版社，可情况并没有什么改变；人们述说自己的专业需要，但这种要求如石沉大海；他们就如何改进经济、文化和教育各抒己见——但所有这些有什么用

呢！

我认识的作家和记者就来找我，开始羞羞答答，像是征求意见，后来则抱怨这种作法纯粹是无效劳动。当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开始还以为这些聚会是怨气冲天的知识分子的出气筒，或者戈尔巴乔夫确实无力相助，后来我才得出结论——两种因素都有。这使我、也使很多知识分子失望。

遗憾的是，尽管时间过去很久，许多允诺仍未兑现。当初人们为新领导人的神奇能力而欣喜若狂；如今这种情绪开始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怨声载道。戈尔巴乔夫闻过则怒。由于过去担任工作的性质，他在斯塔夫罗波尔说了算，从未受过什么批评。当然，那期间也有人给莫斯科写匿名信告他，但所有的信又都退到他那里。因此当民意调查首次表明对他的支持率下降时，他勃然大怒。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莫斯科新闻》在 一列火车上进行民意调查，他就发起火来，大骂雅科夫列夫对新闻界管理松懈，说调查没有代表性，对他的支持率下降的结论是错误的。雅科夫列夫立即着手扭转局势。

可是没有过多久，另一家名叫《论据和事实》的报纸发表了类似的调查结果。这次闹得更凶，最后，在一次与知识界人士开会时，戈尔巴乔夫发起脾气来，点名批评了这家报纸，发誓要解除其总编的职务。从当时他的反应来看，人们可能认为他要杀一儆百。而对他的威胁的反应却使他止步不前，其它媒体的代表纷纷站起来支持那家报纸。戈尔巴乔夫生性优柔寡断，他当然不会再对总编辑采取什么行动。这次把他吓坏了，此后很长时间他韬光养晦并开始努力与舆论界修复关系。记者、作家、院士和艺术界人士虽然珍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但也了解同他们打交道的是什么样的人。对领导人越来越不尊重的情绪通过趣闻轶事、滑稽的模仿和漫画

等形式表现出来。表面上戈尔巴乔夫不动声色，似乎习惯了批评和嘲弄，同时满足于还有些人对他表示满意。实在忍不住他还会发脾气，而反击批评又讲不出多少道理，只好威胁说要辞去这个或那个职务。其实我很清楚，他不过是吓唬那些还在摇摆不定的人。他根本没有打算辞职，他的权欲大得很呢！

赖莎受的刺激比她丈夫还大。她经常打电话来，询问知识界总的情绪，以及某些作家或文化界人士对总书记的态度。她想知道文艺界的人说些什么，可以指望谁给予支持。我能给她提供的信息很少，因为这类事情归伏洛罗夫及其助手们经管，他们的职责是捍卫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和正确性，监视知识界的态度。

所有这些冲突先后发生在1990年7月党的28大之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激烈。1986年2月党的27大开过后的一段时期时，全党全国的气氛是向上的、富有创造力的。大会提出了一个涉及各个领域的激进改革的纲领，旨在加速苏联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久便很明显，要想快速前进，不作重大变动是极端困难的。还有，某些势力对破坏现行的政治制度比加速科学技术发展更感兴趣。“改革”这个模糊概念显然被这些势力用作烟幕弹，对改革的意思含糊不清的解释使人们更不知道它将带来什么后果。俄文字典上早有此字，50和60年代也曾广泛使用。我记得很清楚，勃列日涅夫上台时，政府的许多机构发生震荡，以致官员们编成顺口溜拿它取笑：“手抓牢，别摔倒，改革要启锚！”

这种情况并未使戈尔巴乔夫担心，也可能他根本不知道苏联革命后的改变其实都是改革。是他使这个字眼又流行起来，开始在官方，后来便家喻户晓，它是这个国家重大变化

的代名词。总书记在第一次视察西伯利亚和远东时开始试用这个名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演说中提及两次，其中还提到当时还在本地军队工作的德米特里·亚佐夫。后来，在哈巴罗夫斯克，他大致描述了国家的改革，不过当时的意思还是加速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改革的要点是雅科夫列夫制订的，戈尔巴乔夫在整个任职期间一直在解释它的概念，而他的解释在时间和范畴上总是变化。当他允诺的结果开始从视野消失时，他便把改革的概念说成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发生的一个过程。听上去似乎言之有理，可惜事实是保障社会不发生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很多基本结构已遭破坏。如同勃列日涅夫时代一样，公众听到的是毫不含糊的话，可它既没有约束力，也没有实际意义。情况越来越糟：党总是在自我批评，说要为自己过去的罪过负责，可是又无力改变现状。这使得人民对它疏远，把它视为万恶之源。伴随着权力机构的解体是新派系的形成。他们大声疾呼，既否定过去，也否定现在，可是又拿不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形势变得非常紧张。改革把国家带到爆发革命的边缘，只缺一个借口，而1991年8月出现了这个借口。

国家越来越困难，矛盾越来越尖锐。戈尔巴乔夫开始减少国内视察的计划，因为那样人身得不到安全保证，看到的也只是老百姓骂街。他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国际关系，出访也日趋频繁。苏联国内形势越紧张，国外就越高唱赞歌。实际上，西方对戈尔巴乔夫的吹捧已登峰造极，说他取得的成就，是军事力量或任何力量都达不到的。戈尔巴乔夫在国内不得人心，但他在很大程度上从西方的吹捧和支持中得到补偿。当然，这种补偿也以其它形式出现。

第四章 出国访问

我又一次听到钥匙在哗哗地响，牢门在吱吱地叫，沉重的皮靴踏在地板上。他们要我收拾好东西，搬到另一间牢房。他们开始搜查，翻看每一件物品，还对我搜身。一小时之后，我们来到另一牢房，同样是水泥砖墙，同样是深蓝色墙面（我们不敢碰它，更谈不到在上面写字），几张铁床，焊在地板上的一张桌子，同样的窥视孔，一天24小时都受到监视。实际上，狱吏在夜间走后，年轻的卫兵经常在门外闹腾，又笑又吵，加上脚步声，使我通夜难眠，有时太累了，也能打个盹，可就是睡不着。

记忆是一条长河，人生旅程上的种种事件，都在长河里掀起浪花。其实，我们的生活似乎千篇一律——紧张劳累的工作，每天14到16小时，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有时还得搭上星期六和星期天。我像一个火车头，拉着一长串车厢，干着本该由好几个人干的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把它看成自己的责任，我想把长期受难的祖国从混乱中解脱出来。

那些年我并没有发财，而是借钱度日。实行市场经济后，我意识到，我的儿孙——如果不是我的话——最终会沦为那些已成为暴发户的机灵鬼的雇工，而我还在这里为戈尔巴乔夫撰写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发言稿，就凭着我是一个人、一个共产党员。

出访讨得的基金装满了戈尔巴乔夫的钱袋，他的日子过得很舒服，而且他确实喜欢旅行。在担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期间，他和赖莎就去过欧洲一些国家。调到中央之后，开始他自己安排行程，如1983年5月去加拿大，1984年12去英国。不久之后，我国驻外使节都想吸引这个新星到他们所驻的国家。改革开始，他的新思维政策也开始实施之后，邀请函纷至沓来。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也需要他会晤各国领导人。

礼 仪

无论国内国外，戈尔巴乔夫旅行时都带着赖莎。出发之前很早就开始准备。在改革初期，每次出访都是政治局讨论决定。惯常的作法是外交部和党中央联络部就每次访问是否合适、是否有可能达成协议和推进能导致解决具体问题的谈判等事项提出建议，连同邀请函的复印件送给政治局委员。在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对访问可能带来的成果做出估测，然后外交部长和其他委员发言，最后决定去或不去。有关部门要对计划访问的国家的政治形势、贸易和经济往来和访问中可能出现的其它问题提出报告。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

使领馆以及研究该国的机构也发表意见。戈尔巴乔夫把这项工作交给他的助手——开始是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后来是车尔尼亚耶夫或沙拉波夫，指示他们把这些材料整理出一个概要，并和外交部及使馆安排好出访日程，与政界领导、企业界人士、院校教师和科学家会见等事宜。

还要为赖莎专门拟定一个日程，通常包括会见学校教师、科学家和文化教育界人士，以及参观展览会和博物馆。她还应邀出席茶会，自己也举行茶会。从礼仪角度讲，这是出访中难以处理的部分，常常出现混乱、开局不顺，甚至从礼仪角度出现彻底砸锅的现象。

外交部的礼宾司和保安部门也为准备出访而紧张工作：与外国的相应部门联系，作出必要的细致安排，以确保访问顺利。他们必须落实每次会见的时间和地点、出席的名单、谁负责苏联首脑的安全、保镖带不带枪、东道国是否负责安全等。这些问题都经过充分讨论，总书记随行人员的规模也相应调整。但有件事情是一成不变的，这就是安排把我们自己的轿车（通常是吉尔）运送到去访问的国家，轿车中装配着特别通讯设备，使总书记无论走到世界什么地方都能直接与莫斯科联系。这种轿车高贵豪华，内装安全设施，不过比起当前世界汽车制造的水平来，它有些过时了。发动机时好时坏，往往在最关键的时刻抛锚。

戈尔巴乔夫有一次出访美国，美国人对吉尔发生了兴趣，喜欢它的外观，于是问是不是英国车。他们简直不相信这是苏联车，久久站在那里，摇着头，好像在说：“算了吧，我们不那么傻！”而在西德，人们并不怀疑它是苏联车，特别是当它一时发动不起来时，他们就齐声欢呼，自报奋勇来推车，他们都说这就是我们苏联人创造的奇迹。我们的保安人员当然

尽量把吉尔的机械故障掩饰过去，借口天气太热，汽油挥发，把它抽上来需要时间，有时也找些其它借口。总之，我应该说，这种车漂亮、可靠、劲足，内部设施也好，经得起碰撞，虽不是坦克的对手，装甲运兵车还能对付。

为戈尔巴乔夫出访的准备工作中，注意力不只是放在文件、演说、声明（虽然对这些他过问很细，尤其是初期），他的外表和形象也很重要。出发前很早就定做服装，要适应东道国和途中经过之地的气候。正式场合着深色服装，旅途之中则穿浅色的。各种鞋、领带和衬衣也都经过精心挑选。我们都已经看到，在这方面，总书记看上去比东道主要华丽得多。根据现在的礼仪观念，来访的外国领导人衣着朴实些可能更合适。不是所有的政治家都愿意穿戴得像人体模特一般，稍随便一些给人的印象更实在，比看上去熨过的笔挺服装更合时宜。

赖莎的服饰更煞费苦心。她衣橱里应有尽有，穿戴总是很气派，品味高雅，每一次都喜欢换个花样，首饰尤其讲究。不过我注意到，出访好几个国家，她都戴着白色金属大手镯、戒指和耳环。她有从西方买的各式各样的鞋袜、若干皮衣皮帽，我看不出是什么兽皮做的，总的效果无疑是很引人注目。这种服饰想必非常高贵奢侈。人们弄不清怎么回事，因为总书记的薪金也并不特别高啊！赖莎怎么能置得起这样高档的东西？这只有她自己、保安队长普列汉诺夫、再就是上帝知道。不管怎么说，盛服装的许许多多的大箱子、小箱子、特别包装箱都塞上飞机。

礼品，不管是送给官方还是送给私人的，是戈尔巴乔夫夫妇关心的另一事项。中央委员会办公楼的第三层设有专门仓库，物品齐全，装满华丽的东西，在当时已很昂贵，现在

都成了无价之宝。它就像神话里的阿拉丁山洞，只对手执神灯的人开放，这个人就是党中央管理局长克鲁奇纳。我第一次到“珍宝洞”时，他和他的一名副手曾陪同我去。我看见有艺术大师的绘画和雕塑、巴列赫风格的精美漆盒、来自图拉的水晶器皿、珍品邮册、无数钟表——总之，凡能在苏联特制的，这里应有尽有。除珍贵金属制品外，仓库里还有珠宝、珠宝盒、以及珍贵宝石和半珍贵宝石制成的其它物品。

仔细察看后，我发现其中有些礼品还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留下来的，本来放在国库。我告诉克鲁奇纳把它们送回去。他果然送回一个19世纪的银制茶炊，我想还有几个杯子。我还惊奇地发现，大部分物品的价格非常低。在那个时代，对物品的估价都偏低，花上30到50卢布就可以买到古代金表。

戈尔巴乔夫夫妇出访即将启程之时，管理局的官员们就在总书记与总统办公室隔壁的一个房间里陈列出准备赠送给外国首脑及其夫人和政府要员的各种礼物的样品。戈尔巴乔夫和赖莎每次都过目，选择最适合的礼品。开始他们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定下决心，后来逐步熟悉仓库都有哪些物品，挑选就快了。我记得有一次戈尔巴乔夫准备选取我觉得是一件非常贵重的礼品时，我曾问过他，这些东西值不值得这样用心地挑选，因为在其它国家，官方送的礼品总是上缴国库的。他笑笑回答说，这种作法仅限于官方礼品，个人礼品就是另一码事了。

外国官员的配偶也收受礼品。有一次戈尔巴乔夫告诉我：“我们已经有给撒切尔夫人的礼物，再给她丈夫选件合他口味的东西吧！”他亲口对我讲，“铁娘子”的丈夫喜欢酒。经总书记同意，我们选定如下礼品：一套猎具（包括装在银盒里的匕首）、一个银边杯子、镶金剑鞘、当然还有几瓶酒。为此，

专门备有酒窖，各种形状的酒瓶盛着各种酒，还专门加上一种“绅士酒套餐”，包括苏联最优鱼子酱、蟹肉和伏特加。

总统和总理的夫人一般得到水晶或陶瓷制品、一套餐具、各种宝石和半珍贵宝石制品、巴列赫风格的精美大漆盒，等等。克鲁奇纳对我说过，有一次他发现戈尔巴乔夫准备送罗纳尔德·里根一个精巧绝伦的皮马鞍。他想劝阻，说这可能产生误解，但戈尔巴乔夫置若罔闻。

戈尔巴乔夫为自己能被世界首脑俱乐部接纳而受宠若惊，他大谈特谈外国总统、总理、国王和女皇的生活、习俗、癖好和嗜好，讲他们的趣闻轶事，对他们及其随从一一加以评论。他特别感到可乐的是里根偏爱俄国的谚语和秘闻，数次索要这方面的书。赖莎则喜欢讲对自己接触到的女宾的印象。她似乎总是说，许多国家的第一夫人衣着品味不高，而且话不成句。

交换礼品的仪式蒙上一层浓厚的神秘色彩。到底送了什么、收了什么，对议会都保密，公众更是无从得知，虽然有了“新思维”，围绕着这种“你满意我满意”之事的一些本能则自古到今，一脉相承。总书记出访的随同人员大都接收礼品，礼品的价值因官衔而定。小到相机、手表、钥匙链，大到什么东西就只有天知道了。然而据我所知，把这些礼品都交公的只有克鲁奇纳和我二人。有一次曾把前几年出访交公的礼品列出备忘录，结果清单上的人名不过五六位。有一次出访联邦德国返回后，我把送给我的一个小酒杯上交。国库一名官员后来写个收条给我，说他们收到某某人送来一件××重的银器。如此而已。我有个感觉，老百姓如果知道此事肯定不会高兴的。

出访美国时，我收到里根总统赠送的一个小木盒。我慢

慢打开，里而是空的。我盯着空盒子看了好久，才想到它具有象征性意义，就是让我自己放进东西。这样一想，我也就满意了。我想，在许多国家，这种礼品都是象征性的，没有商业的因素。不过，礼品的价值看来与赠送国的富有度成反比。在这方面，我国当然走在各国前面啦！然而同勃列日涅夫时代相比，如今的礼品对老百姓的负担还是小了很多。

礼品定下之后，出访准备进入下一阶段。赖莎得知出访日程后，便一头埋在书里，阅读有关国家的情况，看电影，读经典，研究文化艺术，了解博物馆和展览会。在少有的我和她在一起的场合，我注意到她津津乐道地与东道主谈论所访国家的古老的纪念碑和其它各种景观。而东道主听得聚精会神，不知是出于无知还是圆滑。她的这种作法是否合适有待讨论，不过总比一无所知地呆望着面前的文化景观要好些。

准备工作就绪后，接着要确定陪同人员。戈尔巴乔夫喜欢带上一大批艺术、文化、文学界人士和记者。他们夫妇的传记撰写人马拉罗夫每次也总是随行，用录音机录下他们的出访。车尔尼亚耶夫很早就草拟出随行名单，一般包括两部分：一是身边人员，一是兼有智囊和装饰作用的人员。第一部分人包括代表团正式成员，通常有外交部长、党中央联络部的代表、一个或几个共和国或最高苏维埃的领导人、以及驻访问国的大使，还有戈尔巴乔夫的助理和顾问、私人秘书和打字员、保安队长普列汉诺夫及其队员，再就是正式团员的助手及译员。所有这些人员坐总统专机前往。

第二部分人员先行出发，前面已提到，他们包括作家、院校教授、科学家和其他知名人士，而所以包括这些人，是为了给访问增添光彩，至少初期是这样。后来我注意到，有些被邀请者以种种借口谢绝随同出访。这使戈尔巴乔夫不安，最

恼火的还是赖莎，因为她为丈夫的出访随员的组成花了大量心血。因此，名单反复变动，有增有删。任何人如果说过对戈尔巴乔夫不敬的话，自然没有机会被邀同访。有些人从未接受邀请，他们或是有独立见解，或者本人不愿意随戈尔巴乔夫招摇过市。其中有些人我不熟悉，他们来电话问他们不去会不会产生误解。其实我也清楚，称病谢绝不过是借口。

万事皆备，需定出发之日。戈尔巴乔夫夫妇喜欢兴师动众的送行。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定下一个制度，送行者需包括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及其助手、政府关键部的部长，主要是波里斯·普戈、克留契科夫、亚佐夫、巴克拉诺夫，或他们的前任，不管他们在党内有无职务。开始时，在苏联境内视察也是这一套。由于戈尔巴乔夫坚持要电视和报刊对他的来去进行报导，老百姓知道后纷纷写信谴责这种作法，说官员们一天到晚只忙于在机场迎送总统。

戈尔巴乔夫不久便同意只在出国访问时出动全部人马。而由于出访实在频繁，群众来信仍持续不断。但是，这种礼仪还是严格遵守。送行大军又增加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然后又加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不过，党中央委员中送行的数量减了下来。如今是伊瓦什科和舍宁。送行人员总是由戈尔巴乔夫决定，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增删，只有他邀请的人（有时是电话邀请）才去机场。

离总统专机起飞还有很长时间，送行人员就集结在伏努科沃2号停机坪，那是专为贵宾准备的登机处。人们在等候期间自然而然地分成几组，讨论各种问题，还常常能解决问题，好像是正式会议的继续。总书记来到后，如果时间允许，他也参加讨论，发布指示或倾向性意见。然后大队人马走到登机扶梯旁，按程序举行送行仪式。送行队伍排成三行，卢

基扬诺夫、帕夫洛夫和伊瓦什科在前，政治局和安全委员会成员居中，其他部长、助理等人在后。接着是握手，前排时间长，中间时间短，后排碰碰手了事。

尔后，总统偕夫人登上飞机，转过身来恋恋不舍地问人群招招手，然后消失在机舱里。送行者则拼命挥手，笑逐颜开——都在听电视台的指挥。以往他们也这样表演，还加上起飞前在停机坪上互相吻别。戈尔巴乔夫时代不怎么接吻了。领导人的频繁变动显然打乱了送行的规定程序。送行队伍脱帽站在停机坪上，一直到专机飞离跑道肉眼看不见时，仪式才结束。每个人都盼望着这一时刻的到来。然后他们来到候机室，等着飞机升空。起飞之前离开被认为是不合适的。有一次赫鲁晓夫的飞机起飞不久因发生故障而被迫降落，结果发现送行人员已无影无踪。从那个事故以后，送行队伍一直要等到民航代表宣布飞机已经升空、飞行顺利，然后才能离开机场。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相亲相别真令人感动，其实他们不到一小时或更短时间内就会在这种或那种会议上见面。

送行人员回家时，总统的专机内则是一片忙碌景象。大家都找到座位坐下来要花大约30分钟。戈尔巴乔夫和赖莎在第一机舱（有半个机身那么长）安顿下来，换上便衣。这个机舱包括一个卧室兼办公室或休息室，还有一个大房间，内有两张木制桌子、几个舒适的扶手椅、一台电视机、一个电话、以及其它设备。家具都是异国风格。卧室隔壁是个厨房，各色食品应有尽有，再挑剔的乘客也能满足。

在厨房后面，车尔尼亚耶夫、外交部长和其他一些成员同保安队长普列汉诺夫与梅德维杰夫同在一个小休息室，内有桌子。设计有8个座位，非常不舒服。这么多人挤在一起，膝盖碰着膝盖，越洋飞行时入睡尤其困难。

第三个休息室里是保安人员、医生、公务员和打字员，比第二舱舒服，不过他们先上飞机，得等很长时间代表团才到。

起飞之后，有人开始拿出文件和报纸，有人等着送茶和甜食。40到45分钟后，戈尔巴乔夫派人把外交部长、部长助理和代表团的其它一些成员叫过去。很难在这种乱哄哄的环境中工作，因此对文件反复讨论后，就转入一般性话题。

我不常随戈尔巴乔夫出访，即使去也没有什么特别职责，就像一件家具或箱子一样，用得着就拿起来，用不着就丢在一旁。我当然不喜欢这种安排，尽量找借口推辞，强调工作任务繁重。而戈尔巴乔夫显然要我把被邀请同行看成是一种奖赏或激励。雅科夫列夫有同样经历。所有决定都是谢瓦尔德纳泽作出的，他还参加谈判。而他作为一名政治局委员在一群政治家中间感到很不自在。

在总统舱工作的有些人留下吃饭，其他人则在座位上就餐。而在保安人员、医生、速记员等人乘坐的舱里，吃饭按飞机上的通常作法：用前排座位上配置的小桌。食物很充足，有开胃的鱼、肉、鱼子酱、蟹肉和蔬菜，然后是菜汤或鱼汤；主菜是鱼或肉，都是热的；再后上咖啡或茶、牛奶、巧克力、糕点、冰激淋和水果。也有酒，但似乎没有什么人要，至少在第二舱是这样。不过在返回路上就是另一码事了。

总统和夫人在国外期间或住在使馆，或下榻在东道国提供的国宾馆里。不过就我所见，他们只住在使馆。这也说明我很少随他们出访。

接下来是正式会议、会晤、午宴、工作早餐——这一套我非常厌烦，因为他们讨论协议时我只能在原地一动不动，面部表情保持严肃。其实我早就知道，一切都事先达成协议，只等签署文件；如果还有什么分歧，就要靠双方领导本人解决，

在场的只有可信赖的外交部高级官员。

戈尔巴乔夫与里根

对美国之行我记得特别清楚，这期间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签署了一项重要协议。戈尔巴乔夫夫妇住在使馆，为此使馆进行了部分重建，陈设也做了调整和更新。高层访问总能推进这种“更新”。实际上，我们驻外各使馆都期待着接待国家元首，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申请巨款装饰宅院、添置餐具，多年悬而未决的项目只要来访一次就可以有结果。有些购置其实并不是访问本身的需要。

随行人员都住在豪华的麦迪逊饭店，它就在使馆对面，饭菜可口，服务周到。即使按西方标准，我的套间也很大，包括两个房间（还可以隔为三间）。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卫生间（盆浴或淋浴），还有电视。不过，在这样豪华的环境中，我也只能睡觉。

在饭店楼下，代表团和总统一行的其他成员可享用餐前冷菜，想吃什么只管伸手。还有一项服务我实际上也不能享用，这就是早餐、主餐和聊天，因为我要干的杂七杂八的活太多了。

我第一次去白宫是在1987年12月8日，那是双方首次会谈。白宫在我们眼里像一个乡间小庄园，房间很多很小，只在二层才有一个可容纳百人的房间。它的图书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室、甚至总统办公室都很小，很难想像哪一间能容纳15到20人。

双方代表会见之前，两位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单独会晤一段时间，其他人则在白宫周围漫步。

我和部长会议副主席弗拉基米尔·卡缅采夫坐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室里谈起来，既讨论实质性问题，也谈了对白宫的印象。环顾四周，我们猜想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现任成员开会时谁坐在哪里，他们的前任又都坐在哪里。我们都感到只有传统才使得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相聚在这样一个小房间里。它在一层，和外面的草坪同一高度。想想我们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不禁对里根总统深表同情。卡缅采夫的办公室比这大一倍。不过，美国总统办公室的侧翼占整个楼层一半。

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单独会晤还在继续，双方参加会谈的其他人员只好四处闲逛。时间过去几个小时，看来大会是开不成了，因为剩下的时间只够我们赶回饭店换衣就餐。戈尔巴乔夫不喜欢大会。此时他走出白宫，即刻进了轿车。于是我们的车队浩荡返回。

下午4时许，举行中程导弹协议签字仪式。美国社会的精英都应邀参加7时开始的白宫国宴。他们包括政府高级官员和企业界、学术界及演艺界知名人士。丈夫和妻子不同桌就餐，这种安排我们看来很奇特。和我同桌的有民主党领导人，还有我的同胞娜塔莎·赛姆斯，她多年以前移居美国，在这里结婚，最终成为富翁。交谈无固定话题。美国人把菜单小心收起，互相在上面签名。

照我们的标准，饭菜量足而不奢华。开胃菜有鲑鱼、龙虾和各种色拉，然后是切成薄片的小牛肉和水果。伴着开胃菜可饮红白葡萄酒、加冰块的香槟或咖啡。同桌就餐的人都在说保持身体健康、避免发胖如何如何重要。我应该说，他

们看上去都很健康苗条。在场有的人有些发福，想必是贪食之故。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先后致词，大家举杯欢呼。

晚会时间不长。大厅里响起音乐，伴杂着叫声和笑声，大家都出来热闹一番。整个气氛很友好，葡萄酒又使人兴奋。钢琴家范克莱本在小房间开始独奏，先是一首勃拉姆斯的间奏曲，继而是拉赫玛尼诺夫的练习曲和舒曼、李斯特、德彪西的几首曲子，最后以《莫斯科之夜》结束，给一个美妙的夜晚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回国之前，戈尔巴乔夫在我驻美使馆举行答谢宴会，邀请美方知名人士出席。有些人从老远的加利福尼亚或其它州赶来。按我们的传统，上的是伏特加。招待员用调羹从银碗里拿出鱼子酱，开始有些客人看着不动，或许他们觉得与美国制作的有些不同，而最后竟要求再来一份。他们喜欢我们的黑面包，以至于不再考虑自己的腰围。下一道上的是腌鱼，各种熏大马哈鱼和鲑鱼，继而是热菜，肉和蘑菇以及开胃菜螃蟹。客人们品尝着伏特加，有人说好酒，有人仍有怀疑，便连干几杯。汤可以自选，有鱼汤、甜菜汤和清炖肉汤，然后是鲑鱼、烤牛肉，最后是薄饼、冰激淋、巧克力、葡萄酒、香槟、咖啡和白兰地。

我高兴地看到，客人们显然欣赏我们的菜肴，尽管有时与他们的饮食原则相悖。座位按美国方式安排，先生和夫人分开。只有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同夫人坐在一起。他们坐在主桌，也就是宴会厅的主席台。

晚宴有音乐伴奏，有名的女中音歌唱家叶琳娜·奥布拉兹佐娃的表演受到狂热的欢迎。大家坐在那里，一边喝酒或咖啡，一边友好热烈地交谈，很开心，以至有时歌声和音乐

都听不见了。

我对这种非正式的社交印象很好，似乎我们两国的关系正迈入新阶段，尽管作出重大改变还有很长的路，过节似的宴会毕竟不是判断这类事情的理想标准。

在离开华盛顿之前，戈尔巴乔夫在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总结了这次访问，并回答了各种问题。两小时后，代表团来到机场，中途在柏林过了不舒服的一夜。在那里，华沙条约国的政府首脑们听取了关于我们与里根签署的文件以及总的访问成果的简短介绍。

在返回途中，戈尔巴乔夫夫妇通常邀请主要的随行人员去专舱喝上一杯——葡萄酒或亚美尼亚白兰地，如有人愿意，也可喝威士忌。大家回忆起会谈中的趣闻轶事，酒喝得不多，有些人只是碰碰杯子。从美国往回飞时，受时差影响，我们都觉得很不舒服。不过在从欧洲返回的这段旅程，大家又活跃起来。在这些场合，戈尔巴乔夫总是谈起他拼命向上爬的年代，对妨碍他升官的人一一点名，对有些人他至今仍耿耿于怀。

回到伏努科沃机场时，迎接我们的是为我们送行的那些人，同样是笑逐颜开。人人都讲看了电视上的全程报导，对取得的成果表示祝贺。在我国，好心的人们不愿意说他们对某一决定不理解，或为什么对某个问题未达成协议，担心这样说会伤害对方感情。最高领导拥有无限权力，大家都学会了听话和吹捧，这是最稳妥的作法。

我经常在想，他们为什么那样做呢？其实他们清楚，总书记的作为远非无懈可击，而且感情用事。这使我想起作家雅申写的一个故事。故事说，一个国营农场的几个共产党员去参加党的会议，人还没有到齐，于是他们便谈起农场糟糕

的现状：牲口饲料紧缺，粮食收成不好。他们认为，如果一定要按计划上交，就必须杀牛宰羊，影响农场第二年的运作。老百姓为本地经济焦虑，这种坦率的交谈司空见惯。但是，会议正式开始后这些人上台发言时，却宣称超指标完成生产任务是对祖国的光荣责任，农场应该把更多的粮食上缴给国家。

显然，这种矛盾心理我们很多人都有，只有碰到极端困难的情况时人们才理智办事。我记得机场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迎接的人们只谈总书记出访的成就，说我们解决了前任多年未解决的许多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的分裂

戈尔巴乔夫也对社会主义国家作正式访问，他受到那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又是自己老朋友的接待，如卡达尔·亚诺什、埃里希·昂纳克、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托多尔·日夫科夫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他们共同做党的工作都已多年。我清楚地记得他们之间友好和互相信任的关系，多次电话交谈，通过官方或别的渠道互赠礼品和互致问候。我总的印象是，虽然他们之中有些人对这位新任总书记感到不舒服，但作为老朋友，他们在开始阶段还是支持他的政策的，并尽力在自己的国家树立他的形象。

欢迎戈尔巴乔夫的当然不只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苏联人民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之间一直存在兄弟般的友谊。我们同属一个防御联盟，有密切的经济往来，对应的城镇或企业间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因此，戈尔巴乔夫对这些国家的

访问组织得很周密，进展很顺利。他和赖莎经常谈起在东欧受到的热烈欢迎。

这样的访问回来后，戈尔巴乔夫就会说：“要知道，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接待。整个国家都动起来了，欢呼的人群几乎要把我们举起来。”

情况当然是这样。同样属实的是戈尔巴乔夫在讲话中谈及苏联改革时，也建议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都改革，尽管这些国家的人们很多都无此心理准备。

有一次出访罗马尼亚，戈尔巴乔夫夫妇和齐奥塞斯库夫妇举行单独会晤，双方在讨论重大问题时各执己见。齐奥塞斯库说，选择一条新的政治航向自然很好，可先要在本国搞成功；这种改革的意图自然要通报给兄弟国家的领导人，但煽动别人亦步亦趋就大错特错了。他还提醒戈尔巴乔夫，当初在罗马尼亚和东德建立共产党政权并不是这些国家自发的，而是苏联的主意，它需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东西方之间设立一个缓冲地带；也是苏联坚持这些国家组建军队，设立军事基地等等，以便在冷战期间顶住西方的压力。戈尔巴乔夫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无助于恢复两位领导人之间的相互理解。

类似的坦率交谈无疑也出现在他与东欧其他领导人的会晤中。戈尔巴乔夫当时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而且受到国内形势的鼓舞，便准备在邻国中撒播改革的种子。

不久便有了结果，东欧国家接二连三地爆发革命，扫荡一切政党和现行政权。最后是东德，在那里，戈尔巴乔夫夫妇曾受到众多抗议人群的“欢迎”，此行加速了事态发展，最终导致国家的垮台。专家们分析，苏联并未从这些变化中获利，甚至没有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在东德的财产。诚然，德国

持续分裂的状态很难继续维持下去；但是不管自己的利益而一走了之，显然也是错误的。这一点在苏共政治局会议上几次强调提出，很多苏联公民写信询问苏军撤出的条款是怎么规定的。

齐奥塞斯库和夫人之死确实使戈尔巴乔夫与赖莎十分震惊和恐惧。我们大家已经看到，如今戈尔巴乔夫外出已乘坐防弹的吉尔轿车。此外还增哨加岗，强化了保安措施。保安人员的薪金得到提高。不过，这种作法是否有效值得怀疑，只提高身边人员的待遇会引起其它一些部门的反感，这些部门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只是不常抛头露面而已。

邻国的事态急剧发展，形势极度混乱。戈尔巴乔夫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朋友或身败名裂，或无业可就，甚至听候审判。令人遗憾的是，在他们危难之际，总书记袖手旁观，没有发言辩护，也没有伸手帮助。这种态度使很多人寒心。陷入困境的不只是政界领导，军界、为国家安全做出宝贵贡献的情报人员、政党领袖、部长、工农企业的经理们，也遭到同样命运。他们大都曾在苏联留学，是我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抛弃他们不但意味着抛弃朋友，而且丧失了做人的起码准则。我国和美国以前都没有这样干过。美国人曾冒很大风险解救朋友，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否则没有人再愿意与其合作。不抛弃朋友既是党的原则，也是普通人应有的道德。

眼睁睁看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体制纷纷解体，为什么竟没有哪一级的领导人站出来敲敲警钟呢？

主要原因是：苏联人民早就习惯于领导人代替他们思考。即使政治局和政府也清楚，国际事务是两三个人（主要是总书记）的专利。除非由他本人邀请或指示参与某一特定工作，

否则没有人敢冒险介入国际关系问题。

除此之外，可以说戈尔巴乔夫和外交部长垄断了关于世界动态、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领导和民心方面的信息。就此而言，情况和斯大林时代没有什么不同，而现任的总书记不打算改变。如有什么变化，那就是现在比斯大林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总书记和外国首脑会谈的情况根本不作通报。外交部和国防部奉命将最重要的加密报告只上呈一个人：戈尔巴乔夫。某些问题的电报也呈报给雷日科夫、雅科夫列夫，必要时还有政治局的其他成员。普通的政治消息则以国际新闻综述的形式送给政治局所有正式委员，经常也给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这就意味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前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不甚了解。

我们已经提到，戈尔巴乔夫夫妇对国外出访激动不已，每次回来总是满面春风，心花怒放。这种兴奋，与其说来自与东道国党政领导人的高级会晤，不如说来自于同民众的接触。有一次我随总书记出访波兰，亲眼看到民众欢迎他的热烈场面，尤其是在什切青。在那里他再次宣布，这个城市过去是、而且永远是属于波兰的。根据戈尔巴乔夫的要求，赖莎代表他会见矿工（我想是在卡托维兹），也受到狂热的欢迎。波兰人深信，这位领导人能够帮助他们摆脱苦难的生活，开辟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新道路。当然，在那个时候，他们并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倒退，倒退到他们再熟悉不过的旧社会。

1989年10月，戈尔巴乔夫从柏林回国后宣布：昂纳克下台指日可待，我们应该考虑德国的重新统一了。此言没有遇到什么激烈反对，人们对此兴趣索然，谁也想不到去研究德国统一的条款以及苏军撤出的条件。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没有向任何人通报，政治局也未予充分讨论。另一方

面,《苏维埃俄罗斯报》1988年3月刊登了化学家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长信,猛烈抨击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政治局倒为此事辩论了两天。很久以来,国际事务一直由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掌管(但后者不参与决策)。需要为裁军起草文件时,再把外交部和国防部的专家叫来。最高苏维埃及其下设的各委员会对我方提出的协议知之甚少,代表们不能充分讨论和批评重要决定,有时只起橡皮图章的作用。

对信息和权力的垄断,以及总书记和政治局工作违背民主原则,意味着前社会主义国家所有这些变化都在悄悄的、未被察觉地进行着,没有不同观点的交锋,没有激情的政治辩论。作为政治局的总管,戈尔巴乔夫根据自己的意图决定国策,哪管什么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成了领导人下大赌注的工具而已。

苏联人民自然理解,分裂的德国对欧洲和平无益,这个问题迟早要正面解决,但是可以从长计议,我们反希特勒的盟国并不着急吗!它们之中有的虽不真正反对,但对于如此匆忙统一则满腹疑虑。即使如戈尔巴乔夫所言时机已经成熟,那也应该在充分考虑全国舆论之后再采取行动。外交部、政治局和总统在道义上无权幕后解决这一问题,尤其是有关统一和撤军条款的起草并没有征求我们原来盟国的意见。

对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深刻变革没有组织过任何座谈会予以讨论,大会小会都没有。据我所知,在苏共政治局、总统委员会或党代表会议上都没有认真提出过讨论此事,也未列入最高苏维埃的议事日程。总书记在党的28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只用两三段的篇幅提及此事。这就说明,在28大前,我们对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没有什么激烈的反对意见。如

戈尔巴乔夫在会议期间所说，“有人责备我们不战而退”。所有批评不过是“责备”而已。

每次出访回来，戈尔巴乔夫总会在机场向欢迎的官员简述自己访问的印象，然而却没有任何正式的出访情况报告。连最高苏维埃的一位代表也抱怨说，即使他们也很少知道他和外国首脑谈了些什么，达成了什么协议。

后来，出国访问和在莫斯科会见西方领导人成为总统的主要工作。西方舆论界把戈尔巴乔夫看作一代新人，说他摆脱了前任的教条，开明，必要时还颇具魅力。人们觉得他致力于和平、致力于摧毁原有的独裁体制，曾全心全意地支持他。不久，戈尔巴乔夫成为西方的偶像，一会儿给他发奖金，一会儿给他授金牌，期刊把他捧为“年度名人”，电视报刊给他专访，其实都在巧妙地利用此人的虚荣心。西方人没有认识到，批评过去、摧毁现行制度容易，而建立新制度就难了。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苏联人不买总书记的帐，为什么德功无量的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国家里反倒成了过街老鼠。

对他的批评，并不是没有根据。1987年以来，国家的财政经济急剧恶化，苏联人民对此有切肤之痛。糖、肉和其它许多食品日益短缺，很多商品从商店里不翼而飞。全国局势日趋紧张。人们开始对改革是否明智提出质疑，也怀疑领导人是否有能力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党组织的高级官员也开始流露出与总书记意见不和甚至严重分歧的迹象。

第五章 公开性：转向民主化

戈尔巴乔夫无疑了解苏联人民的这种新情绪。他们先前的偶像如今越来越成为孤家寡人，曾经对他大唱赞歌的人现在开始咒骂。民众的感情是容易变化的。从此时起，泄了气的总书记发现自己腹背受敌，一面是保守势力，一面是对他不再忠诚的普通民众。

他和我经常谈论此事。他一边翻阅信件（尤其是那些批评信），一边自我安慰地想：这些来信恰好证明自己选择的路线是正确的。“你真要想改革，就难免踩上社会上某些人的脚。这没有什么，并不可怕。我要把这些信公布，在政治局委员中传阅。”

尽管如此，国内视察确实减少了。有时他在国外比在国内的时间还长，对国内现状的了解越来越靠统计部门、国家安全委员会、党中央各部的汇报以及在最高苏维埃开会时与代表的谈话和会晤。政治局开始讨论国家形势，委员们指出，党代会的决议未得到贯彻，本来容易解决的问题也没有解决。他们要求在这方面加强纪律、强化控制和追究责任。经常听到建议采取这种措施或那种措施。这些措施几年前可能还有

实际意义，如今全党和整个社会的心态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人们对要求强化纪律的呼吁并不认真对待。可惜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

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部长会议在党组织的官员和工农业部门的领导中越来越没有威信。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不但负责起草文件，还要监督决议的执行。我常听说，政治局的决议未如期执行，关于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往往是套话连篇，甚至是一纸谎言。我常有机会向总书记和政治局汇报自己的调研结果，但戈尔巴乔夫听后泰然自若。以前他还把办公厅送来的情况简报在政治局传阅，如今他不过看看备忘录。大家都知道总书记的态度。很明显，监督决议的执行已毫无意义。中央文件空洞无物，人们不再理会它。

党的最高层权威的削弱引发了各种矛盾，最终导致各级组织的全面崩溃。中央领导讲话中发出一次次警告，又通过一个个决议，但人们已经认识到，政治局已失去控制能力，形势需要勇于负责，而今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多人认为有必要寻求一种新办法来鼓动民众，承担失误的责任，进而动员全民解决经济问题。然而总书记与行政部门的隔阂已难以消除。

戈乐巴乔夫避免与党中央、部长会议各部门负责人见面，根本看不起他们。如果他要表示对某人的不悦，他就会说，“又是一个机关工作人员！”这种话出自一个一辈子都在共青团和共产党机关工作的人的口中实在奇怪。中央委员会机关的工作人员并不像他。他们都有在工业、建筑业、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研究机构或大众传媒工作的经历。他们对大众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比总书记这位头号机关工作人员清楚百倍。他尽管瞧不起机关工作者，但很会使用这些机关，而且

效果甚佳。他强迫他们起草分析性文件，监督决议的执行，但内心深处仍怀有敌意。他喜欢跟人谈起当年他已是中央委员和区委书记时，他不得不坐在上级的或“教导员”的办公室听他们的忠告，有时甚至是说教。这种事伤了他的自尊心，使他大为恼火。在他担任总书记的整个任期之内，他从不愿意与中央委员会的各种机关人员谈话（仅几次发话说要在他们的大会上发言），因为这些人员中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是非常称职的专家。

在1987年1月底举行的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发表了题为《关于改革和干部政策》的报告，旨在再一次强调在社会各领域继承前任遗产。他重申30和40年代的基本原则，批评了意识形态和学术界一些人把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引入理论上的死胡同的现象。他指出，社会学家未能对国家现状作出建设性的分析，也没有提出使国家摆脱困境的出路。报告还对计划部门、机器制造业、以及主管精神和物质鼓励的官员进行了批评。

报告的中心是社会的民主化公开性，这是前进的根本保证，是克服困难的重要前提。报告要求宣传公开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工农业战线实行民主化，工人参与管理，并为此明确了具体目标，就全社会民主化进程还提出了其它重要措施。中央委员会赞同报告中提出的基本建议，强调在改革时期扩大民主的思想。这一成就的取得，应给戈尔巴乔夫、政治局和中央全会记上一功。

1987年1月，在社会各领域贯彻民主原则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很多人没有把扩大民主看作是发展生产的手段，而视为争取个人和社会自由的武器。公开性深入人心，长期以来受禁锢的思想，如今可以释放出来，不必怕别人听到，可

以批评任何人，包括过去望而生畏的人。自由之风吹遍俄罗斯大地，人们可以畅所欲言，为所欲为，大胆得连西方的激进分子都吃惊。现在有充分机会发表意见。党本身为毫无拘束的公开性打开大门，它作自我批评，也批评过去和现在的失误。

我们知道，公开性经常遇到障碍，有些是客观因素，如傲慢的舆论界对官方公布材料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认为有时有意歪曲事实。但还有其它因素。没有谁闻过则喜。所有这些雅科夫列夫看得很清楚，作为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领导，他必须直接处理新闻自由的后果。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使他相信，既需要发扬民主，也需要新闻立法。他说服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已逐步认识到需要进行民主改革）支持自己的立场。此后戈尔巴乔夫讨论这个问题更经常了。在一天紧紧张张开会之后，他常邀请几个助理前去，回顾当前形势，议论某些中央委员乃至苏联及其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地方苏维埃以及其它政府机构的无能。民主化进程要求对这些机构和工作作出改革。

十月革命70周年纪念日将至，为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要准备一份全面的报告。接受起草任务的一些人建议，报告应充分阐述即将进行的民主改革。戈尔巴乔夫犹豫后接受了。于是展开了长时间的紧张工作，起草关于民主化的主要原则和改善政治体制的报告稿。纪念70周年的报告就民主化对社会进步的极端重要性作了空前详尽的阐述。

没有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政治局和各加盟共和国党委书记的支持，这些难题解决不了。戈尔巴乔夫有信心使改革得到这种支持吗？他的讲话和报告表明，对此他没有信心。

苏共27大刚过几个月，他就发现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变动

还不够彻底。当初草拟参加中央全会的名单时，他主要考虑政策的连续性，变动也只是不动声色的渐变式的。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手脚被守旧派束缚住了。

这不只是印象。人们普遍觉得，在经济一团糟的情况下实行民主化是危险的，那样只会加速经济的崩溃，助长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地区中一部分人的分裂主义情绪。不过此时戈尔巴乔夫把对民主化措施和步骤的恐慌主要看成是对个人权力的威胁。这反过来使他感到有必要粉碎中央委员会中的反对派。为27大准备的文件中有召开党的代表会议的规定，他现在想利用这个规定对中央委员会的构成进行大改组。

“可以看出，这些人已经在走下坡路，他们像木头一样死气沉沉。”他说，“他们根本不理解在当今形势下党走哪条路、我们应该怎样工作。记住我的话：我们党之所以受到批评，主要是因为实施改革的人就是当年原地踏步时期掌权的原班人马。”

在很大程度上他是对的。中央委员会有许多老面孔（当然其中很多人思想进步、很有才干），舆论界和正式会议上对此批评越来越多。把代表选出的这些人统统都清洗不是好办法，需知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是老人，于是他一直想方设法搞掉那些不顺眼的。

当时，党的中央委员会里有他的许多同事。这些人曾经帮他站稳脚根，支持他并贯彻落实他的倡议。可如今他们对他似乎不仅是没有用了，甚至成了绊脚石。他又觉得自己有还不清的债，因此决定劝说中央委员会的部分成员登报声明自愿退出。这样做并不容易，戈尔巴乔夫为此做了充分准备。

首先，他命令中央组织部把领养老金或年纪大的委员列出，然后他坐下来逐一仔细研究。拉祖莫夫斯基受命与一些

同志谈话，劝他们自行退出中央委员会，还安排他们再劝说未拿定主意的委员。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为了党的统一而自愿退出中央委员会的同志聚集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室时，一切都解决了，他们甚至讲出许多要辞职的理由。

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大谈全面审查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必要性。他成功地说服每个与会者接受他的决定，唯一的例外是核工业部长叶·帕·斯拉夫斯基，他拒绝到会。可到后来戈尔巴乔夫又感到后悔，觉得他开除的是自己的战友，虽然上了年纪，可一直随他鞍前马后，共过患难。

他得到报应，因为补选上来取代老中央委员的那些新中央委员，是一些对他毫不客气并持批评态度的人。我感到他后悔莫及，有一次他说：“我跟你讲，我们确实换了一批人，可再来这么一批，中央委员会就乱了套了。”

事前连续召开过两次会议，因为他觉得有必要分两步走。参加第一次会议的是些已下决心自愿辞职的人，参加第二次会议的是些估计不好办的人。然而一切都很顺利，这些同志都很熟悉党的纪律，一致表示愿意退出中央委员会，他们联名向政治局和党中央全会写信表达这一心愿。这样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在苏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据我所知，其它政党也未有过。

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发言，当着很多老部长的面作出承诺：他们的社会福利不变，退休金、公费医疗……一切保持他们生活水平的待遇，都予以保留。遗憾的是，曾几何时，这些历尽战争年代艰难困苦、为国家辛劳一生、没有积下个人家产却负债累累的老同志都被逐出住宅，福利也大都被剥夺。

总书记食言，使他班子里的许多人感到不安。这不只是

因为降低了他的威信，而且也表明，一旦他认为你无用了便会一脚把你踢开。我提醒他注意这个问题，并尽我所能来改变局面，然而没有奏效。他对不再用得着的人不感兴趣。他的秘书们把这些人从过重大节日发贺信的名单上划掉了，戈尔巴乔夫显然已把他们从自己的记忆中划去了。身居高位的他如此轻易地改变面孔、左右舆论，同事一旦受难便把他们抛弃，这使我十分吃惊；然而更让人震惊的是，如果其中有人东山再起，他也会忘记前嫌让我给其发贺电。

他对曾顶撞过他或坚持己见的人耿耿于怀，对有意或无意得罪过他或伤他自尊心的人更是怀恨在心。这种人会发现自己走投无路。有个人不是这种情况，我姑且把他叫作 VVK。他是一位年轻的、很有才华的经济学家，通晓农业，年方 25 岁就与科学院院士涅奥梅德诺夫合作研究控制论和数学在经济中的运用而荣获国家奖。VVK 在国家计委编制局工作的时候，有次应邀参加一个会议。当时，还在农业部门工作的戈尔巴乔夫也参加了会议。很多人在会上发言，戈尔巴乔夫是其中之一。他大谈农业在苏联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农民在经济活动中所占的巨大比例，他为农业对国民收入所作的重大贡献而高兴。VVK 随后发言。他指出，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来鼓吹农民在经济活动中的巨大比例和农业的突出地位，这些其实只表明我国仍属于农业经济，是不发达和扭曲的表现。他认为必须使工业成为主导，农业人口不应占 20% 而只应是 5—7%，发达国家就是这样。

戈尔巴乔夫觉得这等于说自己对经济学一知半解，便勃然大怒。他猛烈批评 VVK，决不原谅他，千方百计地阻止这位青年人事业的发展。可是当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任命 VVK 为一个委员会的领导时，他突然改变态度，急切地叫我

发信祝贺。然而当上总书记之后，他又拿 VVK 开刀，要求把他主管的那个部委的工作列入政治局的议程，然后把他说得一无是处。会后，总书记下决心不让他提升。当党中央经济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V·P·莫津给 VVK 提供一个职位时，戈尔巴乔夫制止了他。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干部，他的全部罪过是说真话，以及显示自己对经济理论的谙熟。我几次为他美言，然而戈尔巴乔夫心怀嫉恨，根本听不进去。

戈尔巴乔夫一步一步地把他称之为“朽木”的老人赶出中央委员会，代之以改革的积极支持者。这样，一个直接的结果是在会议室里走动方便多了，因为老同志少了。但是，对党中央的这种清洗会使批评者满意吗？我觉得未必。如果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长了反对派的胃口，使他们得寸进尺。

坦率地说，就我了解的决策过程内幕而言，决策的深度和性质其实并不取决于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和组成。我认为，如果把改革的目标和采取新措施的必要性向中央委员们解释清楚，他们全都会投赞成票的，这首先是因为工农业管理人员和党的工作者有经验，早就知道国家的弊端所在。其次，他们信任政治局，对它提出来的规划深信不疑。而这些选进中央委员会的年轻人并不比老人更忠诚、更听话，有些人竟批评戈尔巴乔夫的计划，敢于反对他向党和国家提出的建议。

戈尔巴乔夫和政治局通过对党和苏维埃机构以及经济部门滥用职权、对党和人民选举的代表实行独裁进行严厉的批评，同时通过清洗中央委员会的元老，开始在党、国家和基层组织的工作中建立民主机制，提倡充分发表不同政见。苏联宪法作了修改，废除共产党一党专政。当然，这是迫于人民代表和广大民众的巨大压力，充分体现公开性的新闻法被通过。所有这些使传统的管理方法发生重大变革，也为经济

按新的方针发展创造了机会。

1988年6月召开的党的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民主化和政治改革必要性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决议。总书记的报告充满新思想，如人民广泛参政、民族聚居区的发展享有更大自由、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与秩序、党和国家机构职能分开等。

谁 掌 舵 ？

那么，到底是谁在为2000万共产党员和两亿人民掌舵呢？

近70年来，这个职责主要由党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行使。他们制定内政和外交政策，并通过部长会议和地方政府管理经济和控制意识形态。苏联成为大国有他们的功劳，但对一些使苏联人民至今还受苦受难的悲剧性失误他们也有责任。

星期二召开中央书记处每周例会。下午4时，书记处书记、各部部长、主管意识形态部门领导一起讨论解决涉及全党、全国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书记处的职责是讨论涉及党组织和党委的工作、意识形态部门的工作、贯彻政治局和中央全会的指示以及监督其决议执行情况等方面的问题。而实际上，书记处往往超出这些职责而起到政治局和部长会议的作用。这种情况不无道理，因为党组织遍及全国，工矿企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军队、民兵、国家安全委员会、大众媒体、剧院博

物馆，党无处不在。书记处对经常把党组织在铁路、建设工地和油田的活动列入议事日程。

书记处讨论的议题也取决于书记处领导的口味。安德罗波夫倾向于行政和国际问题，契尔年科侧重意识形态，戈尔巴乔夫则喜欢研究农业、经济和青年问题。书记处对于人造卫星和国际青年组织的调查结果广为发表。调查列举的弊端导致共青团中央的大改组。

书记处的议事日程大大超出党团组织的活动范围，它实际上相当于第二个部长会议，不过更强有力、更有权威。

这一事实自然引起部长会议方面的不满。例如，吉洪诺夫得知某一问题准备在书记处讨论后，立即抢先召开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并通过决议。雷日科夫也经常向戈尔巴乔夫抱怨他的工作受到侵犯。这些还是后话。

1985年之前，戈尔巴乔夫主持书记处工作时遇到的是另一种困难：契尔年科及其助手对书记处议程最后说了算，许多准备在会上研究的议题没有事先通气，因而未能提交书记处讨论。由于这个缘故，尽管戈尔巴乔夫竭尽全力，他也只能在已为他圈定好的范围内活动。经常是书记处讨论和决策的问题比政治局讨论和决策的问题还重要。当然，戈尔巴乔夫的动机是出于手头问题的重要性，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想向党、向中央机关表明自己可以当党的第一把手，社会上任何问题都在他的管辖之内。此外，戈尔巴乔夫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远远超出契尔年科。

在戈尔巴乔夫主持下的书记处会议，同以往不一样，可持续好几个小时。很多人出席会议，谁想发言都可以。通常首先讨论人事问题，如书记处待任命名单上的干部的任命，包括州和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报刊杂志和其他宣传部门领导。这

些人的任命，尤其是州委书记的任命，要经过充分讨论，由中央组织部提出候选人。先要详尽汇报每个州或区的形势，查找失误的原因，提出改进措施。新任命的官员在任职初期得到一切可能得到的支持，资源调拨给他所在的地区。总之，尽一切可能确保这个新人得到所在州、区或共和国党组织的支持以及全体党员和人民的尊敬。

在某些情况下，书记处在研究某一地区的形势和问题之后，决定对那里的领导进行调整。这类问题书记处要关起门来讨论，然后呈报总书记作最后决策，再后邀请这个地区的书记到中央委员会要他辞职。如此人尚未老迈昏庸，对工作失误只负部分责任，他或许被调到某个部委或驻外使馆任职，甚至可能被任命为驻非洲或南亚某国的大使。

党中央十分重视把党的干部分派到全国各重要岗位。实际上，每次书记处会议都要讨论这类问题。有时一天能讨论30到50名官员的任命。也曾作出很大努力裁减党中央和政府部门的编制，结果越精简摊子越大。有一个关于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的故事，此人从列宁时代到勃列日涅夫时代一直身居高职，从未间断。人们说他“从一个‘伊里奇’到另一个‘伊里奇’一直在岗位上干，从不得心脏病，也不中风瘫痪”。

有一次他曾把机关的膨胀比作树枝上的乌鸦。它们受到惊吓时便四处逃散；而过几分钟你再抬头一看，他们又都飞了回来，甚至比原来还多。这就是我们精简机构的结果。

经过反复努力，应该说还有些成绩，但待任命名单的规模精简有限。书记处决定更换某处的领导人时，该处第一书记的候选人不便出现在会场。干部的任免是左右一个地区形势的有力杠杆。它威慑各地、各部门必须遵守纪律、维持秩

序，因为不执行书记处的决策会带来严重后果。

书记处会议虽大都以讨论人事开始，以什么问题结束却不尽相同。常常是：有些议题从议程上除掉，只在中央书记和一两个部门领导出席的会议上讨论。这种会议只涉及特别敏感的问题，如某些中央委员或地区部门领导有不端行为、违法乱纪、滥用职权等。追求奢侈生活和住房分配不公常列入议程。讨论后形成的决议往往十分严厉，不过在早期很少公布于众。

原来由书记处会议讨论的最复杂、最重要的问题，尤其是部长会议和其它政府部门职权范围的事宜，后来都交给政治局，由那里最后决策。

书记处会议主持者的风格和工作方法各异。戈尔巴乔夫喜欢速断速决；但当面临难题时，他常常犹豫退缩，最后通过一项毫无约束力的决议。在他被选为总书记之前，有一次某人建议给城镇居民划拨土地（尤其是原居民已迁走的地方）。就此事我写了个备忘录交给戈尔巴乔夫。备忘录分析了全国有多少人渴望种植果园和蔬菜，又有多少空闲的村庄和耕地，清楚地表明分地的好处。会议展开讨论，很多人发言表示赞成。戈尔巴乔夫说：“这当然应该办，人们应该有机会在田里劳动。我们并不缺土地，不是吗？实际上，土地空闲着，只长树。”

接着发言的是中央农业部的代表。他指出，事情并不那么容易。国营农场经理会反对的。他说，如果建议得以实施，城市居民就会来到乡下，在帆布椅上闭目养神；而农民们却一周七天、每天从早到晚在田地里辛勤劳作。这样对农业不利，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不利。当建议准备付诸表决时，戈尔巴乔夫的调子变了，口气软了下来。他心里很矛盾，公有

制农业被破坏如何是好？要知道，安德罗波夫可是反对建造别墅的。可是另一方面，城市居民也需安抚。最后决议形成了，戈尔巴乔夫说：“在有可能的地方，土地应该分掉；但我们不应伤害农庄的利益，也不能影响种田人的积极性。”

这是戈尔巴乔夫的典型妙语。妥协的结果是事情悬而未决，好像根本没有讨论过一样，自然也就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很遗憾，当时作过大量的这种模棱两可的决议，后来更是有增无减。

利加乔夫开始主持书记处会议后，会议的进程就留下了他的个性。他喜欢让书记处按照自己的意愿讨论和通过议题，使用一切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有时甚至是强加于人。

戈尔巴乔夫看到利加乔夫的作法，颇为嫉妒。他很想知道书记处会议进展如何，讨论了什么问题，通过了什么决议。他常常从议程上取下一个或几个议题，声称它们应该由政治局研究，其实政治局也没有讨论。这里有人与人之间惯有的那种勾心斗角。戈尔巴乔夫想方设法阻止别人侵扰自己的领地，想向每个人表明是他驾驭一切。

感情用事、直言不讳的利加乔夫很多事都做过了头。他发现拉祖莫夫斯基绕过他来选任干部，便开始施加巨大压力，常常把他叫到自己办公室，就即将进行的人事调整严词质问，为什么事先没有通报。拉祖莫夫斯基经常抱怨他和利加乔夫之间有道缺乏理解的鸿沟。可他有什么办法呢？戈尔巴乔夫有言在先，人事问题只向他一人汇报。书记处的紧张关系后来酿成大祸。

我们已经看到，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不久便因为对舆论界工作的分歧而彻底破裂。雅科夫列夫支持自由主义的报刊《星火》和《莫斯科新闻》以及

其它一些文学刊物，而对《我们同时代的人》和《青年近卫军》和其它一些保守主义的刊物不满。两人不同的态度导致两种不同的工作方法，结果削弱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这种状况两人都向戈尔巴乔夫做了汇报，后者却置之不理。他的同事之间互相争斗，只会两败俱伤，他的日子更好过。这种情况是他有意而为？还是缺乏办法？很难说。

糟糕的是两人的冲突后来扩大到政治局，每次开会雅科夫列夫都发现自己挨批评。利加乔夫或雷日科夫带头发难，拿出新闻界某篇文章，接着批评的炮弹四面而来，强调主管意识形态部门的领导软弱无力。自由主义报刊《莫斯科新闻》和《星火》发表直接或间接批评戈尔巴乔夫的文章后，雅科夫列夫彻底完蛋了。总书记看到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多数成员都反对雅科夫列夫的立场，便寻求新人替换他。雅科夫列夫失去了信任和支持，觉得不如及早调换岗位。他经常说：“面对现实吧！我从来没有干过自己说了算的工作，为什么这样？让利加乔夫主管一团糟的农业去吧！为什么他们让意识形态部门一山存二虎呢？”戈尔巴乔夫后来把他调到外事口，而在那里他又要听谢瓦尔德纳泽的摆布。

毫无疑问，雅科夫列夫为人自负，但很有影响力，戈尔巴乔夫差不多每次讲话都流露出他的观点。但他和总书记的关系时有不顺，戈尔巴乔夫总是想办法阻碍他发挥主动性。他对下属大都如此，很少让他们独立工作，除非是不得人心之事。

雅科夫列夫不能理解为什么不让他 在列宁诞辰和十月革命纪念日的隆重集会上讲话，他请我为他说情，因为这是他渴望已久的事。我提醒戈尔巴乔夫（我经常这样做），在这种场合谁讲过话，谁没有讲过，言外之意该轮到雅科夫列夫了。

他沉思一会儿后说，现在讨论此事为时过早。结果雅科夫列夫从来没得到讲话的机会。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戈尔巴乔夫不想让雅科夫列夫说出一些可能使自己的思想相形见绌的想法和计划。雅科夫列夫和我也还想到可能有另一种解释：戈尔巴乔夫就任总书记伊始，请他出任助理，而被雅科夫列夫拒绝。戈尔巴乔夫决不会忘记此事。不管雅利夫列夫在什么部门工作，他实际的角色总不过是演说撰稿人、智囊、助理或顾问；一直到总统委员会解散后他还是被任命为戈尔巴乔夫的高级顾问。

整个这一时期，书记处内的气氛一直紧张，尤其是书记们发现自己的决议不再像以往那样有权威性之时。决议被通过，但人们不能或不愿执行。一度有权威、有影响的书记处如今变成了一个争论不休的俱乐部。当选为副书记、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的伊瓦什科无力改变这种状况，因为一度坚强有力的党的影响链而今松动了好几个关键环节。这个多层次结构开始衰落，最终走向崩溃。经济事务以前都在党的控制下，如今不同了；而由于推广公开性，舆论界完全摆脱了党的控制。竞选使党失去了指导人事政策的机会。一次又一次的发生这样的情况：书记处打算任命某人为某州的党委书记，而该州的党员在自己的会议上和代表大会上却选出了另一个人。见此情景，全国各地官员把贯彻书记处决议看作例行公事，算是出于对一度曾是强大而有影响力的共产党的尊敬吧。

政治阴谋的主角斗场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主要经管党的组织和思想事务，不过也曾扩大到许多经济问题，那本是党的各级委员会的事情。但是，在共产党、乃至整个苏联，其主要政治机关、其大脑和神经中枢乃是党中央政治局，内政外交政策中一切实质性的问题都由它操办。是政治局通过决议出兵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是政治局批准关于国界划分、裁军、空间飞行、开垦处女地、建设贝加尔湖至阿穆尔的铁路、物价的升降、印发钞票、出售珍宝等等建议和计划。

政治局委员按传统包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和国际事务权威人士。其成员过去往往都是年长甚至年迈的。这个最高权力机构引起国内外的尊敬和兴趣。

政治局各届的规模和组成不一。例如，有几届其成员不包括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人和计委主席，也可能不包括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过去 20 年间，委员总数都在十一二人。党的 27 大后选出 12 人为正式委员，7 人为候补委员。正式委员有：米·谢·戈尔巴乔夫、盖·阿·阿利耶夫、维·伊·沃罗特尼科夫、安·安·葛罗米柯、列·尼·扎伊科夫、丁·阿·库纳耶夫、叶·库·利加乔夫、尼·伊·雷日科夫、米·谢·索洛缅采夫、维·米·切布里科夫、爱·阿·谢瓦尔德纳泽、弗·瓦·谢尔比基。候补委员有：彼·尼·杰米契夫、弗·伊·多尔基赫、鲍·尼·叶利钦、尼·尼·斯柳尼科夫、尤·菲·索洛维约夫、尼·弗·

塔雷津（候补委员还应有谢·列·索科洛夫——译者注）。党的各次代表大会之间委员均有变化，由国内外一系列因素而定。

28大之后，政治局组成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它不仅包括中央书记处书记和经济机构的负责人，还包括加盟共和国党委第一书记，他们之中有的还兼任本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

每星期四上午政治局召开例会。会议开始前半小时，民兵便封锁了古比雪夫大街交通。然后，一辆辆吉尔豪华轿车在保安车队的护送下，载着决定国家命运的要人，从党中央的办公楼开到克里姆林宫。

会议一般在政府办公大楼三层举行，在斯大林用过的办公室上面。总书记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在同一层，那是一间阴暗、闭塞、不舒适的房间。它长约40英尺、宽约20英尺，长面有窗。房间与楼道之间有一面挂满东西的墙，它也决定了办公室的形状。办公室后面有一间休息室，不过很难想像谁能在那里得到充分的休息。戈尔巴乔夫承认，他本人很少去那里休息，即使身体不舒服之时。总书记办公室最近进行了修缮，改配了意大利家具。办公桌很漂亮，用暗色樱桃木制作，桌面很大，桌座严封密裹，很结实。旁边有两个皮包扶手椅，任何人坐在那里须仰望总书记，不禁有渺小之感。

近门的一侧是间会议室，只能容纳6人。在办公室一角有个矮桌子，周围有几张安乐椅，戈尔巴乔夫喜欢在这里喝咖啡。房间的一端有个小书架，地上铺着精美的地毯，水晶大吊灯照亮整个房间和圆顶天花板。

进办公室之前先要经过接待室，经过戈尔巴乔夫的私人

秘书和保镖。接待室同其它房间一样阴暗狭窄，它也通往政治局会议室的内室（俗称“核桃室”，因为它的镶木都是核桃色）。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书记处书记开会前在此集中。“核桃室”也是讨论机密问题（也就是只有极少数实权人物需要知道的问题）之处。每当政治局委员们从这里走另一个门进会议室时，他们其实对在“核桃室”讨论过的一些问题已心中有数了。

不过大部分问题还是在政治局会议室讨论。这里可坐 80 人（当然坐得不松快）。室中央有张大桌子，桌面铺着绿布，与主席桌成直角。主席桌上有墨水台、座钟、摇铃，还有控制挂在专用幕墙后的各种地图的按钮。座位严格按职务和资历排序。

戈尔巴乔夫右手是利加乔夫，党内第 2 号人物一直在此落座。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曾为此奋斗多年。利加乔夫对面是雷日科夫，按顺序往下排是葛罗米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政治局中年纪最长者），索洛缅采夫、梅德维杰夫、克留奇科夫，再后则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如有政府官员与会，则坐在这些人后面。从来没有人坐在另外什么位置，即使是漫不经心。办公厅主任及其第一副手坐在戈尔巴乔夫左侧的桌旁，记录会议进程，并决定应邀与会者的次序。靠墙和窗的座位一般留给书记处助理和每次应邀与会人员，后者包括：宣传部部长、《真理报》总编、组织部第一副部长。

最后还要提到，会议室外面还有一个小接待室，应邀与会者在此等候，轮到讨论有关议题时再相继入场。很多人觉得在此等候很不舒服，便在走廊里踱来踱去。

为政治局会议做的准备工作以拟定议程开始。戈尔巴乔夫接到此前已在政治局委员中传阅过的文件名单，这些文件

由全苏（或俄罗斯联盟）的部长会议或外交部或其它政府部门起草，现交政治局审定。然后，政治局委员们在助手的协助下从政治上是否有利、是否有益于涉及的政府部门的角度审阅这些文件。这种详尽的审阅使政治局能客观地、深入地判断每个文件的优缺点。委员们对很多文件写下书面意见，包括修订和补充的建议。由于会前研究得细致，政治局就能作出明智的决策。

议程一般包括一两个需要仔细研究的主要问题，加上一些次要问题，这些小问题有时根本讨论不上。因为委员们会前都已看过草案，不费什么周折就通过。根据问题的复杂程度，草案起草者通常有10至15分钟的时间先作一说明。然后，戈尔巴乔夫就让其它有关部门进行评论。对某问题的审议有时持续两三个小时。这并不是什么优点，只会令人头痛。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之前，政治局会议三四十分钟就结束；他上任之后有时能开上10个小时。戈尔巴乔夫还经常以此为荣，说他们如今真正在履行职责。但实际上委员们已经厌倦，效率下降，办不成什么事情。

同政治局委员们一样，我也不理解会为什么开这么长。如果对议题事先有准备，那就采取行动吧；如准备不足，就把提案送回起草人再加工。这样倒好，搞得大家都精疲力尽。葛罗米柯、斯柳尼科夫和其他几个为心血管病困扰的委员甚至气喘吁吁，更为难受。由于戈尔巴乔夫害怕感冒，要求不要开空调。在这种闭塞的环境下连续工作几小时，健康人也吃不消。不时有的委员就会转身面向我打手势要求开空调，于时我叫人把空调打开，立即会得到回答，说空调一直开着。

当然，在初期，由于1986年4月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和同年9月“海军上将纳希莫夫”号客轮在黑海沉没，工作

十分紧张，时间不能浪费。天灾人祸，非死即伤，戈尔巴乔夫似乎命途多舛。然而这些问题很多并没有提到政治局会议上研究，因为戈尔巴乔夫事先已把它们划掉了。

政治局：议题

戈尔巴乔夫接到的关于切尔诺贝利事件的第一个正式报告表明，这是一件空前严重的灾难，西方报导也证实了这一点。很明显，人员伤亡惨重，经济损失巨大。不过，灾难的严重程度一开始并未公开，这方面的新闻报导都经过严格筛选。但完全保密是不可能的。组成了一个由雷日科夫为首的特别委员会，成员包括科学技术专家、军队和工农业部门的高级官员。这一期间政治局经常开会研究切尔诺贝利地区的形势，听取雷日科夫及其副手关于消除事故后果的报告。

有些专家企图把这一事故的责任全部推给核电站工作人员，另一些人则指责科学家，说反应堆一开始就没有设计好。气象人员发布的天气预报开始时叫人吃了定心丸，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放射污染严重的地区在扩大，不仅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部分地区也受到影响。在远离切尔诺贝利的地方也观察到永久性放射性物质。显然，放射污染已波及大片地区，其中有些地方可能在数十年（如果不是数百年）内不适合人类居住。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这些事实未被充分重视。

当然，面对这样大的灾难，也只有像苏联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才能动员巨大的财力物力和科技力量来减轻悲剧性的

后果。很难想像，如果此事发生在现在的乌克兰或白俄罗斯，它们单独如何对付。当时，大风把放射性尘埃吹到很多远离事故区的地方，好几个欧洲国家（尤其是那些蔬菜和水果受到污染的国家）要我们赔偿损失。放射性尘埃还被吹到高加索、外高加索和俄罗斯部分地区。这真是世纪灾难。它也表明，使用核武器危险之至。

政治局极为关注乌塞厄斯·鲁斯特事件。此人驾一轻型飞机，从波罗的海边境一直飞到莫斯科，降落在市中心红场。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个阴天。我看见一架小飞机盘旋在克里姆林宫周围。由于那几年常有飞机和直升机飞越繁华市区拍摄历史纪录片，我开始没有在意。几分钟后，我接到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电话，说一架德国运动飞机已在克里姆林宫旁降落，驾驶员是德国人，他解释说是来莫斯科访问的。此事太离奇了，我要求证实。

戈尔巴乔夫当时不在莫斯科，似乎正在柏林。第二天返回莫斯科，他一下飞机就和前来迎接的政治局委员讨论此事。鲁斯特事件背后的政治原因很明显。赖莎马上指出，这是军方企图羞辱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当即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此事，并要求国防部长就事件过程提出详细报告。

一架德国飞机竟然降落在克里姆林宫旁，苏联人民大为震惊。他们一直为祖国的防空力量而自豪，并为此贡献了几十亿卢布。此事当然损害了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我相信，在外国崇拜者心目中也如此。总书记把这一事件解释为军方针对他个人的蓄谋已久的行动。他对军队本来就有疑虑，如今更是怀恨在心，为这次“小小玩笑”他不会饶恕他们！很长时间他对此事耿耿于怀，不论私下还是在公开场合，他都极力诋毁军队，制造敌视军队的气氛，并把

它散布给大众媒体和最高苏维埃代表。

军方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解释实在难以令人信服。诚然，发现低速、低空飞行的单引擎飞机是困难的，但那天好几个地方的雷达屏上都显示出一个飞行物。边防部队首先发现了它，并报告给防空军，但防空军没有找到鲁斯特的飞机。不久它又出现在军用雷达屏上，当然，图象不太清楚，空军官员解释说，看上去像一群候鸟。战斗机升空，在云层之间发现一架飞机。误击韩国波音 747 客机的事件他们还记忆犹新，便决定不将它击落。飞机改变速度后，又消失了。鲁斯特不时变换速度和航向，邻近莫斯科时，他沿着铁路飞，几乎察觉不到。而当时莫斯科对飞行物毫无所知。

许多政治局委员就此发言，追究军队的责任。最后的处理是严厉的，有些军官受审，有些被迫退休，国防部长索科洛夫被解职。这可以说是戈尔巴乔夫采取的唯一的一项激烈措施，而主要又是因为他把此事视为军方对他的个人攻击。

在当初，政治局讨论问题是充分的，决策是共同作出的（至少表面上如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问题的研究越来越肤浅，越来越匆忙。戈尔巴乔夫权势越来越大，一碰到同事有不同意见，一听到对他工作乃至生活的批评，便搞孤家寡人政策。如今，他准备先在政治局、而后在中央全会上作的报告和讲话事先在政治局委员中传阅得少了。神圣的集体领导和意见一致的原则遭到侵犯。有时他把即将作的报告的大致内容向委员们介绍一番，请他们通过，但这种作法后来也少了。如今在政治局会议上实行的是某种独裁。委员们往往胆怯地互相看看，以表示对改革建议的惊奇，但都沉默不语。

在讨论尼娜·安德烈耶娃致《苏维埃俄罗斯报》的批评

信时，这种倾向就更明显。戈尔巴乔夫翻看着某些文件并对其内容的修改作指示时，突然随便地问我是否读过这封洋洋4500字的信？我回答说已开始读还未读完。

“在我看来很正常嘛！可有这么多人大惊小怪。”他说。

当时我无言以对，后来逼着自己把它读完，因为雅科夫列夫对此信大为反感。几天后，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如今他认为此信是对改革的攻击。是什么使他改变立场的呢？无从得知。下一次政治局讨论此信时，大部分委员或对此信仍然不甚了解，或知道而并不在意。有些人则简单表示支持此信——从而暴露了自己的观点。

会议进行了一天，人们坦言相陈，但讨论很不紧凑。即将结束时，戈尔巴乔夫突然采取行动，说此事很有实质性，我们必须就信的内容公开自己的立场。他宣布第二天继续讨论。他感情为什么这样冲动？令人难以理解。

第二天政治局继续开会，地点改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室。戈尔巴乔夫一副斗志昂扬的姿态。他首先表明自己对信的看法，然后请大家评论。委员们通常按座位顺序发言。从邻近总书记的开始，按顺序至书记处书记。虽然戈尔巴乔夫定下调子，讨论中仍有不和谐的音符。当然，总地说，发言主要还是挑信的毛病；同时，对于信中关于历史部分、关于人民用血汗劳动所创造的成就，很多人发言也表示同意。戈尔巴乔夫听起来显然很不顺耳，常常违反会议程序，粗暴地插其他政治局委员的话。会后他说：“现在我可算认识一块工作的这些人了。跟这些人在一起就别想谈什么改革！”

此时，政治局中连德高望重的委员也改变初衷来迎合总书记了。戈尔巴乔夫开始诘问发言人，对那些对信稍加肯定的委员讽刺挖苦。我想不通，为什么这些人容忍他攻击他们

对既定政策的忠诚、践踏他们的自尊呢？每个人都有权利作出自己的判断、坚持自己的观点，决不应该按照指挥棒左右摇摆。

在与新闻界和西方政界人士的谈话中，我经常听到他们赞扬戈尔巴乔夫举止得体，很有涵养。如果他愿意，他肯定可以留下这种印象，这点我可以作证。但是，我和其他许多人都知道，他性格深处还有其它特点和习惯，戈尔巴乔夫有时可以很粗暴，羞辱他的下级。

政治局委员们花了一整天阐明自己的立场，到头来却发现自己不过是在向总书记宣誓效忠，而忘记会议的本来目的是讨论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在中央全会或其它场合，当围绕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形势产生分歧时，在辩论的结束阶段，戈尔巴乔夫越来越多地使用类似手段，委员们则宣誓效忠，这已司空见惯。实际上，这使我想起从切利诺格勒飞往莫斯科途中一事。那天正好是我50岁生日。赖莎邀雅科夫列夫、拉祖莫夫斯基和我去喝上一杯，然后突然要我们宣誓终身效忠——不是效忠于某些理论或原则，也不是效忠于苏联人民或我们的祖国，而是效忠于领导者一人。话说回来，公众越批评决策失误和措施不力，他就越强调服从。如果他发现有人没注意听他讲话，他就突然提高声音。他经常打断别人（尤其是卢基扬诺夫）的发言，甚至威胁说要把他们撵出会场。这种行为不久之前还闻所未闻，如今人们却装作没有看见。

雷日科夫肩负重担，更主要的还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对他吹胡子瞪眼，两人关系急剧恶化，而后面临崩溃，终于导致自己倒台。当时我没有细想，可人们该怎么解释呢？最后说雷日科夫是心脏病——这种情况并不是他一人。盖达尔·阿

利耶夫有一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受到严厉批评，最后被抬进医院，也说是心脏病突发，休息了两年。就他而言，适当批评也是对的，但为什么要把人一棍子打死呢？为什么不能以尊重人的态度进行适度的、同志式的批评呢？阿利耶夫最后被迫辞职。在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对他的工作也作了肯定，可发表公报时又把这一段从会议记录中删去了。

雷日科夫也是被迫辞职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健康原因”。他健康恶化以及为什么健康恶化，都有个发展过程。我记得他和戈尔巴乔夫开始关系很融洽，而后戈尔巴乔夫说服安德罗波夫安排雷日科夫进中央委员会，然后又推荐他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在艰苦时期形成的关系不一定能适应新的体制，环境毕竟发生了很大变化。部长会议某一个决议未得到执行，导致一系列失误，影响整个工作效率，结果政府受到批评。这当然使部长会议主席团、使雷日科夫本人很不高兴。

雷日科夫努力贯彻他建议进行的经济领域的主要改革措施，然而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却发现批评从四面八方袭来。他的精神压力越来越重。此时有人站出来讲话，说新闻界对政府毫无根据的指责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他当然同意这些人的意见，他自己也直言不讳地批评意识形态部门自毁的倾向，于是给自己招来更大的麻烦。

在政治局会议上，他经常发问：“有谁能告诉我，为什么政府受到这种毫无根据、信口开河的批评？为什么没有一篇文章说说真话？这叫什么样的公开性？”

其实他何必费此口舌，这番话只能招惹更激烈的批评。在部长和其他经济部门官员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建议创办一个政府新闻周刊。遗憾的是很少有人读它，尤其是创刊之初的几个里，因为它名声不大，发行量小，编辑人员又缺

乏经验。

亚美尼亚发生大地震后，尼古拉·雷日科夫亲赴现场，他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从那时起明显走下坡路。雷日科夫在亚美尼亚的所作所为使很多人又惊又喜。他不知疲倦地工作，解决地震带来的种种问题，电视上几次露面也给人留下精明强干的印象。这次访问后，对雷日科夫的支持率上升了。戈尔巴乔夫对此大为不悦，因为他自己的威望已开始走下坡路。

“尼古拉的人缘很不错，不是吗？”戈尔巴乔夫那阵子经常说，“他要进入政治界了，可是他应该做好本职工作，把经济搞好。”

从两人相识开始，戈尔巴乔夫就一直称雷日科夫“米古拉”或“尼古拉”。他几乎对每个人（包括陌生人）用昵称相呼。不过他有些惧怕葛罗米柯，从不敢对他如此亲热。

雷日科夫新的独立性很可能进一步加深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间的裂痕，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即使在那个时候，雷日科夫也在要求采取更果断的措施来恢复国家秩序，强化纪律，这显然是对戈尔巴乔夫的非难。戈尔巴乔夫感到恼火，最后把雷日科夫和政治局其他一些委员看成是自己的对手，抓住每个机会批评他们。不久，雷日科夫因健康原因辞职。这样，戈尔巴乔夫与一个帮他上台出过大力同事的关系宣告终结。

葛罗米柯起初支持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的一切讲话和建议。他就像政委一样，总是第一个从战壕里跳出来捍卫总书记的立场，即使在他并不熟悉的问题上也是如此。然而到最后连他也陷入沉默。他年事已高，很难工作，何况是在这样一位总书记手下工作。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葛罗米柯通常应该主要参与外交事务的研究，他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可是一开始就没有给他这种机会，外交政策的制订与他毫不相干。不管怎么说，对于戈尔巴乔夫与外国领导人会晤和会谈的细节他是一无所知。发给政治局委员的这类通报越来越少。很多谈判和协议对政府，包括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外贸部门也封锁消息。政治局和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加盟共和国的首脑都不很清楚总书记的外事活动。我不知道这方面的通报最后送到哪里，但到我手里的越来越少。

没有多久，年迈力竭的葛罗米柯就放弃了战斗。我可以从他的眼神里看到疲倦和病态。他痛苦地环顾四周，显然为自己参与造成国家悲剧而内心受到折磨。我们已经看到，他在政治局发言的次数越来越少；即使发言，也往往讲些老百姓的苦衷和自己的回忆。戈尔巴乔夫此时就会向其他委员眨眨眼，似乎在说：“看看，我们就得同这种人共事。”戈尔巴乔夫起初曾保证过，他不会犯勃列日涅夫等人一身兼两职的错误。然而，他又逼迫葛罗米柯辞职，不久便接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我早就知道，如果最高领导说“不”，你就应当理解为“可能”甚至为“是”。戈尔巴乔夫怎么说都行——他既可以说出去，也可以收回来。

戈尔巴乔夫任期将尽之时，政治局的议程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如今提交讨论的重要的实质性问题越来越少。整个会议气氛紧张，有些人大声疾呼，有些人无动于衷。我的电话却响得频繁，有的问如何申请养老，有的问养老金有多少，有的问有无可能保留公费医疗。政治局委员的养老金一直按规定发放，他们可以保留公费医疗，还有资格享受一套别墅和配司机的专车。然而如今我却不能给他们一个肯定答复，因为享受养老金的权利越来越打问号。

政治局辩论时往往针锋相对，对当前形势的估价也众说

纷纭。在大部分问题上，利加乔夫往往和总书记的意见不一致，但两人都认为有必要进行改革。其实大家都承认改革必要，但改革的时间表不一致，对戈尔巴乔夫削弱军队、军事工业和党组织的作法也颇有异议。最重要的是他们不理解总书记言行不一，经常背离既定方针，以及左右逢源的作法。有些委员或直接批评戈尔巴乔夫，或对其某些决策消极对抗。

利加乔夫直言不讳。政治局和党中央很多委员都知道，至少是感觉到他与总书记有分歧。很多人支持他。戈尔巴乔夫忧心忡忡，把他看成正在兴起的领袖，能把各派力量聚集在自己周围。这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很快，新闻界开始攻击利加乔夫，给他扣上受贿等莫须有的罪名。对于这样一个名声显赫的政治家，这样的指责前所未有，需要立刻回击。戈尔巴乔夫却不愿意站出来为最亲密的战友说话，虽然他有一次对我说：“我不相信叶戈尔会受贿，他不是那种人。好多事他都可能干，但不会受贿。”

戈尔巴乔夫没有公开反驳这些诽谤诬蔑，利加乔夫只好独饮苦酒，只身自卫。戈尔巴乔夫不再担心利加乔夫是个潜在的领袖，便开始限制他的活动范围。以前总书记不在时总由他来主持政治局会议，现在这种机会就少得多了。如今会议改为不定期召开；即使开，议程上也没有什么重大问题。不久之后，书记处的会议就没有多少要利加乔夫主持的了。戈尔巴乔夫经常说：“我们真需要有两个并行的机构吗？政治局就可以作出一切必要的决定嘛！”

书记处会议不再常开。一度有可能成为领袖人物的利加乔夫如今成为孤身一人——这正是戈尔巴乔夫和诬蔑他受贿的人很想见到的。

第六章 不可对外人说

弗奥德尔·库拉科夫是位美食专家。他同戈尔巴乔夫一样，来自斯塔夫罗波尔，后任政治局委员、农业部长，最后死于胃病手术。他的英年早逝给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留下一个空缺，也是苏联一系列戏剧性事件的前奏。如果没有这一悲剧性事件，戈尔巴乔夫根本不会青云直上。

因为戈尔巴乔夫有在斯塔夫罗波尔政界工作的经历，他成为库拉科夫治丧委员会的一员，在列宁墓上发表一通恰到好处的好处的悼词。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此人，他的外表给我留下不大协调的印象。当时他年纪不大，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又显老，头发明显稀少。他讲话时地方口音很重，有时重音不对。应当说，我当时没有仔细打量这位来自遥远南部草原的新人，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会跟他打交道，更没有想到他会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戈尔巴乔夫显然不这样想。在列宁墓上致完悼词，把库拉科夫的骨灰放入克里姆林宫墙内之后，他就焦急地等着，看看谁会被任命为农业部长。当时他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命运之神朝 47 岁的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

戈尔巴乔夫微笑。他取代了库拉科夫在中央的位置。我们已经看到，党的高层领导中，已有不少人认识他。不过总地说，他的任命出人意料。安德罗波夫曾举荐过他，苏斯洛夫和其他曾在沃德矿泉疗养院疗养和治疗过的高级领导人大都熟悉他。不过，当时也有几派人物向勃列日涅夫力荐乌克兰波尔塔瓦州党委书记费·莫尔贡。两位人选同时来到莫斯科供领导考虑。然而当勃列日涅夫召见戈尔巴乔夫时，却到处找不到他。眼看莫尔贡要在勃列日涅夫的别墅捷足先登，好在一个聪明的侦察工作挽救了年轻的戈尔巴乔夫，多亏契尔年科的秘书们，否则后果很难设想。秘书们设法找到戈尔巴乔夫的司机。司机告诉他们戈尔巴乔夫去了何处。勃列日涅夫支持戈尔巴乔夫，结果可想而知。戈尔巴乔夫被选进中央书记处，不久当上政治局候补委员，26 大后成为正式委员。

这位充满朝气、锋芒毕露的年轻书记的到来打乱了政治局的平静。很明显，有些委员不愿意接受这位从斯塔夫罗波尔来的冒冒失失的年轻人，他和柯西金处得不好，和部长会议中的一些年长部长的关系也紧张。在那个年代，中央委员会的人选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很少有人独立行事；有时看上去独立行事，人们也都认为是事先与部长会议主席打过招呼的。

戈尔巴乔夫和哈萨克党委第一书记穆罕默德·库纳耶夫的关系开始也不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库纳耶夫拒绝承认这个年轻人，到莫斯科从不拜访他，我估计也从未打过电话。一旦有什么关于哈萨克的事，库纳耶夫便立刻与勃列日涅夫联系。两人关系很好，勃列日涅夫对他有求必应。必要时库纳耶夫也找政治局，而政治局不敢轻易拒绝这样一个大加盟共和国首脑的要求。库纳耶夫与乌斯季诺夫、契尔年科、

苏斯洛夫和安德列·基里连柯（都是多么显赫的人物啊！）关系长期不错。

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总书记后，库纳耶夫当然开始改变调子，但为时已晚。1985年9月戈尔巴乔夫视察哈萨克时，他也飞到切利诺格勒。那是9月上旬，正是北哈萨克金秋季节。新任总书记来到地区中心肖坦迪，会见全苏粮食种植学院的巴拉耶夫院士。在那里他呆了半天，研究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抗风蚀的方法。巴拉耶夫虽重病在身，仍带他各处参观，并汇报了学院的科研情况。然后戈尔巴乔夫视察了田野，与正在工作的联合收割机手交谈。

他也和库纳耶夫交谈，但未达成相互理解。戈尔巴乔夫离开的那天上午，库纳耶夫去送行，带上传统的哈萨克礼物：两件深绿色法兰绒长袍，镶着哈萨克刺绣，外配黑貂皮领子，还有一顶黑貂皮礼帽，法兰绒帽顶，其中一件长袍是送给赖莎的。戈尔巴乔夫接过礼物，但两人关系依然冷淡。

1986年12月，阿拉木图发生骚乱，按索洛缅采夫对政治局的说法，是民族主义情绪引起的。结果，库纳耶夫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另一原因是他接受下级的礼品。他离开党中央办公楼时，门卫将其出入证收回。一位长期任共和国领导人的老党员就这样身败名裂了。

戈尔巴乔夫和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的关系也很僵。谢尔比茨基独立性强，不服压。这位被很多人称作“大叔”的人看不起政治局的年轻人。不过他常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还有一次来莫斯科时登门拜访，这使戈尔巴乔夫高兴之至，经常提及此事。显然，两人关系有所改善，不过仍然疙疙瘩瘩，不久便公开化。谢尔比茨基没有参加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的中央全会。当时他正在纽约，声称来不及飞回。但是，戈

尔巴乔夫及其顾问事后得出结论：他实际上是来得及的。

在戈尔巴乔夫1985年访问乌克兰时，两人发生冲突。在党员集会上，戈尔巴乔夫发表演说，严厉批评了共和国领导的众多失误——他的前任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他们连神色都不露。

谢尔比茨基在乌克兰的众多宿敌看到最高层已发出信号，于是蠢蠢欲动。“大叔”意识到应该立即改变态度了。此后，在政治局会议上，他不再那么好战。实事求是地讲，他从来没有蛮不讲理或耍阴谋诡计，只不过是坦率而已。如今他发言很少，不久当政治局调整时，便因健康原因辞职。

在我看来，葛罗米柯是位独立人物，对尘事不闻不问。他以捍卫苏联利益的、博学多识的、才华横溢的外交家而博得公众的尊敬，经常在电视露面也提高了他的威望。他一直忙于外交事务，先是与勃列日涅夫、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一起制订外交政策，后来基本是独自操作。他很少注意到戈尔巴乔夫，至少没有达到这位年轻人所希望的程度。实际上，直到戈尔巴乔夫成为主持书记处工作的中央第二把手，葛罗米柯才开始注意他。

此时，西方传媒已经从苏共老人领导班底中看中了戈尔巴乔夫这位年轻人，把他视为所谓“新一代”的代表。1984年戈尔巴乔夫在伦敦与玛格丽特·撒切尔会见之后，他引起欧美政界的广泛注意。访英成功抬高了他的身价，使他充满自信，而在苏联国内，知道他去了趟英国的人并不多。

苏联新闻媒体在处理中央委员出访的报导时，遵循一个长期沿袭的传统，即只有一个人——总书记——的成功访问才给予突出的报道。外交部也如此，它将驻外大使送来的关于这类访问的报告呈送总书记。如需报导访问成果的更多消

息，常常都会低调处理，通篇没有形容词，像石头一样冷冰冰的。

有好几次苏联政界人士出访时，因西方或苏方新闻媒体突然披露的什么消息而颇感尴尬，或受到赞美而异常欣喜。一旦引起总书记的怀疑，当事者的前程很可能被葬送，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周围正紧锣密鼓进行着阴谋活动。

关于戈尔巴乔夫的英国之行，葛罗米柯给契尔年科送过很多电报，有些电报则留给了自己，报纸对于他的成功访问没有任何报道。困惑不已和经验不足的戈尔巴乔夫得出结论：党中央和外交部中敌视他的某些派系策划了这一切。对此他深信不疑还有一个原因：1983年他访问匈牙利和卡达尔会晤时陷入同一处境。当时他认为新闻界就匈牙利领导人接见他发一篇简短报导十分重要，因为那将承认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之一。但报导迟迟才发，莫斯科并不看重它；另一方面，对戈尔巴乔夫的敌视也是一个因素。戈尔巴乔夫夫妇访问匈牙利时我也随同，同他们一样，我对苏联媒体对卡达尔政府接见戈尔巴乔夫一事所表现出的冷漠颇为不安。我同他人一起努力使新闻报导理想一些，最后总算成功，不过已在他返回莫斯科之后。

葛罗米柯一直隔岸观火，作为外交舞台上的老手，他到最后时刻才改变对戈尔巴乔夫的态度。两人关系迅速改善，终于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是葛罗米柯提议由戈尔巴乔夫担任最高领导；而由于他慧眼识珠，也为自己的升迁埋下伏笔。戈尔巴乔夫和葛罗米柯可以说是你需要我、我需要你。无论在戈尔巴乔夫就任总书记之前或之后，对这位德高望重的外交家都表现出极高的崇敬。然而到后来，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权势和威望的增长，国家元首的职位对他越来越具吸引力，他

的态度就变了。

中央委员会的问题

戈尔巴乔夫初进政治局时并未引起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的足够注意。虽然两人早已相识，但一直保持一种师生关系。戈尔巴乔夫把乌斯季诺夫看作政治局里很有实权的关键人物。他常打电话，尤其是在收割繁忙季节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按照传统，军队总是派摩托化部队去苏联东部支农。

两人关系不断发展，想必乌斯季诺夫也注意到这位年轻人的才干。安德罗波夫去世后，戈尔巴乔夫对乌斯季诺夫说（当时我也在场）：

“怎么样，德米特里，该您挑担子了，我们支持您当总书记。”但乌斯季诺夫拒绝了，他说自己不适合担当此任。“我如今上了年纪，身体又一直不太好。契尔年科可以干。”

这番话使戈尔巴乔夫不安，因为他觉得这样下去自己坐总书记这把交椅还早着呢！当然他当时还不知道，乌斯季诺夫在和契尔年科讨论后者当总书记的同时，已经得到他的承诺：即把戈尔巴乔夫提为第二把手。应该说，契尔年科没有失信，他让戈尔巴乔夫主持书记处的日常工作。然而戈尔巴乔夫缺少真正的支持，又缺乏掌权的很多其它因素，故而在这个岗位上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戈尔巴乔夫一进入政治局，反对这位“狡滑的年轻人”的各派势力便开始联合起来。原有的委员不信任他，担心他权势的加强会打乱整个领导班子。因此，有些委员提议格里戈

里·罗曼诺夫竞选总书记。罗曼诺夫当然是“他们中的一员”，作为庞大的列宁格勒党组织的头头，他已久经考验。他当候选人也有道理，除在列宁格勒的经历外，他还是个经常出头露面的人物，而且熟悉国防工业。他的支持者为其竞选竭尽全力，但他并没有承担这一最高职责的准备。他久已习惯在地区层次工作，想像不出管理整个国家的领导人该怎么做。他既不是杰出的政治家，也不是出色的演说家，在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会议上很少发言。此外，他午餐后经常显得呆滞，这虽是个人身体方面的问题，但人人都会注意到（这在俄罗斯是常见的）。何况背后有人做小动作，散布流言蜚语，这些都妨碍了他的前程。

有一则伤害力特别大的谣传说，罗曼诺夫在女儿结婚时使用了贵族式的庄园和沙皇的餐具。此言是有意陷害，但手段聪明，在官方和民间都流传很长时间。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婚礼只请了12个人，就在罗曼诺夫别墅举行的。而且因为家人吵架，罗曼诺夫本人大部分时间都在楼上自己办公室，说他从博物馆拿了沙皇的餐具则纯属捏造。

虽然事实得到澄清，但新闻界却不公布。戈尔巴乔夫从俄罗斯共和国高级官员处听到此事，我也向他谈过核实的必要性，并准备了一份为此举行新闻发布会的稿子。总书记不感兴趣，涉及到自己的战友他不想再坚持真理。罗曼诺夫就这样不体面地退休了，蒙受不白之冤，连反击诽谤的机会都没有。这种诽谤显然背后有只黑手操纵，才得以流传。对政治阴谋的过程我有了更深的了解，同时也接触到一些新的事实，它们暴露出为谋求高位、尤其是总书记的宝座而秘密活动、进行政治赌博的真相。在80年代中期，几派力量都争夺

关键职位。这是一种没有任何规则的游戏。希望之星接二连三倒台，苏维埃院外活动集团自然有嫌，但也不是唯一因素。罗曼诺夫可能就是权势大的集团之间对抗的牺牲品。1991年夏天我在扎列奇耶他的别墅看到他时，都不敢相认。他看上去非常衰老，两腿下陷，显然是长期疾病的消耗所致，也是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结果。

另一名总书记的候选人是多尔基赫。契尔年科、吉洪诺夫以及部长会议几乎所有资深成员都推荐他。他在不同的经济部门（如石油与能源、机械制造）工作过，在整个工业界很有影响。他曾任著名的诺里尔斯克厂厂长，在工业和党的工作上一路升迁。他是作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吉洪诺夫全力支持他，邀请他参加部长会议许多问题的讨论。所有这些使戈尔巴乔夫非常妒忌，他与多尔基赫的关系也紧张到几乎破裂的程度。一番秘密争夺战以多尔基赫的失败而告终。他退休了，带去很多本可派上用场的精力。

退休之后，多尔基赫常来找我，通过我把信转交戈尔巴乔夫。因为收入不够，他要求工作，可是没有任何答复。戈尔巴乔夫说：“他很狡滑，不是吗？他两面下赌注，显然害怕押错了地方。那么好吧，让他坐在旁边，别伤这个脑筋啦！”多尔基赫曾使他担惊受怕，唯恐到手的权位前功尽弃，为此他不能饶恕多尔基赫。

安德罗波夫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时，戈尔巴乔夫同他的关系不错，并得到他宝贵的帮助。戈尔巴乔夫和接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切布里科夫的关系却一直很糟。他知道，切布里科夫是个唯唯诺诺的官僚，卖力为契尔年科效劳，向他详细汇报各派实力。他也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但那不过是

例行公事，因为他担心他向戈尔巴乔夫透露的任何情况弄不好可能又返回契尔年科那里。另一方面，他又不敢不与戈尔巴乔夫联系，因为他知道，目前争权夺利的竞争者之中谁会最后取代疾病缠身的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自然也留意此人的每一举动，在当上总书记之后便设法把他从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位子上撤下来。当他把卢基扬诺夫安排到最高苏维埃后，机会来了。

切布里科夫脱离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系统，从而同安泰（希腊神话中巨人名，地神之子，战斗时，只要身体不离土地，百战百胜；后被赫拉克利斯识破，将他举在半空击毙。——译者注）一样，失去了权力。作为书记处书记，他被剥夺了原有的地位、权力、影响和信息，悄然从政界消失。下次书记处改组，他自然被迫退休。雅科夫列夫推荐自己几十年的老友克留奇科夫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后者获得任命。最机密的决策都是戈尔巴乔夫同他和亚佐夫作出的。

戈尔巴乔夫讨厌格里申，格里申对他也没有好感。这个莫斯科第一书记有巨大影响力，但属于契尔年科阵营。这就更需要削弱他。机会终于来了。在一次广为报导的审判中，几个商业干部被发现犯有贪污罪。莫斯科商业管理局局长特列古波夫也涉嫌受贿。对这些案件的调查使格里申不安，他怀疑自己是真正的目标。1984年，当他休假回到莫斯科时，他愤怒地发现党中央正在调查商业部门官员同市委机关有什么联系。我听见他在电话里对戈尔巴乔夫说：“莫斯科市委不能对市里每一个败类负责。任何关于市领导个人与特列古波夫和商业局其他高级官员有牵连的暗示都是毫无根据的。”

戈尔巴乔夫试图使他平静下来，说调查的目的不是想使莫斯科市委及其书记们威信扫地，但总得弄清事实真相。放

下话筒后，戈尔巴乔夫说：“听起来他很担心，我敢肯定情况可疑，必须调查清楚。”

进一步调查发现伪造发票的新罪证。利加乔夫参加了案件结束阶段的工作，他开始披露建筑业中伪造清单的情况。各种流言传遍莫斯科，其中有些令人难以置信。普罗梅斯洛夫和格里申名誉受到损害，最终结果是市领导班子瘫痪。

契尔年科经常帮格里申一把，但这一次作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格里申却再不能指望能当上总书记了。反过来说，格里申对病中的契尔年科也鼎力相助，对他的效忠至死不渝。他与契尔年科这种关系使旁人看不顺眼，他同时又想恢复名誉，这两条是他首先站出来支持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的原因。很难说这一举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延长了他留在政治局的时间。然而事后不久，戈尔巴乔夫把格里申请去小叙，而后格里申便宣布退休。新闻界又活跃起来，大肆诋毁莫斯科市委的高级官员。对这一事件各种细节的报导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戈尔巴乔夫对中央书记处其他一些书记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也怀有疑虑。

戈尔巴乔夫当政期间，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缺乏创新和协调。从一开始，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之间就有一种敌对和不信任的气氛，有时发展到摊牌或以辞职相威胁。戈尔巴乔夫对政治局和书记处职责的分工不可避免地造成党的领导人之间互相冲突。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矛盾出现在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之间；出现在利加乔夫和尼科诺夫之间；出现在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之间。这几对人都处理同一事物，都有平等权利，谁也不肯让步。

记得有一次我在戈尔巴乔夫办公室。突然列夫·扎伊科

夫来到，说有急事要与总书记谈。我起身要走，但被戈尔巴乔夫阻止了。也许他当时想，有我在场，扎伊科夫谈话可能会有些顾虑，因而也就呆不长；或许他想让我当个见证人。不管怎么说，戈尔巴乔夫在进行机密谈话时，习惯有位自己的秘书在场。这一次，我无意中目睹了对书记处事务、对书记处工作主持人与其他某些成员紧张关系的一大通抱怨。扎伊科夫当时非常激动，当谈到书记处工作主持者对他大声呵斥，使他难以开展工作，还追问他一无所知的事情时，他几乎落泪。拉祖莫夫斯基也曾向戈尔巴乔夫这样抱怨过。

广为宣传的利加乔夫和叶利钦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党和国家受到极大伤害。雷日科夫也不断抱怨党中央一些工作人员插手经济事务。他开始时同利加乔夫，后又同斯柳尼科夫是死对头。鉴于政治局委员间普遍存在的不和，其他有些高级官员建议戈尔巴乔夫解除他们的职务。这种紧张关系也妨碍着政府的正常工作。在其它国家或组织，不和与争吵可能不会太影响工作，然而苏联是党政一体，经不起政治局成员间这种勾心斗角。

戈尔巴乔夫有一种独特的杰出才能，就是在同事间制造不和。我始终不理解，是他有意制造紧张关系从而便于控制政治局呢？还是由于他个人性格或缺乏经验所致？不论什么原因，结果都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委员们各弹各的调，很难达成一致。激烈争吵贯彻始终，有时令人作呕。戈尔巴乔夫通常在会后留下来单独与雷日科夫辩论。事后他会说：“尼古拉根本不懂改革是什么含意。”雷日科夫可能不懂改革，但戈尔巴乔夫同样不懂。他忽而左，忽而右，弄得整个领导机关、包括自己的同事不知所措。

戈尔巴乔夫加快了调整下属的步伐，这是不足为奇的。到

1987年，政治局委员几乎全部更换，而到1990年又来个大调整。从那时以后，政治局变成加盟共和国和中央政府两方代表的大杂烩，根本无法决策，也起不到团结核心的作用。它标志着整个政府和整个党的机构即将垮台。

开始几年，政治局讨论外交部工作的诸多方面。正式会议结束之后，委员们有时举行秘密会议，讨论最机密的问题，特别是人事事项。这里成了仅为少数人狩猎的保护区。谢瓦尔德纳泽当外长后，开始恢复正常秩序，但努力的结果不过是重新安排一下桌椅，一些贪官污吏仍岿然不动。他面临的任務十分艰巨。由于多年的失误，裙带关系在外交部比其它任何部门都更盛行。

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局的作用逐步下降。会议的次数减少了，会议总结纪录越来越短，决策更匆忙，有时是一人决策。有时几个月内未形成任何决议，使党中央全会大为失望。中央委员们看到一度强有力的党正在衰亡，他们正在目击祖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机构消亡。政权的瘫痪日趋明显。戈尔巴乔夫不听雷日科夫、利加乔夫、斯柳尼科夫以及后来的舍宁关于政治局软弱涣散的抱怨。当然，这些人抱怨时也很讲策略。

盖沃龙斯基原是顿涅茨克区阿祖夫马什工厂的一个电焊工，后来进入中央委员会和书记处。他说得直截了当：“书记处会议过去通常是捍卫既定政策方针，至于领导对我们说的有什么反应，我们根本不在乎。我必须指出，遗憾的是，身为总书记的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只在书记处会议上露过两次面。”

到1991年初夏，政治局三个月未开一次会。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尤里·普罗科菲耶夫在一次集会上这样说：“如果政

治局不马上开会，我将在下一次中央全会上要求将它废除。作为政治局委员，我们不应对戈尔巴乔夫个人作出的决策负责。”

7月14日，戈尔巴乔夫正在伦敦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我对中央委员奥列格·舍宁说：“我和党内外很多人谈过。记者们围着我问情况，以为我作为书记处一员，肯定知道伦敦会议的情况。但实际上我并不知道。”他回答说：“听着，瓦连京，我是政治局委员，我也一无所知。”

这时我意识到，我们已为制造另一个至高无上的领袖人物迈出了第一步。

总书记是这样一个人：爬到高位后更忘乎所以，他被成就冲昏了头脑，以致脱离实际，为自己的垮台铺平道路，而自己还意识不到。不过戈尔巴乔夫尚未完全丧失危机感。他不敢依靠党，党由于处理问题不能始终如一等原因而声名狼藉了；另一方面，他也知道，完全跟党分道扬镳等于政治自杀。

党的28大之后政治局开始走向死亡。党的这一主要政治机构只开过几次会，严肃的问题、甚至有关党本身活动的问题都得不到讨论。

中央全会

党中央全会在党的工作中发挥着突出作用，特别是在为全国制定当前以及长远的战略决策方面，党的高层人事变动也都由它作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恢复了列宁主义的民主

原则，废止形式主义等弊端，使全会恢复了活力。

我记得很清楚，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当戈尔巴乔夫来到中央全会时，与会的全体人员起立鼓掌，欢迎这位满面春风、朝气蓬勃的年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微笑着，等掌声停息下来，然后说请允许他宣布开会，接着请政治局委员主持会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信任总书记，同意按他的意见开会。只要形势有改观，他们准备同意很多事情。

由谁来主持全会的问题一贯是协商确定。即使斯大林也要经允许才主持，而全会并不总是由他主持。当时还比较严格遵循民主程序，后来就不同了。

全会一开幕，接着介绍出席会议的详细情况。在戈尔巴乔夫任期将满之时，他实行一种新作法，即邀请不是中央委员的下列人员与会：武装部队各军兵种司令、各加盟共和国和各州各边区党委书记、政府部长和社会人士，最后还包括各委员会的代表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他不邀请党中央各部门的官员参加，即使会议需要他们发挥某些作用。戈尔巴乔夫仔细审阅准备邀请的与会者名单，划掉那些他认为不合适的。有时我能设法在最后时刻说服他把某些人员列进去，如会议记录员。除总书记外，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通常也主持全会，安排委员（包括戈尔巴乔夫）发言，可是也有戈尔巴乔夫自己径直走到讲台前发言的时候。

在上任初期，戈尔巴乔夫在全会的发言稿要经过精心准备，而后来这些发言就结构松散、不甚连贯，里面还夹杂着不知从什么渠道得来的信息，认真一查就会发现那些全是不实之词。不过在开始阶段，出席全会的人对他的讲话还是颇感兴趣、字字入耳的。会议开展建设性的讨论，中央委员根

据个人意愿发言，而不是按照会前规定的名单。要求发言者登记然后送到戈尔巴乔夫桌上，发言名单和发言顺序由戈尔巴乔夫亲自圈定。于是登记表的第一个人很可能最后发言，或根本没有机会发言。有些中央委员向主席团抱怨，想知道为什么他从来没有机会发言。

尽管有这些弊端，会议毕竟在无拘束的气氛中进行。大家都可以各抒己见，包括批评意见。有些发言者也确实发现在全会上充分发表意见相当困难，尤其是那些估计会在发言中提出下述要求的委员：在全国范围加强纪律、给中央委员提供更多信息、质问意识形态部门为什么允许批评任何人、任何事包括苏联人民一直奉为神圣的东西。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意识形态部门的批评日趋激烈。发言者愤怒指责雅科夫列夫及其继任者梅德维杰夫。报刊编辑也受到批评，其中有伊凡·弗洛罗夫，人们指责他让《真理报》支持根本错误的观点并在他的工作人员中制造混乱。

在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的前期，中央全会集中精力具体解决专门的问题，而后来就专门为政治辩论而政治辩论了。党不再处理具体问题，全会成了为个人或宗派利益而角斗的战场。

戈尔巴乔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批评的压力下，开始变换策略，而且嗓门越来越高。但这不过是他奉行一左一右路线的典型做法，目的是大事化小，保持各派平衡。1990年和1991年，他受到中央委员的逼迫，越来越多地使用这套自家发明的策略。当他感觉对手准备发射又一排批评炮弹时，便先发制人，对与会者大发脾气，扬言要辞职。这种办法果然奏效。批评者乱了阵脚，压低了调门。当这种策略不再奏效时，戈尔巴乔夫便在会前约见各共和国、各州和边疆区党

委书记，给他们发言出气的机会，待全会正式开始时，气氛就缓和得多。

我不理解他为什么采取这些办法。依我看，如果他想继续担任总书记，他应该以冷静和以理服人的方式向中央委员们解释自己怎样看待局势的发展，党在未来起什么作用，党的领导和党的组织应当怎么做。这样坦率的作法肯定会使全党支持他的工作。实际上相反，他对全会夸夸其谈，中间还夹杂着外国词，如 consensus（英文，意为“意见一致”——译者注），大家听了莫名其妙。他的话就像五颜六色的糖纸一样，可惜里面没有糖果。

中央委员们经常抱怨，说总书记是闪烁其辞的大师。听完他的讲话，大家几个小时才明白过来，原来他给他们吃的是镇静剂，而不是思想的营养品。

戈尔巴乔夫不喜欢其他人在全会上作报告，尽管这是党的传统。只有一次他让利加乔夫就教育问题向全会作报告，而紧接着他又就意识形态问题作了长篇发言，跟正式报告毫无二致。结果，原本对利加乔夫报告的讨论走了题，后面的发言都集中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上了，尽管事先没有这种准备。

由嫉妒别人到决心一手包办的作法无助于改善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的气氛。人们发现自己在扮演三流角色，便漫不经心。戈尔巴乔夫的同事们与他离心离德，政治上消极起来，这是原因之一。

全会很少超过一天，因为戈尔巴乔夫开恩，给每个发言人最多 15 分钟时间。而且每隔两小时休息一次，人们下楼吃些点心。在戈尔巴乔夫任职初期，点心的花样很多，还有三明治和水果。午餐包括热香肠、汤和焙烤食品。这些都打入行政预算，后来改为自费。委员们边吃边就主报告和发言进

行讨论和争论。州和边疆区委书记们则利用开会全的机会解决本地区急需解决的问题，例如争取得到工业硬件和其它物品。

在全会还在进行或刚刚结束之时，戈尔巴乔夫经常问书记们、部长们和助理们会议的气氛怎么样。他们发现自己的回答很难使他满意，逐渐地，委员们不再去见他，他也经常是会议一结束便打道回府。州和边疆区委书记们不再费心去和总书记或党中央机关人员联系，逐步形成一种互不理解、互不满意的状态。

待到戈尔巴乔夫任期即将结束时，整个气氛变了。最说明问题的是：当总书记步入会场时，竟不再有人鼓掌，也无人起立，很多人继续交谈或在会议厅散步。戈尔巴乔夫只得提醒大家注意秩序。然后，主席团委员们径自就座，改变了以往要经全会邀请的程序。对中央委员来说，在主席团就座的有些面孔十分陌生。大家都在想：他们是何许人也？为什么爱沙尼亚出了两个政治局委员？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来的那些人又是谁？他们对所有加盟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都进政治局这种新安排感到惊异。人员变动如此之快，有时我怀疑戈尔巴乔夫本人是否能记清谁是谁。

在主席团就座的那些人只是党的昔日伟大的影子。他们大都感觉得到大难即将临头，但在这个总书记的领导下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只好等着任期结束，即使把时钟拨回，他们也无能为力。

1990年7月召开的党的28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政治局和中央全会尾声的开始。政治局不常开会了，中央全会上则吵闹不休。一个有伟大历史的党，如今她的大脑衰退，致使整个组织瘫痪。

从1985年春往后，党开始从戈尔巴乔夫多卷选集中、从党中央全会和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中寻找指南，这样党的最终命运已经注定。

文件和群众来信

1987年初，卢基扬诺夫被选进中央书记处，负责党中央国家与法制部。从1983年以来，他一直担任终日忙碌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他不愿意调离，因为新职务涉及一个包罗万象的新领域，要统管军队、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务部、纪律检察部等部，以及所有行政和执法机构。与此同时，我也不再担任戈尔巴乔夫的助理。

某次全会结束后的一天，我突然被召到会议室，就是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开会休息时喝咖啡的地方。我到时他们正在随便议论会议的情况、主报告和发言（不管有无价值）的细节。戈尔巴乔夫打断议论，说：“这就是我为阿纳托里·卢基扬诺夫找的接班人。你们都知道博尔金，我想请你们通过他为办公厅主任。”

我大吃一惊。两个月之前，戈尔巴乔夫曾含含糊糊地提过此事，但我拒绝了，我说自己对此项工作一窍不通。如果不再需要我干助理工作，我可以回《真理报》。我对他说：“我不会像走马灯那样处理那么多文件，那样只能把我累死。”

“好像宣判你死刑似的！”戈尔巴乔夫回答说，“我真的需要把那部分工作搞好，而且需要你的帮助。”

或许他为我的反应而恼怒，或许他当时还没有下决心而

只是放一个试探气球，总之这个事情没有再提起。不管怎么说，我尽力反对这样做。一想到那种不可理解的工作和永远拴在办公桌上（我从没有这种经历），我全身每个细胞都反感，我喜欢独来独往。这样被介绍给政治局委员，好像我已任此职。委员们都说赞成戈尔巴乔夫的选择，于是他立即签署了我的任命，任命显然是由卢基扬诺夫事先拟就的。

我本来恨这种工作，如今不得不适应它，这是个痛苦的过程。以前晚上9点钟我就能回家，而今半夜能离开就算幸运。

办公厅到底是个什么部门？它行使什么职能呢？

最初的结构是在20年代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原本是党中央下属的一个特别部门，为政治局、秘书处和中央全会服务。它还负责分发文件和群众来信给各机关部门，并把这些部门拟制的材料上呈下达。文件多得要命。到戈尔巴乔夫任职时期，中央委员会一年之中收到群众来信百万余封，党、政、经济部门关于当前议题的文件和其它材料数万份。要处理全国各地形势的信息，类似的文件邮包还要分送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委、州委和一些独立专区。

办公厅是这些文件源源不断流往党中央的唯一通道。邮件立即分送党中央有关部门，并呈送书记处书记和政治局委员。每封来信都登记注册，直到作出相应决议并给寄信人答复。

随着时间的推移，戈尔巴乔夫对把文件呈送他批阅越来越不耐烦。疲劳无疑使他不能像以往那样聚精会神地阅读和指示。有时文件放在他那里很长时间，甚至原封不动地退回来。在他准备向党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和最高苏维埃的报告稿时，文件只好等着。当然，对其中有些最敏感问题的材料，他也会马上翻看。

群众来信占邮件很大比例。我已经说过，一年之内要收到百万余封这种来信，1987年达120万封，其中大部份直接写给总书记，有30到40万封来自国外。可是到后来洪流变成了小河，而当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最高苏维埃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辩论后，戈尔巴乔夫声望大跌，小河又变为小溪。

戈尔巴乔夫有次打电话来，要我把某一天党中央收到的全部来信汇集起来给他看。我叫人把信放入箱内，安排在五楼一间空着的大房间里，结果不但堆满了桌椅，地板也用去大半。其中有三万封直接写给他。他翻了翻，随便读了几封。而后在政治局和群众集会上，他谈到自己从信中看到的東西。来信堆积如山。群众在这些来信中向党中央送去问候，提出要求、抱怨和建议。其中还有很多信令人不安或恐惧，人们叙述生活之苦和社会的不安定。最使我不安的是那些描述老人和婴幼生病的信，它们就像由于我们漠不关心和缺乏医药而处于死亡边缘的绝望人们发出的呼救声。想到这些就令人心痛。我部人员尽其可能帮助无助的老人，但他们能力有限。

当来信中对戈尔巴乔夫的批评上升为主导地位时，他便对群众来信失去兴趣。但我每天还是收集约20封来信放在他办公桌上。这对我们双方都不是愉快之事，尤其是对他。

名目繁多的特权

又一天过去了，想必是晴空万里，太阳低悬，温暖着城市。有对在傍晚，阳光能穿过钢帘，照到窗

户的铁栏杆上，落在放在窄缝处的我的手上。这时我会感觉到夏日的温暖。然而阴影很快扩大，阳光消失，黑暗笼罩大地。晚饭后，我甚至感到冬日降临，伴随而至的是严峻险恶，与我形影不离。今天，我站在窗前达三小时之久。窗子用厚玻璃复盖着，外面是钢制窗帘，只留下一条窄缝。我想像得到有天有地有太阳，但看不见。

灯熄了。我睁着眼睛躺在床上，思绪返乡，痛断肝肠。家中有九旬老母，有妻、女和外孙女。我只有发给我的薪金和在《真理报》工作时业余的一些收入，但调查员把这些钱从妻女手里拿走了。如今她们何以维持生计呢？靠妻的180卢布的残废金吗？靠女儿休产假所得100卢布的补贴吗？为什么她们和我五个月的外孙女如此受苦受难？

我的思绪飞回家中，脑海里出现了家人和婴儿床。琳诺奇卡想必已入睡，再有两天她就满五个月了。我还能再见到她吗？想到此，温暖、疼爱和苦涩之情一齐涌上心头。我从未想到小外孙女在我心头占着这么大的位置。

我的小太阳啊！一想到你，整个牢房就充满温暖和光明。我伸出手去抚摸你，然而触到的却是粗糙的墙壁。对这些女人我以前没有尽到责任，看来今后也不再有此机会。这种折磨比肉体痛苦还要难受。

你们怎么过冬呢？你们像汪洋大海里的一条小船，如何活下去呢？凭你们的脆弱之躯，能挺得住吗？我反复思索，想不出答案。如果你们依赖于我，

哪怕一点点，我愿献出自己的满腔热血。

我给你们的生活带来了悲哀、痛苦和混乱。因为我深深爱着我的祖国，不忍心看着几百万难民流离失所，我的兄弟们互相残杀，无辜的人民在流血。难道我不应该这样想吗？这些问题，关于妻女和琳诺奇卡的问题，我都苦苦思索，不得答案。四壁和地面都默默无语，只听见门外卫兵的皮靴声。

由于亡国亡军、由于内战就把人送上断头台吗？这里唯一的罪名是报效祖国。我相信这是可能的。当然，热爱祖国而求报以特权是错误的。我深信，对许多人来说，特权没有什么价值。我为戈尔巴乔夫工作并不是谋求特权。在他的随员中，我首先站出来，拒绝乘坐海鸥车（吉尔车的前身，苏联领导阶层60、70年代乘坐的豪华轿车，地位的象征——原注），我还一直住在十年前配给我的拥挤的住房里，尽管按级别我有权享用更好的条件。虽然我每天工作14至16个小时，没有星期天和休假，身体都累垮了，可是我没有去过那个特殊的门诊部。

但是，特权确实存在，而且被充分利用。实际情况或被扩大，或被缩小。当然，缩小的目的在于使人们不去批评那些拼命捞特权、白吃白喝的人。

特权制度是怎么出现的？为何能持续这么长的时间，直到万炮齐轰才瓦解？

在苏联，物质待遇从未基于平等的原则。众所周知，早在革命初期，国家工作人员就有权享受供应各种高热量食品的饭店。当时的解释是政府雇员的工作日不固定，如果没有

这些服务项目，很难吸引高素质人才进政府工作。位于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专对病弱的国家机关人员开放的医疗饭店是在列宁的倡议下兴建的，后来逐步扩大到党的工作人员。这些人的工资虽与工人相差无几，但他们可以享受为数众多、五花八门的特权。这些特权使他们珍惜自己的工作，保守国家和企业的机密，不去从事非法活动。在那种情况下，有一些特权显然是正当的。然而，像违反原则的其它事情一样，特权慢慢蜕化，并开始向社会其它阶层保密。

各加盟共和国首都和其它一些大城市也有这种特殊饭店和商场。有一次几位德国人来取经，也想建立这套制度。他们访问了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上的那家餐馆，发现搞特权的办法妙极了。他们只提出一条（他们觉得这肯定是我们国家的一大特色）：即使在不对公众营业的特供商店，人们也在排队，有时一等好几个小时。他们说对，想买一磅香肠有时要等上两小时。我记得曾看到著名科学家、工业设计家、艺术家和科学文化界其他知名人士在工作时间排大队。他们的时间多么宝贵，花在这上面真是犯罪！直到安德罗波夫当上总书记后，上班排队的现象才消失，人们可以不必等很长时间就能买到不缺货的商品。

为一些党政工作人员提供的特权比起最高特权阶层来真是小巫见大巫。直到1987年，至少在明文规定中，政治局委员，包括部长会议主席，月薪都是800卢布。这个数目不大，但它不决定党和国家高层领导的生活水平。究竟谁享受什么特权，只在政治局和部长会议某些秘密决议里有规定，有些只有三人知晓。例如，除工薪外，政治局委员可从国家安全委员会九局的仓库里免费领取价值400卢布的食品。同党中央各部门一起工作的书记处书记们一日三餐都免费，还有水

果和其它他们想吃的东西。

我经常看到保安人员跟着主人，把沉沉的皮包和木箱扛到车上，运回别墅。有一个在外交部门工作的书记处书记特别贪婪。这位为世界革命和共产主义在全球的胜利而奋斗的不屈不挠的战士掠取额外物品时并不手软，然后把它们送回阔绰的家宅。我看见他，就感到光明的前途罩上了一层阴影。

主管中央行政事务的尼古拉·克鲁奇纳常到我这里来，手里拿着一大叠帐单，上面登记着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每日公款请客和自家花销的惊人支出。这种开支何乐而不为呢，特别是考虑到有些食品最终还送到别墅去嘛！在那个时代，许多高层领导每天要花去党的30、40甚至50卢布，这相当于很多人的月退休金。

“告诉我，”克鲁奇纳说，“这一切该怎么办？”

“为什么你不跟戈尔巴乔夫说？让他改变这种作法嘛！”我所能建议的不过如此。

他没有说话，只拿出编号为001的戈尔巴乔夫帐单。数字如此惊人，我觉得再无必要提什么建议了。再看看那一大叠帐单，我很不安。全国正在开展反特权运动，而我们的领导人却脱离实际，脱离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平。1991年夏，我向戈尔巴乔夫建议，对公款开支应有个限额，其它则一律自费，当然，总书记例外。

高层领导享受的特权并不局限于高薪和食品特供。国家和党的预算还为寓所、别墅、汽车等等提供经费。寓所都是舒适的住宅，必要时还配有保安人员和公务员。当然，照西方的标准，寓所并不算高级；另外，考虑到主人所肩负的重任，这种享受也不为过份。这些党和政府的高级官员在城里的时间一般都很少。据我所知，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

同级的其他许多人并不定期住在莫斯科公寓里，他们没有必要这样做。

别墅则是另一码事。它们座落在首都西边，莫斯科河沿岸。大部分别墅非常现代化，可算建筑业的杰作，周围是120英亩的针叶林区，配有温室、鸟舍和狩猎区，后来又增设了游泳池和桑那浴室。

政府别墅有一大群内勤人员，厨师、女佣、女招待、女清洁工、园林工、以及保安人员。我有位朋友，被任命高职后也分到这样一所别墅。他面带困惑地对我说：“你看，我不能住在这样的别墅里。”他相当认真地补充说，“我在这里不能放松自己，到处都是佣人，而且在这种豪华的公寓里很容易迷路。我打算放弃它，并把这个决定告诉戈尔巴乔夫。”

此前不久，我同一位刚刚入选书记处的同志有一番内容相似的谈话，对于即将过这样前呼后拥的高规格生活，他也感到不安，他准备请上级批准继续留在原来中央委员的别墅。我对他的忠告是不要着急决定，有的人有幸能习惯这种生活，有的人不幸适应它。过一段时间这个问题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了，住在这种环境中的人就会开始感到了不起。他们从外观、姿态到讲话都摆起架子来了，并开始疏远故交。由于这个原因，也因为我知道是戈尔巴乔夫本人把别墅分给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所以我不急于发表个人意见。

另外，别墅就在莫斯科市郊，那里还有沙俄时代建起的乡间别墅和庄园，是夏日休假胜地。在这个地区，几乎每一家都有自己的别墅，新的还在不停地修建。戈尔巴乔夫计划还在高加索黑海沿岸的克里米亚、在基斯洛沃茨克和高加索其它地区建设新的别墅。他喜欢这种建设，喜欢把自己的想法溶入建筑和园艺设计。他不愿意在前几任总书记或其他政

治局委员用过的休假地度夏，于是在格鲁吉亚海滨专为他建了住所。正如戈尔巴乔夫所指出的，格鲁吉亚一些高级官员经常向他吹嘘当地气候十分宜人，海风伴着高加索山上松柏的清香令人陶醉。大规模建设快速地进行着，实际上，海滩上的沙子是从百里以外用卡车运来的。戈尔巴乔夫在福罗斯的官邸的建设速度更快，有数以千计的军事建筑人员在那里奔忙。

但是，戈尔巴乔夫的重点建设项目还是莫斯科郊区的新官邸。除建筑工人和保安人员外，没有什么人知道详情。不过从专家和戈尔巴乔夫本人告诉我的情况来看，保安人员所谓的“狼窟”实际上是一所漂亮豪华的宅第，平时战时管理国家所需要的一切设备这里应有尽有。

我认为，像苏联这样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确实需要这样的住所，但是它的设计应由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决定，因为它的造价高达数亿卢布。毫无疑问，夏日休假地的建设也应由人民控制，以使经费限制在合理程度。党的领袖毕竟不是阿拉伯酋长，过分讲排场、摆阔气不应由公款开支。即使沙皇也是用自己的私钱购地置房的。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对建筑的热情还不限于莫斯科市郊的官邸。

公寓的变迁

约在1987年仲夏，克鲁奇纳打电话给我，要求紧急约见。几分钟后他到了，脸色很难看。他血压高，中风后一直在吃药打针。很明显，他为什么事很不安，但还是克制住自己沉

默了一会儿，然后擦擦额头上的汗，对我说，有件事他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

“戈尔巴乔夫把我请去，拿出总书记新官邸的几个地址方案让我看，还谈了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供我参考，所以我得给他写个关于总书记新官邸的最恰当位置的初步报告。”克鲁奇纳停顿很久后接着说，“我开始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不过我觉得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我已经接到命令在列宁山上修建他的新居，离莫斯科大学不远。”

我默默地听着，同他一样，对这一决定感到惊讶。戈尔巴乔夫的前任中没有人决定为自己建造专门官邸，都是简单地搬迁进空公寓，和几十户甚至几百户人家同住一幢楼。这些公寓大楼本来质量不错，即使总书记们发现设计有些缺陷，还可以适当改建，用不着花太多的钱，也不会招来很多批评。戈尔巴乔夫可能不了解问题的微妙和可能产生的反响，或者顶不住某些压力。不管怎么说，这个决定是个新鲜事儿。

克鲁奇纳带来的这条新闻使我惊奇。我估计，这一新情况一定会给关于总书记对建造别墅非常热心的谣传推波助澜。

我小心翼翼地问克鲁奇纳，有没有可能找一个不那么显眼的地方。因为列宁山就在莫斯科市民众目睽睽之下，它也是旅游者前往观象台的必经之路。他叹口气说，他本人已经建议过几个方案，但没有用，看来戈尔巴乔夫已经定下决心。从我了解的莫斯科情况来看，我想他是对的。不过我还是提出几个其它地点，在那里造房子不太引人注目。然后我又说：“休塞瓦大街怎么样？那些公寓挺不错。”

“他们已经住在那里了，但有些方面他们不满意。”克鲁奇纳回答说，“我建议戈尔巴乔夫在列宁山上的国有宅邸中选

一所房子搬进去住就行了（赫鲁晓夫和其他一些党政领导人都在那里住过），或者就在那个地区建造一个新宅邸，那里的一切生活设施都很齐备。可他听不进去。”

我没有掩饰自己的愤怒，怎么想就怎么说道：“选这个地址根本不行，因为由此产生的谣言会带来极坏的影响，戈尔巴乔夫很难对付。”克鲁奇纳叹口气说：“总不能影响莫斯科大学的形象吧，那是戈尔巴乔夫的母校啊！”

我实在提不出什么好建议，克鲁奇纳也不能使戈尔巴乔夫改变主意。除地址外，克鲁奇纳还为造价担心，保守的估计也得几百万卢布。

“我们已经找到一个建筑师和几个设计家，但是还需要建筑工人，尤其是石匠、熟练的木匠和其他技工。不用说材料可不容易备齐。”他一面喝着茶，一面不停地擦汗。这表明他内心极度不安，这种工作真要他的命！

我记得有一次驱车路过列宁山区的戈尔巴乔夫寓所。当时我还不知道它的确切位置。我看到的是一所阴暗肮脏的水泥建筑物，窗户窄小又不对称，看不出有什么特色。它看上去像一所医院，一层楼住着保安人员。住房的设计很不理想。戈尔巴乔夫和女儿一家占了上面整个一层。他和他的代表经常去国外选购厨房设备，还有壁纸、窗帘、瓦、灯架、吊灯、台灯等等。使克鲁奇纳深感自豪的是他从德国选购的一套厨房设备，部件都是最先进的型号。使他难忘的是自动洗衣机和烘干机、大冰箱冰柜、根据最新物理原理设计的各种炊具和烤箱，以及食品加工器。还有很多器皿他说不上确切用场。公寓有六室，两间卧室，两间浴室，过道通畅，地板铺的是有异国情调的木料。而所有这些只供两人享用。

住宅的陈设构成管理部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柳克

斯木器厂订购了数套用外国木料制作的家具。寓所需经常更新、改建和粉刷。

然而，当戈尔巴乔夫的官邸的装修工作接近完工时，全国范围的反特权运动开始了。列宁山上那所住宅越来越引起公众和人民代表的注意。旅游车在前往莫斯科大学旁的观象台途中，导游人员定会提醒游客注意：他们正在路过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宅院。于是大家把头探出窗外，争相观看这一建筑奇景，它使人想起60年代初临时建起的学校。反特权运动还没有波及到戈尔巴乔夫，不过为保险起见，他决定还是谨慎为好，于是偷偷地搬出了六居室官邸，住进了同一层楼原本为保安人员准备的那个三间一套的单元。

这等于官邸建设又翻开新的一章，还要改建和装修又一个单元房。我不知道进口设备和家具花了多少钱，但党为建设这所总统府列出一大笔预算。

中央委员会的所有建设项目都需经书记处和政治局通过，但是我没有看到过有关列宁山上那个官邸的有关文件，也没有造价预估的记录。这些文件可能在卢基扬诺夫主持办公厅工作期间就已完成。克鲁奇纳在贯彻总书记指示过程中总要遇到种种困难，而最使他为难的是后来出席党的28大的代表提出质问，要求公布所有开支。说实话，他已经身心焦瘁了。总书记训斥的可能，像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一样，始终悬在他头顶上。

至于说戈尔巴乔夫本人，谁可曾想到，一个普通农家的孩子，有多年在极其简朴环境中生活的经历，如今却对为自己、为家人建造豪华住宅和别墅、精美的家具、最高级的设备和用具、用进口的原料装修表现出非凡的兴趣和天才？戈尔巴乔夫对为自己修房子孜孜以求，一直到下台。

雷日科夫任部长会议主席期间，戈尔巴乔夫竭力劝说他和他的副手们从克里姆林宫政府办公大楼搬出去。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显然，雷日科夫已经给同事们发话，说他绝不作从克里姆林宫搬出的第一任部长会议主席，因为那是政府传统所在地。很难说这是不是他后来辞职的原因之一。不管怎么说，任命瓦连京·帕夫洛夫为部长会议主席并通过其内阁组成后，戈尔巴乔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政府迁至普希金大街的一幢楼里。这意味着，二楼斯大林原来办公的办公室现在空出来了，戈尔巴乔夫随时可以乔迁。

1990年底，戈尔巴乔夫把普列汉诺夫、克鲁奇纳和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们说（开始时还绕弯子），二楼那个套间需要装修，以符合苏联总统的身份。他详细描绘了他对办公室及毗邻房间的设计（当时他的办公室在三楼）。政治局会议室也要改成一间外宾接待室、一间电视室和一间小办公室，剩下的空间将作为他个人住宅，包括一间厨房、一间餐厅、一间休息室、一间办公室、两间卧室和其它房间。

克鲁奇纳和我花了很长时间讨论这项任务。一想到又要在克里姆林宫内搞一套公寓，我们心中都很不安。在克里姆林宫保留列宁的那套住宅作为纪念馆是必要的。在他那个时代，党和政府的很多高级官员在城里都没有住处，市郊也没有别墅，只能住在克里姆林宫。起初我们不理解，为什么总书记兼总统需要在克里姆林宫内搞套住房？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已经开始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现在他已坐上防弹的吉尔轿车，又增加了保安人员。普列汉诺夫还采取了其它安全措施。在克里姆林宫深处搞一套住宅，驻扎一个特别团担任警戒，自然更安全。当然，还可能有一种解释：戈尔巴乔夫想让自己的办公室将来也成为纪念馆，纪念改造苏联

的这位伟人。

保安问题无疑重要，但要改造由著名的卡扎科夫设计的克里姆林宫内这种独特建筑会带来一大堆麻烦事，肯定会引起人民大众、尤其是保护文化古迹协会的抗议。

克鲁奇纳和我一开始就认为，不上这个项目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希望尽量找借口拖着。要取消这个项目可以找出一大堆理由，其中一条是：此座建筑已经年久失修，内部结构已失去安全保证。

但戈尔巴乔夫等不急，他要求马上作出计划。约六周后，普列汉诺夫及其工作人员把计划拟出请他过目。往常很难说一项建议能不能得到他的批准，但这一次他欣然同意了，甚至还加上一些评语。于是修改后的计划没有什么大的变动便被采纳。就我所知，保安和行政人员已经就此项目的建议开始行动。1991年8月事变显然打乱了计划，我听说，连原定党中央办公楼总书记办公室的改建工作也中断了。克鲁奇纳曾对我说过，该办公楼五层要搬空，以便改建成总书记的官邸，外配外宾接待室和电视间。

纵观总书记兼总统的所作所为，最有成效的要算对楼内地板的更新改造。如果形势不出现逆转，谁知道建筑大师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会青睐什么新的项目呢？

如今特权更多

特权不限于食品、公寓别墅和各种廉价进口的奢侈品（其中有些后来流入黑市），还包括配司机的小车和医疗待遇，

还可以免费乘坐专机，出访时还可以在“出差补助”的名目下捞一大笔钱。戈尔巴乔夫出访时，夫人每天也有补助，尽管整个访问期间苏方保安机构和东道主都为总书记的需求作了精心安排。

当然，不是所有的党政领导都搞特权。许多人生活简朴，值得称道。尽管如此，对特权的批评使领导层不安。戈尔巴乔夫反对废除下层官员的特权，犹豫很久才决定关闭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上那个食疗店，不过仍允许工作人员从办公室订购食品。谁要使用国家安全委员会九局的别墅，几分钟就能得到解决。政治局委员进政府别墅，书记处书记进中央委员会的别墅区，部长会议官员则进部长会议的别墅。给谢瓦尔德纳泽一套外交部的别墅，这所别墅从卫国战争起就没有修缮过。空着的国有别墅在混乱中被随便分掉了。新住户包括部长会议第四局、最高苏维埃、还有一些工厂的工人。分房18个月之后，普列汉诺夫曾去视察，发现进口的浴室设备、壁纸和镶木地板都给撬掉了。

这个时期只有一家还像勃列日涅夫时代那样大搞特权，这就是总书记兼总统一家。

对进口物品的分配也是这样。戈尔巴乔夫借口清理特权，最初是规定同僚购置外国货不得超过某一限制，而后就干脆不准买。这使他成为这一特权的唯一受益者。他和家人最后采取按商品单购物，这样方便多了。

关于戈尔巴乔夫的服装报纸上有很多谣传，说它们都是从著名设计师处订做的。我不知详情，对衣服也不在行，但我知道他的服装是由库图佐夫斯基区两位天才的裁缝制作的。服装做得又快又好，格调高雅，与他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极为相称。我记得曾把他的服装先与里根、而后又与布什

的服装作过比较，发现或者是因为美国没有高水平的裁缝，或者是因为他们花不起这个钱，反正他们都没有戈尔巴乔夫那么好的服装。至于赖莎的服饰出于何处，恐怕只有她自己清楚。

前面已提到，我认为总统需要有个像样的生活环境。一个大国的元首总不能穿着破衣服，也不能穿打补丁的鞋。4000卢布的工薪不算高，他给自己夫人买不起像样的衣服，更不用提给母亲、孩子了。但这些问题的解决要合理，要公开。

这么多的别墅、住宅、国有疗养院和休假地变换主人，很折腾了一阵子。刚刚平息下来，戈尔巴乔夫就决定把皮聪大的别墅分给卫生部第四总局。政治局没有参与别墅的决策。谢瓦尔德纳泽对此感到震惊。他指出把一个加盟共和国的财产分给另一个加盟共和国是不对的，特别是这个别墅位于划为自然保护区的松林之中。早在50年代赫鲁晓夫开始兴建别墅时就已经谣言四起，现在旧事重提有什么意思？不过他这番话使戈尔巴乔夫清醒了一些，他意识到自己在一手包办国有资产的处理，终有一天可能要追究他的责任。他嘱咐普列汉诺夫把一套别墅拨给外交部，把最喜欢的还是留给自己。就这样，扎维多沃仍留在原来的管辖范围，国家为此花了不少钱。

领导人有几百名听使唤的服务人员，每座别墅都有一大群，其中大部分是保安人员。他们为主人生活舒适效犬马之劳。可是，反过来，他们却受到暴君式的虐待，被视为奴隶一般。有些领导的家庭对工作人员很坏，服务人员干脆逃之夭夭，还警告同伴千万不要为那些家庭工作。

戈尔巴乔夫的工作与娱乐

戈尔巴乔夫刚当选为总书记时，工作和娱乐方式和原来没有什么变化。他7时起床，散步游泳后读报，8时30分专车和护送车开到门口，9时开始工作。作为总书记，他的工作性质发生变化，工作量大增，日程排得更满。上午，他接见办公厅主任卢基扬诺夫，一起研究党中央收到的文件。文件总量很大，但戈尔巴乔夫细心审阅呈交给他的每一份文件与涉及政治局和书记处工作的各种信息。所有电报也在上午送到他的办公桌。

看过文件之后，他就接见两三个州委或区委书记，有时也包括中央委员。然后他就有可能实施改革的问题着手工作。进行经济改革就必须对世界性问题予以研究。1985年开始为召开加速发展科学技术和在一些工业部门实行改革的会议做准备工作。当时还没有改革的总体战略，戈尔巴乔夫本人对改革也只有零零碎碎的理解，认为它指的是加速发展经济、改造某些经济结构，生产方式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则保持现状。就在此时，他匆忙采取了一些未考虑成熟的步骤，如禁酒令、限制承包，既想加速发展，又没有进行根本性变革。

人事问题经常在上午研究。此时，戈尔巴乔夫单独与利加乔夫商量由谁担任什么工作，后来拉祖莫夫斯基及其副手叶夫根尼·拉祖莫夫也参加讨论。党的新领导班子的缺陷是，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和拉祖莫夫斯基对干部（不论中央的，还是地方的）了解甚少。他们选人大都基于本人简历、旁人

推荐、个人印象好坏，而不是此人的能力，对新一代领导是否忠诚自然是关键因素。

下午1时至2时之间，戈尔巴乔夫用午餐，他说一声“等一会儿”，便到休息室吃专用快餐了，经常是五至七分钟吃完。

正式午餐时间要长一些。饭后戈尔巴乔夫或午休，或找医生按摩。下午他要与赖莎电话交谈五六次，因此她对他的计划和活动一清二楚。

晚间他又用于阅读文件和吸收信息。他很喜欢研究国外对自己倡议的反应，我给他读过几遍的报导他常常大声念出来。他把这类材料放在一旁以便带回家去。如果没有什么紧急事务要处理，总书记在晚餐后，8时至9时之间下班。一到家便同赖莎去散步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然后回到办公桌旁准备第二天的日程。11时至12时之间（有时更晚）他会打电话，指示我第二天他上班前要做好什么准备，次日上午的日程有什么新安排。此时他也给其他有些政治局委员打电话。他的同事都不敢给他的别墅去电话，因为他有言在先，不让别人打扰。

政治局要开会时，戈尔巴乔夫要比平时早到办公室，研究与会议议程有关的文件和信息。上午11时前，他接见会议准备通过新任命的那些人，通常是州和边疆区党委书记、加盟共和国党委书记、政府部门领导和军队高级将领。政治局会议11时开始，有时一直开到晚9时或10时，中间休息午餐，或者根本不休息。

在任职前期，戈尔巴乔夫经常在会后请一些亲近的同事到自己办公室，询问他们对政治局委员发言的印象。他们则或褒或贬直言相告。但到后来，总书记不再早到，不再为议

题早作准备，显然在吃老本。而老本经常不够吃，于是，暴露自己的无知后，他便抽出某个政治局委员发言中的某个观点大肆发挥。这种并不聪明的策略使人听起来无可奈何又颇为反感。我察觉得出，他越来越讨厌开会。

到后来，如果不开会或接见外宾，戈尔巴乔夫便迟到早退。不过回到家他仍然睡得很晚，想睡也不一定睡得着。

在任职后期，总书记在克里米亚的福罗斯为他新建的别墅里休假。按规定，夏天他有45天的假期，但他一般只休一个月。在任职初期，他还在皮聪大休冬假。国家形势如此，领导人不宜懈怠，他终于取消了冬假。政治局其他委员也纷纷仿效。

夏天休假期间，戈尔巴乔夫很少停止工作。他仍然听取紧急报告，审阅重要文件，有时要车尔尼亚耶夫为他写文章著书——其中就有《新思维》。他把这部书的草稿分送在敏感问题上信得过的助理和政治局委员。在约20人的协助下，这部书最后定稿并在西方发表。戈尔巴乔夫拿到一大笔稿费。

戈尔巴乔夫没有什么特别的业余爱好，如打猎或钓鱼。其实猎枪他玩得挺好，这是他有次去别洛韦日自然保护区时我亲眼所见。他在任斯塔夫罗波尔第一书记时期，常接待莫斯科来的显贵，为他们安排文娱活动，包括打猎。因此，不管他喜欢不喜欢，他还是得学会打猎。

对他来说，游戏就是政治，而他自己则是一位政治大师。善交际的勃列日涅夫喜欢邀朋友（有些是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来的）到他在克里米亚海滨的休假地去玩。相比之下，戈尔巴乔夫休假时则深居简出。

戈尔巴乔夫把南方别墅分给不同机构后，党和政府的高级官员发现安排自己休假相当困难，为争好时间好地点而闹

得关系不好。无人想去普通的疗养院，那不合他们的习惯。莫斯科周围的别墅安排起来也很紧张，只有政府别墅尚有空闲。如果仅仅是难以去好地方休假，倒还罢了。可是，不去胜地休假意味着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部长会议副主席们丢掉了原来的气派和神秘色彩，被老百姓当作普通人看待。意识到这一点令人震惊。我们这个国家同中亚国家一样，至高无上的身份是领导人的重要因素，他们都清楚自己不会统治多久，似乎越搞孤家寡人，他们江山就坐得越长。

与此同时，多年形成的政府机器虽然仍在运转，仍在通过决议，但党和政府机关再也说不清这些决议是否正确。

在政治局会议上，政府部长们拍案而起，就面前的决议草案、国内形势、执行计划漫不经心的现象发言，措辞激烈，时带嘲讽。发脾气倒也好，更糟糕的是沉默不语、不屑于发言。政治局批评他们，他们不再害怕，而是满不在乎、嘻嘻哈哈。我记得有次政治局休会后，一个部长模仿总书记的声调和手势装模作样地提出一个什么倡议，引起哄堂大笑。

党和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对国家的问题当然比上司更敏感，因为他们的地位使他们能了解详情。

在戈尔巴乔夫任职后期，对他的报告和演说的准备工作，我参与的越来越少。戈尔巴乔夫显然看出我对他卖弄字眼不感兴趣，便起用新人，起用对他喜爱的那些越来越古怪的字眼尚未厌烦的新人。我并不掩饰自己对总书记喜欢作口头和书面文章是怎么想的，和他多次谈过此事。1987年有时我们晚上坐下来谈谈，那时他比较放松，可以谈各种问题。我对他说，话已经开始贬值，太短的时间说了太多的话。他的演说集起初还畅销，如今堆在仓库里。老话应当尽量不多说，要说就说新话。此事我和雅科夫列夫议论过。他也感到，戈尔

巴乔夫不受嘲弄的唯一办法是少说话，多办实事。

我在沃伦斯科耶有很多朋友，有时前去拜访。我感觉得到，他们犹豫不定，忧心忡忡。中央委员会从各机构借调人专为戈尔巴乔夫演讲和报告撰稿，如今这个顾问班子对总统讲话所包含的思想已失去热情。他的思想本身也确实越来越经不起推敲。看到他们的困惑，我便坐下来和他们讨论各种问题，或者向他们解释党和国家面临的各种困难。他们之中有些人不愿意直言相告，显然担心会引起我的误解。我发现自己的身份和职务影响与别人坦率交换意见，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只有多年的挚友才对我倾诉衷肠，告诉我他们对时局、对国家形势的担忧。至于我，很多问题更难启齿，因为我了解其中内幕，知道政治局内部的勾心斗角，总书记的为人，以及他亲近的助手对他的影响。

戈尔巴乔夫的写作班子网罗了各界人才。所有这些人都有真才实学，是卓有成就的党务工作者或科学院院士。不过，其中有些人逐渐变得消沉起来，或许他们认为自己夜以继日的辛劳不过是浪费时间，所有的进展仅仅体现在纸上，实际上却毫无变化。

第七章 失败的改革

我是什么时候感觉到改革开始没落的呢？这有个过程。最初的迹象是戈尔巴乔夫言行无定，开始到处寻求管理的新办法，害怕承认自己的过失而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他到处讲话，仓促决策，毫无实效。改革的没落也许开始得更早些，即在政治局、党中央和政府不再协调行动之时。我看得很清楚，戈尔巴乔夫对这种情况心里很明白，但仍然言不由衷，表现出毫无根据的乐观态度。显然，他在期待奇迹发生，把他从毁灭中挽救出来。

党和国家形势越严峻，他在与各界代表秘密会见时的态度就越变幻不定。与民主派会见时，他便打保票，要坚持自由，坚持公开性，大力推行民主改革；而与改良派会见时，他则声言，只有共产党才能实施改革。想必戈尔巴乔夫已经意识到改革的失败、经济形势的严峻和自己对此应负的责任，因此不得不投向改革势力的左翼，以便站在不久前还曾是自己的反对派的旗帜之下给苏联以致命一击。这不难理解。不过，他总是从一条沉船跳到另一条沉船，从不暴露自己真正的立场，这使每个人都感到困惑。恐惧或许使他意识不到自己在

作求生存的本能挣扎，但旁观者对他拼命施展政治伎俩看得一清二楚。

另一种可能是：党内都看到他的许多倡议言不由衷，脱离实际，造成地方党组织和党中央不一致。在1987年1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描述了他的社会民主化计划。他说，当选的人民代表和党员代表现在受政府机构的领导，而不是受中央委员、党的执行机构和苏维埃的领导，这种体制必须改变。当然，他忘记说整个政府、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工会及其它非政府组织也统统在政治局、也就是说在总书记的领导之下。如需任何改革，就从他自己做起。

尽管如此，提出社会民主化的问题无疑是正确的。很明显，政府机构需要精简，职能需要转变。指出机构的不足之处后，总书记接着采取具体措施，并成功地予以实施。实际上，直到最近，政治局和书记处一直在管理经济，部长会议只起橡皮图章的作用，通过党已批准的决议，或者执行已通过的决议所规定的具体任务。这一事实说明很多问题。在过去几十年间，党中央建立起由专家组成的很多办事机构，负责起草实施其决议的五花八门的文件，它不但包括党务和意识形态部门，而且还有完全有资格处理机器制造、化学、农业、经济、科教、军工、行政事务、内务等各行各业的部门。

在苏联，没有党中央各部的批准，对稍带实质性的问题都不能进行讨论或决策。在很多问题上，书记处把草案呈交政治局，得以通过后即成为政治局和部长会议的决议。

关于干部政策的中央全会召开之后，戈尔巴乔夫命令利加乔夫和书记处拿出大力精简机构的方案。在草案呈交政治局之前，戈尔巴乔夫对它进行了精心研究，对许多部门采取了砍、并、减的办法。这不仅适用于监督经济机构的部门，而

且适用于纯党务和意识形态部门。需要起草决议或准备报告时，总书记常常找来对有关问题有专门研究的人员，再加上自己的助理。他一面高声朗读文件，一面指出不恰当的措辞，并在与会人员的帮助下提出修改意见。这时他就会问：“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化工部呢？要一个管硅的有机化合或诸如此类的部门干什么呢？把它裁掉！”

当然，他是对的；但这一套是他继承下来的。问题不在于机器制造部或建设部本身，整个管理体制仍反映着战时经济和战后复兴的需要，它强调纪律、控制和责任。一切都需要改变，但改变的方式又不能破坏经济，不能使国家倒退几十年。

然而，那时戈尔巴乔夫削减部门的数量和规模的唯一的目的是提高民选机构的自治权、威信和责任。当时先是苏联最高苏维埃、后是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都面临换届选举，他的这一举动有助于避开批评。党参加选举的口号是：“给代表更多的自主权，给民选机构的代表更多的自由行动权。”

民主化进程始于最高苏维埃代表实行竞选的决策，每一席位有好几名候选人竞选。这种原则很民主，但也很危险。其实戈尔巴乔夫比大多数人都更早地认识到这一点。他感到，由于国内动乱，很多党和政府要人都不能参加竞选。于是他想出一个办法：代表不但由选区选民选举，而且要由各类组织选举。他的理由是：最高苏维埃代表必须充分体现民意，不但要有地域基础，而且要有职业基础，因此，工会、共青团、共产党和其它行业组织（如作家协会、记者协会、艺术家协会等等）都应有其代表。

这个主意看来不错，党、工会和其它组织都表示欢迎。根据他的指示，制订出关于代表组成的一套规定。党、工会和

其它大型组织各有一百名代表。我已说过，这是一个聪明的办法，但操作起来有些困难，因为这几百名代表也应由竞选产生，这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再次达成妥协，即各组织按自己的意愿选出代表。戈尔巴乔夫在和助手讨论此事时说：“中央全会上我们决不会让受人尊敬的人像那样竞选。”

那时他已经开始担心自己每况愈下的声望了。他害怕在某一选区参加竞选，如果失败怎么办呢？可是他又不愿意全体会议实行秘密投票。他的理由是：“投反对票一多，整个事情就可能砸锅。要求公布结果和追究责任的候选人显然会不得人心。因此，我们不能为这一百个席位在党内进行竞选式投票。”

他的担心可以理解。他经常失眠，身体不佳。同事们可以看到，他在迅速衰老，好像换了个人。他表面镇静，但说起话来满腹怨气，措辞激烈。他决策仓促，又朝令夕改。例如，在大选之前，他拿不定主意是否参加竞选，就询问身边人员的意见。他推测：“如果我在选区当选，党员们就会说我不愿意代表党竞选；而如果我在中央全会上参加竞选，人民又会说我不信任他们。”

我有一个看法。我感到，他应该在一个大选区参加竞选，选民中既有共产党员，也有非共产党人。我对他说，他毕竟是在竞选人民代表，而不是党代会的代表。当时他似乎同意我的看法，但与政治局讨论之后，他又决定在党内竞选。

事后很久我才意识到戈尔巴乔夫为什么决定在党的全会上竞选。此前他已决定不在莫斯科竞选，因为那里反对势力很强，他很可能落选；而选择另一选区则有失体面，碰到敌对候选人时尤其如此。他很担心会败在越来越强的对手鲍里斯·叶利钦的手下。

拉祖莫夫斯基和中央组织部的官员们着手拟定“百人”名单。它包括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很多委员，还有州委和边疆区委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的党委书记。戈尔巴乔夫对此并不满意。他对自己列入“百人”的复杂性很清楚，便花了两个整天的时间同拉祖莫夫斯基坐在长会议桌旁对名单反复研究，划掉可能成为对手的名字。陪同他选举的人员一定要选准。本来是一张党的代表的名单，如今看上去像是由作家或艺术家协会拟定的。它包括知名作家和艺术家，还有工厂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党的官员则有些被删去，有些增加。戈尔巴乔夫的主要任务是确保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列在其中，如作家、记者、院士。工作不间断地进行着，其间送上咖啡、茶和三明治，因为名单必须在几天之后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之前拟就。同时还要避免引起怀疑，那样可能会导致重新变化，增加新的候选人，后果不堪设想。

全会最终召开之时，中央委员们自然产生疑问，问的最多的是为什么自己的名字没有列入名单。他们之中很多人内心都害怕参加选区的竞选式选举，这是可以理解的。戈尔巴乔夫在会上讲话，就名单作出解释。他滔滔不绝，其实听众中很多人对他的逻辑都很清楚，这就是：红花还需要绿叶扶持。为了使某些候选人列入名单，就必须同时列入一些知名作家、艺术家、还有工人和农民。这样，任何人就不会说这是“百名”党的官员，从而避免激怒党外知名人士。实际上，这种小聪明并未完全成功。人们把这样产生的代表分别贴上“红百人”或“黑百人”的标签（“黑百人”指19世纪反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原注）。

党有党纪。因此无需长时期辩论，选举相当顺利地进行。有些选票划掉几个名字，但这很正常；而如果实行竞选，很

多候选人根本没有可能当选为代表。这种选举比较简单，它可确保成功，用不着高谈阔论来取悦公众，或作为代表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当然，还要过一关，就是由选举委员会批

报刊杂志在那一期间发表过多少使人心寒心悸的文章？可到后来，政治形势一改变，民众和舆论界的抗议声戛然而止。废物处理当然是必要的，它涉及到人们的生命健康；但另一方面，它的费用又是昂贵的。不管怎么说，苏联还不具备控制污染的技术。不过，问题不在这里，当时有人把生态问题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以左右民心。对关闭工厂的呼吁人们听得进去，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毒害他们的当权者的回击。

但是，对民主改革初期的现象不要过早地作结论。公众对实行正常选举来自由表达自己心意渴望已久，而党的领导人却迟迟不给他们这种机会，从而激起民愤，领导人咎由自取。过了这一阶段，选民们看得就会更清楚，候选人的确认和选举会更谨慎地进行，只有那些认真对待自己职责的人才会当选为代表。但在初期情况不大一样，激情、骚动和经济混乱使政治流派各立山头，为主权而战，各执己见，势不两立。这样，我国走的就不是欧洲现在走的这条路，实际上也不是世界其它国家走的路。我们还要在这条歧路上走多远呢？这一进程不可逆转了吗？

最高苏维埃选举后，人民代表各得其位，下一步就是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组成管理机构。是 2500 名代表每次都来开会呢，还是选出其中少数人成立常设机构？目前尚不清楚。戈尔巴乔夫认为此事需进一步研究，他对事态的发展方向和代表们的内心活动不摸底，还会出现很多预料不到的事情。不过，与此同时，他已作好准备就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一宝座他盼望已久。

此时他已意识到，作为党的总书记，出访外国、与外国领导人会谈越来越不合适。

西方领导人也这样想。因此，戈尔巴乔夫不再信守“不

身兼两职”的诺言，开始为自己当选国家元首作理论和实际上的准备。他先与亲密的同事、后与中央委员讨论此事。前者显然都估计到有此决定，于是人人都同意这一观点，即：改革之所以失去控制，就是因为党的领导人不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征得同意（至少没有遭到反对）之后，他便实施正式选举前的第二个步骤，就是在中央委员中游说。他邀请来大批加盟共和国、州委和边疆区委书记，向他们建议，在民主政体之下，各级党的领导应兼任同级苏维埃的领导。

“在文明国度，执政党指定自己的领导人为总统或政府首脑。”他说，“我们违背这一民主传统是错误的。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组成上，我们应该仿效西方。我请你们就此发表意见。我们面临一场艰巨的政治斗争，不可失去政权这个杠杆。”

书记们一听要他们推举自己为各级苏维埃领导人的候选人时，一个个都愕然无语。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自己不提名，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亦步亦趋。终于有一人发言，告戒不可仓促行事。显然，书记们没有兼任同级苏维埃领导的思想准备。有些人认为这是额外负担，另一些人则担心自己不会当选，只有很少人支持戈尔巴乔夫的倡议。

戈尔巴乔夫是雄辩大师，如今英雄有用武之地。他说得头头是道，眼神和声音都流露出真情实意，终于说服了正在犹豫不决的书记们。我感觉得到，他们心中在比较现任职责和苏维埃领导的职责，而结果防线被攻破。即使那些不愿身兼两职的书记在获此允诺之后也同意戈尔巴乔夫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其余的人则认为戈尔巴乔夫和他们自己都有必要身兼两职。

这一过程持续了三个小时，用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话说，“伤透脑筋”，不过总算以胜利告终。前面还有一道障碍，不

过他如今可以指望得到各加盟共和国、州和边疆区党的书记和代表的支持了，事情会完全按他的意愿发展。总书记在获取新职位方面已积累了足够的经验。

1989年5月25日，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天气温暖晴朗，青草翠绿，枝叶繁茂。来自各方面的代表汇集一堂。有的是以高产而不是口才知名的工人，有的是管理经济的党的工作者。后者也不是演说家，他们早已失去作使人心悦诚服的慷慨激昂的演说的能力。代表中也有一部分新人对公众演说并不陌生，他们能言善辩，有深厚的理论根底。如今任何事都怪罪苏维埃统治已成时髦，但有一个领域未受到批评，那就是中高等教育，尤其是在科学领域。反对派中有很多大学毕业生、科学家、作家、记者和律师，没有谁能抱怨自己未受到良好的教育。必须承认，他们缺乏在工农业或经济部门的实践经验，但这不要紧，毕竟他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才，有表现自己的才能。

代表、来宾和记者挤满了大厅。我看着周围新当选的代表，感到枯燥乏味的会议即将成为过去。各派代表已开始组织核心小组，部署力量，改进战略。各代表团也未闲着。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加盟共和国已决意公开反叛。第一书记们抱怨出席大会的有些代表行为不端，这些人在家时沉默不语，而今却吵吵嚷嚷要大会讨论他们提出的议程。大厅里乱哄哄，像蚂蚁窝一样。在前排就座的是来自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代表，其中还有很多人来自各个州，他们正在制定自己的辩论策略，尽管他们的立场事前已经商定。

在大会开幕前一天，代表中的党员在戈尔巴乔夫主持下开会。会议进展不顺利。共产党员自己也四分五裂，对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其它领导机构的选举达不成一致意见。以前

此类工作都由党中央组织部协助，而今它不愿介入，担心那样会遭到指责，说向代表施加压力。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对中央机关的领导功能有言在先，如今他们都愿意无所事事，会见代表也是应代表之求。

其结果很有意思。党中央和书记处几十年以来都把中央机关视作控制地方党组织的工具，而今却指责它越权。戈尔巴乔夫本人曾多次督促各部人员对地方党委的工作要严加控制，还要他们多去各地视察，以确保党的路线得以贯彻。党中央机关甚至专设一职，名“指导员”，其职责之一就是向下级党组织和党委的工作提出建议。而今天，同是这些人员却受到轻蔑和批评，被禁止行使一直在行使的部分职责。这些人看到政治局如此轻易地把自己的过失归咎于机关的“小人物”，只好迷惑不解地耸耸肩。

代表大会首先处理组织和程序事项，一开始气氛就很热烈。里加急诊中心主任V·托里皮兹尼科夫要求公布下令殴打1989年4月9日第比利斯和平游行者的罪魁祸首，并建议大会悼念在此事件中的牺牲者。他的发言犹如干柴上点燃一把火，会场顿时哗然，喊叫声与喝采声响成一片。这位医生早就知道会有此反响。很多代表情绪激昂，发言席前排起长队。他们都想发表高见，为正义而大声疾呼，在电视上抛头露面，以使自己的选民感到他们没有选错人。莫斯科来的代表特别积极，不过他们也受到批评。莫斯科比起其它城市来食品供应充足，这一事实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反对派联合起来成立跨区组织。大规模论战愈演愈烈，各方慷慨陈词，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有时甚至发展到拳脚相见。党、党中央机关、军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受到一连串指责，特权成为最吸引人的靶子。批评自然有其道理，但大多是夸大其词甚至

无中生有，而且无人还击。代表中的共产党员试图挤到话筒前，但没有发言机会；即使有人讲话，也大都显得软弱无力、信心不足。对赤裸裸谎言的真诚的、有说服力的唯一回击来自于几个义愤填膺的妇女代表。不过，对她们使用的语言也不敢恭维。

除共产党外，军队是攻击的另一主要目标。托里皮兹尼科夫的发言引发出对战士、军官和将军们的指控，谴责他们驱散第比利斯示威群众，致使老百姓死伤多名。他们强烈要求军方领导和格鲁吉亚当局对此作出解释。出席大会的人全体起立，为全国各地被害者默哀。看到这一场面，我不禁自问，为什么专挑出军队加以攻击？他们只是执行命令而已，如今却当众受辱！战士不就是人民的子弟兵吗？他们被派往阿富汗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吗？驱散第比利斯的示威群众是他们自己心血来潮吗？也可能我错了，不过我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并对戈尔巴乔夫直言相告。

第比利斯骚乱及其后果

对于第比利斯事件，即军队官兵介入驱散示威群众并导致无辜死亡一事，苏联人民有权利了解真象。戈尔巴乔夫对那几天的事情了解得相当清楚，因为不管他在哪里，全国各地的情况都会及时向他汇报。

戈尔巴乔夫肯定了解1989年4月第比利斯的形势。那些天接二连三地发生重大事件。4月2日，戈尔巴乔夫飞抵古巴，他多年称这个岛国为“自由之岛”，如今实现了访问它的

诺言。他本打算1988年12月访美后从纽约回国的途中去古巴访问，但由于亚美尼亚发生大地震，计划被迫取消。这一次他如期抵达，会见了卡斯特罗和古巴人民。总地说，访问很成功，只是在改革问题上有些小分歧，对改革的外延在苏联、在古巴，都未得到充分的理解。归途中戈尔巴乔夫在英国逗留数日，与英方多次会晤。

就是在这—期间，我形成一个深刻的印象：总书记对他的随从已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谦虚和同志式的态度。相反，他的举止像皇帝—样，几十人（包括代表团正式成员）在他住所内听候吩咐，—大群助手、保镖和侍从前往使馆—层他的私人住所。有一天，总书记不知因何故耽搁了。克鲁奇纳和我围着住所转了几圈，但他还是没有下来。我们以为他病了。实际上，后来我们了解到，只是日程有所变动，需要他换件衣服。可是为什么这样小题大作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戈尔巴乔夫在伦敦期间，第比利斯的事态发展到高潮。据我所知，—直与莫斯科保持联系的普列汉诺夫向他通报了—这个情况，国家安全委员会第—副主席菲·博布科夫设法通过专线打电话与我联系，告诉我最新发展，然后我告诉戈尔巴乔夫说看来局势正失去控制。我想他—定会立刻打电话给莫斯科，但不管怎样，—到国内，人们马上向他作了详细汇报。前往机场迎接的政治局委员认识—致，包括派谢瓦尔德纳泽前去第比利斯执行和平使命。然而外交部长并未前往，显然是与戈尔巴乔夫商量之后改变了主意。

后来我从朱马贝尔·帕季阿什维利处了解到第比利斯事件的更多细节。他当时任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书记，乘飞机来莫斯科，设法见了戈尔巴乔夫。两人关系—度很好。他坐在戈尔巴乔夫办公室的接待室，耐心地等了两天，却被告知

回旅馆去等候，叫他时再来。我对戈尔巴乔夫太了解了，他是在尽量推迟会见，最后竟要我自己去见帕季阿什维利，了解他有什么要求。这显然不合逻辑。当可能带来坏消息或麻烦的访问者求见时，戈尔巴乔夫往往把他推给别人。他照常处理各种文件，指示别人接见他们，并准备对策。在第比利斯问题上，他故伎重演，让利加乔夫、拉祖莫夫斯基和军方帮他摆脱困境。

帕季阿什维利听说总书记不愿见他，便垂头丧气。他含着眼泪，断断续续地说，谢瓦尔德纳泽之行之所以未按计划进行，是因为冲突显然不可逆转。此前已经达成协议，不过他没有讲与谁达成协议。帕季阿什维利很为难，全部真相他只能对戈尔巴乔夫一人讲。他也不愿意把一切罪责都承担下来。他与谢瓦尔德纳泽的关系从在共青团工作时起就一直不好，这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但是，到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时，帕季阿什维利的调子有些改变。官方越来越多地把第比利斯事件的罪责推到军队身上，这种倾向得到广泛支持。战士、军官和将军们成了替罪羊。政界领导如此轻易地把责任归咎于军方使我十分惊愕。没有一个政治家有勇气站出来为军队说话，而实际上军人是按他们的指挥棒行事的，他们不过是贯彻他人意愿而已。我坚持认为，这一事件提交大会讨论时，戈尔巴乔夫应该站出来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我充分认识到，这样做相当困难，主动承担责任需要很大勇气。但是人民代表和整个国家似乎都在期待着这样一种承认，遗憾的是没有人站出来。于是我向戈尔巴乔夫讲了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您本人应该为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我说，“袖手旁观是错误的。即使假定您对事情的进程一无所知，您作为总书记、武装力量总司令和国防委员会主席也是有责任

的。您的下属可能误导了您。这些指挥员无论是好是坏，有才干或是平庸，可都是您任命的啊！您应该有胆量为自己判断的任何失误承担责任。然后您再找出谁应具体负责并加以惩处，但不应该让他们单独承受各界的愤怒声讨。这样做需要勇气，但它是体面的事、高尚的事，人民会相信您、原谅您。您把批评转移给无辜者的作法最终只能损害您自己。您不应该袖手旁观，您应该保护军人，维护军队的荣誉。”

戈尔巴乔夫没有说话。我知道自己触动了他的痛处，肯定引起他的不满。

我至今仍然认为，总书记兼武装力量总司令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这种景象无助于提高他的威信。在很多人眼里，尤其是在军方心目中，他不再值得信任。苏联总统和军官集团——乃至整个军队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这是原因之一。

连日来，各种政见的鼓吹者在大会上慷慨陈词，争相争取代表和社会的支持。对大部分与会者来说，这是一场精疲力尽、令人厌倦的过程。戈尔巴乔夫主持大会，玩弄手法，根据需要时而安抚、时而鼓励不同派别。不过他也逐渐忍耐不住，往往提高嗓门、发起脾气。安德烈·萨哈罗夫发言时，他关掉麦克风。会议厅顿时哗然，有人赞成，有人抗议。对大会主席团，所有代表都不满意，指责他们让不适当的人发言，纪律松弛，不遵守程序，一片混乱。会议休息时，戈尔巴乔夫就退到主席团休息室，一付精疲力尽的样子。这个房间确实是为主席团准备的，以前举行党的代表大会或隆重庆典时，政治局委员们也在此集中。而这一次党的领导人没有被选进主席团。他们坐在半圆形会场上，在所属的代表团中。不过，他们还是常回到这个老休息室，喝杯茶，休息片刻。主席团其他成员则在楼下一个简单的房间稍事休息。

在楼上休息室的政治局委员们第一次发现自己已无力控制或改变局面，此时正在焦急地商量对策。他们内心在想什么呢？大部分委员认识到，现在犹如房门大开，各色人群一涌而进，他们在整个国家面前有什么说什么。政治局委员们大吃一惊。这种情况也使千百万老百姓不安，他们看到电视荧屏上的这种场面，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人民代表大会与最高苏维埃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戈尔巴乔夫常常提前三四十分钟到达克里姆林宫，偶尔也可能在会议即将开始之际。追踪他每一行动的保安人员会告诉我，比方说，他正在通过凯旋拱门，正朝克里姆林宫走去，或他的专车正通过克里姆林宫门。总书记通过一个专用入口进入克里姆林宫，保安队长在此迎接他。助手帮他脱下外套，护送他乘坐电梯来到三层，那里有他一个小书房，有医护人员、按摩师和理发员为他服务。戈尔巴乔夫以香波开始一天的生活。他走进过道时，理发师在一旁等候，为他梳理头发，把后颈和两鬓的头发轻轻刮掉，再梳好吹干。开始几年他用的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理发师，后来不知为什么将他辞掉，接替他的是一位年轻妇女。做头发期间，有时他还让我把当日文件送去。我简要汇报情况后，他来决定该给谁发送备忘录、索要信息或指示采取行动。待到他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厅露面时，早已与克留奇科夫、弗拉索夫或普戈、亚佐夫、谢瓦尔德纳泽、部长会议主席以及中央书记交换过意见，对国内外时事

都了如指掌。

梳洗打扮后，戈尔巴乔夫乘电梯来到楼下主席团休息室，过去政治局通常在那里碰头。互致问候之后，他有时坐下喝咖啡，不过通常还是同他人一起直接前往主席团，讨论会议的议程、决定会议的主持人。开会期间，戈尔巴乔夫常常离开大厅，来到主席团休息室喝杯咖啡，或给赖莎打个电话，或会见政治局委员、助理或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头几天，戈尔巴乔夫经常离开会议厅，与苏联领导人、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以及反对派领导人会谈。

几天过后，共产党员代表明显处于守势。戈尔巴乔夫也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等了很久才把各州、各边疆区党委书记们召集到书记处会议室，想给他们加油打气。在讨论大会辩论过程时，他听到一些批评，代表团团长和中央委员会机关受到指责，说他们辜负了代表们的希望，说党忽略了个别接触的原则。总书记拿不出自己的对策来回答这些抱怨，只好建议他们尽量争取发言的机会。这正是反对派使用的手段，他们的代表频频碰头，商量对策，以确保成功。他们的主要办法是猛烈攻击共产党，攻击特权，攻击国家现状。有些发言抨击军队，语言辛辣，受到社会上某些势力的欢迎。老百姓对此只是部分地感兴趣，但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听到这些批评表示高兴。

政治局委员互相商议更频繁了。我从未看到他们如此惊吓。他们讨论大会的进程，商讨对策，以便稳定局势，然而得出的唯一结论是与这次大会的代表辩论毫无意义。对他们、尤其是对易受极端口号影响的动摇派，只能个别接触。而民主分子正是这样做的，而且做得很巧妙、很坚决。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声称，他们在旅馆受到游说、贿赂、甚至恐吓。还

有人打电话进行威胁，很多代表感到惊恐。

大会越往下进行，人们看得越明显，在这种激动与不和的气氛中根本不可能作出建设性的决议。大会通过倡议：从代表中选举最高苏维埃常务委员会。接着候选人之间便展开激烈竞争。在大会发言最激烈（有时甚至不顾礼仪）的代表大多未被选入。

获多数选票才能当选的原则保证了选举的质量，从而也激怒了民主分子，于是他们提出一种名叫“积极地服从”多数的理论，也就是中亚代表那种不动脑筋的一致投票办法。另一种作法是波罗的海地区代表所持的立场，他们很多人准备退出会场。大会出现许多软硬兼施的现象。

人们应该记住，这个人民代表大会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代表们还未从竞选的激情中平静下来，仍在尖锐地、盲目地相互攻击。每个人都急于留下自己的痕迹，尽快争得发言的机会，以便向当局发起攻击。他们发言反映出的激情很快便席卷全国，得到很多代表、甚至很多党的工作者的支持。大会开始选举最高苏维埃及其主席、副主席时，不同党派间的战火再起。戈尔巴乔夫的提名当选并非易事。很多代表（有些是他的支持者）提出使他不悦的建议，要他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以便集中力量处理国事，还要求他就建造福罗斯别墅一事作出解释。萨哈罗夫指出，他在选举中支持戈尔巴乔夫是有条件的，就是要看对根本政治问题辩论的进展情况。他还说，如果选举只流于形式，那他就拒绝参加。

从哈尔科夫来的代表、卡车司机 L·苏霍夫回忆起他在党的 19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向戈尔巴乔夫提过一个问题，他说：“当我听您咄咄逼人的演说时，包括您粗暴地打断别人讲话时，我不是拿您同列宁或斯大林相比，而是把您比作伟大

的拿破仑。他不怕枪林弹雨，不怕流血牺牲，领导他的人民走向胜利。遗憾的是，他的老婆和谄媚小人使他和共和国变成王国。我十分担心，同样的事也可能在这里发生。如果真这样，我们的革命事业将毁于一旦。依我看，您也没有能逃脱夫人的影响。我准备投您的票，但要记住我的话，要使人民确信我们正朝着共产主义的目标前进。”

接着开始了对戈尔巴乔夫提名的空前激烈的大辩论。鲍里斯·叶利钦也获得提名，不过决定不与总书记竞选。选举结果是，2221名代表投票，其中2123票赞成戈尔巴乔夫当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卢基扬诺夫也当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一副主席。戈尔巴乔夫的一个雄心得以实现。

大会结束时，会议的影响像飓风一样席卷全国，民情激奋。大会也震惊了世界，人们忧郁地看着俄国熊从熊穴里慢慢腾腾地走出来，走向文明世界。它加入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行列时会不会引起大乱，谁也说不准，但毕竟它走向了共和制。变革精神感染力很强，不但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地区掀起波涛，而且也点燃了东欧各国的激情火花，这种激情过去就多次出现过。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此后又召开多次，每次都充满斗争，但力量对比变得对最高苏维埃有利。卢基扬诺夫当上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第一任总统。如今总统兼总书记手中握有无限权力，包括实施紧急状态的权力。他本可以在不毁掉苏联，不致于把它像超级市场一块牛肉那样弄得支离破碎的情况下，实施任何革新，完成改革，取得中国在短期内所取得的那种成就。

大会的结果同人们猜想的一样，也是分析家早料到的：在新形势下，党不再能战斗。它对大会、对全国的进程，已失

去了控制能力。出现这种局面的另一个原因是，早在选举期间，相当多的公众已不再支持共产党。大会加深了党与人民群众的鸿沟，同时也启发了过去对政治斗争从不感兴趣的人们。

首次人民代表大会表明，党中央及其机关对政治辩论和对抗的这种新形式也没有准备。因此，共产党员开始怀疑党的领导是否有能力坚持他们的原则和理想。最后一点，人民代表大会证实了一个严酷的事实：政治局和总书记缺乏威信，在需要的时候没有能力动员起全党力量。人们不禁要问，这难道仅仅是没有能力的问题吗？

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整个民主进程是在不利于党的形势下出现的。改革不成功，社会形势和经济形势恶化，党的领导和中央机构因过去和现今的错误而受到攻击。另外，中央新闻机构已经摆脱了党的传统领导。党的第27次代表大会和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表明，党比人们估计的还要软弱。

我相信，戈尔巴乔夫觉得这个问题不值得考虑。这位新当选的总统美梦成真，正乐不思蜀。大会的混乱，甚至他自己当选的困难都没有引起他足够的警觉。如果说对他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使他更加趾高气扬，更相信自己万无一失。当他与自己的同志、与加盟共和国、州和边疆区党组织官员、党中央和政府成员谈话时，他可以粗暴地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可以忘记礼貌，甚至伤人感情。人们显然想知道，为什么这样一位有魅力的、有智慧的、有同情心的人突然变得如此粗暴无礼。很多人想必都已注意到，他即使与老年妇女交谈时，也很不礼貌地直呼其名。他发起脾气来便大喊大叫，满嘴脏话，不过他仍保留着迷惑人的能力。

“阿历克斯，”他会对被他赶出总统委员会后至今仍耿耿

于怀的雅科夫列夫亲切地说，“你好吗？你来撰写这篇讲演稿如何？然后我们一起研究。”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冲突

1988年6月28日，党的第19次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开幕，这在战后是第一次。党需要召开大会通过一系列决议和其它文件，并举行选举，使中央委员会满员。完成后一个目标有障碍，因为第27次代表大会没有想到要通过一个书面文件来规定党的代表会议有权举行这种选举。不过，这次会议的召开并通过决议这一事实本身已成为党的生活中一件大事。会议议程包括苏联社会的民主化、政治改革、清除政体僵化、民族关系、公开性和法制改革。

到1988年年中，全党全国都群情激奋。有的人认为当前进行的改革实属必要，另一些人则感到它过于激进，难以接受，由此出现了不同派别。公开性促使每个人都想站出来讲话。报刊和电视充满真话、半真话和彻头彻尾的谎言，有损党组织形象的故事到处流传。这种紧张气氛不能不影响到普通共产党人。

选举党的代表会议代表的办法发生根本变化。共产党员受世风影响，也倾向于慷慨激昂与党作对的能言善辩的候选人。结果是出席大会的代表中既有明智的民主人士，也有纯粹是想在电视上出头露面的哗众取宠之辈。

这次会议非同一般，对领导的批评和耸人听闻的演说贯彻始终，其中要首推《星火》主编维塔利·科罗提什。他声

称，据他所知，与会代表中就有受贿的高级官员。此言一出，全场哗然。阿尔泰的代表立即要求把这些人公布于众。最后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进行核实。科罗提什此言基于最高检察院捷尔曼·格德里扬和弗·伊万诺夫调查组提供的材料。后来才发现，这些材料仅表明乌兹别克的一些州委书记涉嫌受贿。科罗提什交给大会的就是这份材料。

毫无疑问，某些高层官员确实以各种形式接受贿赂和礼品，以权谋私的暴发户比比皆是。但是，把他们与其他许多同级官员混淆在一起，甚至把全国说得漆黑一团则是错误的。有些狡猾的人利用乌兹别克事件谋取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优势。反对腐败是一项神圣的事业，绝不能让那些手脚不干净的人利用，也不能秘密进行。

批评者意识到，反人民的错误指责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于是把目标转移到政权的其它阶层。他们不但怀疑、而且实际上毫无根据地指责一些人，而这些人根本不可能涉嫌。被指责者包括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和戈尔巴乔夫，不过主要目标是利加乔夫。

戈尔巴乔夫为这一连串指责深感不安，因为有些是针对他本人的。最使他不安的是有人暗示，当年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工人闹事时他曾参与。这种指责刺痛了他，于是他下令总检察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制止这种诽谤，并把详情汇报给他。政治局召开秘密会议讨论乌兹别克事件，会后下达指示，几名党中央委员被捕受审（很大程度上征得戈尔巴乔夫的首肯）。后来他们获释，主要是证据不足，也因为审讯他们的程序不合法。

在党的19次代表会议上，有关乌兹别克事件的问题一经提出，对党和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的建设性讨论全部让位。这

个问题的提出并非偶然，某些人下定决心要证明党的领导人的腐败罪恶，党的本性是不得人心的、是嗜血成性的。如果找不到确凿证据，至少也要一笔抹杀党的成绩，把党搞臭。为此他们翻箱倒柜，寻找各种文件和材料。每公布一项党机关享受的特权，会议厅便一片义愤。代表们质问他们的钱到什么地方去了，党的硕鼠是怎样肥起来的。

代表们如此激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披露斯大林 30 年代到 50 年代所犯罪行对青年一代的影响。老一代党员对此已有所知，或出自亲身经历，或来自党的 20 大和 21 大文件以及党中央致各级党组织的信件。党的 20 大后，大会主席团发出内部信件，揭露斯大林时代领导人的罪行。如今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指示，这些材料出现在报纸上。

利加乔夫在大会上的发言使讨论更加戏剧化。他本来就是新闻媒体和公众舆论中各民主派代表攻击的主要对象，如今又同时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对他的指责包括：主张用行政命令手段治理党和国家，对新闻界严加控制，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以及未能坚持党的工作原则。实际上，他是代戈尔巴乔夫受过。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人敢提出罢免他。

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在大会上发言，陈述自己的立场，回击批评。会议休息时，他把这个意图讲给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劝他不要发言。“他为什么要发言呢？”戈尔巴乔夫事后对我说，“那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如今你可以看出我们处于什么境地。”

当然，他是对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但利加乔夫继续作发言准备。他的助手把打好的发言稿交给他，他改好后又付打印。我估计他是想把发言先准备好，但不到必要时就不发

言。但是我错了，他已经拿定主意。不久轮到他发言了。

他详尽地说明自己的立场，回击批评，并就他与叶利钦的关系作出解释，这是代表们经常触动到的另一痛点。利加乔夫的发言坦率，有时甚至尖刻。他的讲话不但在大会而且在公众中引起广泛评论，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与叶利钦关系紧张。这两人久有争执。我不知道确切原因，不过我认为，这两人都很倔强，尽管有多年友谊，但终归不可避免发生矛盾。就我所知，两人的误解可能是这样产生的：

农业在苏联很多地区都是个头疼的问题，乌拉尔区也是如此，包括斯维尔德洛夫。这个州的领导多年来都是从工业和建筑业中选拔出来的，他们对这些领域自然很熟悉，但往往忽视农业。抱怨食品匮乏的群众来信很多。当地高级官员说，工业和涉及国防的事务太多，他们无力改进农业区的面貌。农民便涌向城市谋生。

党中央农业部一直注视着这些地区的形势。它决定对斯维尔德洛夫州的农业进行研究，邀请当地领导来书记处，共同研究如何改进。党中央和部长会议有关部委还派出专家组前往该地调查，形成一份备忘录，批评州委失误，并作出结论，提出重要建议。中央委员会对调查结果进行了研究，但由于该州的反对，中央又不愿得罪辛辛苦苦的州领导，竟将备忘录转给州委。党中央农业部副部长为此专程前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但是，在州委的全体会议上，委员们（包括最高领导）批评了中央的文件。

党中央了解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反应后，立即召叶利钦来莫斯科进行严肃谈话。对此事细节我不熟悉，但我知道，当时作为党中央组织部长的利加乔夫参与了谈话。叶利钦按照党内原则恰当地、坦率地与党中央交换了意见，博得利加

乔夫的好感。随即决定，最好把他调到莫斯科，任党中央建工部部长。叶利钦立即全力投入新工作。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后，利加乔夫负责人事，准备让叶利钦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他的前任——维克多·格里申工作不力，造成首都食品短缺，眼看就要下台。莫斯科不但食品短缺，住房也很紧张，社会问题成堆，确实需要更换领导。

叶利钦是担当此任的正确人选。他与腐败的莫斯科官员没有什么瓜葛，这一事实对他十分有利。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选人担任莫斯科领导这种作法是否明智，有些人存有疑问，因为本地也有称职的候选人。但反对意见没有占上风，于是叶利钦当上市委第一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他一上任就着手各种改革，首先是人事变动。这是必要的，因为各级政府人员老化，因循守旧。首都食品越来越紧张，社会问题越来越尖锐。他奋力对付这些问题，感到四面受敌。与此同时，作为党中央常务负责人的利加乔夫却强调各级领导尽职尽责。有时他管得可能太宽了。但不管是什么原因，总之，叶利钦很少出席党中央会议，两人关系也开始紧张起来。

两人不和还有一个原因：叶利钦没有拿出什么治理成果，却任免了一批又一批官员。此举引起公众不满，也引起党的高层领导的关注，开始怀疑任命他为莫斯科市委领导是否明智。形势紧张起来，叶利钦感到四面楚歌，工作大受影响，在政治局会议上经常一言不发。别人在那里讨论，常常一开就是八九个小时不休息，而他像是个局外人。

1987年夏，叶利钦就改革现状写信给戈尔巴乔夫，说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未抓住重心，声言自己不能留在政治局。我当时和现在都认为，他写此信是孤注一掷。惯于玩弄手腕的

戈尔巴乔夫，忽前忽后，忽左忽右，使人摸不着头脑。他可以告诉马克思主义强硬派：他在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而战，他决不背离这条路线；另一方面他又向自由市场派允诺：前进的唯一道路是按照奥地利或瑞士模式扩大市场经济、实行民主自由。总书记这种多元化理论越发挥，人们就越糊涂。叶利钦不会不知道，戈尔巴乔夫的两面派手法已引起各种政治派别的疑惑。

戈尔巴乔夫讲过他接到叶利钦的信，但未透露信的内容。针对叶利钦提出的问题，他建议两人过一阶段，最好在十月革命纪念日之后见面，因为那年正是70周年，要举行隆重的庆典。

党中央在10月召开全会，研究总书记在纪念大会讲话主要谈什么问题。这纯属普通的正常会议。戈尔巴乔夫发言后，主持会议的利加乔夫问还有没有人想发言。无人回答。即将宣读决议之前，利加乔夫又环顾会场，宣布如无人发言，会议将进行下一个议程。

像往常一样，一个偶然的机会有改变了会议后来的整个进程。戈尔巴乔夫看看前排就座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们，然后打断利加乔夫说：“我想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想发言。”

叶利钦是不是真想发言，我没有把握，因为只有主席台就座的人才能看清他是否举手。不管怎么说，他站起来，走到发言席。在简短的发言中，他首先表示赞同戈尔巴乔夫报告的基本思路，然后转到改革这个话题。经他本人审阅的记录稿忠实地记录下他的发言，后来公开发表。他谈了以下几个观点：改革遇到阻力，未能始终如一得到贯彻；中央书记处未能履行自己的职责，有时甚至起绊脚石的作用；莫斯科

的党组织毫无用处，它的决策陈腐不堪、脱离实际等。他在讲话中用了一个字眼，其含义可以理解为“个人崇拜的再现”。本来是一次枯燥无味的会议突然活跃起来，许多人相继发言，气氛越来越紧张。

戈尔巴乔夫气急败坏，宣布休会。我可以看得出，他在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一提到他有个人野心，便触到他的痛处。正因为如此，他才不得不授意他的追随者争相发言为他辩护。整个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横刀立马，准备战斗。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本人却扮演起调停者的角色。当然，他并不想扩大冲突，但机器已经发动起来。中央委员们急忙写下发言要点。我可以看得出，戈尔巴乔夫决定着政治局委员发言的顺序。

铃响了，委员们各归各位。我突然发现中央委员的立场有些变化。过去他们对叶利钦本来就一直存有疑虑，如今好像堤坝被冲毁，掀起一股声讨的洪流。戈尔巴乔夫也不再顾及体面。政治局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来自基层的党中央委员（有些来自莫斯科）都争先恐后地发言。他们不仅支持叶利钦自己提出的辞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建议，而且强烈要求将他免职。但是，发言结束后，戈尔巴乔夫问叶利钦：“告诉我，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您还能像过去那样工作吗？”

如今问这种问题为时已晚，因为全会群情激昂。叶利钦坚持辞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但认为自己仍可保留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后来他写信给戈尔巴乔夫也表明这一立场。但全会发生的一切不可逆转。由于精神压力太大，叶利钦承受不了，不得不住院治疗。

他的状况有所好转后，莫斯科市委安排了一次全会，他答应出席。戈尔巴乔夫、拉祖莫夫斯基，我记得还有利加乔

夫也都参加。

叶利钦身体虚弱，带着上次惨败的阴影蹒跚地走进会场。这次会议又重演了中央全会的一幕，他遭到众人无情的批判。对上司阿谀奉承、亦步亦趋的人对可怜的受难者不但没有同情心，反而落井下石。这种情形我过去就看到过。

会议决定任命列夫·扎伊科夫代替叶利钦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扎伊科夫没有经验，又优柔寡断，未能给首都带来平静。不久很多人就回忆起叶利钦，说他处事果断。但此时，他已降为部级，任建委主任。

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和大部分中央委员围攻叶利钦的过程，公众看得一清二楚。很多人同情叶利钦，与他保持联系。叶利钦的声望越高，戈尔巴乔夫就越惊恐，如今他把叶利钦看作需要认真对付的政敌。他也曾尝试过妥协，指望叶利钦能俯首称臣，但没有成功。

斗争进入新阶段：使用现代技术使叶利钦声名狼藉。手段之一是《真理报》转载意大利某报关于叶利钦美国之行的一篇文章，电视台也播放了他在访问期间讲话的部分画面。

利加乔夫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抨击了叶利钦的政策，使会议气氛更加紧张。会议即将结束之时，雅科夫列夫要求发言，被戈尔巴乔夫制止，他径自走到讲台前，等在那里。与会者要求给他发言机会。戈尔巴乔夫把我叫过去说：“叫他去主席团休息室，告诉他，我让他发言，但现在他应该坐下，不要那样站在讲台前。”

我走过去，请雅科夫列夫到主席团休息室。他很激动。我尽量使他平静下来，告诉他，戈尔巴乔夫答应让他发言，但要求他先坐到前排去。雅科夫列夫果然走到前排，戈尔巴乔夫随即让他发言。

雅科夫列夫在发言中从理论上批评了利加乔夫和其他很多人的发言。他综述了自己所理解的改革，列举出需要采取行动的领域。他还历数了改革的缺陷，党的改革之缓慢，新的个人崇拜出现的可能，以及对莫斯科的具体支持不足。雅科夫列夫建议，凡新的总书记一上任，整个政治局都应解散，中央机关应改组。他还主张，党的预算应该公开。

在发言最后，雅科夫列夫要求撤消 1987 年全会关于他的发言“在政治上是错误的”那个决议。他只承认有一个错误，就是说得太晚，应该在十月革命 70 周年之前就讲出来。

会场又骚动起来，简直是 10 月全会的重演。很多委员反对雅科夫列夫的提议。对已经习惯不疼不痒的发言和决议的共产党员和民众来说，雅科夫列夫的发言像一枚重磅炸弹打破了党内万马齐喑的局面。

从会议第一天开始的这一不可逆转的变化（50 年来第一次）震动了苏联和世界。人们认识到，如果没有秩序，国家取得的一切成就都会丧失，还有亡国的危险。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领导人的意图，我就不理解。我几次向戈尔巴乔夫提及此事，他根本不理会，只是说：“等着瞧，我会采取行动的。”

政治局、总统委员会和后来的安全委员会，以及部长会议都不知道他在玩什么把戏，即使最亲密的同事也不清楚他的真实意图。他是不是有一种使苏共解体、使苏联垮台的大战略呢？我想他没有。但他确实有某种最终目标，而这种目标不破坏现存制度就不可能实现。大部分人都认为改革旨在使国家繁荣富强，然而事实表明，这不是总书记的初衷。国家滑向灾难，正式的国家政策越来越像处在滑雪道上一样飞快地下滑。人们不禁要问，他究竟想干什么？

基础动摇

党的第19次代表会议后，很多中央委员和地方党委领导人还记得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总书记的那次中央全会。他们没有忘记他开始时小心翼翼迈出的步子。那时他缺乏信心，需要忠告和帮助。这些人的帮助在1985年是宝贵的；而今，同是这些人对他来说却成了累赘。领导人周围的人命运就是这样悲惨，他们知道得太多，而且又不够听话，因此不再为人需要。现在最好启用崇拜偶像的年轻人。

到1990年，戈尔巴乔夫完全换了一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他需用不同的工作方法，在党的高层领导、中央委员会和政府中使用不同的人员。州委和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换班后，他仍不满意。在一次中央全会上，委员们提出很多批评。中间休息时，他说：“我怎么能与这些人共事呢？我们这里需要新鲜血液，越快越好。”

党的第28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他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为此他做了认真的准备。他想把它开成一个民主、公开、有声有色的大会，像人民代表大会那样。因此，采用了竞选的办法。整个程序按人民代表选举的模式进行，竞选活动如火如荼。在对领导失误批评特别尖锐的地区，获选的党组织代表发表非常尖刻的演说，也不管听众能否接受。

党中央组织部不能像以往那样实施控制与指导。该部的人员已被裁减，留下的也担心落得个干涉党委和党组织事务的罪名，尤其在选举代表的问题上。实际上，即使他们想干

预，也不可能。组织部的有些部门如今只剩下四五个人，还要监管从库尔斯克到外高加索这一大片地区。这就意味着，中央书记们对全国各地的情况不甚了解，而加盟共和国、州和边疆区党委对于中央精神也不知道。到下面视察，即使打长途电话，也受到限制。在一般情况下，这种失去控制的情况不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而苏联多年来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体制，并不欢迎地方发挥主动性。

各级党委都感到迷惘。更糟糕的是，总书记先是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后是苏联总统之后，对在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党的事务已失去兴趣。如今这种会议往往以“特别会议”的形式出现。会议通过的为数不多的文件并没有反映国家形势的全貌，也没有明确党组织面临的任务。

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党的代表都通过竞选产生。这样，外部因素有时发挥作用，该获选的代表结果落选。当然，这还不足以决定代表对大会的立场。如果党和国家的形势稳定，如果大家坚信路线正确，那些人也不会咄咄逼人。问题不在于竞选，而在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失误。

而领导层，至少是总书记，并没有从党的19次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中吸取教训。在苏共28大召开之前，戈尔巴乔夫曾认真考虑过自己将来在党内的地位。他当然看重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更看重苏联总统的职位，认为党务既累人又可怕。看上去他似乎要辞去党的最高领导的职务而专心致力于国务。先是人民代表、全国各地的很多共产党员，后是中央委员都提出这个方案。但有两个因素起着反作用。一是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会大大削弱戈尔巴乔夫的地位，使他受到来自左派和右派的夹击，而出现一位新的党的领袖最终将把这个改革倡导者推翻。二是戈尔巴乔夫本人曾劝说所有州

和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兼任本地苏维埃最高领导。如果他在担任国家元首后不再担任党的领导，就会给批评者提供更多弹药。戈尔巴乔夫就此问题与助手磋商。他会问：“即使我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为什么不能继续作党的领袖呢？”“列宁曾是政府最高领导，同时不也是党的领袖吗？”

他等待助手的反映。有些助手觉得这个想法不现实，其他一些人则认为是个好办法。我心里想说，这个主意又好又现实，可是首先他得具备列宁的素质啊！而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这种征象（并不是责备他）。不过我没有吭声。

听过一些评论后，他又说：“不可以设立党的领袖这个职位吗？”

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想法，要在一两年前可能行得通，那时戈尔巴乔夫还不这样引人注目。而今如果这个办法拿出去而不成功，就意味着在政治上宣判他的死刑。需要找出一个更简单的方案。

各种提议都仿照历史上的作法，越来越不现实。遗憾的是，提到的历史上的领导人都表现出独裁的倾向，民主社会难以接受。最后的决定是中庸之道：总书记由代表大会选举，设副书记，也由大会选举，负责党务和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

然后戈尔巴乔夫开始物色这位第二号人物。自利加乔夫在新闻界和人民代表大会发表批评性言论之后，戈尔巴乔夫在思想上已与他分道扬镳，因此不会考虑他作为副书记的人选。这样就需要找一位新人，而且此人不仅洁身自好，还必须具备某些优秀品质，才能通过党的严格选拔程序。他必须是一个规模大的党组织的第一把手，思想开放，有在党内或政府内工作或管理经济的实践经验。不过，如果有人认为

党内第二号人物必须是智慧库，性格刚强，能言善辩，那他就错了。相反的，想当副书记的人必须有“自知之明”，不可与头号人物抢镜头，还要善于把自己的主意说成是总书记的意思，至少不要坚持是自己的主意。可哪里去找这样的候选人呢？有这些缺点的人在党内大有人在，但具备这些优点的人却寥寥无几。

确实是个问题。有个解决办法，但是要冒风险。戈尔巴乔夫可以从政治局委员中选拔一个，由他们去你争我夺吧！过去的经验表明，这种做法可以使第二把手很忙活一阵子，而且要依赖总书记的支持。这样任何人不可能捣鬼，但风险也有：政治局委员们也可能因此团结起来。

候选人的物色就这样开始了，由戈尔巴乔夫亲自负责，他也尽量不透露自己的选择。政治局委员的调整方案也同样保密，去留的标准依据久经考验的原则：必须是自己人，决不与他唱对台戏的人。

要组成一个班子，搞这种幕后活动可能是唯一的办法。而由于它是秘密活动，难免引起人们的非议。难道正常选举不成吗？大家都看到谁有领导才能，把他们选上就是啦！当然，这种逻辑只有从未担任过领导的人才想得到。

那时已是春天，离党的代表大会越来越近。戈尔巴乔夫对会议的结果忧心忡忡，常常到沃伦斯科耶、后来则到新奥卡廖沃（离他的住所更近）去看望正紧张工作的报告起草组。起草组不常去扎维多沃，那里太远，环境也不好。我可以看得出，他们一个个非常疲倦，无精打采。他们觉得自己在为历史填写空话，而不是实绩。过去的五年基本上是个空白，希望落空，幻想破灭，生活水平下降，人民怨声载道。给总统的来信表明，共产党员成了牺牲品，即使在高炉旁和田野里

辛勤劳作的工农党员也未能幸免。

党的 28 次代表大会于 1990 年 7 月 2 日开幕。戈尔巴乔夫在主席台宣布：共选出 4683 名代表，4657 名出席，26 名缺席。会议接着选举主席团，即刻出现争议。来自马加丹的一名矿工建议：党的一切权力应交给大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应该辞职，他们之中任何人都不能选入大会执行机构，因为他们未能贯彻 27 大的决议。他还要求对每个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作出评估。

为使辩论气氛缓和下来，戈尔巴乔夫耍弄手腕，答应以后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后来他根本不再提起。不过当时会场确实平静下来。接着选出无实际作用的大会主席团，成员很少，其它执行机构也得以通过。大会本应按议程进行下去，然而发言者提出了众多挑衅性问题。两个半小时过后，代表们的情绪才平定下来。于是戈尔巴乔夫开始作主报告。

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极力给人以乐观和满怀希望的印象。他强调党选择的道路是明智的，也是唯一的选择。然而报告越往后，会场的气氛越紧张。报告充满着人们熟悉的字眼，如“社会主义的选择”、“共产党人的角度”、“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利益的反映”等。他还阐述了党所遵循的其它一些原则。总书记本人相信自己的话吗？或者，他的所作所为（或无所作为）是对已改变了的形势的对策吗？即使熟悉他的人也分辨不出他何时真诚，何时撒谎。

27 大时，戈尔巴乔夫曾声称，私有制的理论是错误的，党根本不予考虑；而今他在 28 大上却说，所有制必须多种多样，才能发挥经济刺激的作用。“市场”一词以前他用起来小心谨慎，今天都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当然，问题并不在于他改变了立场，而在于他应该向党和国民说明改变的原因。戈

尔巴乔夫旧时用的口号早已被抛弃，或被新口号所代替，可人们今天还在喊。人们开始怀疑，总书记和政治局是不是还在管事，他们是不是根据外界批评而忽左忽右。我记得我与在《真理报》工作期间结识的一位边疆区党委书记的一次谈话。他说：“你们当领导的为什么总下不了决心？你们的理论总是变来变去，我们跟不上。我常去工厂和农庄宣讲形势，告诉他们社会主义原则不容动摇。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你们又有了一套新理论。然后我又得去向工人农民解释。他们提醒我，三个月之前我说的可是另一套。他们想知道，我自己有没有脑子。我当然有。我的感觉是：我们选出的那些领导人就像风向标一样。为什么你们不能一开始就有一个准主意，然后明确告诉大家？你们不要以为内地的老百姓都是傻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一切都看在眼里，只是到目前为止还保持沉默罢了。”

大会坚持要听领导人述职，戈尔巴乔夫只好同意。首先发言的是雷日科夫。接着是梅德韦杰夫，人们一直批评他破坏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他却声称他接管这个部门时这种意识形态就已经崩溃。随后发言的是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扎伊科夫、利加乔夫，然后是政治局其他委员。代表们对他们的述职不满意，要求领导人承认错误、悔过自新。党代会开得和人民代表会议很相似，代表们争着发言，发言来则斩钉截铁。是不是因为这种举动时髦？是不是西方民主国家的代表也这样表达自己的意见呢？另一种解释可能是：代表们大喊大叫是在发泄。空话、套话他们听得太多了；而实际行动呢？苍白无力，甚至无所作为。

代表大会日复一日，天天如此。政治局委员意识到，这是他们参加的最后一次党代会了，既感到气愤，又漠然视之。

在政治局委员的休息室，人们可以看到各种情绪的表演：怀疑、绝望、愤怒、好战。戈尔巴乔夫越来越焦虑。他不时走进休息室，接受电视台的采访，或与代表们交谈，如同人民代表大会期间那样。代表们挤过来，想在电视上露个面。戈尔巴乔夫也想突然出现在代表中间，但代表们并不聚集在他的周围。人们见到他并不从椅子上站起来，没有人主动接近他。这使他很伤心。

戈尔巴乔夫的自信心和精力不断下降，有时看来他已厌倦这一切，后悔承担起这样沉重的负担。人们一直指责他和中央委员会缩手缩脚。当批评触及到他的疼处，例如人们要求他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国内事务而不是出访外国上时，他本来还算坚强的承受力也会支持不住。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使用最侮辱人的语言向提此建议的发言人回击，事后很长时间他还怒气未消。但作为建议人的阿尔泰边疆区委书记并没有被吓倒，而是重申自己的立场。

大会进入最后阶段——选举总书记及其副手。从一开始，代表们就表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例如：应该让总书记完成改革，一身兼两职是不适当的，也是不可能的；总书记不关心党的事务；如果最高苏维埃不允许身兼两职怎么办？但戈尔巴乔夫决心已定。众多的其他候选人都撤出竞选，只剩下克麦罗沃州基谢廖夫市委第一书记 T·阿瓦利阿尼。他奋斗到这个地步很不容易，面临与戈尔巴乔夫竞选并不畏缩。他只得到 500 多张选票，这不足为奇；值得奇怪的是：4538 名代表中，有 1116 人给戈尔巴乔夫投了反对票。苏共第 17 次党代会时，只有很少几个不安分守己的代表莽撞地给斯大林投了反对票。按有些人的说法，斯大林因此几乎将所有代表斩尽杀绝。而这次反对票多得多。在 1990 年，这种结果意味

深长，它是戈尔巴乔夫道义上的一次大失败，因为1/4的代表对他投下不信任票。戈尔巴乔夫内心十分震动。当然他并没有设想一帆风顺，但一开始就受到这样一次政治上的沉重打击，确实令人震惊。

前面还有一次考验——选举副总书记。除预定的候选人伊瓦什科外，利加乔夫也被提名。在提名审核听证会上，两人都顺利通过，不过利加乔夫被严词审问，看来选举时会遇到麻烦。结果未出人意料，伊瓦什科当选副总书记，对利加乔夫投反对票的有3642人，投赞成票的只有776人。

我碰巧目睹了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最后一次在一起的场面。当时选举后戈尔巴乔夫正从会议室出来，在克里姆林宫的圣乔治大厅和大会堂之间的过道上与利加乔夫意外地狭路相逢。开始他觉得很尴尬，然后出人意料地说：“我投了你的反对票，叶戈尔。”对此，利加乔夫回答道：“可是我在选举总书记时投了您的赞成票，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

于是两人分手了，永远地分手了。我清楚地记得1985年春天戈尔巴乔夫竞选总书记时利加乔夫帮的大忙。当时他管党的干部，为了使戈尔巴乔夫在那一年召开的中央非常全会上当选，他给几十名中央委员以及州和边疆区党委书记做工作，要他们支持戈尔巴乔夫。时隔五年，两人的思想、性格和原则都越来越不同。戈尔巴乔夫善于抛弃旧朋老友。我想他从来没有挚友，至少在莫斯科是这样。对此更有发言权的是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而他们也纳闷：为什么总书记不愿意与人为友？有一位英国政治家曾经说过：英国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或许戈尔巴乔夫按此哲学行事。

有一次在与赖莎打电话交谈时，我觉得这是个适当机会，

便提起此事。赖莎总是很想知道普通人（以及不很普通的人）对她们家是怎样想的。我对她说，党的领袖不能以正常的、民主的方式与同事相处，不能与他们讨论日常事务，这实为了一件憾事。她听了当然不高兴，当即挂上电话。五分钟后，她又打电话来说：“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每年元旦前后带夫人聚会一次。难道你不知道吗？”

是的，我知道。不过，首先，这种聚会每年只举行一次；第二，书记们对我说过，这种聚会很死板、正规，像政治局开会一样，只不过加上了夫人和香槟酒。很多委员和书记在这种气氛中都感到压抑，想方设法避开。

但是，反复敲打终会有回声。第二天，戈尔巴乔夫要我把他的助理和顾问及其夫人列一名单。他本想办一个什么聚会，可后来又改变主意，或许因为要请的人太多。实际上，问题不在于举办什么社交聚会，更不是豪华宴会；问题在于总书记和自己的同事之间缺乏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和相互尊敬。世道艰难，助手们又为他这样卖力地干，很需要给一点温情和鼓励，哪怕一点关心也好。我一直认为，单是金钱决不能促使人们承担这样繁重的工作，何况我们的工薪少得可怜呢！他们勇挑重担，是因为他们有崇高的信念。因此，助手们看到戈尔巴乔夫待他们如奴隶，倍感伤心。有些政治局委员和助理几个月都见不到他的面，不能当面反映情况，只好给他写信。戈尔巴乔夫对同事们提出的问题往往觉得不屑回答。

政治权力之争超越人的正常感情吗？难道还有人让权力迷住心窍，其它都无所谓、甚至等于不存在吗？

28大选举中央委员会的艰难过程结束后，紧接着召开中央全会，选举政治局和书记处。由于大会的组织者忘记了总书记不但要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而且还要被选入政治局，所

以戈尔巴乔夫还要再一次参加选举。雷日科夫、利加乔夫、梅德维杰夫、雅科夫列夫、扎伊科夫、斯柳尼科夫等原高级官员都没有被选入党的新一届最高领导机构，代替他们的是一批带有这样那样优点和缺点的新人。新一届政治局包括所有加盟共和国的第一书记。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也进行了大调整，留任的上届委员仅占 20% 左右。

大会进行期间，有一次我走进戈尔巴乔夫单独办公的小房间，发现他在紧张地准备中央委员会的名单。这件事如今他不再委托别人去干，也不好与本届政治局委员磋商，因为他知道，绝大部分委员即将离开政治舞台。他也不与拉祖莫夫斯基商量，后者前不久正式向他辞职，理由是健康不佳。不管怎么说，他不喜欢拉祖莫夫斯基，和利加乔夫讨论自然更无可能。

戈尔巴乔夫坐在小屋里，只身孤影，草拟一份党中央委员会的名单。这个机构几十年以来在苏联的权威是独一无二的。我翻翻放在桌子上的草稿，意识到自己正在目击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悲剧。这些委员之间不久就表现出不妥协的敌视态度，党中央不再是过去那种坚如磐石的组织，而成为各派势力代表的大杂烩。党不再是强有力的党。

第八章 苏联解体

1990年3月15日上午，人民代表成群结队地从俄罗斯大饭店和莫斯科大饭店走向克里姆林宫。上午10时，他们将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厅开会，宣布头一天晚上选举苏联总统的结果。会议大厅挤满了人，不仅包括人民代表，而且有众多的来宾：政府各部的部长和工作人员，几十个国家的外交人员，还有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与摄影师。

人们激动嘈杂。计票委员会的工作未能保密，投票结果在代表中间悄悄传开。但经验告诉人们，最好不要匆忙下结论，而要等待正式宣布。

铃声响起，召唤代表各就各位。我作为北奥塞吉亚的一名代表落座。几分钟之前，我曾在会议厅周围漫步，也曾去过主席团集中的房间。政治局委员们已在那里得知投票结果。看上去戈尔巴乔夫是在天亮时知道的。他一夜未眠，十分疲倦，但显然为此结果而高兴，笑容可掬地接受大家祝贺，又召集助理们到一旁，要他们准备就职演说。对他本人，对国家，这都是一个新的程序。但助理们都熟悉美国的作法，因此不感到很困难。其实他们已经准备下一个草稿。总之，就

职演说不成问题。

主席团委员就座后，计票委员会主席开始发言。会议厅一片寂静，只听得见空调的嗡嗡声。他宣布，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以 1834 票（共 2486 人投票）当选为苏联第一任总统。此时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向新的国家元首致敬。宣誓就职仪式后来在 5 月 28 日举行。戈尔巴乔夫将手放在《苏联宪法》上，宣誓他将恪守宪法规定，维护宪法精神。

苏联第一任总统就是这样产生的，而仅仅 18 个月后，它又有了十几个总统。

总统的办公机构

第二天，戈尔巴乔夫把我叫去，只研究一个问题：总统需要一个合适的办公机构。此事我们以前就讨论过，当时因为他集中全力竞选总统，机构之事只是粗线条地议论过。这一次我们研究了若干具体方案。没有人了解他需要什么样的机构。其实他作为党的总书记，手下已有一个十分健全的行政机构。当着我的面，他先与助手、然后又和克留奇科夫与卢基扬诺夫联系，要他们提出总统机构组成方案。“你也写写你的意见，”他对我说，“记住，机构必须精干。”

说起来容易，但在考虑它的结构和规模之前，必须首先弄清部长会议是否继续存在。此前戈尔巴乔夫曾暗示，他不需要一个拥有这么多部长和工作人员的政府。我重提此事时，总统却未正面回答。“你先考虑一下，”他说，“我们以后再研

究。”

克鲁奇科夫、卢基扬诺夫和沙赫纳扎罗夫每人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过了一会儿，戈尔巴乔夫把我叫去，把这些方案交给我。他已看过这些建议，认为它们在很多方面不一致，很难由此产生一个小型机构。戈尔巴乔夫也一直在考虑自己的方案。他在办公室踱来踱去，口中念念有词：“我们需要五六名部长，最多不超过八个。它们是能源、国防、交通、经济、财政，还有一些吧——我们得解决这个问题。其它工作则交给地方，交给加盟共和国，剩下的中央政府部门则要裁减和改组。目前这种部长会议我们不要。总统领导一切，一个以总理为首的内阁负责处理日常经济管理工作。副职要精减，总统和总理使用同一管理机构和技术服务部门。”

就这样，总统探讨着行政机构，提出几名高层职务的人选。不过，我觉得，他对此问题的考虑还是探讨性的。不对地方政府改组而只是改变中央的政府结构是很困难的。举例说，他将拿核工业与核电站怎么办呢？又得要外交部长，又得要外贸部长。谁来管银行呢？我建议新政府或其主要官员应该拿出管理经济的统一机构的方案，戈尔巴乔夫表示同意。他说：“总统机构还应包括为内阁服务的部门。”

十天之后，我提交了一份关于总统机构的框架。那时对政府的确切性质还不甚了解，因为这方面的方案还没有出台。我把总统机构的各个部门及其各自地位与相互关系在一张纸上画了个大表。戈尔巴乔夫对照说明审阅一番，然后说自己再研究研究。几天后，他把表和其它文件还我，并附有自己的建议，如哪些部门合并，哪些部门自治，还增设一个机构，帮助他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处理事务，他建议设立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及其办公机构，监管武装部队、军工生产、内

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后来他任命巴克拉诺夫担任此职。

我对自己的方案又进行修改，然后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他把我召到克里姆林宫。当时竞选俄罗斯苏维埃联盟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正搞得如火如荼。主要候选人是鲍里斯·叶利钦。老的敌意和偏见把代表分为两派。党决定支持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弗拉索夫。两轮投票后，对他的支持率不高，于是党决定转而支持另一名竞选者——新组建的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伊凡·普罗兹科夫。

然后戈尔巴乔夫采取前所未有的举动——他前去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发表演说，直截了当地支持普罗兹科夫，并且坐镇会场，直到选举结束。作为苏联总统，不论在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之前或之后，他都没有再去过俄人民代表大会。只有一次例外，1991年8月事变后他去过一次，而当时身份已大不相同，坐在那里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然而在1990年，正值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选举之时，座位问题却至关重要。有必要专门为此事召开会议予以研究，卢基扬诺夫作为专家也应邀出席。会议决定戈尔巴乔夫不能坐在前排。有人建议他坐在会议主持者上面三四排的主席团位置。这个意见也被否定，因为戈尔巴乔夫决心带着苏联总统的旗出席会议。

国旗和其它总统标志是戈尔巴乔夫建议采用的，他可能看到美国总统无论走到哪里，国旗总跟在身旁；也可能是助理出的主意。不管是什么原因，他指示把国旗放在身边，国徽涂在总统专机上。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保安人员贯彻他的旨意。此后，配有特制旗座的小红旗出现在总统办公室、会议室和总统去的其它地方。

在决定他出席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时应坐在什么位置那天，国旗问题甚为重要。既然会议厅和主席团均无可能，于是有人建议他坐在二楼楼厢座里，这样总统和国旗都比较醒目。他虽偏于一侧，但肯定是在代表之上。基本想法是：他的在场对党支持的候选人的拥护者是个鼓舞。也可能是总统和国旗都不够醒目，不管怎么说，他在大会的突然出现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普罗兹科夫没有当选。

总统机构的设计方面却有些进展。一天，戈尔巴乔夫邀我去克里姆林宫。在楼台上，他拿出总统机关的框架结构。我们仔细研究，予以增删改变，使它们直接隶属于总统，最后总算通过了机构的规模并安排好组成程序。各部门的主管和他的助理均由总统本人指定，并隶属于总统。他要我提出建议并负责这些机构。

我们必须成立各种部门，服务于高层领导——苏联总统、副总统、安全委员会、国防委员会、以及戈尔巴乔夫和亚纳耶夫的助理、顾问班子。办事班子按过去的标准大大增加。到末期，仅总统办公室就包括梅德维杰夫、列文科、阿赫罗梅耶夫、扎格拉金、叶戈罗夫、卡拉肖夫、伊格纳坚科、奥热列利耶夫、切尔尼亚耶夫和沙赫纳扎罗夫，还有普里亚欣、古先科夫和其他一些助理。同美国一样，总统的助理班子还有自己的服务人员，如助手、顾问、秘书、以及打字复印员等。总统还可以直接任命一大批临时顾问，其中有阿巴尔金、西塔良、奥西皮扬和其他一些知名的院士、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

由戈尔巴乔夫亲自设计的总统办事机构根据实际情况不可避免地要作些变动。我们已经看到，隶属于总统的内阁一开始计划只有五六个部长，最多八个。但设想是设想，现实

归现实。我惊奇地发现一个有自治权的政府正在形成，其规模与原部长会议不相上下，像细胞繁殖一样，很快发展成一个强大的管理机构。根据部长会议主席帕夫洛夫和所有部长的意见，戈尔巴乔夫提出建议，并得到最高苏维埃的批准，建立起一系列的新部委，以致新内阁与老部长会议很难区分。

设立一个精干的办事机构和相关部门的想法实际已被摒弃。内阁各部共有 2000 人，为其办事的行政和技术人员可达 1.6 万人。到 1991 年 8 月时，苏联总统办事机构包括技术人员在内只有不到 400 人，进一步合并精简实无可能。戈尔巴乔夫签署命令，准备建立一个联合机构，但没有人理会。他对此很清楚，于是对我说：“听着，你和帕夫洛夫找出个解决办法。为什么凡事我都亲自去做？你们不能自己拿主意吗？”

我能决定什么呢？如果苏联总统有关重大事项的法令都不能得以贯彻，又怎么能够就精简机构“拿出解决办法”呢？戈尔巴乔夫看到内阁部长们对这个问题不予理会，但什么也没有说。或许是劳累，或许是其它什么原因，总之戈尔巴乔夫有时不能坚持原则，不敢说“不”，对来自有影响人士的请求更是如此。关于经互会办公楼如何使用的问题就上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伊凡·西拉耶夫要求总统允许他接管办公楼，理由是俄罗斯联邦的部委及其服务机构需要地方，经互会的办公楼又离俄罗斯白宫不远。戈尔巴乔夫指示帕夫洛夫答应这个要求。不久，卢基扬诺夫发来便函，声言人民代表办公的地方太小，要求把经互会大楼转交苏联最高苏维埃。总统作出的反应是，指示帕夫洛夫认真考虑卢基扬诺夫的要求。后来莫斯科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也要求，把办公楼归莫斯科市委。最后提出这一要求的是叶利钦。戈尔

巴乔夫都下达了类似指示。他就是这样对待很多问题，包括实质性问题。

从党的总书记到苏联总统的过渡并不顺利。他的管理风格，加上他多年作为斯塔夫罗波尔区和中央书记所养成的很多方式和习惯，都随之来到总统办公室。他需要一个类似于政治局的机构，依此来发表演说，下达命令，考虑值得注意的事务，尤其是国家事物的立法问题。这个想法表面上是由雅科夫列夫建议的，但它像一颗种子落入沃土一样，很快生根发芽，结出了总统委员会之果。这个新机构包括政府代表和知名人士——钦吉兹·艾特玛托夫、尼古拉·雷日科夫、V·亚林、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瓦连京·拉斯普京、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瓦·梅德维杰夫，还有几个，包括我。

设立总统委员会是个好主意，但不太成熟。苏联宪法无此规定，其规模和组成都由总统决定。它的职能也没有明确。它召开过六七次会议，研究各种现实问题，包括军工转产和经济事务。其成员的素质和身份都不足以对付手头的棘手问题。其实，事到如今，对戈尔巴乔夫提出任何忠告都是徒劳的，因为他根本不需要忠告。因此，总统委员会的会议非常不正规，组织得很乱。总统觉得召集委员会是个负担，是烦人之事，尤其是委员们就国内形势发表意见的会议。因为那时候委员们会觉得自己还有用处，就尽情评议，并提出各自的解决方案。

他们所讲的使戈尔巴乔夫大吃一惊。亚林、拉斯普京和其他一些委员说，他们发现人们已经厌烦了试验、犹豫和空谈。对他们之中大部分人来说，“改革”一词使人恶心。他们觉得，一个好端端的事业付之于东流，变成了垃圾。我看到戈尔巴乔夫脸色发青，知道要有麻烦了。尽管其他委员还没

来及发言，他便宣布休会，而何时继续开会却遥遥无期。

戈尔巴乔夫神经质地在他办公室踱来踱去。他说：“简直是一堆垃圾！而他们还是我信任的人，从各处搜罗而来。尤其是亚林！至于瓦连京·拉斯普京，他嘴里还会吐出象牙来？”

这等于宣判了总统委员会死刑。1990年11月，委员会在成立8个月后宣布解散，其原因可以有多种解释。戈尔巴乔夫或许感到它无用，或许对其委员不满意，或者由于最高苏维埃的批评而下的决心。因为苏维埃代表把总统委员会看作愚蠢和惰性之源。最后决定来得十分突然，委员会成员事前都没有得到通知。我知道这种高压手段使他们之中很多人感到不满。

总统委员会的解散对雅科夫列夫来说是个沉重打击。“我们被罢官，这件事你事先知道吗？”他说。我慢慢地摇摇头，对整个这件事我和他同样不安。“好哇，上帝的秘密之手在行动啊！”

不久，雅科夫列夫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一次交谈。戈尔巴乔夫试图平息他的不满，答应他福利待遇不变，并许愿由他担任新成立的总统顾问组组长。同雅科夫列夫一样，原任政治局委员和总统委员会委员的梅德维杰夫也成为顾问组一员。要他隶属于雅科夫列夫自然不可能，因此两人都被封为高级顾问。我从普列汉诺夫那里得知，戈尔巴乔夫没有保持他们原来的交通待遇。薪金一事也是这样。如果有些顾问比另一些顾问钱拿的多，他们就会不理解，只能导致新的矛盾和冲突。

人们了解到苏联总统不是一个守信之人，十分痛心。雅科夫列夫对交给自己的繁重工作认真对待，但发现戈尔巴乔夫不再信任他。当《真理报》和其它报纸批评他时，戈尔巴

乔夫也不为他说话。他终于下定决心辞去高级顾问职务。1991年春，他向戈尔巴乔夫递交了辞呈。

后来戈尔巴乔夫对我说：“亚历山大到我这里来，交上辞职报告，并详细写明辞职原因。我劝他三思而行，不要仓促行事。你把这个报告拿去，但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6月初，雅科夫列夫在瓦尔达休假期间，又给戈尔巴乔夫递交上第二份辞职书。这一次戈尔巴乔夫批示同意。

对事态的这种发展，我感到不安，但并不奇怪。谢瓦尔德纳泽的辞职我没有预料到，但此后没有什么事再能使我吃惊了。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看人不准，他一面任用一些（显然不是有意）阿谀奉承、平庸无能、甚至阳奉阴违之辈，一面又不停地抱怨这些人的缺陷。在他的周围长期以来已形成一种不健康、不诚恳的气氛，对此他自己应负责任。他嫉妒他人的作为和成就，似乎不信任任何人。不过，人们并不是常常都能看穿他这种特性，所以起初总是受他诱惑。

疑 惑

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初期，很受院上、作家、记者和政治家的赞赏，有的是因为他比较年轻、又受过高等教育；有的则由于他有做党的工作的经验，是冉冉上升的新星。不管怎么说，他在知识分子中间很自如。知识分子这个阶层，不但要求改革，而且寻求一位能团结社会各进步力量的领袖。人们以诚恳无私的态度帮助他，把多年构思的建议提供给他，尽全力促进改革，使其成功。

当初，大部分人都相信，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形势会好起来，全社会将洋溢着自由和创造气氛。可是即使在初期，戈尔巴乔夫对前来帮助他的人也表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冷漠。他从不坦诚直言，使人感到他对别人的诚恳和信任怀有疑虑，结果是离心离德和得过且过，再加上总书记不讲策略，使他与周围的人之间形成一道屏障，很多人寻找借口一走了事。

我原来一直认为，他与卢基扬诺夫早在莫斯科大学就是同窗，这种关系应该使戈尔巴乔夫相信他的忠告和协助吧！其实不然。戈尔巴乔夫经常以轻蔑的口气谈起卢基扬诺夫的教授腔和居高临下的建议。“他总是喋喋不休地谈群众来信的批评意见和民意测验，企图吓唬我。”他生气地说，“实际上，苏联人民是我的后盾，他这样对我讲真是多管闲事！”

我不知道两人过去和现在关系的细节，不过我可以感觉得到戈尔巴乔夫对卢基扬诺夫的敌意。对卢基扬诺夫送来的材料（主要是最高苏维埃代表的意见和建议），他很多连看都不看就原封退回。他的有些讲话表明，他对卢基扬诺夫在最高苏维埃颇有威望十分反感；卢受教育程度比他高，卢的著作有更多的读者，这些事实也使他不快。而且他往往控制不住这种敌意。当然，卢基扬诺夫不是完人，他雄心勃勃，过于敏感，生性多疑；但他恪于职守，总书记的指示他都很好地完成。遗憾的是，这并不够。在1991年举行的第六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指责他参与当年8月事变并要求检察院立案调查。与会代表和电视前的观众都有印象。

前面已经提到，我曾推荐车尔尼亚耶夫任总书记在国际事务方面的助理。此人受过良好教育，能力很强。雅科夫列夫支持我的推荐，戈尔巴乔夫同意任用。车尔尼亚耶夫后来

的表现证明这是个明智的选择。戈尔巴乔夫考虑任何国际问题时，都叫他参加，还说在写作风格上，他是唯一与自己相似之人。休假时，戈尔巴乔夫把他带到福罗斯，要他准备书稿、文稿和政治文件。在他与戈尔巴乔夫共事的整个期间，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才干或其它素质。正因为如此，当有一次戈尔巴乔夫说车尔尼亚耶夫不可信任时，我大吃一惊。总书记怀疑他泄密，叫我限制车尔尼亚耶夫接触机密的范围。

更使我吃惊的是，戈尔巴乔夫说自己的助理伊格纳坚科接受新闻媒体的贿赂。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伊格纳坚科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多年，曾参与撰写多部著作，包括勃列日涅夫的《小地》和《复苏》。很多记者告诉我，他在《共青团真理报》工作期间，曾刊登过自己儿时的一幅照片，当时正在高加索作战的勃列日涅夫抱着他。他因主持拍摄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电视系列片而获列宁勋章。雅科夫列夫对他很了解，并把他推荐给戈尔巴乔夫。

“为什么有人要给他行贿呢？”我问道。

“为安排对我采访，”戈尔巴乔夫回答说，“每次他从记者手里收好几万美元。”语气中听不出惊奇或埋怨。

受贿使我吃惊，如此平静叙说受贿更使我吃惊。我的反应只能是接着问：谁能证实这一点？他答道：“此事已有一段时间。实际上，有一次我问过他，为什么来采访的记者都来自同一国家。我想他从此意识到我清楚他的底细。但是，我要对你说，我最信任的人是那些干活总得有些物质刺激的人。”我怀着惊恐和迷惘的心情离开总统办公室。原来如此！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竟相信受贿者，并不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有什么过错。

后来，克留奇科夫把一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备忘录给我

看，是关于伊格纳坚科退回的贿款和其它不端行为。戈尔巴乔夫有书面命令，要求调查，只是在最后时刻才取消。但总统要克留奇科夫继续调查。不管怎么说，他交待我不要给伊格纳坚科看任何文件。1991年8月后，伊被解除新闻发言人的职务而被任命为塔斯社社长。

戈尔巴乔夫也不信任沙赫纳扎罗夫。他常常抱怨说，中央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冲突的决策被泄露给在国外居住的亚美尼亚人，但他没有采取任何对策。只是当来自国外的绝密情报泄露给出席国家安全会议的人员时，戈尔巴乔夫才下令克留奇科夫进行调查。他同时下令，禁止他的助理和顾问参加以后的安全会议，会议讨论机密问题的范围也严加限制。

总统的助理班子规模很大，他又不全信任他们，这使气氛十分紧张。每个人都极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和特权；很多人还写备忘录，抱怨自己的才干未得到赏识。更糟糕的是，总统对人不信任开始向高层政府官员发展。戈尔巴乔夫对谢瓦尔德纳泽的某些行动不满，怀疑他自作主张，关心的只是抬高个人声望。戈尔巴乔夫也不再信任雅科夫列夫，他发现后者“耍自己的把戏”，常常把他支去莫斯科郊外的别墅准备文稿。

戈尔巴乔夫一旦感到某个高层政府官员（如部长会议主席、外交部长或高级军官）的威望在上升，便立即开始散布贬低他的言论。在报刊上或最高苏维埃对某一政界人士的批评自然意味着总统准备把此人手脚捆绑起来奉送给代表和新闻界。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怀疑大部分同事不忠诚、贪婪、想要推翻他。这方面很有些趣闻轶事。戈尔巴乔夫在郊区别墅时不愿意别人给他打电话，只有克留奇科夫、亚佐夫、

普戈和伊瓦什科例外。可另一方面，他却常常给我来电话，有时似乎忘记了我们仅在15分钟之前还议论过此事，有时打电话则无话找话。“你这会儿在哪儿？”他会问。听到我的回答后，他又会说：“好吧，过一会儿我再打。”

他对其他人也这样打电话。我觉得他这是在核查我们，这种习惯表明他不信任任何人。我的这种想法很快得到证实。

1990年夏末，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休假期间，有一天上午11时左右突然打电话给我。从他讲话的内容和口气来看，他在为什么事非常激动不安。“你知道雅科夫列夫这会儿在什么地方吗？”我回答说不知道，因为那天是星期六，我想他可能在自己的别墅。“不，不！”他叫道，“我往那里打过电话，他不在。巴卡京呢？你总该知道他在哪里！”在我看来，人们在夏日周末或许在别墅，或许去树林，或许去河里游泳。“同往常一样，你什么都不知道。”他训斥说，“总参谋长莫伊谢耶夫也不在他该在的地方。”听他的口气像是演一场悲剧，“他们告诉我，这些人都去打猎了。你发现什么情况马上告诉我。”他挂上电话。

这次电话交谈使人内心深处既不安又不满。某人去林间散步，或去钓鱼，他为什么大惊小怪？他自己在海边休假又怎么得知每个人的行踪呢？显然，有些人在监视另一些人的行动，然后向他报告。

约40分钟后，电话又响了，又是戈尔巴乔夫。他说，总算和他们的小汽车联系上了。他们在梁赞州某处森林里，但只有司机在，其他人都下车去什么地方了。司机正在寻找他们。“他们怎么凑在一起啦？到底想干什么？”他不安地问。我小心翼翼地说，他们可能在采蘑菇。“你是什么意思？要知道，其中还有几位将军呢，肯定在搞什么名堂。”

我平静的心情被打乱了。我估计他会不停地来电话，很长时间我得守在电话旁边。但下一个电话直到深夜才来，他的口气平静一些了。他说，他已与米哈伊尔·莫伊谢耶夫通过话，对方解释说，他去狩猎区打猎，在那里偶然碰到巴卡京（内务部长）和雅科夫列夫。“我还没有和亚历山大联系上，他们说 he 去了森林。我肯定事情并不这么简单，想不到他会这样。”他最后说。

我并不特别信赖瓦季姆·巴卡京。看到他在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哗众取宠的演说，我很惊奇。戈尔巴乔夫极力鼓励他竞选俄罗斯总统。“他不会超过雷日科夫，”戈尔巴乔夫说，“不过他还是有用的，他可以吸引一些选票。我们将全力协助雷日科夫。”

这种核查活动相当频繁，他与雅科夫列夫、巴卡京、谢瓦尔德纳泽的关系越恶化，对他们行动的监视就越严密。他常说：“看来亚历山大决心当上最高领导，他还想干什么呢？”

两人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雅科夫列夫越来越想辞职。一场名副其实的瘟疫在总统班底内传开，结果失去两名院士：彼得拉科夫和沙塔林，还有谢瓦尔德纳泽。雷日科夫和利加乔夫已经走了。班底中的中央委员大大减少。另一助理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也告老还乡。

这位忠实的、爱国的老战士发现自己处于悲剧的地位，终于作出这一抉择。他参加过卫国战争，为人民、为祖国立下不朽功勋，因此取得军界最高荣誉和地位。在冷战最严酷的年代，由于他的努力，苏联确保了军事上的均势，国泰民安。尽管如此，他被指控把一台公家的冰箱（或是别的什么电器）放在自己的别墅里。在报纸上读到、或在人民代表的发言里听到这位元帅“滥用职权”，再想想那些小人居然没有勇

气为他辩护几句，真叫人伤心！实际上没有人站起来说：“我们大家都应该感谢这个人，他为我们在前线打过仗。我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他一直在不倦地为我们工作，战争时期、和平时期都是这样。人民代表如果对他采取什么行动的话，那只应该是赠给他一套全副装备的别墅啊！”

戈尔巴乔夫身为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国防委员会主席和苏联总统，却不为自己的同事说话。而由于他的无动于衷，致使这位在世界上都名声显赫的元帅任人嘲弄。我陪同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访美期间，可以看得出美国军方和罗纳德·里根对他和对戈尔巴乔夫一样的尊敬。即使在他成为苏军总参谋长之前人们对他就十分崇敬。如今他却身陷流氓之中任人践踏。总统这种背叛行为不能不给这位杰出的老战士的心灵留下创伤。在他逝世之后，各种指控堆到他的身上，这无疑也是苏联领导人不光彩的行为所致。他们谁都不愿出面给他应有的评价。正是这位军人，为加强国防竭尽全力，而后当形势需要时又积极裁军。

1991年8月事件的前两个月，阿赫罗梅耶夫向总统递交了辞呈。他毫不讳言地抱怨自己不被尊重和公众针对军队的不端行为。他认为，苏联的裁军措施考虑不周，仓促出台，尤其是单方面的。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他说他无权再留任总统身边这一职务，不愿参与苏联军队和国家的解体。戈尔巴乔夫颇感意外，他要求元帅暂时不要考虑辞职。开始时他把阿赫罗梅耶夫拉上，是想利用他的名望，来掩饰当时苏联向美国所作的让步（其中有些是必要的）。对这一动机他并不讳言。“你知道我为什么需要他吗？”戈尔巴乔夫坦率地说，“只要他和我在一起，裁军问题就好办。军队和军工界依赖他，他在西方也受到尊敬。”

苏联元帅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与世长辞了，他没有背叛自己的原则，也没有违背军人的誓言，再没有出卖戎马征程上的战友。由于他的工作，苏军更强大，官兵们都培养起对祖国的无限忠诚。

戈尔巴乔夫班底的成员早就失去创造精神，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我的工作一向刻板繁杂，以前只觉得烦人，而今使人感到很受压抑。由于种种原因，戈尔巴乔夫在位最后两年里日见疲惫，经常发火。我感到光阴荏苒，体质下降。每天工作14小时，没有星期天，没有休假，身心都紧张过度。改革已经搁浅许久，高层领导却热衷于勾心斗角。我开始认真考虑回去搞新闻老本行。即使在作为人微言轻的总统助理工作期间，我也抽时间从事书籍工作，整理稀有版本，组织力量进行装订。我等待适当时机再递上辞呈，尽管我知道反应会是冷漠的，但总得采取措施。我只能向一个人讨教，他就是列昂尼德·伊里奇。他是科学院院士、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谢瓦尔德纳泽和党的很多高级官员都很推崇他。60年代初，命运把我俩安排在一起。当时他是党中央书记处书记，我在《真理报》干着自己喜爱的工作。突然我被告之调到中央，任伊里奇的助理，不管本人愿意不愿意。我和他一起工作好几年，然后回到《真理报》。这次我去找他，他深表同意。他对我说，他自己本来也很喜欢干记者这一行，不得已才步入政界。他劝我不要灰心，要笔耕不辍。

伊里奇可能是对的，但即使如此，我越来越感到自己与周围环境不协调。1985年戈尔巴乔夫开始进行激进改革时的同事如今所剩无几。有的被他撵走，有的自动出走，只剩下我还陷在这里。这种日子越来越没有意思。

戈尔巴乔夫自己承认，他只信任两个人：亚佐夫和克留

奇科夫。他与这两人每天电话交谈多次，还经常面谈。他们常常向他汇报国内和军内的形势，政治发展趋势，他们已经采取和建议采取的行动。戈尔巴乔夫掌握所有情况，每天都看几百页的各种信息，或浏览，或细读。他要我与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保持经常接触，与他们磋商，尽力协助他们。总统一方面本人与他们经常联系，另一方面还派人请他们参与文件的起草工作。开始我没有在意，后来才意识到，不管他是否真信任他们，他这是在两面下注，通过第三者来解决某些敏感问题。

克留奇科夫、亚佐夫，或许还有内务部长普戈都是戈尔巴乔夫的支柱。直到后来，他们清楚地看到，国家、军队和整个社会都在走向毁灭，苏联可能分裂，导致民族冲突、经济崩溃、人民流离失所。我国的反间谍人员已从西方情报机构截获情报，表明他们正在策划苏联的垮台，并准备采取必要步骤将苏联这个大国彻底消灭。

在一次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决定取消总统委员会，成立安全委员会。安全委员会的成立有宪法根据，它包括巴卡京、克留奇科夫、帕夫洛夫、普戈、普里马科夫、亚佐夫和亚纳耶夫。就我所知，这些人都致力于改革，致力于苏联的强盛。他们协助戈尔巴乔夫解决难题，直到最后国家的崩溃、经济的混乱和流血迫在眉睫。此后他们便分道扬镳了。

巴卡京和普里马科夫在安全委员会中没有明确的分工，只是临时受命；其他成员各居要职，责任重大。委员会没有正式的规章，大家都不知道它该发挥什么作用，戈尔巴乔夫本人更是一无所知。开过几次会后，他便得出结论：它纯粹是额外负担，浪费时间。一个时期以来，他一直单独决策，决策的贯彻则直接交给第三者去办，不需要任何人提供咨询。他

向公众宣称的民主原则如今反倒成了障碍。对大部分国内外问题，总统已不再向安全委员会或政府高级官员通报；他与外国领导人或知名人士谈话的简报，也不再传阅。1991年8月1日安全委员会开过一次会，戈尔巴乔夫只就乔治·布什对莫斯科的访问简单说了几句，好像美国总统只是前来游览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漫步红场一样。他对这次访问如此敷衍地介绍后，委员们纷纷打电话或直接找我，问我是否了解更多的情况。访问的结果不但对安全委员会保密，对党的其他领导人更保密。

其实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访问。戈尔巴乔夫把他与乔治·布什的谈判情况只透露给极少数信得过的人。大部分时间是他们俩人间的单独对话，结束后一有机会他便离去。有一天午餐时，服务员还在上咖啡，戈尔巴乔夫从桌旁站起来说：“乔治，到我这边来一会儿。”

他们离开饭桌，走到楼下，仅有一名译员陪同，从后门走进克里姆林宫的伊凡诺夫广场，然后来到红场。他们之间已建立起一种相互信赖的关系。这种坦率的交谈始于戈尔巴乔夫访美期间，当时布什曾陪同他环城漫步。戈尔巴乔夫当时就意识到，里根的任期将满，他应该与其继任搞好关系，而时任副总统的布什很有可能继任。戈尔巴乔夫对随从也常提到这一点。

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同车从苏驻美使馆前往白宫时，两人有番密谈。据事后戈尔巴乔夫说，谈话是关于苏联改革未来阶段的框架。他没有讲框架的具体内容，但我注意到，他不止一次通过自己在华盛顿的密使转告布什说：“我们在车中达成的协议依然有效，我将确保协议得以贯彻。”看来在那次访美期间，戈尔巴乔夫作了某种承诺，而后便定期向布什通报

履行承诺的情况。

戈尔巴乔夫与布什之间密切的私人关系增强了他回国后推行改革的信心。而美国政界与企业界的领导人则更注重实际，他们喜欢给这位苏联领导人现金奖赏，而答应给苏联的贷款却迟迟不到位，使我们没有机会缓解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我肯定戈尔巴乔夫知道这些事，也明白友好关系与经济往来是两码事。西方不愿意、实际上也不能够为一种根基不稳、摇摆不定的政治路线支付费用。

戈尔巴乔夫从未向苏联领导人与最高苏维埃详细说明过他与布什的谈判结果以及作出的承诺。我们已经看到，总统委员会从未被重视，也不定期开会，开会通常也只讨论临时性的小问题。什么问题呢？1991年4月开过一次会，委员们听取了联邦委员会工作的介绍，然后讨论了各加盟共和国对全苏财政承担义务的履行情况。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怀疑自己在经济上吃了亏，因此都各行其事。委员们对他们管理经济不力和在联邦委员会上的某些不妥言论提出批评，并讨论了改进的办法。4月30日，总统委员会研究了格鲁吉亚地震问题及赈灾措施。考虑到全国范围内的罢工现象，委员会还讨论了总统是否颁布法令对经济领域的某些方面实行紧急管制的问题。

在1991年5月8日的会议上，委员会讨论了苏联是否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问题。7月1日在亚纳耶夫的主持下，委员们研究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形势。总统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在8月召开的，研究布什总统的来访和正在新奥卡廖沃市郊举行的关于一项新的联盟条约的谈判进展情况，还议论了农工联合体问题以及收获季节之初的形势，不过没有作出决议。这些会议唯一的目的是

传达信息。实际上，在农业方面，即使部长会议也不能够作出任何有意义的决定，因为大权已掌握在加盟共和国手中，于是这个问题交由联邦委员会研究。

虽然总统委员会是根据宪法成立的，但它不能解决任何方面的实际问题。它的失败进一步说明国家危机的严重程度和政府无力恢复秩序。实际上，部长会议的决议也好，总统法令也好，都贯彻不下去。组成原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首脑经常在戈尔巴乔夫不参加的情况下开会，他当然不满意。共和国领导自行其事，实际上已把苏联总统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

可是戈尔巴乔夫直到最后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坚信，把党政大权集于一身，又有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力，他就可以对这样一个大国实施无条件的控制。实际上，他手上只有一条马鞭，而骏马早已脱缰而去，如今驾在别的什么车上了。遗憾的是，在1991年3月2日总统60寿辰之日，本为掌握这些信息而设立的政治机构却突然背弃了他。

戈尔巴乔夫的六十寿辰

在苏联，对大部分人——至少对工业、农业和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人来说，到60岁就该退休，申请养老金了。然而对政治家（包括戈尔巴乔夫）来说，60岁是成熟的开始。养老金不是为他准备的，尽管他体力已明显不如以前。他往往一句话重复好几遍，离开讨论的话题，忘记谁对谁说了些什么。经常犯剧烈的头痛和严重的高血压之类的老病。血压高最使

他不安，他担心这是遗传，很可能导致中风或其它问题。

1983年春，他突然说了一句话使我大吃一惊：“你知道吗？我快要死了。”他伤感地凝视着远方，情绪低沉而不能自拔。我问他什么事使他这样突发幻想，是不是医生说了什么不吉利的话。“我父亲死的时候就是我现在年龄，而且我现在的症状和他一模一样。”他回答说。

我很清楚，当时他还很健康，充满活力；至于血压高、动脉硬化或其它心血管病，几乎人人有之，特别是总坐在办公室而又贪食的人。他疑心特重。年轻时他常去热列兹诺沃斯克接受治疗，总是要医生查出他什么地方有毛病。他的胃口很好，如果节食，也是为了减肥。他每周两次节食，只吃家常乳酪，这是一种特制的带酸奶油的乳酪，24小时内不再吃别的。可是他坚持不下来，边喝咖啡边吃些点心、甜食、三明治、糖果、搅奶油冻和水果糖。很快吃完自己的一份之后，他便站起来，绕着大会议桌慢慢走一圈，不时停下来同别人交谈几句，顺手——也可能是完全无意识地——把别人剩下的东西塞进嘴里。他给我的印象是，他精心研制出的节食计划只是带来大吃大喝，使他越来越胖。

政治局会议开得很长的时候，除非总书记正在节食，否则他和其他委员就会饱餐一顿。他喜欢家常便饭，特别欣赏荞麦片和烧羊肉。早餐吃热面食，晚餐有时也这样。当然还有菜，他最喜欢肥猪肉拌大蒜瓣。

总书记的60岁生日是个值得庆贺的事件。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通常都要举行极为排场而热闹的庆祝活动，所有的头面人物都参加，当然还有朋友、同志、亲戚和熟人。只见金樽交错，共祝伟大英明的领袖万寿无疆，在建设新社会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传统的大吃大喝的同时，要授予

老寿星最高功勋章。戈尔巴乔夫的寿辰没有这样大操大办，甚至连最喜欢阿谀奉承的小人也没有说他伟大英明，更没有祝他在建设新社会的事业中取得新成就。由于总书记平时不爱接近人，他的同事和朋友少得可怜，而且互不熟识。

在这一时刻，给戈尔巴乔夫的最高奖赏并不多，溢美之辞更少得可怜。这一点我支持，我认为不需要豪华气派。起先，只举行了一次小型聚会，中央书记处书记和莫斯科州委、市委书记聚集在书记处会议室向戈尔巴乔夫祝贺生日。他们围桌坐了几分钟，听戈尔巴乔夫讲话。他以极其诚恳的口气谈到党在自己生活、在改革中的作用。这套话他编造得很巧妙，旨在使别人放松警惕。我发现自己有时还真相信他说的话。其实他言不由衷，或许他真地相信自己的话，如同他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一样。

聚会以香槟酒和留影结束，自始至终简单平淡。然而这里一结束，戈尔巴乔夫立即离开会议室前往克里姆林宫，那里还有个聚会，他将接受国家安全委员会、政府高级官员和最高苏维埃对他的生日祝贺。而在这里，只有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留了下来，他们和总书记在一起只呆了半小时，气氛又如此正规，无疑感情受到伤害。于是克鲁奇纳赶忙张罗着给他们上酒。

与此同时，在克里姆林宫，第二轮庆祝活动开始了。卢基扬诺夫发表感人至深的讲话，并向总统赠送礼物。然后是亚佐夫祝贺，礼物是一把军刀，刀鞘镶着图案，刀把是黄色金属的。普戈送给他一个盒子，里面是马卡罗夫式手枪，上面刻着字，还有一个装着子弹的弹夹。戈尔巴乔夫原来已有马卡罗夫式手枪，是镶金的，切布里科夫所赠。苏联总统全副武装、咄咄逼人，一支手枪放在办公室保险柜里。

巴卡京送给他一位什么诗人的大理石胸像，不久戈尔巴乔夫便原物送还。克留奇科夫和别的几个人把礼物直接送到总书记的别墅。国家机关、其它一些国家的元首和使馆也送来礼物。以上属于个人礼品。按戈尔巴乔夫的要求，中央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联名赠送一个精美的巴列克式手工漆盒，盒面上画着克里姆林宫。

下面就轮到总统的助理和顾问了。他们的祝愿充满溢美之辞。戈尔巴乔夫认为车尔尼亚耶夫和沙赫纳扎罗夫的祝辞特别热情和独出心裁，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上点名表扬。

每组致贺辞和传统的拥抱（经常带上接吻）之后，便退入隔壁房间，那里的大桌子上备有各种食品和饮料。有些人乘兴豪饮，掀起新一轮热潮；但很多人只是尝一尝便赶忙告辞，回去处理手头的紧急事务。官方的庆祝活动到此为止。戈尔巴乔夫只身回到别墅，没有邀请任何同事。实际上，我觉得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谁也没有去过他的别墅。他的一些下属，对刚才参加的生日聚会的正规和呆板很不理解，便聚集在克里姆林宫再喝上一杯。这一次气氛热烈，很多人按照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传统，谈起过去的艰难岁月。

新奥卡廖沃的死胡同

新奥卡廖沃是莫斯科市郊一个住宅区。在那里召开的“点子会议”（新闻界的这种称呼倒也合适）以及由此开始的协调前苏联的各自治共和国关系的过程将在我国历史上留下

自己的足迹。实际上，它的意义超过了我国的范围。它不能不成为中央政府投降的象征，一个大国崩溃的象征，民族冲突愈演愈烈的象征，并将以此载入世界历史，从而使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作为它的设计师而流芳百世。

会议给我们社会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其后果目前还难以预料。这些变革的法律依据是新的《联盟条约》。所以制订这个条约，是因为全国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决议和总统的法令越来越不在意。在应该首先遵守苏联宪法和苏联法律还是共和国宪法和共和国法律的问题上，长期以来存有分歧，结果是各共和国对中央政府的决议采取“合适的就执行，不合适的就不执行”的态度。他们不按定额向国家银行完税，并限制短缺食品的调出和驻军在其领土上的活动。

新《联盟条约》并不是政治方面的需要，而是经济崩溃的结果，是各地区在动乱时期往往闭关自守防止邻居掠夺的一种返祖欲望，后一种原因助长了民族主义情绪，导致流血冲突，这反过来又加剧了全国的离心倾向。经济崩溃，国内政策不力，中央政府无力实施已宣布的改革，也不能使社会各种力量联合起来。这种种因素促成了新《联盟条约》的产生。

大部分有识之士早就知道，各民族聚居区自我封闭的状态只能加剧苏联各民族的社会经济的困境。人们经常告戒说，单干没有出路，它只能使经济全面崩溃。但是，当雄心勃勃的政治领袖们准备甩开膀子大干时，当人们的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起来时，很难使人们认清真正的原因。于是接连不断的倒退成了唯一的出路。某些分裂势力的胜利只能助长另一些分裂势力的胃口。于是像试管一样，化学反应无控制地进

行，一直到产生一种新物质。各共和国除了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国防工业外，还要求有独立的货币、自己安全的边界、自己的海关和自己的国徽。

由于中央政府无力领导国家，就必须将权力分配给各地区强有力的领导人。很多人觉得这样做至少可以推迟灾难的来临。苏联总统所能做的仅仅是为自己和中央政府保留维持总统府及其它象征性的权力。而即使争取这些可怜巴巴的权力，中央政府也要奋力相拼，不择手段。这次摊牌地点选在新奥卡廖沃，它是革命前的一个庄园，离莫斯科约 21 英里。

庄园的一处位于莫斯科河畔的一片小松林高地上，那里建有数幢漂亮的楼房，原先属于帝俄的一个工业家所有。在庄园深处有一幢哥特式的石宅。十月革命后，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这里住过，据保安人员讲，其中包括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和契尔年科。后来戈尔巴乔夫把它用作他所谓的“个人家庭会晤”场所，他曾在此接待过罗纳尔德·里根和其他一些西方首脑。

在更靠近公路的地方有一座两层楼的招待所，只有一间办公室和一间卧室，但却有好几个大餐厅。在密封和有暖气设备的阳台上，也摆着许多桌子能坐七八十人。为起草新《联盟条约》的联邦委员会会议定于在这个招待所的二楼召开。

会议组织者认为，新奥卡廖沃将作为新思维的成果，作为在原帝俄的废墟上以民主方式建立新社会的见证而永垂史册。他们估计条约会使人想起至今还记忆犹新和津津乐道的“戴维营协议”。

1991 年初，成立了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工作组，开始起草新《联盟条约》，为首的是苏联科学院副院长 V·库德里亚夫

采夫院士和总统的两名代表——T·列文科和G·沙赫纳扎罗夫。这是一项艰苦而长期的任务，来自各共和国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法学家都参加了工作。初稿完成后，需要更高层的政治领导进一步研究，也需要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共同讨论。于是戈尔巴乔夫决定把他们都集中到这个庄园来。

那时，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维护我们的联盟。1990年底，我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命运和戈尔巴乔夫进行一次坦率的谈话。这种面对面交谈的机会越来越少。他不愿意谈令人不快的话题，尽力避免这种“尴尬的”谈话。但这是最重要的话题。这个问题我过去经常提及，只是没有这一次如此强调罢了。其实，自从1988年以来，国家结构中已出现严重的磨擦，某些加盟共和国出现了分离倾向。在许多作家、院士和其他知识分子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出离异的苗头。后来在讨论国家统一的问题时，政治家的言论中也流露出这种倾向。乌克兰有几位老友对我说，对外高加索、摩尔达维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代表的激进情绪不必担忧，但乌克兰民族主义情绪一旦抬头麻烦就大了，那将意味着苏联的末日。这种看法对我来说难以设想。多少年来在为共同事业、为我们祖国的战斗中结下了深厚友谊的乌克兰弟兄们难道会出卖我们的联盟？

在那个时候，关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裂的任何说法对我来说完全是异教邪说。但我不知道有些派别已私下定下决心，非把苏联推向解体不可。波罗的海沿岸的几个共和国则完全是另一码事。他们一直觉得自己属于西方，苏维埃政权通过集体行动在那里建立工业和基础设施，其中道路大都是按飞机跑道设计的。

这样，我坐在总统办公室，洗耳恭听总统关于联盟前途的宏论。对我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与总统能否合作取决于此。我来他这里工作并不是沽名钓誉（这之中没有什么荣誉问题），也不是为了多挣钱；我只有一个目的——帮助我的祖国克服困难，把她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以不辜负国民的希望。戈尔巴乔夫知道我这种信念。在我看来，也正因为如此，他给我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苏联将继续存在。你刚才提到苏联瓦解会对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是对的；但是你没有看到国家分裂会导致政治和社会大灾难。工厂的所有制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我们的国土怎么办？边界还要重新划定吗？如今有几千万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住在本民族聚居区之外，你想过他们吗？来一个民族大迁移怎么得了？还有立陶宛，那里的克莱佩达属于我们，可是还有些地区原来属于波兰。”

总统接着列举了高加索和中亚的共和国、州和边疆区内可能引起冲突的地区。他以乐观的语气最后说：“只要我还是苏联总统，我就不允许国家毁灭。正因为如此，宪法规定了对抗鲁莽决定的措施。还有经济问题，有些共和国如果没有石油、天然气或其它燃料，看他们日子可怎么过？一旦切断他们的生命线，又减少补贴，他们连半年也维持不了。我在爱沙尼亚时就谈过贸易平衡问题，解释了现在谁养活谁的问题。这一点你可以从日常生活看出来。还有一点：爱沙尼亚并不是靠强大的俄罗斯而得以生存的唯一地区。因此你不必为此担忧，不要紧张。”

“我不反对行使主权，”我回答说，“但是我对当前形势感到震惊，因为我能看出民族冲突将会带来什么危害。正因为这样，我不能参与国家的分裂，在这方面我不能当您的助手。”

我对‘文明分离’的可行性也抱怀疑态度。”

“你在说什么呢？我刚才已对你讲了：苏联将继续存在。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立场是坚定的。”

谈话不愉快地结束了，总统差一点儿发起脾气来。跟别人谈话时他常常发火，指责对方，扣上各种帽子：沙文主义、帝国野心等等。

很难说戈尔巴乔夫这番话是真心诚意呢，还是为其真实意图打掩护？想必他已经意识到，所有人都看得出他在节节败退，从而使苏联越来越接近崩溃。尽管他作出许多承诺，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共和国还是违背宪法规定并且未经正式照会便脱离联盟，从而给苏联的经济和防务体系打开一个缺口。更重要的是如下这一事实：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不被这些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波罗的海人当成人民，从而惨遭抛弃。

在我与戈尔巴乔夫这次谈话到苏联解体前的一段时间里还发生一件事：维尔纽斯。我不知道总统对这次行动过问多少，但显然他对事件的发展一清二楚。就是在此期间，他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起草方案，准备在全国或在某一地区宣布紧急状态。此举旨在维护全苏联盟还是避免中央政府的垮台不得而知，但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后一种解释可能性更大。

联邦委员会会议订于1991年5月24日召开，此会将决定国家的命运。会前准备工作正紧张进行。来自苏联和各自治共和国的委员们已经到达，各共和国的代表们在温暖的阳光下在庄园空地上散步，等候最高领导的到来。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代表自己安排车辆，已然到达。然后苏联总统也来了。大家登上二楼小会议室。水晶吊灯、精美的

家具和地毯、高雅隔板的墙壁营造出一流的工作环境，但并不很实用。会议桌很大，坐50人都很宽松，但音响效果不佳，天花板太低，光线也分散。大家坐下来，戈尔巴乔夫坐在大会议桌一端的小桌前，那是专为会议主席准备的位置。卢基扬诺夫在其右，帕夫洛夫在其左，然后是叶利钦、尼古拉·杰缅捷伊、纳扎尔巴耶夫和其他共和国领导人（按苏联宪法的排序），原来的自治共和国领导人坐在会议桌的远端。

会议正式开始。总统建议会议讨论有关新联盟条约的一系列问题：签约国的地位，组成新联盟的原则，新联盟最高机构，以及税收和财产交割等。条约草案中的这些主要问题在联邦委员会过去的会议上一直争论不休。

条约草案建议新联盟采用“主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名称，以保留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СССР”这个缩写形式（但把苏维埃一词换成了主权一词，这两个字的字头都是C——译者注）。目前的联盟机构予以保留，以使中央有必要的机构管理主要经济部门。戈尔巴乔夫在讨论时首先发言。他说已收到关于某些实质性问题的建议，现在要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把工作继续进行下去。俄罗斯联邦的立场至关重要，因此每人都洗耳恭听叶利钦的发言。他的观点是：条约草案需要充分讨论，不过首先联盟名称应该是“主权国家联盟”；中央政府如何构成？苏联总统实施管理要拥有什么资源？这些问题统统按共和国的意愿而定；应将权力尽量交给地方政府。他认为，只有解决财产和税收问题后，才有可能签订条约。每一个主权国家可在自己权限范围内征收税款，然后上交一定的必要的数目给中央政府。这个条约一开始应由构成联盟的共和国签署。

乌克兰也采取了同俄罗斯一样的强硬立场。

与会者认识到：签署《联盟条约》并非易事。很多原来的自治共和国领导人达成协议：以主权国家的身份签订条约。鞑靼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M·沙伊梅夫发言时，强调共和国只有作为独立的整体签字，才能接受这个条约。“我喜欢俄罗斯维护自己主权的样子。”他说，“但是，鞑靼斯坦也在经历同样的过程，我们也绝不会放弃主权。如果我们不能坚持这个原则，人民就不会理解，就会义愤。还有经济问题。为什么化工和军工要转交给俄罗斯管辖呢？有些部门应该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

从第一次会议开始，像这样的言论就使本已不稳的形势更加动荡，辩论的口气越来越尖刻。苏联总统建议对草案继续加工，以缩小分歧。会议暂时休会。

然后，所有与会者应邀出席晚宴。在玻璃罩内的阳台上，餐桌已经摆好，服务员送上丰富可口的饭菜。没有什么仪式。酒是伏特加和白兰地。戈尔巴乔夫坐在中央，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中央政府及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领导人同桌。一顿美餐和几杯美酒下肚，敌对情绪通常会缓和下来。本来在谈判桌上分歧很大的势不两立的双方如今可以互相妥协，达成协议。话题往往转到一般性内容，中间穿插幽默和祝酒。凡辩论到不可开交之时，戈尔巴乔夫便决定休会，然后把大家召集到餐桌周围。但是，如果他企图用这个办法使《联盟条约》得以生效，那就是自欺欺人。因为待会议复会时，每个人又回到原来的立场。

1991年6月3日，联邦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继续努力说服各共和国代表调整自己的立场。但这很不容易。戈尔巴乔夫建议，大家对条约草案逐项研究，找到各方都同意的表述语言，然后逐页签署。这个建议遭到反对。俄罗斯联邦强

调必须讨论实质性问题，于是大家重新回到上次的议题：联盟名称、共和国的主权、财产。在草案的第一页，只有第二、第四两段得以通过。大约有 40 位共和国领导人出席会议，各有各的观点，各有各的要求，各有各的套路。不同委员对草案提出不同问题，彼此争论不休，都达不成协议。在实质性问题，谁也不准备让步。会议在午夜后才结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6 月 17 日下午 3 时，联邦委员会全体委员在新奥卡廖沃再次开会。开始有人建议对条约草案逐段审议，很快便被否决。原有的自治共和国领导人反对对他们权利的任何限制。他们认为自己是主权共和国，并要求在起草条约时这样看待他们。正如北奥塞吉亚的代表所说：“否则的话，让九个加盟共和国签订条约吧！我们干脆打道回府。”

为缓和紧张气氛，于是宣布休息。后来的辩论进行得比较平静，但没有谁作出实质性让步。苏联将面临这样一种局面：构成原苏联的 15 个加盟共和国将被 30 个主权国家代替，包括俄罗斯联邦范围内的自治共和国。俄罗斯联邦领导人发现自己好像一个农夫，眼睁睁地看着破烂不堪的粮袋中一粒粒米漏出来，感到前景不妙。于是新一轮讨价还价重新开始，直到有人建议休会。

7 月 23 日下午 2 时会议再度开会。总统面色阴沉。形势一天天恶化，政治激情空前高涨，戈尔巴乔夫受到舆论界越来越尖锐的批评。左派、右派、同事、敌手都批评他。《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题为“致俄罗斯人民”的文章，由反对戈尔巴乔夫政策的一些政界知名人士和公民签署。此类声明以前也曾见诸报刊，但这一次签名者包括尤里·邦达列夫和奥列格·巴克拉诺夫，后者是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会议主持人的不安情绪影响了与会人员。联盟成员的问题经两个半小时的辩论仍无结果。那天必须解决的主要议题是向中央政府交税的问题。叶利钦坚持固定的税额，并应经过共和国政府上交；而戈尔巴乔夫主张由中央政府估价每个企业应交的税款并直接征收。“除非这一条款写进条约，否则我不如回家。”戈尔巴乔夫说着就收拾文件准备离去。他事先就准备走这一着棋，以便向与会者施加压力。叶利钦不买帐，他说：“不要强迫我们在您缺席的情况下决定此事。”

戈尔巴乔夫十分尴尬，不知所措。离开会场会十分可笑，而留下来也很困难，而且政治上会产生致命的后果。身居高位的他竟耍这种小把戏，谁还拿他当真？很明显，他的思想准备不足，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已发生变化。时间一秒秒过去，大家静观他如何行动。如今他对俄罗斯领导人的反唇相讥作出义愤的反应也为时已晚。戈尔巴乔夫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宣布休息，把自己所有希望寄托在晚餐上。

晚餐时达成协议：叶利钦、卢基扬诺夫、帕夫洛夫和杰缅捷伊四人最后敲定这一条款的措辞。

还有很多有争议的问题有待解决，谁也说不准国家、经济、军队的前途如何。中央政府还能干些什么呢？它能把各共和国联结成原来苏联那样吗？已有几个共和国退出辩论，并拒绝签署《联盟条约》。除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共和国及摩尔达维亚、格鲁吉亚之外，如今乌克兰也不愿签字。俄罗斯境内原有的自治共和国现在对独立谈得更多，更坚决。巴什基尔和雅库特已效仿鞑靼斯坦的作法，卡累利阿和车臣—印古什也提出同样要求，而且语气更强硬。类似问题在布里亚特、图瓦和戈尔诺—阿尔泰等自治州也展开了讨论。主张建立一个统一联盟的代表发现条约草案中有很多提法欠妥。例如，它

根本没有提“联邦”，甚至不提“邦联”。俄罗斯和乌克兰不想让自己境内的企业直接向中央政府交税，而要通过他们，而且中央政府必须事先说明用这些钱去干什么。这样，军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政府其它部门的预算都要公布于众。大部分工农业设施（包括与防务有关的设施），还有土地和资源都要置于共和国的管辖之下。

到8月中旬，原来的15个加盟共和国中，只有8个愿意签署条约。其余的共和国或明确拒绝或表示等一等再说。俄罗斯联邦的原有自治共和国有些也未能签署条约。

部长会议闻讯十分激动。在一次会议上，有些人对签署这一条约是否明智提出质疑，认为它会导致联盟分裂、国家瓦解。最高苏维埃也是这种情绪。卢基扬诺夫一贯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条约的签署不仅意味着中央政府的解体，而且意味着人民代表的解散和整个议会制的废弃。很多职能部门，如政府各部委都对签约的前景表示不安。

专家们认为，条约对原苏联是一种死亡威胁，即使仅由几个共和国签约也意味着一个新的政治实体诞生，亦即取消了原苏联的合法地位。由于原实体已不复存在，没有签约的那些共和国自然也会把自己置于苏联之外。

对于反对苏联解体的人士来说，事态的这种发展使人不安。他们坚信，这种后果会使经济财政破产，损坏武装部队和其它经济政治机构，破坏我们共同的文化，恶化民族关系。就我所知，1991年8月间力图防止国家崩溃的那些人的唯一目的就是避免国家走这条路，就是使社会避免那样可能造成的后果，包括无辜百姓的流血牺牲。今天，原苏联很多地区都发生着流血冲突，而且愈演愈烈。

第九章 执政党的分裂

今天是星期六，允许我洗澡。小窗户开了，看守厉声高叫：“洗澡时间到了，做好准备！”其实大家早就做了准备。床单枕套已拿出，又发了肥皂，只等来人把我们带去。十分钟后，我们听到命令：“好，出发！”押送我们下楼洗澡的人对我们的态度不同，有的有同情心，有的很冷漠。洗澡其实是淋浴，只有四个喷头，如果有水的话，也是冷热不一。看守宣布只给我们 20 分钟。澡堂热气弥漫，我们赶快洗澡兼洗内衣。澡堂和更衣室又脏又乱，但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是有热水，可以暖暖身。二三十分钟后，我们又被押回，人和衣服都还没有洗好。楼梯很陡，我爬上去很吃力。七点钟吃饭，然后准备睡觉。我害怕黑夜，那时你只能孤身独思，回顾自己的过去。

我从记忆深处挖掘出很多细节，然后按因果逻辑将它们排列起来。

戈尔巴乔夫心情好时，有时会轻声背诵诗篇。他最喜欢的诗人是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有一次他吹嘘说，上学时每逢重大节日他都登台朗诵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篇，很多都可以背下来。但在同事面前，他只是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这首诗里反复引用“只有党不会出卖我”这一句，一面意味深长地看着大家。

党确实忠实于他；然而党却被自己的领导人所出卖和抛弃。

正准备庆祝自己百年诞辰的党已不复存在！我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一事实：使她声名狼藉、使她斗志涣散、使她组织解体没有花多少时间。此前一个月，我还认为没有谁能预言，苏联共产党会如此迅速地灭亡。她是世界上最大的党，70年来作为执政党，领导着一个大国取得惊人的成就，深受人民的爱戴。

戈尔巴乔夫显然被1991年8月事件吓倒，很快放弃了总书记职务，不再与党沾边。苏联共产党在戈尔巴乔夫的纵容下，在他的参与下，最终被解散了。如果他能表现出一些勇气和自制力，这些本可以不发生。尽管党内发生动乱，几百万共产党员自始至终还是忠于总书记的。尽管总书记的所作所为（或者说“无所作为”）使党员怀疑、愤怒或迷惘，大部分党的组织还是支持他的。当然，离心倾向也很明显，戈尔巴乔夫不会注意不到。

到最后，戈尔巴乔夫开始害怕党中央开会，害怕与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坦诚相见。党中央委员、州和边疆区党委书记遇到书记处书记或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时，总会不解地问：“怎么回事？党中央机关为什么不工作了？我们已经和中央失去联系。戈尔巴乔夫一直在回避我们，拒绝回答党向何处去，最

重要的是，对于国家面临的问题无所作为。”

对于党的工作、党的威望来说，总书记的影响自然至关重要。但是，公正地说，应该指出，如果党没有挑选这样一位领导，如果党自身没有处于如此严重的困境，即使是戈尔巴乔夫也没有能力这样彻底地摧毁它。

我对党的各级组织、尤其是最高层的表现进行了分析，越来越感到党内很多问题是不可避免的。造成这种局势的因素很多，其中主要有两点：一是党的领导人的智力低下；二是在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同主张和实践方面缺乏任何竞争。

一开始，问题出在最高领导丧失权威。列宁受过良好教育，具有多方面杰出的才能，他是雄辩家、理论家，谙熟政治斗争的战略和战术。他的接班人则是一位素质不那么杰出的政治家。然而，斯大林虽不能言善辩，但无疑还有深厚的理论基础，阅历丰富，组织能力很强。遗憾的是，他成为不以法治为基础的体制走向极端的象征，给党留下不可愈合的疮疤。他的继任者赫鲁晓夫虽有天赋，但未受过高等教育，理论和思想水平都很一般。他的文字功底很差，决议文本上都有他的很多错误，有时连同事的姓名都拼错。

我看过斯大林亲手写的信件、文章和决议。他对众多决议文本所作的精辟修改显然是一个老练政治家的手笔，语言运用自如。他书房中不少书籍留有他的很多批注，看得出涉猎很广，不但熟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且对持敌对观点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史学家的作品也很清楚。我也看过赫鲁晓夫起草的一些决议。我的印象是：它们出自未受过良好教育者的手笔，此人不适合做这种工作。他口述给速记员的材料确实有趣，语汇丰富，带着浓厚的乡土气息，但大都不

宜发表。我记得曾编辑过他讲话的文字记录，以供报刊发表，那真是件头疼的事。

勃列日涅夫的上台并未明显提高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智力形象。任何学者如果想从档案中找到他的自传著作《小地》和《复苏》，恐怕是白费功夫。他从不动笔，不管是写文件还是写小说。党、他的同事、我想还有人民大众，对此十分清楚。人们所以原谅他，是因为他为人温和大度，他进行社会实验无疑出于为人民造福的真诚愿望；当然，与此同时，他也允许官僚机构捞取好处，因为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安德罗波夫像一缕阳光，使这阴沉的天空闪亮，可惜瞬间即逝。他无疑极有天赋，受过高等教育，素质很高，可惜任期太短，很难有所作为。他的继任者是契尔年科，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可能提高党领导素质的品格。最后一棒交给了戈尔巴乔夫，他能力强，受过良好的教育。作为理论家，他的最高成就可用《新思维》一书代表（也许还有未发表的其它文稿）。专家们最后将集中研究他的报告、文章、对记者谈话等。这些当然值得研究，但要记住：它们往往经过了编辑的集体努力，从原稿中涂掉了许多他的重要想法。纵观几位总书记，除智力方面一代不如一代，还有一种倾向，就是年纪偏大，没有个性。这就是后几任（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显得鹤立鸡群的缘故。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在政治局委员和党的其他高级官员中，无疑有才华出众之人，但他们的影响很小。

命运注定，智力一般还不是党的唯一缺陷。党从成立那天起，就一直有不同意见的冲突。它曾与机会主义者、异端分子、分裂主义小集团作过斗争，如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以及其它实际存在或幻想存在的反对党的路线的敌对分

子。但是，党没有与高层中的腐败、贪婪作过斗争，这是党的历史上有喜有悲的几页。欺诈病毒严重地侵蚀着党的健康肌体，破坏了它的稳定。一些州和边疆区委书记、还有中央委员，涉嫌各种不正当活动。根据道德时尚，给高级官员（包括总书记）送礼并没有什么过错。在全国性节日前夕，负责联络的官员忙于从南方地区向中央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运送大包小包的礼品，腿都跑断了。这种风气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发展到顶峰。安德罗波夫时期有所收敛，但劣根未除。

为防止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有人提出给总书记送贵重礼品（包括国外送来的）的问题，也给每个代表发点什么东西以堵他们的嘴。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是电视机或手表，戈尔巴乔夫时代就没有那么贵重了。受礼者很少想到应上交国库。据我所知，安德罗波夫在这个问题上过得硬。

戈尔巴乔夫和赖莎就是另一码事了。开始时，赖莎把部分礼品上交，报界给予简短述评，后来便不提了。总书记开始从各种基金会收到巨额奖金，《新思维》和其它著作的稿酬以硬通货的形式源源不断地流入他的银行帐户。奖金名目繁多，需派特使前去领受。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这些钱不自动转入国家银行，由国家给戈尔巴乔夫钱呢？除硬通货外，他还收到金银或铝质奖章，还有名贵金属制成的收藏币。据克鲁奇纳讲，这些都没有上交国库。

有件事一直令我不解，它涉及到十万美元。戈尔巴乔夫访日结束，并在韩国一个岛上同卢泰愚总统会晤之后，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据他自己说，里面装有十万美元。“卢泰愚给的。”他说，没有更多的解释，“看看我们怎么花。”

我至今还是想不通，刚刚与苏联建交的韩国领导人为什

么给一个超级大国的总统十万美元呢？而且只有一面之交。南韩人习惯怎样做生意是他们自己的事，但戈尔巴乔夫怎么就把钱收下了呢？做了什么交易呢？既然收下，又为什么不立即上交国库呢？而当我和我的助手已起草文件建议把这笔钱转交给布良斯克的一所儿童医院时，为什么他压了六个月不批呢？等着这件事变成丑闻吗？

这种行为意味着什么？令人不安。且不用想假定如何，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得到，就送礼之事提出的许多问题都石沉大海。群众纷纷来信，要求说明是谁出的钱给总统盖别墅？戈尔巴乔夫和赖莎收到的礼品如何处理了？苏联方面为此给对方什么回报？人们对戈尔巴乔夫的硬通货收入、他在国内外的存款、他的住宅和别墅、以及他的收支情况都很怀疑，议论纷纷。这些都无助于提高他自己的威信、他的下属的威信、以及整个党的威信。我们收到的国内外来信往往把这些敏感问题同我国对外关系联系起来。人们想知道，为什么苏联裁军的步子这么快，又是如此不均衡地裁军？为什么苏联如此匆忙地从原华沙条约成员国撤军，根本不考虑我国在那里的财产及其它权益？

党的问题不止是腐败。党之所以能取得政权，并经受住工业化和反希特勒的英勇卫国战争的考验，靠的是伟大的理想和使命感；而今在和平时期这一点就淡化了。有些人入党动机不纯，领导层老化，党开始脱离群众。被勃列日涅夫任命为党中央组织部长的伊凡·卡皮托诺夫对此起了关键作用。他规定工人阶级在党内要占一定比例，从而把学者、科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排除在党外，他应该对党组织的日益僵化负责。

卡皮托诺夫后来由利加乔夫接替，然后是拉祖莫夫斯基。

后两个都是戈尔巴乔夫的老友，总的说与他观点一致。利加乔夫很有主见，很有能力，不论贯彻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决议都全力以赴，只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原则就坚持。但他缺乏灵活性，有时他的权威受到批评。拉祖莫夫斯基更加优柔寡断，他在任职后期意识到自己无力改变党的现状，便辞职退休。戈尔巴乔夫也乐意他走。

任命一位新组织部长会给改革党的干部政策创造有利条件，但具体改变尚需时日。党内普遍有种情绪，认为党的一些高级官员已经蜕化变质，在公众心目中丧失了威信。后来，他们也开始不信任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曾企图改换党的高层领导，他作到了，而且并未就此止步。党的28次代表大会后，他更换了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但更换的标准并不都是正确的。政治局和书记处中有不少是他原来在共青团工作时的老相识或其它时期的同事。伊瓦什科当选为党的副总书记。这是个好人，讨人喜欢，可惜身患重病，没有机会展示自己作为政治领袖的才干。以前他教书，留下职业病，讲起话来给人以居高临下说教的感觉。奥列格·舍宁在党中央负责人事工作。他年轻，肯干，为人正派，组织能力强。遗憾的是他在党内、在中央、特别是在民众中的知名度不高。戈尔巴乔夫在共青团工作时的老友波里斯·普戈也是这样。A·扎索霍夫年轻时就认识戈尔巴乔夫。他为人随和，政治上灵活，通晓国际事务，但对于意识形态却一无所知。戈尔巴乔夫原打算让他负责意识形态部门，他本可以从此飞黄腾达。然而，他有自知之明，所以拒绝担当此任，这样做无疑是明智的。

作为掌管新闻部门的领导，P·卢钦斯基深感力不胜任，他自己也很苦恼。他不知道如何与新闻界人士谈话，对记者

一行也知之甚少。与此同时，一位名叫加林娜·谢苗诺娃的杰出编辑却负责党和其它组织的妇女运动。她是突击提拔进政治局的。在一次中央全会休息时，戈尔巴乔夫把她叫去，告诉她他准备让她当政治局委员。她大吃一惊。此后一些典型例子，都表明某某人进入党的高层领导使中央委员会十分惊奇，因为事先没有跟他们打招呼。

在党的第28次代表大会上，所有加盟共和国党委第一书记都进入政治局，更替之快，连政治局委员们也互相询问：“此人何许人也？”把书记们（其中两位来自爱沙尼亚）引进政治局的作法非但未加强、反而削弱了政治局，使其工作停留在一般事务上。正因为如此，政治局的决议变得毫无意义，政治局会议也逐渐减少，最后干脆取消了。从加盟共和国来的很多新政治局委员不了解中央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也不参加有关会议。中央和地方的联系就是这种状况。

所有这些都是总书记的既定方针。有主见的委员他都一一罢免，专门起用寡言少语、唯唯诺诺之人。这样，中央委员会的组织能力下降。频繁的人事变动把大批平庸之辈提拔到领导岗位，新人无力承担这种重要工作，使党组织的战斗力的大受影响。这是总书记的严重失误，如果不是他的有意举措的话。

中央的其它失误还包括任命一些在党内和社会上知名度很小的人担任要职。列宁很明智，他重用聪明能干之人，甚至包括一些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并不赞同中央策略的人。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列夫·加米涅夫、列昂·托洛茨基、尼古拉·布哈林和其他党的高级领导人虽然性格、能力各异，但都有真才实学，在党内、国内都享有盛名。戈尔巴乔夫本应逐步地提拔新手，帮助他们适应新环境，提高他们的权威。雅

科夫列夫肯定会赞成这种作法。但戈尔巴乔夫妒忌心强，不会帮助任何同事提高权威。

对世界上最大政党之一的工作作出评价时，应该考虑到上述事实。同样重要的是：选拔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不应基于自己喜不喜欢，对自己是否忠诚，或以前是不是同事。那种作法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极其错误的。对主子感恩戴德之人很难自律。到头来，不论是戈尔巴乔夫共青团时期的老友，还是因为唯唯诺诺而被重用之人都没有能挽救他。当然，要做到任人唯贤，自己首先必须堂堂正正。不过，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最后，从党的领导机构近年的经历还可以得出另一结论：高层领导人的频繁更换是极其危险的。不能让他们像流星一样在政坛上一闪而过，那样有损党的威信。必须尽一切努力使离任领导者的形象不受玷污。总书记及其他领导人越是贬低前任，自己的形象就越受到损害。凡事都有个度。当然，我的这些看法只是探讨性的，因为我对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接触有限，对中央其它部门了解更少。总的来说，我的观察证明是正确的，不过我并不因此感到高兴。

党及其领导机构就是这样逐步名誉扫地、大难临头。而戈尔巴乔夫未能把党的力量集中起来，克服长期存在的弊端。实际上，他加速了党的灭亡。千百万诚实的共产党员信任他，把他选为自己的领袖。而掌握全党命运的总书记却第一个站出来表明与党脱离关系。他公开抛弃和背叛党，他是个懦夫。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裁决。不管国家的前途如何（我希望她走向民主），人民决不会宽恕面临危险时就把他们抛弃的领导人。这些人就像航船即将沉没时不管船员的死活而只身弃船而逃的船长，就像率先逃离战场的指挥官。

人都有维护自身生存的本性，这本不足为奇。总书记不能把日趋分崩离析的中央委员会团结成一个整体来实施建设性的决策。凡有独立头脑的人与他都合不来，只好一走了之。总书记最后把自己封闭起来。他意识到，总书记当不长了。党中央的组成和全党的情绪都使他感到厌烦。他自己告诉我，7月底时他曾和雅科夫列夫议论过有无可能把党内的左翼民主派拉出来，与“民主改革运动”合并，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新党。这样做无异于分裂党。

戈尔巴乔夫这样想也不奇怪。他已经爬到权力顶峰，既然对付不了整个党，如今他愿意与其中一部分共事。他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公开，不过这并没有保住他的威望，因为阴谋活动最终都没有好下场。失去党的支持仅四个月后，戈尔巴乔夫又被剥夺了总统权力，被赶出政治舞台。当然，他可以像西方退休人士那样，到国外跑跑，也可以谈论已往的总书记、共产党和苏联的光辉岁月。

与其威望下跌同时出现的是政权的解体和经济的崩溃。工业企业间的关系破裂，一次煤矿工人的大罢工使钢铁等部门（包括大部分机器制造业）的生产瘫痪。1991年，国民生产总值下降10%以上，国家收入和生产率也都下降。所有这些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困难，物价上涨，失业和半失业人数增加。由于财经危机，很多共和国采取自己顾自己的措施，利用关税或其它手段将邻国拒之门外。

戈尔巴乔夫肯定意识到大难临头，甚至还谈及此事，但他没有拿出任何可行的解决办法，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在1991年于党中央办公楼五层大理石大厅里举行的俄罗斯共产党州委区委书记会议上，他讲了一番反映现实情况的话。他首先对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作了估价，然后从宏观上

谈起国内形势：

“让我先说说农业吧。农业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主要原因是经济链条遭到破坏，大家都转到易货买卖。我们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建起的体制如今几个星期就土崩瓦解。工农业生产下降，协议和契约没有得到履行，很多企业擅自停止签约在合作基础上供应商品。这也损害了外贸，影响到硬通货的收入。”

与会的书记们对农业的困境深感不安，他们很清楚，食品短缺会引起大麻烦。总书记的讲话并没有使他们放心。1991年收成不如头一年，而且不会再有工人、军队和学生前去帮助收割。因此必须尽一切努力把地里成熟的庄稼收进来。即使这样，全国还面临损失1/3收成的可能。超过这个限度就极其危险。

总书记在讲话中也强调必须使工业继续运行：

“罢工引起更大的混乱。原煤生产的下降带来严重的后果，影响到焦炭、金属和其它重要原料的生产。以V·多古日耶夫为首的委员会正制订规划，旨在使经济形势得到控制。如果出现障碍，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实行强硬的紧急措施，希望你们给予支持。”

“造成这种局面，经济困难只是原因之一；反对派一直在煽动群众，企图破坏社会的稳定，可能造成局面失控。当然，4月份实施的提价给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些困难，但是我们必须度过这些难关。”

“财政形势特别使人担忧。加盟共和国的行为破坏性很大，俄罗斯已停止了向国家财政缴税。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们将冻结他们的银行存款，罢免俄罗斯联邦财政部长。”

书记们都意识到，总统仍不准备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扭

转严峻的形势，便要求他采取行动。他们对他讲，他们听得够多了，特别是听他的讲话。如今他们要求采取具体的、有效的措施来扭转局面。他们督促他履行总统的职责。

戈尔巴乔夫强作辩解，企图把皮球踢回去。“应该采取行动的是你们。”他说，“为什么把一切推给中央政府呢？行动起来，做好你们的工作，没有人妨碍你们嘛！”这就是戈尔巴乔夫对地方官员的老生常谈。

经济实权已从中央政府转移到共和国，后者正忙于强调各自的主权，选举各自的总统。他们作出的决议只反映自己的利益，根本不管联盟部长会议的决议和苏联总统的法令。各共和国领导人急于维护主权，留下自己的足迹，他们对抗中央，彼此之间也达不成谅解。苏联财政部长承认，1991年上半年，预算短缺500亿卢布，新发行纸币280亿卢布。俄罗斯联邦根本就没有提出预算。现在一切都靠国家的黄金和其它贵重金属和珠宝的储备来维持。要走出这个死胡同，必须采取果断措施。经济学家已起草建议，准备用300天到500天过渡到市场经济，但总统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实际上，他是想随波逐流，在泥潭里越陷越深，还把偌大的一个国家拖进去。当年有人对列宁说，俄国没有任何势力和政党能改变现状时，列宁斩钉截铁地说：“有这样的党！”

当时的共产党是一个严肃的、有权威的政党，它担起改革的重任，使苏联成为世界大国。而到1991年9月，人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地球1/6的地区，这个党、这个国家都已不复存在。

跋 你为我们祖国都干了什么？

1985年3月11日，时年54岁零9天的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在那个阴冷的一天，在世界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国度里，他的权力在党内、国内达到了顶峰。他像一个画家站在一张白纸面前，有大展宏图的机会。他可以将自己设想的任何方案付诸实施——只要老百姓能从中受益。他有独特的魅力，谈吐爽快，说服力强。苏联人民几十年好容易盼来了可以寄予厚望的领袖！

六年之后，他从总统和总书记的位子上退下来，失去了权力，失去了威望，也失去了大多数苏联人民的尊敬。更确切地说，他是作为失败者被迫下台，因为他失掉了国家，抛弃了把他推到权力顶峰的党。对于这六年，有些人说是盼来黎明，把光明重新带回伟大的国度；有些人则说是一场悲剧，它导致苏联的解体，带来经济崩溃，使人民饥寒交迫。在美国看来，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和六年执政的结果是西方对“邪恶帝国”的胜利；而在我国，人们把它看作民族灾难，是共和国的解体，是对经济、科学和社会道德的大破坏，是贫困、饥饿和兄弟间残杀的开始。

那么，到底应该怎样估价“改革”和戈尔巴乔夫时代呢？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冲破阻力、走入世界文明，还是表明一种体制的无能和投降，经济破产，几十年建起的道德规范的丧失呢？时间将给这些问题作出圆满的答案，但是现在就可以作出某些显而易见的结论：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改革带来一些积极成果（尤其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当然也有严重的消极后果。产生积极成果的最初行动之一是透彻分析了我国社会的现状以及产生经济、财政和社会问题的根源。这些分析是实行激进改革的基础。其它值得一提的成绩包括：民主化决策，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公开性。还可以视为积极成果的是戈尔巴乔夫外交政策的某些方面，如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遏制军备竞赛。

如果改革的理论得到更充分的研究，贯彻得更始终如一，与其它的政治和经济决策更好地融合在一起，它的成效本可以更为显著。改革在不需要多少创造性的领域最为成功这一事实很说明问题。经济领域则完全是另一码事，提高生产率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措施无一取得积极效果。这一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在社会民主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改革政策的制定有些心血来潮，不能始终如一，贯彻又不力，因此把事情弄得更糟，加深了社会矛盾。

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社会和经济所作的值得称道的分析使人们对我国现状有了更充分的理解，由此得出一些实事求是的结论和摆脱后期国家危机的出路。过去的官方统计数字只为取悦于领导，报喜不报忧，因此对经济、财政、文化、科学和教育现状的研究至为重要。

来自全国主要研究机构、苏联科学院和统计部门的专家、院士承担这次分析任务。阿贝尔·阿甘别吉扬、S·A·安奇

什金、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V·P·莫津和S·A·西塔良五位院士以及来自国家计委与其它一些部门的高级官员对原始资料加工处理。分析结论以备忘录形式报给总书记。结论表明，工农业危机和社会紧张形势即将来临，其原因是前任领导忽视社会及经济问题，未能及时采取措施扭转局面，随着形势的恶化，几十年积累下的弊端终于表面化。

人们本可以期待这种分析会产生大量材料，为社会各领域进行激进改革提供基础。然而由此产生的结论却缺乏远见，思想偏激，因而不完全正确。备忘录主要被用来鞭挞过去的领导，作为勃列日涅夫、前政治局委员和前部长会议无能的证据。这些人的失误自然是评论的一个话题，但把一个严肃的分析报告变成皮鞭或秋后算帐的工具来使自己的前任声名狼藉也是错误的。报告的意义要大得多。它详尽地分析了苏联社会的现状，从而可能制订一系列纠正措施，进行经济预测，为改革、尤其是经济领域的激进改革提供理论基础。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和经济政策上摇摆不定，列入计划的改革项目一事无成，这一失误是其主要原因。另外，他没有向其他领导人解释这些分析，而愿意在演说中直接公布于众。

戈尔巴乔夫没有为他改变体制的大体思路提出理论根据，也没有明确激进改革如何划分阶段。这样，他发现自己无力处理日常事务，连很小的障碍也克服不了。但对失误他不检查自己的错误，而是怪罪别人没有采取有效行动。结果是政府领导人、工农业高级官员、苏维埃主席和党中央机关的频繁改组。六年间，政治局委员全部更换，部长会议主席换了三任，部长会议主席团的成员也几乎大换班。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也换了三任：葛罗米柯、戈尔巴乔夫和卢基扬诺夫。高层领导的频繁更迭是戈尔巴乔夫的重大失误，也给

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后果。

民主化和改革的进展使人民敢于说出自己对国家形势和党的政策的真实想法，并批评党对社会发展理论的一家之言。在这种思想大动乱中，很多富有朝气、勇于开拓的人士走到前台。一党专权的结束使众多政治派别为争取人心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竞争。如果我们的文化和民主传统扎根更深，如果没有某些领导人和其他人士极端主义的煽动，民主化和改革的进程还可能更好一些。民主进程有个良好开端，本应创造性地加以利用，作为促进文化、健全法制和团结全社会的手段，在改革的形势下我国本应按此方向发展。但是，在我看来，民主化被用来制造分裂，加剧不同政治派别间的对抗和个人间的相互攻击。

共产党是全社会组织最严密的力量，拥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军人和科技人员等各界代表。它发动起社会各领域的改革，也是能较顺利地将改革贯彻始终的唯一的组织力量，它的许多高级官员仍站在改革运动的最前沿。然而，党被弄得声名狼藉，而仅仅是因为过去的领导犯了错误，从而被排除在社会创造性进程之外。造成这种局面，戈尔巴乔夫是有责任的。他未能将全党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下，他在普通党员中的威信扫地，导致了整个党组织的毁灭。

军队也是这样。人民代表大会首次会议就开始对部队进行心理攻击，它持续了四年。结果，凡穿军装的人都受嘲弄和虐待，殴打军事人员（包括军官）的现象司空见惯。作为苏联总统和武装力量总司令的戈尔巴乔夫没有尽到保护军队的职责。实际上，他本人就害怕军队，不信任军队，挖空心思来削弱军队，破坏它的威信。对于国家安全委员会他也是这个态度，根本拒绝会见这一部门的人员。

戈尔巴乔夫上任不久便在作家、记者和科学院院士中失去影响。他的思路狭窄，却热衷于讲演、在电视上露面、在国内外出版著作；最主要的是优柔寡断使他在知识分子中失去支持者。有些知识分子对他完全失去兴趣，另一些人则成为他的政敌。

而当工人、农民、养老金领取者的生活水平开始下降时，戈尔巴乔夫便失去了整个人民大众的支持。当他初试改革时，他得到广泛的支持，而今苏联人民摒弃他。如果不是西方领导人和部分公众舆论支持他（他们记住了戈尔巴乔夫对欧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作出的无私的让步），他早就彻底孤立、四面楚歌了。

组成苏联、乃至整个世界大家庭的人民群众不会忘记戈尔巴乔夫当政的年代。不论历史朝什么方面演变，苏联人民的子子孙孙决不会纪念他。

几十年来，苏联人民把和平视为第一需要，他们愿意为此作出各种牺牲。他们期待的和平，只有通过均衡裁军才能实现。“新思维”在处理国家（尤其是核大国）之间的关系上，基本思路是世界是一个相互依赖的统一整体。根据这一思想，苏联共产党在其第27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裁军的主张。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主张，但要完全付诸实施，苏方就必须作出军队所称的“重大让步”。

90年代初，苏联的裁军已失去任何实际意义，因为国家已解体，随之陆军、防空体系、战略空军司令部和海军也相继解体。由于苏军从华约成员国撤军，这些国家部分领土就暴露于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打击之下。其它的问题还有苏军部队纪律涣散，指挥系统瘫痪，结果部队失控，大批军人开小差。独联体的一些新成员国把各自民族的军人召回去，成立

自己的国防军。就这样，国防关系的新思维，加上改革的其它措施，不管用意多么好，实际上都有效地破坏了国家的军事防御体系，也从而使布什总统得以大谈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

“冷战的胜利”一词远未反映出事变的全部真相，它不仅仅是一次胜利，而是已涣散的苏联军队的大溃败，是昔日强敌的精神崩溃。但这种失败并不是美国军事和科技力量、也不是其战略天才作用的结果，而是我国反对现政权的那些势力内部背叛的结果。

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上任以来，改革的思想，以及变革社会经济的愿望都是进步的；问题在于它们脱离社会实际，又缺乏扎实的理论和组织基础。例如，直到1989—1990年间才提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问题，而一提出就要求在很短时间内完成。这个规划无疑用心是好的，但它脱离实际，就像50年代中国著名的“大跃进”一样。

我们国家幅员辽阔，西起布格河，东至千岛群岛，南起泰梅尔半岛，北至库什卡。在这样大的一个国度，不顾各民族的传统习惯，企图一夜之间改变人们的心理，把他们都集结进市场经济的大熔炉里是不可能的。但戈尔巴乔夫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企图一下子跳出几十年形成的体制。结果，国家因充斥五花八门的理论和计划而不堪重负，开始出现裂缝，最终彻底解体。我国进行的一系列试验没有收到人民预期的奇效。须知不付出代价，奇迹是不会发生的。这里的问题是代价要多高？是人民饥饿、贫困、受苦受难吗？是民族冲突流血吗？是使子孙后代负债累累、任人驱使吗？

理论上的混乱、工作中的懈怠和组织的瘫痪加速了经济的崩溃。1990年，工农业产值和人民生活水平开始全面下降。

一些冶金和机器制造大企业倒闭，煤炭、石油等行业中工人罢工。农业形势也很严峻，饲料短缺，工业产品涨价，以及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前途未卜使牲口存栏头数及其生产率陡降。

相关工业企业间的供应链（有些位于原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地区）遭到灾难性的破坏，导致了经济的全面衰退。

经济每况愈下，而中央政府又无力控制局势，这就进一步激发了分裂主义活动，纷纷组成独立国家。民族冲突连绵不断，先是民族间仇恨、后是民族间战火在高加索、中亚和摩尔达维亚燃起。在其它很多共和国和俄罗斯的大片地区，民族关系也十分紧张。曾经在大片领土被占领的情况下而顶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艰苦，曾经历了冷战时期的破坏而坚如磐石的国家，而今落得个四分五裂的下场。

后果是严重的。成千上万说俄语的人从中亚、高加索、摩尔达维亚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共和国被排挤出来。几百年以来祖祖辈辈生活在亚美尼亚的阿塞拜疆人不得不逃亡，而成千上万的亚美尼亚人又离开了阿塞拜疆出外谋生。很难想象它给老百姓带来多少苦难。今天，无辜百姓血洒疆土。这种现象若发生在以前，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老百姓悲痛欲绝，又因惧怕内战的可怕前景而麻木，已经对老人和儿童惨死司空见惯，便把自己关在家里，对周围发生的事不闻不问。

不管戈尔巴乔夫的动机有多么好——这越来越值得怀疑——他的所作所为导致了一个昔日强国的倒台，工业瘫痪，犯罪率上升，出生率下降，生活水平下跌。

这种结果得到西方的高度赞赏，然而对于生活在一度称之为苏联的占全球 1/6 的土地上的同胞来讲则是极其痛苦的。对苏联社会各领域的改造，戈尔巴乔夫执行得很不得力，

很不果断，最后干脆背弃了它。对于劳苦大众来说，“重建”成了悲剧。人民不再奢望为世界文化和人类进步作出贡献，因为他们终日为生计忙碌。

出发点本是国富民强的改革计划最终导致工业乃至整个社会的毁灭，科技文教的败落，民族间的流血冲突。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据我看，主要原因在于戈尔巴乔夫的性格——他优柔寡断，一直恪守他在青少年时期形成的观念。从根本上讲，总书记是其时代的产物，是使他成长、最终成为第一号人物的体制的产物。一方面，他看到现存秩序的弊端并努力改造社会；但另一方面，他办起事来又脱离不了老的套路。尽管他高谈阔论民主化和公开性，本质上他还是狡猾、残忍和背信弃义的，不过不是斯大林、甚至不是勃列日涅夫那种型号，而是他们可怜的尾随者苏斯洛夫的模式。即使是苏斯洛夫，他也学得不太像。

这一结论可以从他的行动得到证实。戈尔巴乔夫一方面大谈民主，指责同事搞斯大林主义；另一方面却一人独揽党政大权。他个人主宰别人的命运：决定党中央和政治局的人选，根据个人的好恶指定加盟共和国、州、边疆区委第一书记。他一方面大谈集体决策、恪守一致的原则；另一方面却单独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不给持不同政见者发言的机会，清除前进道路上的对手。他一方面鼓吹公开性；另一方面却把政治局过去的情况和国内外形势的重大情况向党和人民甚至自己的同事保密。他威胁要撤换发表对自己不利的文章的报刊编辑，有几次也确实这样做了。总书记兼总统与外国领导人会谈，却不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或最高苏维埃通报会谈结果。他一方面呼吁保护司法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却指示总检察长

如何进行某项调查。他一方面反对用行政命令的手段管理经济；另一方面却对各部委严加控制，由中央给所有经济问题制定对策。

他一方面大谈必须向地方放权；另一方面却把无限权力集中在作为拥有千百万党员的大党的总书记手中。作为苏联总统和国家元首，他主持部长会议，不把部长会议主席放在眼里。他兼任武装力量总司令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独自直接控制着国家安全委员会、军工委员会、内务部、外交部和国防部。

戈尔巴乔夫一方面大谈必须精减决策机构；另一方面却扩充为自己服务的部门，并充分利用这些部门作为反对政敌的武器。他一方面把自己看成遵纪守法的典范；另一方面又不择手段地探听对手、同事和身边人员的一切情况，以此来控制他们。他一方面宣传生活简朴，并被普遍认为是反对特权的；但另一方面，他在剥夺下属福利的同时对自己却保留了所有福利，或完全免费或廉价供应，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腐败作风毫无二致。

他的这种双重标准还可以无限地列举下去，但仅从上述事例中，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改革的进程如此曲折艰难，为什么改革注定要失败。在意志薄弱、摇摆不定和胆小怕事者的领导下，社会怎能突然大规模地改变方向呢？人民需要目标明确、能把计划贯彻始终的领导人。生活毕竟不是舞台，即使是舞台，也不应该让小丑扮演指挥官。

我怎样也不会忘记一位中年妇女写给戈尔巴乔夫的一封信。这位妇女带着女儿和外孙女被迫逃离生活了几十年的中亚，她的不少亲友都埋葬在那里。

“亲爱的米沙，您为我们国家做了些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使您不满意呢？还是您想作为一个改革家永垂史册？我们已经绝望了，像野草一样，被撵得东奔西颠，没有立足之地，到处受到轻蔑和殴打。我们已经失去一切——朋友、财产、家园。请告诉我，我们怎么生活下去呢？为了维持三岁的外孙女和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不得不靠乞讨为生。如果您还有良心，为什么您让人民抛洒这样多的血泪？眼见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化为泡影！我们怎么办呢？我和我的子孙们将永远记住您和您的子孙们——您对我们太好啦，您对全国人民太好啦！”

苏联总统收到无数这样的来信。阅读这些信件使人感到恐惧和痛苦。信中描述人民被迫离开家园，流离失所。国家、经济、军队纷纷崩溃，几百年以来一直和睦相处的各民族如今刀枪相见。他们呼吁制止这种灾难，悲剧不能再演下去，形势不可每况愈下！

1991年8月，某些掌权的领导者，不为争权夺利，只恐百姓流血，为国家和平昌盛，力挽狂澜。但他们过于谨慎，过于正直，不愿使用强硬手段，更不愿违背人民的意愿。

70多年之前，正当苏维埃政权诞生之际，英国作家赫伯特·威尔斯说，他看见俄罗斯在阴影之中。历史是有反复的。如今，阴影再次笼罩着一个大国的辽阔土地，人民重新受难流血。俄罗斯还能作为大国重新崛起吗？我们这一代人还能看到我国赶上文明国家吗？现在还很难说。时间会给每件事一个合适的位置，对20世纪的众多事件作出裁决。这个世纪发生过大战、悲剧、胜利和失败，有光辉的成就、引人注目

跋 你为我们祖国都干了什么？

的科学发现、杰出的文化发展，也有人类大规模毁灭和令人心碎的神话。

在 20 世纪即将结束时，在这片欧亚大陆广阔的土地上发生了动乱和流血。还会重返安宁吗？或者这只是一次大动荡的序曲？只有时间才能给予回答。